

喇嘛殺人--西藏人流亡四十週年專書

林照真 著

作者簡介

林照真，台灣屏東人，政治大學哲學系、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畢業。曾從事電視工作二年，於中國時報服務近十二年，現為中國時報社會關懷小組召集人。著有《中國人的悲哀》、《覆滅部隊---日報白團在台密史》、《水的政治----宋楚瑜與台灣水利》、《最後的達賴喇嘛》等。

達賴喇嘛序

正如眾所週知，從一段時期以來，在中國的漢民族當中正出現一股關注當前西藏問題的新趨勢，來自台灣的新聞記者林照真女士就是其中之一。

她出於對西藏問題的特別關注，曾先後多次專程前來流亡藏人所在地——印度北方喜瑪諸爾邦的達蘭薩拉等地，通過對許多耆老的親身採訪，特別是那些曾經歷當代西藏歷史上重要的事件的當事人，透過對他們進行口述重建這段曾經被淹沒的歷史。同時也對西藏問題的總體情勢，特別是對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發生在西藏的許多事件的前因後果，以及種種真實情況做了深入了解。

林女士在了解西藏問題之諸多真實情況後，心有所動，並籍此為西藏人民抗暴起義四十週年紀念日著作。我對於林女士撰寫這本書而付出的重大心力和她的敬業精神表示由衷的贊賞。

一段時期以來，在中國或散居世界其他各國的許多漢族朋友們，通過對西藏問題的了解和研究，秉持公正的原則，對正義表現出的支持態度是特別值得讚賞的。鑒於廣大的中國漢族同胞們對西藏或西藏人民真實的歷史、現狀、以及其他諸方面進行了了解或認識是極為重要的，因此，本書的出版對於廣大中文世界的讀者加深對西藏問題之真相情況的了解必定會具有重要的意義。

展望未來，期望能在中文世界中，就中國與西藏間關係的歷史真實、現勢發展、西藏文明的恢復與宣揚等見到更多的作品與研討，相信對促進西藏與中國的相互了解與利益會有很大的幫助。當然，我們也期待能對目前在國內的和流亡國外的藏人之真實的現狀和所處的困境、我們的想法與願望、對未來的祈求以及為解決中藏間存在的沖突與誤解等方面問題，秉持公正超然的立場，提供有益的建議。

最後，謹向本書的作者和廣大的讀者表示衷心的問候，祈眾生幸福。

達賴喇嘛

一九九九年一月六日

（註：本文為西藏政府外交與新聞部翻譯）

自序

——林照真

我在這本書全部完稿後，才開始寫自序的部分，這時正好是達賴喇嘛為了要不要發表聲明回應江澤民的『兩條件』說，而弄得舉世關注的一刻。果然，達賴喇嘛強調『自治、而非獨立』的立場依然無法取得中國方面的信任，在四十年過去後，藏人流亡的命運無法扭轉，兩年來許多與流亡藏人接觸的經驗不時湧上心頭，自己似乎更能體會藏人在角落中的暗泣。

西藏，對一個處於熱帶台灣的記者而言，是一個遙遠的名字，這些地方我沒有去過，一九九八年二月我向中國政府申請到西藏的採訪計劃到現在還是石沉大海，雖然到不了拉薩，但我卻在印度、尼泊爾等異國地區發覺西藏人深深的絕望。有許多年輕一代的藏人和我一樣沒有親眼見過西藏，但我和他們不同，我畢竟站在台灣自己的土地上；西藏人不同，他們只是流亡者。

一九九七年初，達賴喇嘛訪問台灣在台掀起一陣『達賴喇嘛熱』，在這之前，我便因為要製作有關專題，得到報社的支持而到印度、尼泊爾等流亡藏人定居點去採訪，當時也有不少媒體記者啟程到印度採訪，好多台灣記者都成了流亡藏人社會的稀客。

在那時，藏人也親眼見識到台灣記者的厲害。有多次陪同台灣記者採訪的『西藏通訊』編輯達瓦才仁說，他看到有的台灣記者在採訪藏人悲慘的際遇時，難過得當場流淚；但也看到有的台灣記者故意穿上藏服，像個演員一樣採訪拍攝；也有記者在達賴喇嘛行經時，突然遞出麥克風搶問問題，嚇死了身邊的藏籍與印籍警衛人員；還有的便是像我們這一類的記者，到處問，什麼都想知道的記者。達瓦觀察的不錯，這些都是台灣記者的真實面貌。

藏人覺得更奇怪的是，他們的印像中台灣不大，但為何會有上百家的有線電視？而台灣的報紙也是這麼發達。他們常會問：『叫自由時報是否表示報紙就自由？』、『叫自立的報紙言論是否就獨立？』、『叫中國時報的是否就最中國？』面對這些有趣的問題我只得私下一一據實以告。

我記得第一次到流亡政府外交部去拜會時，很自然以自信的口吻自我介紹：『我是台灣第一大報的記者』時，外交部秘書長丹巴才仁一直在笑。我覺得很奇怪，問他為什麼笑，他告訴我：『你是第三個介紹自己是台灣第一大報的記者了。』原來，先我而至的聯合報和自由時報記者也都同樣這般自我介紹。

在台灣掀起達賴喇嘛狂熱時，走在達蘭薩拉街上都會碰到台灣的新聞同業，但從第一次熱熱鬧鬧的採訪過後，但現在仍沉浸在西藏領域中的記者卻已經不多了。只是，在達賴喇嘛熱潮沉寂後，現在的西藏問題卻因中藏對話可能展開，而進入一個關鍵的時刻。這時，反而更需要媒體記者居中扮演更多資訊交流、心情交換的角色。

觀察

我訪問過很多西藏人，其中西藏『青年會』資探秘書長央金卓嘎的那一次訪問至今叫我難忘。在達賴喇嘛已經放棄西藏獨立的立場後，央金卓嘎侃侃而談『青年會』所懷抱的西藏獨立思想，在她身上西藏婦女傳統服飾與穿著完全無法遮掩她獨特的藏人本色。央金卓嘎的英文很好，談吐不俗，看得出她在印度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即使她的獨特立場鮮明，也不會給人任何壓迫感。

在侃侃的談話中她的重點轉到實際現況上，她說到：『每天早晨醒來，我就想到自己是一個流亡者，想到沒有自己的祖國，沒有發言權，在這裡寄人籬下，自己的同胞都在受罪，想到這些就很傷心。』說時央金卓嘎的語氣由堅定轉為柔弱，且已忍不住飲泣、放聲痛哭，一旁連日來陪著我四處拜訪藏人的達瓦才仁也跟著哭紅了雙眼。他們二人的傷痛讓我感受到藏人內心深切又無助的絕望。

我只能在一旁，靜待悲傷的氣氛漸漸淡去，但在我離開青年會、回到台灣多年後，卻始終忘不了那一幕。我努力做一個冷靜的記者，雖然我能在現場克制住眼淚跟著放肆，但卻無法阻絕自己內心對藏人流亡命運的感歎。

藏人流亡的身影在黝黑膚色的印度人身邊流動，已經度過四十年流亡命運的西藏人，很多人都已經可以說一口流利的印地語，也有些經濟條件較好的西藏人已悄悄入了印度籍、尼泊爾籍，成為異國公民，但是，多數藏人還是做著有一天回到西藏的夢。

走在達蘭薩拉碎石路上，路旁擴音機響起：『中國軍隊侵略我們的家鄉，我們一定要返回西藏』的歌，這首歌不知唱了多少年了，但西藏人還是回不去。擴音機也同樣響起達賴喇嘛的錄音帶，達賴喇嘛說，西藏人不是野蠻落後的民族，但也不是很好。很多西藏人都有邊走路邊唱歌的習慣，藍藍的天空一群烏鴉飛過，這樣的天空在他們的家鄉也有。

深度探訪西藏

然而，儘管西藏問題彷彿已成為世界的時髦，或是有很多人因為宗教經驗而接觸到西藏問題，但對於西藏問題仍然弄不清楚，這也是我一開始碰觸這個新領域所遭遇的難題。西藏問題由何而起、藏人的痛苦由何而來、甚至至到今天，就連中國方面都還不斷強調解放西藏農奴的功績時，西藏人在中國解放軍入藏後究竟發生哪些事，便成為追究當今西藏問題的一切根源。

但這一段歷史，卻因為藏人接續而來的苦難與流亡，到現在仍是資料散落各地，沒有完整的記載，有一次我無意中聽到達瓦才仁說，達賴喇嘛不斷鼓勵藏人記下這一段經歷而藏人困於流亡又做不到時，我突然認為那對我而言，其實是不錯的報導題材。

我曾尋求某些支持，但沒有得到任何回響。無所謂，我決定以自己的經費、時間，再到印度、尼泊爾去尋找更多的真實歷史素材，達瓦才仁為了協助我所需的一切費用與器材也必須添購，同時間我們也希望能看到由他所執筆的藏文版問世。最後，我們以最刻苦的方式，用最少的錢去更多的地方，接觸到更多的藏人。雖然我一句藏文都不懂，但中文極佳的達瓦才仁以最大的耐性為我克服這個困難。在每次好幾個小時的採訪中，都可以看到達瓦在一陣藏語交談記錄後，立刻為我進行中文翻譯。

從訪問藏人的經驗中，也慢慢認識到這個民族。流亡厄運讓藏人外表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衰老，但他們十分友善，尤其當他們深信一個台灣記者可以替他們把西藏問題帶到外面的世界時，他們很多話都會說。但是，面對四十多年前與中國解放軍對抗的這段痛苦經驗時，藏人卻極少說自己打輸的一面，即使歷史事實卻絕非如此，但他們似乎很希望這段口述歷史能變成一部吉祥的歷史。藏人在回述他們的歷史時，都會盡量強調他們打死了多少個中國人，並縮小自己的死亡人數，這些都有待採訪者明白後慢慢去克服。

但我也發現有些藏人由於在當時曾經為中國解放軍當兵，或是在對抗解放軍時曾經投降保命，因此為免自己在流亡社會中無法立足，大都拒絕了採訪，這樣的心態使得僅能從手中的書面資料去了解中國軍隊當時的情形，而無法從藏人口中得知。

奇妙的探溯

另外，我做為一個漢人記者，由於對西藏歷史的全然陌生，在一開始也必須花些功夫去克服，有好幾次都想打推堂鼓。有一次為了採訪與美國中情局接觸極多的拉莫才仁，從印度德里坐火車聯係坐了三十三個小時才到大吉嶺，車資是很省，只需幾百塊台幣，但在火車上這段期間只吃得到餅乾和橘子，旅途時間漫長，一共有兩次在火車上看到太陽爬升天亮的景緻，我看著窗外印度一望無際的平原不斷安慰自己，這樣的採訪對自己都是挑戰。

連同報社採訪在內，兩年來我一共到印度六次、尼泊爾兩次，腸胃經常被迫面臨最嚴厲的考驗，但是西藏人所給予我的異國文化的沖突，卻讓我對這個領域充滿了好奇與興趣。現在我已不太會拉肚子了，在印度，我住過一個晚上兩百美金的房間，也曾住過一個晚上二百多台幣的房間。我心裡明白，這些都不算什麼，重要的是將來你能寫出什麼。

採訪西藏人，是我一個非常奇妙的經驗，對於這個虔誠信奉佛教的民族來說，像我這樣一個台灣人的闖入，對他們也是一個有趣的體驗。我記得有一次我去採訪阿奈巴青，她是一個年老的尼姑，一九九七年採訪她時，她已六十五歲了。她住的地方很小，裡面有廚房、佛堂、還有幾張臥床，另外達賴喇嘛的照片則四處張掛著。她在監牢內被中共關了廿一年，被抓的時候才廿六歲，其韌性相當令人敬佩。阿奈巴青透過達瓦才仁的翻譯告訴我，她們西藏人甚麼都沒有，原來在西藏時從來不覺得需要任何人來幫助她們，等到自己失去國家時，才有很多人同情她們。而一直以來，中國可以給錢讓很多人來說話，但像我們這些台灣記者，本來可以去做其他的事，可是卻花時間來採訪，對此她代表西藏人表示謝意。然後，阿奈巴青看著我說：『你肯定是個佛教徒吧！』達瓦半開玩笑地說，因為西藏人認為不信教的八成是個野蠻人。當達瓦告訴她我並不是佛教徒時，只見阿奈巴青瞪了眼說：『不是佛教徒，怎麼會想幫助西藏人？』

而在採訪西藏這段歷史中，自然又會接觸到沙場老將的西藏老兵。有一次我到達蘭薩拉的養老院去訪問他們，那一天正遇上一個老人去世，老人所有的財產被拿出來放在地上賣，東西大都已經破舊不堪，但又必須靠這些賣來的錢才有辦法為他辦理後事。幾個老人坐在一旁閒聊，曬太陽，手上還拿著唸珠，對他們而言，死亡並不是太遠的事。

面對這群西藏老兵，我突然感覺到多年來的採訪工作中，不知為何總與老兵關係密切。我曾經從中國老兵寫了我的第一本書『中國人的悲哀』、後來又寫到白團的日本老兵、再寫到現在的西藏老兵，原來在中國老兵身上聞到尿酸味現在又在西藏老兵身上聞到。心中感覺到不同種族的人類因為戰爭而來的苦難都是一般，更特別會在年老時摧殘我們。

其中，西藏老兵洛桑更秋在採訪快結束時，難過地對我說：『我這一生中會四種武器，不論是英式、美式、俄式、印度式的各類槍枝我都會使用，但卻一直派不上用場，自己原來是個喇嘛，後來變成士兵，但是喇嘛沒有當成，仗也沒有打成。』。他難過地說：『真不知這是什麼樣的人生？』

與活佛接觸

此外，達賴喇嘛在接受我採訪時也曾建議我，康與安多的許多寺院都被多次摧毀，中國解放軍來時摧毀了，之前清朝趙爾豐來時也毀過一次，在青海一帶也有馬步芳摧毀寺院。但藏人在寺院第一次被摧毀後沖建，第二次被摧毀後又重建，等到一九五九年第三次便全部摧毀，達賴喇嘛認為這些歷史應該要寫出來。達賴喇嘛說，現在中國民族老是說英國人入侵西藏，英國人來西藏是壞的，中國人來了，卻讓西藏解放等。但英國人入侵拉薩時沒有摧毀過一間寺院，中國人不管是叫作『侵略』西藏也好、或是『解放』西藏也好，卻摧毀了很多寺院，這些應該做專門的研究，研究在半個世紀內，在某一個西藏人的生命中，中國人是如何有計劃地摧毀這些寺院，這些應該寫清楚。達賴喇嘛說，現在碰到康和安多的老人，他們常說中國人毀了多少寺院，對藏人有多大的影響，這些事情現在更應該讓下一代和未來的中國人知道，但必須是沒有虛假和編造的歷史，這極為重要。

我很遺憾，在這次的採訪中，卻無法找到太多如同達賴喇嘛所建議的採訪對象，加上我這次的採訪重點是放在中國部隊入藏到逃亡將近九年的藏人抗暴過程，對於寺院被摧毀的素材有很多來不及蒐集。但是，『喇嘛殺人』的現象卻讓我感受強烈。

曾有一次我在藏人開的小餐館吃飯，因為頭頂上的蚊子不少，我習慣性地伸手出去打，並發出清脆的手掌聲。這時，坐在一旁已還俗的喇嘛用手遮住臉，苦惱地問我：『打倒了嗎？』我注意到他的表情，故意回答：『沒有』時，他的態度才轉為愉快，但我真的不敢讓他知道，蚊子的屍體正在我的掌心上。但是，當我感受到藏人不殺生的一面時，卻又同時發現，他們的家鄉抗暴時，都會沾沾自喜地談他們曾經殺死了多少中國人；我在訪問中得知許多遊擊隊員原先是個喇嘛，這樣的情形很多，甚至有的喇嘛當了指揮官，還可以做到一面唸經、一面下令把犯罪者拖出去宰了，這對我這樣背景的人心中產生了不小的衝擊，於是我才會由此入手，去了解以喇嘛殺人為脈絡所衍生的西藏問題。

幾次訪問達賴喇嘛的經驗也非常有趣。做為記者，我們被教導要與受採訪者平起平坐，哪怕他是個總統；現在我得說，哪怕他是個活佛，都一樣。

第一次訪問他時，不知為什麼，錄音機錄音的按鈕突然跳了起來，我嚇了一大跳，臉上恐怕同步顯露出驚慌之色，只見達賴喇嘛先做出要我不要慌張的手勢，並且馬上停止談話，好讓我有時間調整錄音機。而原先預計僅有半個小時的採訪，也在達賴喇嘛的同意下延長為一個小時。喇嘛保佑，我終於完成第一次有關達賴喇嘛的專訪。

訪問結束後，達賴喇嘛總會習慣地站在一定位子上，接受拍照留念，那種感覺好像是接受影迷合照般的熟練。現在每每看到當時的照片，我都會回想起他曾有的善意。

除了第一次的生澀外，以後他都會流露熟悉的打招呼方式，有時是輕拍臉頰，有時卻很用力的拍打你的背。第三次專訪他時，他一直流露出疲態，在旁的助理也一直暗示時間差不多了，但因為牽涉到江澤民『兩條件說』的敏感話題，再加上只要訪問的問題具有挑戰性，達賴喇嘛都會樂於接招，絕不逃避。因此，我看到他揮手對一旁助理表示沒有關係，他要我繼續問，但是卻開始脫鞋子、脫襪子、然後又換上拖鞋、抓抓背、再繼續做答，整個採訪持續了兩個多小時。他的態度，讓我感受到一個大人物的誠懇，也讓我體會到一個朋友的親切。

終於完成此書

我能在一句藏語都不懂的情況下對藏人進行大量口述歷史並完成這本書，最要感謝的是兩年來一起為這本書努力的藏人夥伴達瓦才仁。他的中文佳、民族意識強、更重要的是他的真性情。他幫助我認識到更多的西藏歷史素材，更幫助我在極短的時間內進入西藏問題的核心。也要謝謝達拉朋措扎西、拉莫才仁、然楚阿旺、嘉樂頓珠等許多接受採訪的藏人，多麼無私地提供我第一手素材。

謝謝達賴喇嘛為這本書寫了序言，這說明他對西藏歷史的重視，以及對本書的期待。而在報社，我要謝謝杜念中對我撰寫這類文章的支持，以及英文採訪上給我的幫助，讓我還有一點信心去拯救自己的破英文；我還要謝謝好友倪炎元經常協助我進行多角度思考，以及不斷加油打氣；要謝謝工作夥伴攝影好手陳孔顧在印度、尼泊爾的患難相助，以及提供本書的許多好照片；另外，也謝謝攝影記者遊智勝為我翻拍許多西藏歷史照片；謝謝英文極佳的蕭羨一在英文資料上曾給我的協助；謝謝在台灣中文一樣好的藏人貢嘎經常為我做翻譯；更要謝謝我哲學系的學長薛中立，他是本書的第一個讀者與第二個讀者，幾次修正後都給我很多逆耳的建議，才讓本書能夠有所進步。

謝謝我的家人，他們永遠是我溫馨的後盾。

最後，我要謝謝聯合文學出版社，讓我覺得關心西藏問題其實並不孤獨。

第一章流亡

現在的人幾乎無法想像，四十年前（一九五九年）的三月十日，會是西藏歷史上最重要的轉折點，當今所有的西藏問題都要從這一天談起。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由於中國西藏軍區在這一天邀請達賴喇嘛前往營區看戲，藏人懷疑中國將會藉機拘禁達賴喇嘛，一旦達賴喇嘛去看戲就再也回不來了，因此一再要求達賴喇嘛不要前往。

在這之前，西藏東部的整個康區已經戰火連天，西藏康巴、安多人為了抵抗中國軍隊入侵，已經在廣大的草原上進行了無數場遊擊戰鬥，鮮血把家鄉的江河染成紅色。藏人的裝備與組織訓練根本無法與中國相比，節節敗退來不及喘氣的西藏遊擊部隊已經退到西藏的西部來。

在金沙江以西的西藏西部地區，原本是『一國兩制』的保護區，不料也在後來續演東部的血腥戰鬥，無數藏人躲入叢林中進行最後的捍衛，更多的藏人只能帶著絕望的心情顛沛流離，在人煙稀少的西藏土地上已經望不見毀敗的故鄉，拉薩成為他們最後的寄託。

拉薩是藏族的聖地，在這個西藏首邑之處有他們最崇拜的達賴喇嘛，是他們的再世活佛，平時藏人就常在這裡繞塔禮拜，現在受了中國人的欺壓，更希望在這裡找到最終的安慰。但很多藏人都親身經驗到，當時的中國人經常會藉著開會或看戲名義將人拘禁，在西藏東部地區有很多藏人都因此一去不回，但仁慈如達賴喇嘛卻絲毫不了解中國人的詭計，所以許多藏人自動聚集起來，決心阻止類似的悲劇發生在他們的活佛身上。

那一天，超過一萬以上的拉薩藏民聚集在達賴喇嘛的行宮羅布林卡前，內心焦急又憤怒。他們不停高喊著：『中國人滾回中國去』、『西藏的主人是藏人』等口號，震耳的怒吼讓在行宮內的達賴喇嘛終於放棄去中國軍營區看戲的計畫，但這個群眾行動同時也促使中國各路軍隊從現地開始向拉薩集結，漢藏對峙局勢隨之升高，拉薩被推到戰爭的邊緣。

從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九年，中國軍隊逐步擴散之後，整個西藏大致上已為中國所嚴密控制，對達賴喇嘛而言，幾乎可說已無片土安全之地，但因為拉薩情勢愈來愈緊張，流亡成為這個年輕活佛無法抗拒的劫數。

七天之後，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被迫化裝流亡到印度，接著有近十萬名西藏人跟著逃出來，除了天上的青天與腳踏著的土地外，流亡的西藏人一無所有。

逃亡前，達賴喇嘛最後一次來到他的經堂，在他的寶座上坐下，翻閱一本置於座前敘述佛陀教導的書，看到了釋迦佛要弟子們勇敢的章節。

然後，達賴喇嘛闔上書，加持了這個房間，關上了電燈。沒有人認出他就是達賴喇嘛，這個人身著傳統藏族士兵的服裝，戴一頂帽子，背了一枝槍。

達賴喇嘛說：『這是我第一次把釋迦牟尼佛的袈裟脫下來，穿上俗人的衣服，心中覺得非常的悲哀。』

當時護送達賴喇嘛的達拉朋措札西（以下簡稱達拉）提到，達賴喇嘛和他一起逃出，因為他是警衛團團長，常常在巡邏，達賴喇嘛跟在他的後面，喬裝是他的保鏢。達賴喇嘛平時穿袈裟，但那晚他穿著藏服，戴一頂帽子，背一枝槍，就走在他的後面，別人可能以為只是一個普通的巡邏人員。

達賴喇嘛沒有時間攜帶不是十分必要的東西，他們必須在黎明之前遠離拉薩。噶倫（指內閣官員）們攜帶了噶廈（西藏政府）的印鑑、辦公室的印章、以及一些碰巧放在羅布林卡行宮內的文件。達賴喇嘛所能帶的只是兩、三件換洗的喇嘛法袍。

所有要走的人一共分三批，達賴喇嘛的母親和姐姐都打扮成康巴族的男人，她們和達賴喇嘛的弟弟第一批走，達賴喇嘛第二批走，其他的噶倫和經師殿後。

幾乎沒有人注意到這個卑微的士兵，達賴喇嘛第一次在沒有人民列隊歡迎的情況下，走出自己的行宮羅布林卡。

達賴喇嘛的心情一直非常痛苦，雖然他極不願意離開，但由於情勢所逼又不得不離開。達賴喇嘛不知道，現在他離開，什麼時候能回來？他正在離開西藏，但他的人民卻還在西藏。達賴喇嘛一路上對這些事一提再提，不願離開，可是，也沒辦法。

流亡的史詩讓西藏人痛苦地吟唱至今，十四世達賴喇嘛，和他的前世一樣，終不可免地須在流亡中遙視自己的西藏子民，兩世達賴喇嘛的痛苦都是來自避也避不開的鄰邦—中國。

然而，當時這個出亡計畫究竟如何策畫進行，一直是個歷史秘辛，幾個秘密策畫人從未透露當時行動的內容，第一手的資料也未曾對外公佈。如今，透過當時包括帕拉、尼烏夏與達拉朋措札西等數名秘密策畫者的口述歷史資料，逃亡行動的真相才得以一一揭開。

根據當時噶倫尼烏夏回憶指出，從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藏曆二月一日）早晨西藏人民湧到羅布林卡後，噶廈三名官員先到羅布林卡，然後到中國西藏軍區司令部對中國人解釋達賴喇嘛不去看戲的理由，回來再向達賴喇嘛報告經過，一直到十七日逃亡前，前後共七天的時間裡，根本沒機會回自己的家，而且白天不思飯食，晚上又睡不著，雖然不覺得驚慌，但也不知要如何是好。

達拉則表示，在三月十六日那天，噶廈內部其實還沒有決定達賴喇嘛第二天就要離開，但隨後中國軍隊共射擊了兩發砲彈，都落在羅布林卡的北邊，發射的地方來自布達拉宮附近，後來知道他們是在測試大砲的距離，西藏政府本來的擔心因此更加深了一層。

十六日清晨，尼烏夏曾經特別回到布達拉宮，收拾在新年和法會時佩戴的金護身符等珍寶，他順便從布達拉宮屋頂用望遠鏡觀察，看到中國軍隊的駐地一如往常，還在汽車站院內曬衣服，一片寂靜，看不到有任何作戰準備的樣子。

他在宮內祈禱後回羅布林卡，沒想到中國部隊就在這個時候開砲了。一發砲彈落在羅布林卡達丁不變宮的後面爛泥中，另一發落在院牆外附近，中國軍隊的砲擊使噶廈突然處於緊張中，也因此促使了做出出行的決定。尼烏夏說：

『我們噶廈坐鎮羅布林卡，每天開會商討，各級官員都在，期間我們穿著平民的服裝每天前往羅布林卡四周巡視各部守軍，同時為了指揮軍隊也成立了指揮部。出行的當天晚上，還來不及換衣服就到羅布林卡內院，乘早已準備好的卡車到德吉林卡更德林（拉薩寺院名稱，但主管喇嘛也叫更德林）的房間。我們的出行人民並不知道，坐卡車也是為了防止讓他人發覺。』

在出走之前，噶廈大部分官員在羅布林卡待了七天左右，最後大家認為達賴喇嘛繼續留在羅布林卡是很危險的，必須出走，換言之，十六日砲彈攻擊事件發生後，才做出出走的決定。出行路線和細節是由達賴喇嘛侍從官帕拉一人負責，帕拉於是製定了一個出行計畫。帕拉回憶說：

『當時我們與中國人之間的關係已經相當惡化，因此再繼續這樣留下去，後果難以承受，加上我們再這樣待下去也不可能有任何結果了，因此討論多次的結果是要在某天突然出行，在此之前都不能傳揚出去。』

由於絕對不能公開出行，因此必須在做好內外保密的同時做好準備，而如果準備的人太多就會像諺語所說的：『未抓住糜鹿而漫山全是獵狗的叫聲』，因此必須慎重佈置，盡可能的如俗語所說的：『既不驚動母雞又能取出雞蛋』。因此，有關的準備最好由一人負責，由是噶廈讓我全權準備出行事宜，於是，我決定了製定一個出行計畫。

當時因已確定出走，就出走的路線和時間等等商討了許多次，最後請乃窮護法降神諭，再根據神諭於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外出，有關出行的方式和路線、內外保密等準備工作，由噶廈下令落在我身上。

為了保密，做準備工作是非常困難的，政府雖有許多騾馬，但如果使用這些騾馬將有可能洩密。當時更德林有許多騾馬，我便要更德林將所有馬匹先趕到雅魯藏布江以南等待。

更德林已派了所有的馬匹先行渡過雅魯藏布江等待，又由於羅布林卡無法騎馬排隊而出，因此準備到時將布達拉宮山下軍械庫的武器，由卡車乘夜運到羅布林卡散發給人民時，乘機實施出走計畫。

當時，羅布林卡以南沒有中國人的兵營，是個乾淨的去處，從那兒前往山南的途中要經過拉薩河的然瑪岡渡口，為此我派了札什兵營代本（西藏最高軍銜，相當於團長）札西巴拉等率部分精銳持精良武器前往佔據然瑪岡渡口和渡口對面的夏嘉噶波山頭等。

在天剛黑時兩位經師、噶廈、西亞（藏人稱達賴喇嘛家族的人為亞西）、以及負責達賴喇嘛食、寢、供的三總管等，用去運武器的卡車從羅布林卡送到更德林的房子中，車上主要的有達賴喇嘛、總堪布噶仲、警衛團團長，我自己則通過羅布林卡南門向然瑪竹卡渡口進發，先步行一段時間後，然後為達賴喇嘛騎馬出行而準備了乘騎，這事是由軍營連長噶桑佔德負責派遣。

在噶廈出行時，由於不便著黃僧裝而著俗裝，做好一切準備，隨時可以動身，在上述準備妥當後，也向噶廈做了報告，在此之前，羅布林卡各門甚至一些水溝也派遣了政府僧俗官員與軍人、人民等擔任守衛，並在羅布林卡附近對來往人員進行搜身檢查，晚上噶廈和我等出去巡視時，會有守衛喝問：『是誰？』並以手電筒照射觀察。

為了防止洩密，在達賴喇嘛出行前的一天，我們召集守各門的人員，對他們說：『我們晚上出來巡視時，如喝問是誰並以手電筒照射的話，敵人的特務說不定就在那裡，可能會被發現，因此從今晚開始我們出來巡視時，除了雙方從聲音辨別以外，不許用手電筒照射。同時，明天將派汽車前往布達拉宮山腳運武器，對卡車也不必檢查，可以讓他直接去。』

而且在達賴喇嘛未出行前，我們即將達賴喇嘛的廚師、餐具以及有關器具先行送到然瑪竹卡，因為達賴喇嘛的食物不能出問題，所以讓他們在頭上頂著佛祖照片、發誓絕不向他人洩露點滴。這名廚師在臨走時還說：『我就這樣走掉大廚不會追查嗎？請向大廚說一聲。』我說：『這樣亂的時候誰會追查？』但後來我向大廚也談了這些人是我派去的。

在此之前，我又讓色拉寺堪布（高僧）派十餘名可靠的僧人裝成替我念度母經，且一直駐札在羅布林卡裡面待命。』

所有的準備事宜都在高度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當時參與的達拉曾憶及，從位於羅布林卡的寢宮出走時，達賴喇嘛正在進行乘覺法事，他和帕拉以及兩個警衛在經堂門口等候，為防起疑，他還將隨行的兩個警衛先遣回，達賴喇嘛從經堂出來前往羅布林卡南門時，另有總堪布（高僧）加入，一行共四人，當時達賴喇嘛著普通裝肩上扛著一枝步槍，裝成警衛士兵。

一行人出南門時，正好與派去河對岸偵察槍聲的人相遇，他們詢問去向，達拉說去巡視，他們要求一塊去，由於與達賴喇嘛同行，為防洩密，帕拉說：『我們不必如此愚蠢，一個人可以去的地方卻去那麼多人，彷彿在告訴人我們在這裡。』在他說話的同時，達拉和達賴喇嘛從帕拉後面溜過去了，後來帕拉才再趕上。

十七日晚上七、八點左右的時候達賴的兩位經師、工作人員、噶倫及達賴喇嘛的親人等共計將近一百人，分三批走不同的路離開羅布林卡。當時有一點月亮，刮著風，離開時就怕驚動附近老百姓知道。

到然瑪竹卡時，達賴喇嘛騎馬出行，前後左右都是西藏士兵與民間遊擊隊『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的人。到了南嘉貢附近，達賴喇嘛雖想休息一下，因為該地沒有人家、又未帶墊子，不忍讓達賴喇嘛坐在地上，於是又往下一站南嘉岡溪卡出發。

一路上天氣都極為惡劣，不但下雪又下雨，非常寒冷，到南嘉岡溪卡時，帕拉見寢室已經準備好，達賴喇嘛準備要休息，但卻沒有被子。這時帕拉看到達拉的馬鞍上有一條毛毯，心想達賴喇嘛不披毛毯會著涼。達拉說，他已在上面跨過，想來已不潔，不適合給達賴喇嘛用，但除此沒有其他衣被，於是帕拉取下來拍了拍，圍在達賴喇嘛的腿上，讓達賴喇嘛睡一會兒。這段期間，噶廈和兩位經師一直未到，帕拉等人擔心中國人追過來，於是又急忙起程，當時已是凌晨四點。

第二天下午，噶廈的其他人也已趕到，當晚住在冉蔑寺院，達拉說，因為他已有七天沒有好好睡覺了，那天雖然沒有被子，但僅是圍著一個僧人的法衣就沈沈地睡著了。

如此達賴喇嘛一行人就慢慢來到瓊結，通過雅隆到隆孜宗、措納、到芒芒，最後到了一個叫曲頓瑪的印度邊防處。帕拉並且對一路上的護衛事宜做了說明：

『從羅布林卡出行前，札什兵營的代本巴拉等官兵被派去守衛夏嘉噶波山和然岡渡口，做好了一切準備，其後達賴喇嘛從羅布林卡通過然瑪竹卡到印度為止，負責警衛的是上述那些警衛和札什兵營的官兵，負責馱運的有在羅布林卡裝成給我唸母經十餘個僧人。然後到了然瑪竹卡（已是山南四水六嶺的勢力範圍），就有四水六嶺部的更噶桑丹、羅桑益西，四水六嶺的部隊都列隊持旗，隆重護送。』

然而，在達賴喇嘛離開羅布林卡時，一開始並沒有計畫要到印度，就只是想著要離開，先過雅魯藏布江，渡了河後再進一步與中共談，這是因為覺得過了河比較安全，總是有一條河隔著，沒有想要到印度。

但出行後第二天，噶廈等人商討後認為最合適去的地點是印度，可是擔心在邊界被阻，於是決定先派一個可靠的人赴拉薩向印度領事館提出要求。

後來帕拉派哲康堪瓊到位於德吉林（在藏語為幸福林園之意，為一林園名稱，印度代表處就設在那裡）的印度代表傑巴處，提到中國和西藏已處於緊張關係，達賴喇嘛可能被迫需要出行，出行期間西藏還會與中國人談判，如果談不成，達賴喇嘛出行的地方除印度外別無他處，因此請印度代表傑巴就此向印度政府報告。

印度代表傑巴的回覆是，他們需要知道出行的時間、地點，因此需要帕拉親自走一趟德吉林。但帕拉因為擔心自己可能受到監視而再將訴求重提一次，請他務必向印度政府報告。最後，傑巴同意向印度政府報告，如此，西藏政府未出行前就已先和印度打了招呼，但印度方面尚未就此給予答覆。

尼烏夏也說，剛開始的計畫不是要直接去印度，他們原以為四水六嶺有很大的勢力，因而企圖據守山南地區（指拉薩南部、雅魯藏布江以南到印度邊境一帶），並先將西藏政府的首都設於隆孜縣，打算暫時在隆孜縣住下，再立即向西藏各地宣布，要求同心協力抗擊中國人的攻擊。但至瓊結時，傳來拉薩發生戰爭以及中國軍隊正向山南進發的消息，於是宣佈建立新政府後只待了一天便起程前往印度。當時若非武器優劣懸殊，他們寡不及眾而未能守住，一度曾有在山南停留抗擊的打算。

達拉則說，當時沒有計畫到印度，但西藏政府計畫到隆孜縣成立一個臨時政府，後來據消息說中國部隊在山南增加兵力，也在後面跟蹤，因此才有到印度的想法。

到了貢噶縣，噶廈政府以達賴喇嘛名義寫了兩封信，一封是給班禪喇嘛，一封是給留在中國西藏軍區內的另一噶倫阿沛阿旺晉美，請他和中國談，不要用武裝的力量對抗西藏人民，要好好談。達賴喇嘛離開是不得已，不能不離開，請中國不要用武力對付西藏人民。

最後達賴喇嘛一行人到了芒芒、前面有一叫曲頓瑪的地方，是一邊防站，他們不知能否在曲頓瑪直接越界到邊境，於是提前派了派仁希帕拉與噶桑土登前往聯繫，要他們一得到回音即刻稟告。

當天晚上噶桑土登返回芒芒傳來印度政府的話說：『請達賴喇嘛前來，印度政府已準備好接待。』於是當達賴喇嘛一行人到了曲頓瑪時，已有印度官員和地方縣長等表示歡迎，門達旺的縣長請達賴喇嘛入帳篷，在場的士兵也致敬，令逃亡的一行人感覺彷彿做夢一樣。

當時的噶倫協色說：『這不會是乃窮法王的幻術吧！』由於門大旺已有極佳準備，大家休息了三天。

達賴喇嘛能夠有驚無險地逃亡到印度，事後其實連隨行官員回憶起來都覺得奇怪，當時西藏到處都是中國特務，但不知為何始終沒有發現他們的行蹤。而且逃亡過程中驚險萬分，有一次甚至幾乎是與中國軍營擦身而過，那是他們步行兩三公里到拉薩河邊的然瑪竹卡渡口，過河往西走了一段路，這期間便與位於羅布林卡以西諾堆林卡中中國軍營隔河相望，逃亡隊伍再往西走了一段路後翻過潔拉山，就大致脫離中國軍隊控制的範圍了。當然如果中國軍隊召來追兵，達賴喇嘛還是有危險。

尼烏夏後來回憶說，他不知道為何中國軍隊一直沒有發現他們，因為在出行期間，雖然他們一直說隨行的官兵要分批運行，但是四水六嶺的六、七十騎卻一直和達賴喇嘛擠在一起，不管怎麼說就是不聽。尼烏夏說：

『隨行的官兵雖分批運行，但四水六嶺的六、七十騎卻一直和達賴喇嘛擠在一起，對他們說：『不要這樣，要遠遠分散，如此如有追兵也好佈署，像這樣一塊走對達賴喇嘛是極危險的事。』但不管怎麼說就是不聽。例如，到措納時有飛機來，當時下雪，一片雪白，我們在雪山中，有一個康巴人竟以槍瞄準，我急忙說請不要這樣。當晚我說，你們不能這樣，今天來了飛機已發現了我們，明天出行時說不定會前來轟炸，因此你們不能擠在一起隨行，我們應將隊伍分成幾股前進等。

第二天出行，天空一片晴朗，我心裡想著不會有飛機來吧！不停地向空中張望，幸虧未來，那時敵人不知被什麼矇住了頭所以沒有發現我們，否則與敵營是相當近的。在雅魯藏布江這邊南行時，河對面敵營中燈火輝煌，但隨行的士兵對此不僅不謹慎，還在隊伍中呼喊，如說不是這條路等，並打手電筒，我說不要這樣，但沒有人聽，從那點看中國人似乎會知道，但他們摸不著頭而沒有來，否則怎麼打得過啊！』

達拉也說，當時那些四水六嶺的首領在途中都佈置了軍隊，並說有一、兩百人，但在一些地區卻只有五、六人，那麼危險的處境現在想起來都害怕。

但達拉認為，達賴喇嘛出行是虧了三寶的佑護才平安無事。

然而，對於這段西藏人極為珍視的歷史記憶，中國卻提出截然不同的版本。儘管西藏方面自認是因聶仲（秘書）帕拉的秘密計畫，以及達賴喇嘛偽裝成功才得以逃出中國魔掌；但中國方面出版的一些書籍卻把整個事件解釋為是因為毛澤東故意放人，所以達賴喇嘛才能夠離開西藏。

曾在西藏軍區政治部宣傳處任職的吉柚權，在他個人所著的『西藏平叛紀實』這本書中就提到：

『當時的軍區領導譚冠三得知拉薩局勢變化，已離開文工團，回到軍區司令部。譚冠三立即將噶廈發動叛亂情況向中央及中央軍委作了匯報。軍委立即將西藏的情況電傳正在湖北視察的毛澤東。

毛澤東在得知西藏噶廈政府發動叛亂的消息後，並不吃驚，微微一笑說：『果然等到了今天。』毛澤東並於十二日電報指示西藏工委和西藏軍區，指出：『照此形勢發展下去，西藏問題有被迫早日解決的可能，叛亂集團的策略是：『在拉薩搞叛亂，將我軍驅走，這一批人實際上已與中央決裂。』

而西藏工作委員會當時的工作策略是：『軍事上採取守勢，政治上採取攻勢，以分化上層，教育下層，如果他們逃走時，我軍一概不要阻擋。無論去山南、去印度，讓他們去。毛澤東對噶廈叛亂集團外逃敞開大門。』

而且，吉柚權還在該書中提到，中國共產黨的老大哥蘇聯，在獲知西藏叛亂後，從十日起將蘇聯的衛星不斷調整在西藏上空飛行，給中國中央不斷提供西藏叛亂集團的軍事行動狀況，為中國中央、中央軍委對付西藏叛亂武裝制定措施和方案提供了可靠依據。

同時譚冠三也召集工委和軍區領導，分析拉薩情勢，制定應急措施。中途收到毛澤東的指示後，譚冠三立即通知山南（僅有澤塘是唯一解放軍據點，其他多是四水六嶺護教軍）、亞東（位於西藏與印度邊境）部隊及各邊防哨卡，如發現達賴及其叛亂集團外逃，一律不許阻擋，放他們出去。

吉柚權的這些說法其實相當誇大，令人不得不懷疑。在有關蘇聯調整衛星一事，不但技術困難，而且衛星之可調整次數很有限，就算可以，代價也是很高，四十年前的蘇聯有沒有這個技術與條件都值得懷疑，就算有，又是否願意做調整，其實都是很大的疑問。

再者，所有中國方面的記載都提到毛澤東的『放人政策』。當時的西藏軍區副司令李覺也在事後回憶到：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夜，達賴他們在拉薩河北岸準備離開河灘沙灘。但是，中央沒有命令阻截他們。我們是靜靜地坐在林子裡，憑藉月光看著他們驚慌地用牛皮船一船一船地往拉薩河南岸渡人……。』

此外，前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在他的『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中提到，毛澤東有些想法和考慮，常出乎一般人預料。一九五九年，西藏軍區司令張國華負責解決『西藏叛亂』，當時達賴被圍困在布達拉宮內。毛澤東發電報給西藏工委和張國華，因為電報抄告各省、市委，他當時正是擔任江蘇省委書記，因此看了這份電報。

許家屯說，毛澤東在這份電報上要張國華部隊主動讓出一條路，並指定這條路由布達拉宮經何處，直到中印邊境，讓達賴喇嘛撤退到印度去。電報很詳盡規定了張國華要如何做，什麼時候開始，佯攻什麼地方等等。這樣達賴喇嘛果然逃到了印度。

許家屯認為，這樣的指示，出乎他們處理這類問題的常識之外，毛澤東這個考慮，是因為達賴在西藏人心中是個活佛，活抓固然不好處理，擊斃更不妥。他認為這是毛澤東的考慮過人之處。

許家屯的回憶記錄相當令人吃驚，這似乎是可以證明毛澤東有意放人的明顯證據。但令人不解的是，當時張國華本人在北京、並不在拉薩，拉薩主要領導是第三號人物譚冠三，因此，毛澤東在下這道指令時，為何是給張國華、而不是譚冠三，則似乎有違常理，也與『西藏平叛紀實』的內容不相符。

而且，更讓人無法置信的是，按照許家屯的說法，等於說毛澤東將最機密的戰情電報廣發天下周知，這種做法相當違背常理。同時，毛澤東人遠在北京，如何能指揮戰場現地什麼做、什麼不做、如何做、何時做的戰術性細節行動？也是極不合軍事常識的。

『西藏平叛紀實』的作者是中國高階軍官，雖然他在查閱當時資料上有一定的便利條件，甚至還可以說是較權威的，但對此的敘述卻也很混亂。例如書中提到三月十六日下午，譚冠三的信到達賴喇嘛手中，達賴喇嘛寫了第三封回信，第二日（十七日）逃離拉薩時，該書中說到：

『譚冠三剛收到達賴秘密傳來的信，正在考慮如何伺機將達賴挾來軍區，他擔心時間拖久了達賴會有危險或被叛亂集團挾持外逃，根本沒有想到達賴在今天（指十七日）晚上離開了拉薩。』

自從拉薩形勢變急後，西藏軍區情報部派出情報小組到拉薩各渡口、重要交通路口潛伏觀察敵情。

潛伏在拉薩河南渡口的情報組，十七日深夜發現幾百人從拉薩河涉水上岸到南渡口，上岸後往南而去。但沒有想到會是叛亂集團的首要人物達賴和他的親屬。...

三月廿日凌晨三點四十分，一五九團副團長吳晨在拉薩河南渡口與叛匪打響，譚冠三立即將此情況上報中央及中央軍委，並匯報達賴喇嘛可能逃離拉薩，中央立即將此情況點轉給在湖北視察的毛澤東，毛澤東指示軍委要求西藏軍區把叛亂武裝死死吸引在拉薩，等增援部隊進藏時對其進行合圍，將噶廈叛亂集團徹底、乾淨、全部殲滅在拉薩。』

換句話說，在達賴喇嘛離開拉薩時，中國在西藏的最高軍事指揮官譚冠三，不僅根本沒有想到達賴喇嘛會離開拉薩，甚至在考慮援救方案。當達賴喇嘛離開拉薩三天後，譚冠三給中國中央的報告中還只是不肯定的估計達賴喇嘛可能已經離開，當中國軍隊炮轟羅布林卡時，書中談到譚冠三擔心達賴喇嘛還在裡面，但中國西藏軍區情報部部長認為已不在，理由是十七日夜晚有五、六百人攜械過河，只有達賴喇嘛才需要出動如此多人等，分析雖有理，但解放軍部隊居然能面對數百人的攜械行為，卻全然無動於衷的說法，也令人無法置信。

中國的報告中曾經特別強調持械一事，關於這點若根據達賴喇嘛警衛團營長索南札西在其所著『一個藏軍老兵的一生』所言，就可得知中國所指的可能是這些斷後的藏軍，只是人數沒有他們所說的那麼多。索南札西寫到：

『藏曆二月八日（三月十七日）達拉叫我準備一百餘名精銳，說如果達賴喇嘛需要出行時可以為後衛。我於是挑選了勇敢、機靈又可靠的一百廿五名官兵，告訴他們我們要去佔領然瑪岡渡口附近的山頭，叫他們準備二至三天的口糧。當晚十時，達賴喇嘛離開羅布林卡，十二時，我率領一百廿五名官兵隨後跟進，在內吾宗一直待到凌晨為止，這時見河對面的中國軍隊吹了起床號，不久敵軍出來做體操，與平時一樣毫無異狀，顯然沒有發現達賴喇嘛已經離開拉薩。』

不過，同樣在『西藏平叛紀實』這本書中，還特別針對在拉薩發射的兩枚炮彈做了解釋。書上說，因為叛亂武裝曾經連續三次向青藏公路管理局拉薩運輸站進行挑釁性射擊，密集的槍彈打壞了該站許多門窗，氣焰非常囂張。

該站的經濟警察雷惠山對叛亂武裝的這種抗釁非常氣憤，沒有請示任何人就用六0迫擊炮還擊了兩發炮彈，炮彈落在羅布林卡北面圍牆以北兩百到三百米處爆炸，雖未殺傷叛亂武裝人員：『但叛亂武裝以解放軍開炮射擊為藉口，又以保護達賴安全為理由當晚深夜挾持達賴從拉薩河南渡口逃向山南方向，叛亂武裝的上層集團六百餘人隨行。』

從目前掌握的資料來分析，當時中國軍隊也許從一開始就懷疑達賴喇嘛會出逃，但達賴喇嘛真正離開那天，他們說不過是看到幾百人離開而已。

但這些說法實有太多疑點，以公安進行炮擊一事而言，當時的共產黨軍紀甚嚴，軍官在前線豈敢無令而行？而且，如果中國早已料到達賴喇嘛會出逃，無論如何推想，看到大批人群一定會上報反映，當時都沒有這些動作卻在事後做這些說明，很容易讓人認為，其實中國軍隊在當時事前完全無法掌握達賴的行蹤。

而在許多中國有關記載中，對於達賴一行人的出行隊伍都是以六百人稱，但當時陪在達賴喇嘛身邊的西藏政府警衛團團長達拉卻表示，事實上出行者一共分成三隊，只有幾十人、不到一百人而已，達賴喇嘛決定離開羅布林卡時，噶廈政府已在拉薩河的山腰都佈置了西藏人的軍隊，來保護達賴喇嘛。人是幾十個人陸續通過，那條路常有當地人通過，七、八人，五、六人，但不集在一起，後來就是這個辦法才通過的。

離開羅布林卡有一段路是走路，後來達賴喇嘛騎馬到拉薩河岸，然後又坐渡船離開河岸，在此之前，都是在晚上行動，晚上有風吹，有一點月光，樹葉交叉成各種形狀，讓人懷疑有沒有中國軍隊的埋伏。過了拉薩河就有人接應，就都是藏軍了。

達拉指出，當時中國應該已料定達賴喇嘛可能出走，為了抓達賴喇嘛，在西藏拉薩河旁邊佈置了很多西藏軍區的情報人員，一有情報馬上就傳到西藏軍區，但深夜二、三點時，有帶馬的人將近一百人離開河畔，情報人員想這些人絕對不是達賴喇嘛，沒想到這一行人正是達賴。

有關達賴喇嘛逃到印度中國並未阻撓的說法，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認為，毛澤東完全是『打腫了臉充胖子』的說法。嘉樂說：

『毛澤東講大話，如果他老早知道此事，達賴喇嘛就出不來，也不會有今天西藏的問題了。中國不可能隨便把達賴喇嘛放掉，這些話是騙人的，毛澤東已是騎虎難下，因為達賴已過到山南，不是他的控制區了，除非他派飛機來轟炸，飛機來轟炸也不一定炸得到達賴喇嘛，聽說那時有兩枚大砲打羅布林卡，但沒打前達賴喇嘛已經離開羅布林卡了。

所以毛澤東才騙人，說是他叫達賴喇嘛走的，這是說假話。不要說毛澤東，就連新華社社長許家屯都說他曉得這件事，真是開玩笑！當時很少人知道這件事，連我都不知道，達賴喇嘛離開到山南後有我們的通訊人員，我才知道達賴喇嘛已經離開，所有人都不知道。

共產黨在開玩笑，毛澤東是一個非常殘忍的人，如果他可以消滅，他一定會做這樣的事。』

嘉樂頓珠所指的通訊員之一的阿塔也說，（在達賴喇嘛到了山南之後）他每天都以發報機與美國聯繫，告訴美國護送的狀況。

究竟是因為毛澤東的計謀、還是佛祖三寶的保佑才讓達賴喇嘛順利逃出 B 在戰爭邊緣的拉薩，這個歷史謎點到今天依然無法解開。由於山南在當時幾乎已全是『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的勢力範圍，達賴喇嘛一旦逃到山南，要順利到印度幾乎沒有任何困難。然而，雖說當時達賴喇嘛是喬裝出行，而且行前屬於高度機密，但因須做各種逃亡準備，因此消息可能難免走漏。

例如，帕拉等人必須事先與四水六嶺的軍官進行聯繫，以便在山南時進行護衛措施，應該已有相當數目的人知道出行計畫。而且，就算不知道具體離開的時間，很多人都已猜到達賴喇嘛不得不走的可能。

如達賴喇嘛的警衛團營長索南札西是出亡的當天早上才知道的。而被中國稱為『叛軍總司令』的拉魯才旺多傑（原來的昌都總管）則在中國出版的『西藏文史資料選輯』中談到，他是在達賴喇嘛走後才知道這個消息的。拉魯回憶說：

『藏曆二月二（三月十一）日，我到羅布林卡頌經堂參加會議，三日會議遷到布達拉宮腳下的雪印刷廠召開，會議選出我和其他四人為總司令，侍衛代本達拉朋措札西又來請示是否要佔領然瑪岡山峰，我向下屬詢問了具體狀況，派人給功德林拉章（拉章是活佛官邸）稍去了一封極為重要的短信，並要求派兩個人到然瑪岡山佯裝拾柴，觀察解放軍有沒有佔領山峰。如果沒有，便從渡口抽調百餘人去佔領。

六日，羅布林卡侍衛軍裡的一個昌都人，名叫甲央索巴的告訴我，昨晚開了頭人會議，要求備好所有馬匹，我想，可能是達賴一行準備到外國去了。

九日上午，我派傭人米瑪去打聽，但羅布林卡各個大門均由藏軍把守，禁止任何人出入，我估計他們已經走了。

十日上午，糧倉職員僧官強佐羅珠群沛告訴我，達賴喇嘛一行已於八日晚啟程前往印度，羅布林卡中的精銳衛教軍也走了一半。』

由此可知，就連前噶倫、衛教軍總司令拉魯都不知道達賴喇嘛出行一事，事前他都是猜測。負責策畫出行事宜的帕拉也提到在出亡期間，曾有人當面問他達賴喇嘛離開羅布林卡的事，他無奈也只好裝傻以應，帕拉說：

『至南嘉貢附近，天氣很冷，達賴喇嘛說是不是休息一下，因該地沒有人家，又未帶墊子，因此我不忍讓達賴喇嘛坐在地上，便說我去找一戶人家，當時我正在牽達賴喇嘛的乘騎，我讓代本達拉替我牽馬後揚鞭先行，到一戶人家問此地情況，對方說最好是到南嘉岡溪卡（貴族的莊園）去。

我們到了策木林所屬的這個溪卡已點燈，在門邊安置下馬凳，上面鋪毯子等，總之做好了一切準備，溪卡的人們對我說：『見到您很是高興，達賴喇嘛出行了嗎？』我佯裝不知地說：『達賴喇嘛出行嗎？』對方說：『覺登大喇嘛來此說，達賴喇嘛出行與否都要做好一切準備。』我說我不知達賴喇嘛是否出行，對方又問：『那您去那裡？』我只好說：『來看看。』

既然藏人中已經廣為猜測達賴喇嘛出走的可能性，那麼中國軍隊應該也已有此警覺才對，在中國的想法上，一開始可能認為因為羅布林卡受到拉薩群眾團團圍住，達賴喇嘛應該還在裡面。但不管中國部隊的砲彈轟炸是有意還是無意，由於砲擊必然造成極大的驚嚇，中國官員應該很容易就可推論出，砲彈雖然未命中目標，但受到圍困的達賴喇嘛已心知非得設法逃亡不可。

然而，就算中國軍隊內部已經獲悉達賴喇嘛出走，但也未必就能掌握達賴喇嘛的行蹤。而且當時達賴喇嘛身上並沒有穿著袈裟，中國軍隊有沒有能力識破達賴喇嘛的喬裝，也是一個問題。目前以各種資料推敲來看，幾乎可以斷定，達賴喇嘛在急促間做出出走的決定，在時間上很可能比中國預期的要早，在達賴喇嘛順利逃出後，中國方面只好以『故意放人』的說法來自圓其說；也因為這樣，中國方面很多『目擊者』口中的人數與真實出入過大，想來多半是出於想像吧！

回顧這段歷史，西藏人基於民族自尊，絕不願相信自己的領袖是在中國的竊笑偷窺下離開；而中國方面力圖平叛，沒想到最後竟讓『達賴集團』溜到海外，造成今日難解的西藏問題，頻頻受到國際譴責，毛澤東雖然贏了『裡子』，但卻重重輸了『面子』。到了九〇年代以後，中國方面一切對外言論齊一口徑的說法，不能說沒有心理戰的成份在內，但究竟有幾分真實，還有待更多的直接證據。

在達賴喇嘛離開後，拉薩終於像東部其他部落一般，進入戰爭的暴風圈。

中國部隊不斷轟炸拉薩城市和寺院，拉薩戰役終於爆發。

拉薩戰後，中國部隊終於用武裝力量『解放』了西藏。對此達拉說，中國提到達賴喇嘛是他們故意放的，他認為沒有這個可能，因為事後得知羅布林卡死了很多人，中國軍隊還去翻那些屍體，看看是不是達賴喇嘛，表示他們認為達賴喇嘛可能在砲擊中身亡，但他們看了好幾具屍體，都說不是達賴喇嘛。

從此，達賴喇嘛已經順利逃出的消息在藏人口中流傳，西藏人心潰散，從拉薩到印度的路上到處都是逃亡的藏人，內心完全絕望。但達賴喇嘛卻沒想到，他們的逃亡會成為全世界關注的焦點，就連遠在歐洲與美洲的人們都想知道達賴喇嘛是否平安的消息。

更沒想到的是，這次出亡，卻接續出四十年流亡歲月的辛酸無奈，達賴喇嘛說：『當時除了逃跑我沒有其他的選擇，假使我留下來，也不能為我的人民做點什麼，中國人最終會捕獲我。我所能做的就是到印度去要求庇護，為我的人民保存著不滅的希望！』...

第二章 和談

一九五〇年一月，莫斯科時間凌晨兩點鐘，莫斯科給北京打了一個電報：『支持北京解放西藏』。

達賴喇嘛的警衛團團長達拉朋措札西說，他曾經看過這麼一個機密文件，毛澤東在當時徵求蘇聯老大哥的意見。得到的答覆是，假使武力解放西藏，蘇聯承諾將完全支持。

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年打敗國民黨後，同年十月一日便宣布要解放台灣與西藏。但當時只說要解放台灣和西藏，並未說要用武力解放。後來毛澤東結束莫斯科的訪問回到北京後，就計畫武力解放西藏。

在西藏內部，卻依然是青康藏高原上封閉自主的農牧社會，達賴喇嘛二哥嘉樂頓珠回憶說，當時西藏內部的情形很複雜，西藏社會非常封閉，這不是一、二年的封閉，是幾百年的封閉，以致非常的保守落後，不要說知道世界的情形，連中國大陸的情形也不知道，還有印度的情形也不清楚。

嘉樂說，西藏人和外國人很少有接觸，只有少數的幾個英國人在拉薩設了一個商務辦事處，還有尼泊爾、國民黨政府也有一個辦事處在那裏，除了這三個辦事處外，西藏人很少和外面接觸。

藏人不太了解外面的情形，也不了解中國大陸的變遷有多大。像是一九一一年孫中山革命後、到國民黨發展抗日戰爭、抗日戰爭後又發生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內戰、然後國民黨到台灣等，這種情形藏族人不太清楚，根本不曉得解放軍會突然解放西藏。

然而，西藏人民在國民黨主治中原期間，卻已先經歷藏區遭致割裂的痛苦，從元朝就有的『大西藏』概念，在一九二〇年初期，由於西藏正規軍與中國軍閥作戰失利，西藏軍隊一路敗退，戰敗後西藏被迫簽署『岡託協議』，明定金沙江以東為非藏人區。原有的大西藏被縮小為僅包括金沙江以西與六個藏人地區等西藏自治區的範圍。換言之，青海省三分之二、以及四川、甘肅、雲南等藏人地區全部被劃在藏人自治區之外。許多被劃在西藏自治區之外的西藏安多、康巴人心中甚為不平，他們認為自己也是藏人的身分不容抹煞。

當時，西藏政府在昌都的總督拉魯還曾計畫乘中國內戰之際，收復玉樹（現青海省玉樹州），阿沛上任後，明確告知西藏政府，藏軍無力收復玉樹。

中國共產黨建立政權後，西藏政府外交部給中國政府軍寫了一封信，信中要求和中國政府進行談判，要求歸還被佔領土地（指青海和西康等），毛澤東於是指示，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

中國解放軍已著手進行各項準備，當時主力軍準備從西北出發，本來是以彭德懷的西北軍為主力，再配合鄧小平和劉伯承的西南主力。後來考慮到戰略地位的問題，於是變成以西南主力、西北配合，戰鬥路線則是從康定前往昌都。

內戰過後，國民黨軍隊很快從四川、甘肅、雲南等地退出，那裡的國民黨軍隊逃的逃、降的降，從一九五〇年三月到八、九月，甘孜等金沙江以東地區已無國民黨軍隊，因為甘孜一帶也沒有西藏的軍隊，共產黨很容易就把甘孜一帶控制下來，金沙江以西雖有藏軍和民兵約兩萬人，但西藏人也未想到共產黨來會有什麼後果，在這種情形下共產黨很容易就控制了下來。

從一九五〇年一月起，中國西南軍政委員會開始著手讓鄧小平與劉伯承將共軍引進西藏，進軍工作主要是由十八軍負責，約有三萬餘兵力。十八軍的軍長是張國華，軍區政務委員是譚冠三。

因為有這樣的戰鬥計畫，西藏政府為了應付這個狀況，由昌都沿線遂行做戰準備，當時昌都地區的總督是拉魯次旺多傑（簡稱拉魯），拉魯是東部西藏總督，駐紮在昌都，他還訓練西藏的軍隊，西藏正規軍約有一萬多人，正在準備中國部隊來時要如何防範、攻擊。

當時有一名英國無線電操作員陪伴在拉魯身邊，不久，拉魯拍電報到拉薩，向西藏政府報告中國已調來強大軍隊，聚集在東部邊境一帶，很明顯有進攻西藏的企圖。當這個警報傳到拉薩時，噶廈立即召開緊急會議，他們明白，西藏正面臨著有史以來，來自東方最嚴重的軍事威脅。

然而，西藏卻沒有武器與人力來抵禦入侵，以維持其領土的完整，唯一能做的做是立即向幾個大國申訴，希望他們能及早勸阻中國。於是，共有四個代表團被派往英國、美國、印度、和尼泊爾。在四名代表離開前，緊急電報已經從拉薩發出。

這幾個國家的回覆卻令西藏大失所望。英國政府雖然表達了對西藏人民深切的同情，並表示遺憾，但由於西藏的地理位置，以及印度已獲得獨立，他們愛莫能助；美國政府也是同樣答覆，甚至拒絕接見西藏代表；印度政府也闡明不會給予軍事援助，但建議西藏不要武裝抵抗，而應進行基於一九一四年『西姆拉條約』的和平解決方法去談判。西藏人因此明白，在軍事上他們是孤立無援的。

『西姆拉會議』是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在拉薩正式宣告西藏獨立後，中國、英國、和西藏三方代表在印度北部的西姆拉，針對中藏間長期來的邊界爭議所舉行的一次會議。從一九一三年十月十三日起到一九一四年的四月廿七日，由三方政府充分授權的談判代表進行與西藏主權密切相關的各項協商，最後終於簽訂了草案，稱為『西姆拉條約。』

這項條約明白規定『中國將保證尊重西藏的完全自主』、『中國在西藏依舊擁有宗主權（而非主權）』；同時，西姆拉會議還將西藏分成兩個區：在東區的康區為『內藏』、在喜馬拉雅山高原中部及南部的『外藏』，中國雖可以在內藏繼續擁有些影響力，但不能干涉外藏行政事務。另外英國方面則賦予可以直接與西藏談判有關邊界和商務的權力。

在三方簽署這項條約後的第二天，中國政府便拒絕承認這份草案。

但是，當西藏面臨來自中國強大的軍隊入侵之時，內部又因為藏東新舊總督交接，使得對中國態度出現前後不一致的情況。由於東部西藏總督的工作有任期，拉魯正好任期屆滿，在這關鍵時刻，西藏政府於是派阿沛阿旺晉美（簡稱阿沛）來接替總督的工作。當時西藏政府雖派阿沛替代拉魯，但西藏政府認為當時的情況比較嚴重，也比較緊張，所以也希望拉魯能暫時留在昌都，兩個人一起工作。但因為阿沛說他可以承擔完全責任，拉魯最後還是離開昌都回到拉薩。

阿沛上任後，卻改變了政策，他認為藏人的力量和中國相比懸殊太大，藏人對付不了解放軍，就應用和談的方式來解決。雖然當時西藏軍隊在金沙江以西打了一些勝仗，也殺了不少共產黨軍隊，但後來因中國部隊從德格、玉樹、理塘、雲林四個不同方向進攻昌都，在這種情形下，昌都就很難確守得住。

而中國西南軍區在四川全力籌劃十八軍進藏準備工作的同時，成立了由十八軍副政委王其美、軍副參謀長李覺和中央委員天寶等人組成的『前線指揮部』，並組成了南、北兩路先遣隊，北路先遣支隊係五十二師一五四團、軍工兵營等組成，主要取道雅安、瀘定、康定等進入甘孜，南路先遣支隊則係五師一五七團組成，取道雅安、瀘定、康定、雅江、理塘、進入巴塘等。

當時最主要則是以從四川進攻的十八軍三萬人為主力，陳賡所部兩個團由雲南向昌都以南發起攻擊，彭懷德所部獨立支隊由玉樹直插昌都退向拉薩的後方要道，堵截後退的藏軍。王震所部則由新疆向西藏西部阿量進發，四路進軍，形成多路向心進攻的陣式。

昌都是一個交通要道，十月間當昌都快要落入共產黨手裡很緊張時，阿沛緊急通知西藏政府，說明情況嚴重，很快就會有危險。隨後，中共部隊的主力即南北兩支先遣部隊便不宣而戰地分路渡過金沙江、怒江、和瀾滄江。從十月七日開始，雙方在昌都進行慘烈的主力會戰。戰鬥於十月十五日結束，由於武器和訓練技術居於劣勢，藏軍約七個代本（團）的五千多人橫死沙場，西藏政府駐昌都總督阿沛阿旺晉美被俘。

當時共產黨解放西藏的口號是『我們不會動西藏人的一針一線，我們也會保護西藏人的風俗習慣、寺廟文化』，西藏人就想共產黨也不會壞到那裡去。共產黨還有一個口號是：『藏人不管是僧人、官員與平民，以前有什麼樣的待遇，未來也不會有任何改變。』

在原國民黨統治區的藏人甚至想，這樣共產黨比國民黨還好嘛！心裡上也曾經表現過一種支持的態度，在這種宣傳下，雖有軍隊，但還是上當了。

總督的更換造成政策混亂讓局勢更無法控制，阿沛從一開始就有棄守昌都的打算，他很快就把他的指揮部搬出昌都，退到西部。因此，當一些藏軍在前線打完仗退到昌都時，才發現昌都已為他所廢棄，不得已只好焚毀昌都的兵工廠和軍火庫，以防落入解放軍手中。

昌都戰役是中國軍隊入藏後的首場大戰，也是中國武力解放西藏的起點，西藏自此開展長達近廿年的武裝遊擊戰，苦難幾乎就從這時候開始。

一九五〇年十月，中國解放軍『解放』了昌都。不久，阿沛再回到昌都，當時中國部隊十八軍五十二師的政委王其美前來歡迎阿沛，同時據說王其美還掉眼淚表示抱歉。

當時王其美說：『我們解放軍為什麼要進入西藏呢？就是為了要保護西藏人，不會有不好的念頭，但在這期間，你們還是受了不少苦，因此我非常抱歉、難過。』王其美建議阿沛派代表去西藏政府，表明現在需要和談，中國也願意以和平的方式解放西藏，不用武力。如果不放心到北京，也可以到昌都來談。

當時達賴喇嘛還未行使政治上的權力，但因昌都情況愈來愈嚴重，西藏政府與老百姓於是希望達賴喇嘛趕快即位，達賴認為自己年紀小，擔當不了這個責任，但西藏政府與人民一再希望達賴喇嘛即位、攝政王辭職，加上神諭所示，於是，達賴喇嘛在他十六歲那年，接下了領導西藏政府的責任，西藏人也把所有希望都寄託在達賴喇嘛身上。達賴喇嘛曾經說：

『在根本無法推卸、無法捨棄的情況下，我十六歲，便不得不肩負起西藏救亡圖存的重責大任，坦白說，這對於一個十六歲的少年而言，可說是一頁極嚴峻的考驗；尤其，論年齡、論學識、論問政治國的經驗..，無論哪方面我都是非常不足的，反觀中國官方卻是暴虐蠻橫。此一期間，我不但要居中協調，致力於與中國和諧共處之道，而且也要考量謀取西藏全民的幸福安樂。』

那時，噶廈已經把西藏危機向聯合國申訴，在沒有得到正式答覆前，達賴喇嘛必須設法與中國達成某種協議，以避免造成更大的傷害。於是，達賴喇嘛透過佔領昌都的中國軍隊司令，給中國政府寫了一封信。

達賴喇嘛在這封信中寫到：『在我年幼期間，我們國家之間的關係曾經很緊張，但我如今承接了全部責任，真誠願意恢復以往的友誼。』達賴喇嘛並且向中國要求，釋放被俘虜的西藏人，並把軍隊撤出被他們武裝佔領的西藏地區。

與此同時，西藏政府對於當時的局勢卻愈來愈悲觀，他們研判後認為中國大軍隨時會向拉薩進軍，達賴喇嘛的生命甚至有危險，因此請求達賴喇嘛能先離開拉薩到接近印度邊境的亞東避難，如果最壞的事情發生，恐怕就得流亡印度。

達賴喇嘛心想，他的情形是否就像四十年前，他的前世一十三世達賴喇嘛般，因為中國入侵而被迫流亡。年輕健壯的達賴喇嘛拗不過眾人的要求，因為對西藏人而言，達賴喇嘛的人身至為珍貴，於是，達賴喇嘛便做好暫時出走的準備。臨行前，達賴喇嘛指定了噶倫魯康娃和僧官羅桑札西二人為司倫（代總理）—全權代理達賴喇嘛負責西藏事務。

另外，更讓達賴喇嘛驚慌失措的是：聯合國全體代表大會決定對西藏問題不加考慮，而且還是由於英國的發言而廢除了此一議題。達賴喇嘛心裡遭受到無比嚴重的打擊，因為在十三世達賴喇嘛主政時，也是英國把西藏視為獨立主權而與西藏相互締結協約，等於暗示承認西藏的獨立，不料現在卻在聯合國大會中說西藏的法定地位不清楚。

至此，西藏對中國的大軍壓境已是全無招架之力，目前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談判了。當時西藏政府希望儘快和談，也希望中國共產黨和西藏的關係就像國民黨時代的關係一樣。而共產黨當時雖不斷宣傳和談，但在金沙江以東的軍事情勢卻愈來愈嚴重，西藏政府也只好和談，以解除當時緊張的情勢。

西藏政府希望談判地點能在拉薩或昌都進行，且西藏談判代表阿沛阿旺晉美必須在中國軍隊不再深入西藏的前提下，才能展開雙方談判。但是，駐印度的中國大使則建議西藏派代表上北京。

不過，西藏政府為何非指定阿沛阿旺晉美為談判代表的策略相當令人不解，當時阿沛在昌都戰役中為中國部隊俘虜，所到之處都受到共產黨的禮遇，等於是共產黨籠絡藏人的『樣板』，可以想像其思想必然受到共產黨相當程度的影響。但達賴喇嘛當時卻任命這樣一個人為主談者，其考慮為何？還需要更多的解釋。

除了阿沛阿旺晉美外，另外幾名談判代表分別是當時的財務部長夏噶巴、布達拉宮的重要負責人圖丹傑布、旺久德丹、與一名哲蚌寺的格西（藏文原意為善知識，亦指佛學造詣極高，有資格講經說法、授課者）。圖丹與夏噶巴分別是正、副領隊，另外還有達拉朋措札西擔任中文翻譯，差仁晉美松贊為英文翻譯，另外還有兩個工作人員。那時還是一九五〇年底，但因為沒有簽證，所以幾名談判代表皆無法成行。

北京沒去成後，幾個談判代表就到亞東，那時達賴喇嘛已經先到亞東避難，在亞東又決定另派代表到北京和談。最後從昌都出發的有阿沛與桑布丹增頓珠、堪瓊圖丹烈盟兩名代表；另外從亞東出發到德里、經香港到北京的有索南旺堆、堪種圖登丹達兩名代表。同行的還有中文翻譯達拉朋措札西、英文翻譯桑都仁欽等。達賴喇嘛指定阿沛阿旺晉美為主要代表，另外四人則負責協助阿沛。

一九五一年四月底，當索南旺堆到達北京時，阿沛等已比他們先到兩、三天了。到達北京後的第一個行程，周恩來歡迎西藏談判代表準備了一個晚宴招待，晚宴上西藏代表與中國代表互相介紹，西藏代表下榻的地方就是北京飯店，和談的地點是人民大會堂，第二次和談地點是目前的統戰部辦公室。

中國代表團的全權代表就是當時統戰部部長與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李維漢，另一名代表張經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室主任；十八軍軍長張國華是第三號人物，第四名代表是西南軍區秘書長宋志遠。

一九五一年四月廿九日，雙方第一次會談。李維漢首先開場白，他提到，很高興以和談為目的大家見面等話，並對西藏政府代表說明開會的時間、如何開會、開會的議題、過程，並要求雙方一定要討論。然後李維漢拿出一本記有十點的小書給西藏代表，要求以這十點為基礎和談。大意是說為了解決西藏人民的困難，不會帶走一針一線、亦會尊重人民的風俗習慣等共十條。

西藏代表也提出幾點和談條件：如承認共產黨政府、希望保有像國民黨時代的雙邊關係、已佔領的地方請歸還給西藏、昌都軍隊請撤退、邊境地區不需要共軍、西藏可以派自己的軍隊維持邊境等。但中國根本不理睬，達拉朋措札西說，當時中國方面一直強調以他們提出的那十點來談，根本不理睬藏方提出的要求。而對藏方而言，中國那十點在未佔領昌都前，都已經宣傳過了。

由於中國不理會西藏提出的幾點，西藏代表不同意，堅持要以他們提出的五點為基礎來談。雙方沒有辦法談下去，李維漢表示一定要把十點記住來談，並說十點中有任何意見都可以提出來。當天沒有談到什麼，藏方提出的那幾點也只好收下來了。達拉說，第一天李維漢所表現的態度非常好。

當時中藏雙方談判情形，在達拉朋措札西的回憶中原音重現。達拉說：

『雙方沒有談出什麼結果，過幾天就到了五一勞動節了。勞動節那天，中共安排阿沛阿旺晉美與我會見毛澤東，只有我們二人在主席台和毛澤東在一起，西藏其他代表就坐在下面。我們二人在主席台上等候毛澤東的來臨，李維漢也一起來，後來並做了介紹。禮貌上阿沛二人也向毛澤東獻了哈達，陪坐一旁的還有劉少奇等。』

當時就坐在主席台上，台下有學生、工人、老百姓都在吶喊著『毛主席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並且放鞭炮、汽球、鴿子，有兩個很大的汽球下面寫著兩個紙條，因為是中文，所以阿沛問我：『那中文寫的什麼內容？』我回答：『一個是『和平解放西藏』，一個是『一定解放台灣』。』

後來汽球飄來飄去，『和平解放西藏』的汽球飄到天安門的屋頂，卡在樹上無法飄；『一定解放台灣』的汽球先也跟著飄了起來，然後又飄走了。阿沛問我，已經飄走的是『西藏』的那個、還是『台灣』的那個，我一看是台灣的那個，阿沛談到：『台灣可能沒有辦法解放』，就說了這句話。

談判繼續進行，中國表示達賴喇嘛的權力不變；西藏政府官員過去若有聯絡帝國主義者，將不咎既往，以後就不許來往。另外中國也談到會尊重西藏的風俗習慣，並保護西藏的宗教與文化，陸續談了在十點以外的好幾項。

當時還談到和平解放西藏後，在西藏成立軍政委員會，軍政委員會主席應由達賴喇嘛擔任。當時圖登丹達說：『前兩天你們不是說不改變達賴喇嘛的地位和權力，今天又怎麼說軍政主席由達賴喇嘛擔任，這不等於改變他的地位嗎？』

圖登問了後，李維漢非常的生氣，他用力拍了桌子，大聲說：『你們一定要聽我們的，不可以隨便講話，我們那有說不改變達賴喇嘛的權力和地位的話？我們什麼時候說過這句話？』他的態度非常的兇。

李維漢又說：『我們是說和平解放西藏，並不是說武力解放西藏，你們聽會比較好，如果不聽也沒有關係，你們要選擇，你們是要和平解放、還是要武力解放？所有邊境都是我們的軍隊，打一通電話就可以了。』

李維漢說：『如果你們不願意聽我們的，你們現在就可以回去了，如果待在北京，我們會好好招待；如果要回去，我們會負責你們的安全，會派人把你們送到中國與西藏邊境。』

談判中斷，隔了幾天，當時阿沛的膽量非常的大，阿沛說：『那現在我們沒什麼話可談，沒辦法談下去了。』這是第一次談判中斷。

後來中國軍隊十八軍聯絡部部長朋措旺傑來了，朋措旺傑是西藏西康人，小時候在重慶長大，他的舅舅是巴塘人，與國民黨關係很好，在西藏人中，巴塘人是較注重中文的。朋措旺傑在重慶時就加入第三國際，與蘇聯有接觸，但以前西藏人並

不知道他是共產黨。在當時談判破裂的情況下，朋措旺傑成為藏方與漢方的橋樑，他認為雙方一定要談判，在他促成下，幾天過後雙方又展開談判。」

在談判進行中時，十世班禪喇嘛正好從青海來到北京，並受到共產黨的歡迎。當時中國除調集解放軍進駐西藏外，另一方面又拉攏第十世班禪喇嘛，以致後來班禪喇嘛曾經寫信給毛澤東和朱德，希望能夠很快解放西藏。

十世班禪的認證過程一波多折，俗名為貢布才旦被『班禪堪布會議廳』確認為是轉世靈童後，就曾經報請國民政府批示，但同時西藏噶廈政府卻又訪得另外兩名靈童，因此堅持應依歷史舊制，經由金瓶掣籤以選定誰才是真正的靈童。由於雙方堅持，只好各自報請中央裁示。

當時國民政府中央希望先改善『班禪堪布會議廳』與噶廈的關係，因此一直未處理此事。一九四九年初，大陸全面撤守，蔣介石宣布下野，代理總統是李宗仁。南京班禪辦事處處長計章美便趁機向李宗仁陳情，請免金瓶掣籤，由於時局緊迫，李宗仁便同意其所請，宣布貢布才旦為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卻吉堅贊，並且派當時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關吉玉到青海西寧主持班禪的坐床大典，當時的青海省主席馬步芳也參加了坐床大典。但是，這事是在西藏政府不知道的情況下做出的決定。

原本國民黨本也有計畫要邀班禪喇嘛到台灣訪問，不料國民黨兵敗如山倒，李宗仁派關吉玉到塔爾寺去舉行典禮，典禮後希望很快把班禪接到台灣，當時班禪喇嘛才十三歲。關吉玉走了後，國民黨在四川重慶已經失守了，那時好多官員包括蔣介石都已經跑到台灣，李宗仁已經跑到美國了。

班禪喇嘛沒辦法，只好避居青海鄉下，那邊有一個班禪的莊園，但中國的彭懷德已到蘭州，已經『解放』，馬步芳也已逃到阿拉伯去了。班禪沒辦法，自然與共產黨合作，於是共產黨派人把班禪接到塔爾寺，後來班禪就在塔爾寺向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說是希望趕快解放西藏，中國就利用這個向西藏做宣傳。

因此當班禪喇嘛到北京時，中國方面要求大家到火車站去歡迎，當時西藏代表團說他們並沒有承認這個班禪喇嘛，所以不去火車站歡迎。中國方面說，就算團長不來，也可以派其他人，後來就派桑都仁欽、達拉等三人去迎見班禪喇嘛。

以後雙方在談判中也提到此事，中共提到國民黨已經承認這個班禪，他們就繼承國民黨的政策，說他是班禪的轉世。

達拉說，他們三個人去，是為了給中國面子，後來繼續談，中國認為班禪的問題必須納入十條中，卻遭到阿沛的反對。阿沛認為，在歷史上有班禪曾經擔任達賴的經師，但從未有班禪掌握西藏的政治權力。阿沛否認中國的說法。當時張國華提到：『我們解放西藏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班禪的地位問題。』雙方意見不同，談判再度中斷，這是第二次中斷。

談判中斷後，雙方各自用餐，後來中國的孫志遠提出一個新的建議，就是十三世達賴和九世班禪過去和好時候的地位要保持，希望藏方可以同意將此項列入條文，阿沛最後同意。在這種情形下，就不得不簽署最後的十七條協議。

一九五一年五月廿三日，中國與西藏代表就解放西藏問題，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因為具體條文共有十七條，因此簡稱為『十七項協議』。這十七項協議內容如下：

- 一、西藏人民團結起來，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大家庭中來。
- 二、西藏地方政府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
- 三、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之下，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力。
- 四、對於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中央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
- 五、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職權，應予維持。
- 六、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係指十三世達賴喇嘛與九世班禪額爾德尼彼此和好相處的地位及職權。
- 七、實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西藏人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保護喇嘛寺廟。寺廟的收入，中央不予變更。

八、西藏軍隊逐步改編為人民解放軍，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武裝的一部分。

九、依據西藏的實際情況，逐步發展西藏民族的語言、文字和學校教育。

十、依據西藏的實際情況，逐步發展西藏的農牧工商業，改善人民生活。

十一、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採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

十二、過去親帝國主義和親國民黨的官員，只要堅決脫離與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關係，不進行破壞和反抗，仍可繼續供職，不究既往。

十三、進入西藏的人民解放軍遵守上列各項政策，同時買賣公平，不妄取人民的一針一線。

十四、中央人民政府統一處理西藏地區的一切涉外事宜，並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與鄰邦和平相處，建立和發展公平的通商貿易關係。

十五、為保證本協議之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設立軍政委員會和軍區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員外，盡量吸收地方人員參加工作，加軍政委員會的西藏地方人員，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及各區、各主要寺廟的愛國份子，由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代表與有關各方面協商提出名單，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十六、軍政委員會、軍區司令部及西藏人民解放軍所需經費，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給。西藏地方政府應協助人民解放軍購買和運輸糧秣及其他日用品。

十七、本協議於簽字蓋章後立即生效。

這項協議最主要內容便在於中國同意西藏自治、但同時西藏應協助解放軍入藏，等於承認中國在西藏擁有主權。這種體制在當時可能不易被了解，這卻正是現在中國不斷鼓吹的『一國兩制』的精神。換句話說，一般人以為在香港已經實施的『一國兩制』是出自鄧小平的發明，但事實上，就十七條協議來看，『一國兩制』第一次實施地區應是在西藏。而中國與西藏間簽署的『十七條協議』，正是北京在一國兩制上的最初嘗試。

然而，西藏代表在簽署前並沒有將具體內容報告達賴喇嘛和西藏政府。達拉說，未做報告是阿沛做成的決定，阿沛說：『我們不得不簽，以後西藏政府與達賴喇嘛有什麼懲罰，全部的責任就由我們來承擔。』

達拉說，因為如果不聽，中國就要用武力解放西藏，西藏的政治、宗教、文化都會受到很大的影響，所以不得已被迫簽了。

因此，當時人尚在亞東的達賴喇嘛，卻是從收音機北京廣播電台播出阿沛的廣播中得知的，聽到廣播的達賴喇嘛大吃一驚，覺得十七條協議比他想像的要壞的多，而且更具壓迫性。雖然協議中也有些中國人的承諾，但是，因為達賴喇嘛內心有著國家主權獨立地位已經失去的憂慮，儘管他個人強烈反對十七條協議，但卻只能接受，唯一希望就是中國能夠履行他們的諾言。其他方面，完全無能為力。

不久，中國駐拉薩代表張經武帶著毛澤東的親筆信和禮物，到亞東去拜見達賴喇嘛，並勸說他返回拉薩。痛苦的達賴喇嘛在一九五一年七月回到拉薩，同年十月廿六日，中國解放軍進駐拉薩。由張國華和譚冠三指揮的十八軍二萬人，在這紙協定的掩護下陸續入前後藏，新疆軍區王震部的二軍，則派騎兵團進軍阿里。

當昌都戰役在西藏響起第一聲槍響後，西藏從此便一直籠罩在武力入侵的陰影中，藏人反而紛紛加入保衛家園的『反入侵』戰爭中，而『平叛』，則成了中國後來引兵入藏的理由。一九五九年拉薩發生漢藏流血衝突事件後，等於雙方都背棄十七條協議，這項和平協議也正式走入歷史中。

從此，在青康藏那一塊高原淨土上，有關『反入侵』與『平叛』的爭辯，沒有一刻止息過。...

第三章 漢人入侵西藏

『中國人來了！中國人來了！』

從中國入藏起，『中國人』竟然成為中國部隊『當兵的』的代稱，『解放軍』、『共產黨』也成了藏語中的新名辭。

有些藏人開始對這些新名辭加以註解；老百姓認為『解放軍』就是『軍隊把繩子解開的意思』。而『共產黨』就是專砍頭上當官的，因為『共』是『頭』、而『產』則是罰的意思。

然而，中國人內部打打殺殺，從國民黨到共產黨，西藏人卻參不透這是一段什麼樣的恩怨；藏人然楚阿旺在西藏東部的康區做買賣，他說，在中國人內戰結束後，共產黨來了，在康區的國民黨軍隊沒有打一槍一彈，他們把國民黨旗幟降下來就升上共產黨的旗子。

但是，共產黨旗子換上沒有幾天，國民黨的一個『田師長』來了，他領了軍隊過來，共產黨又退了出去，但都沒有相互交火，又升起國民黨的旗幟。田師長到處發佈告示，要大家來領東西，把共產黨倉庫裏的東西、鹿皮全拿出來，到處分給老百姓，那時很多窮人都去領了。

大概過了十天左右，來了飛機，共兩架飛機空投很多東西，有黃金、彈藥、鈔票，是國民黨給田師長的補給，田師長不允許藏人出康定，所以他們也一直留在那裏。國民黨還要解放軍俘虜全部套上國民黨軍裝，變成國民黨士兵。這樣又過了三天左右，田師長又帶了許多軍隊、約一萬人往西走，準備向雲南、緬甸方向跑，然後共產黨又來了，但兩邊還是沒有打。

共產黨一來，就開始到處抓人，十幾個一批、二十幾個一批抓了以後，滿街都是貼的佈告，寫的都是中文字，然後再把犯人三、四十人拉到飛機場旁，那裏有一條長長的溝，遠遠看到那些人被槍射死了。就這樣天天殺，和國民黨有關的被抓、被殺，持續了二十幾天，當時有人抗議共產黨殺很多人，二十幾天後屠殺才停止。

西藏人知道，國民黨已被共產黨所取代，讓娘寺加塞仁波切（在藏文原意為大珍寶，用來尊稱有實修成就的師長，中文常以活佛稱呼）提到，中國人很能騙人，國民黨時期他們家鄉被馬步芳統治，馬步芳和解放軍打得最兇時，向他們囊謙廿五族（現青海玉樹藏族自治州）徵派一千匹馬，藏人不敢不交，但在趕著送往西寧途中，半路上馬步芳被共產黨所取代，他們也就把馬獻給了共產黨，以討好共產黨。共產黨因此說，玉樹是最好的，第一個歸順的，並予表揚，還說玉樹的一切不予變更，指派了三人做為他們的代表。

這前來的三個人中，兩個是共產黨軍官，不懂藏語，一個懂藏語的，人人叫他特派員，其實是國民黨的投誠人員，現在已是一伙的。

據康區娘榮人阿丁在他所著『我的一生』中提到：『中國軍隊佔領我們位於金沙江以東的家鄉後，在各地都派來軍事代表，他們建立了一些基層政權，幾乎全部上層人物都被任命了官職，除了宣傳『民族平等』、『民主國家人民當家作主』外，主要就是徵調人力畜力運送物資，一九五二年公路修通後，宣布罷黜烏拉，並給藏人發錦旗，賠償損失等，大約一九五三年初，中國軍事代表被撤消，代替的是黨委書記，開始在藏人中以救濟的名義進行摸底工作。』

事實上，阿丁就曾經是積極份子，幾次被派去進行這類摸底工作，他的上級告訴他，扶貧救濟等只是暫時的，主要是現在先了解情況，為民主改革鋪路。

無奈的是，還沒能夠讓西藏人弄清楚『解放軍』是如何解開繩子時，中國軍隊就已帶著一張嘴、扛著槍的來到拉薩了。西藏人漠然地看著中國軍隊踏上他們的土地，但是，解放軍帶來很多銀元卻是一件受歡迎的事。

藏人洛桑格列說，中國人帶來了很多錢，他們要趕建公路，也修建了很多的營房，於是大量招募藏人去幹活，給的價格也比較高，給的都是大洋。他覺得這是中國人的政策，是為了吸引老百姓，讓老百姓對他們產生好感，所以就對窮人大量給錢，一天給四塊錢，超乎尋常，幾乎是平常的六、七倍，可說是在撒銀子了。

因為這樣，最窮的人有活幹，又有錢買得起東西，老百姓有出路，又稍微安靜了些，共產黨一舉兩得，一方面路修好了，一方面老百姓覺得共產黨也不錯。

而且，讓娘寺加塞仁波切也說，慢慢地中國人愈來愈多，並開始向人民宣傳說：『解放後不要上稅，信教自由，不像國民黨軍隊，共產黨的軍隊是不偷、不搶、不派烏拉（烏拉是西藏原有的一種地租性質的交通運輸勞役，但烏拉差役並不是無償的，如果西藏人民沒有接受土地，就沒有支應烏拉的義務）』等等。

而且，開始他們甚至對撿牛糞的人都以大洋付工資，他們花錢像流水一樣，支應烏拉差役也給大量的超量的大洋做為報酬，並廉價出售白糖、冰糖、瓷碗等，藏人的羊毛、牛皮、甚至狗皮等都可以賣好價錢。

加塞仁波切說，這麼做藏人當然非常高興，所謂：『共產黨像父母，大洋多得像下雨。』就是那時的話。前一句話是中國共產黨給藏人教的一首歌曲裡的歌辭，後一句是藏人的感受。

但漸漸地事情就變味了。

曾任昌都白日縣縣長的洛尼則說，中國軍隊入藏後，一開始藏人並沒有反抗，是因為中國人剛來時，說買賣公開，拿一把糧食也給錢，損壞東西要賠償等文件、告示到處都是，許多藏人不僅不反對，有些甚至有好感，認為中國人來了就不用支差上稅。藏人不懂政治，一開始時如何能懂得中國人的險惡和詭計。

但慢慢地如當時諺語所言：『中國人的政策是溼牛皮帽子，愈乾愈累』，不再像開始那樣一點東西都給遠遠超過價值的錢，不僅不給錢，反而開始徵調，並要沒收私人財產，咒罵宗教和僧侶，不准進行宗教活動等等。於是人們才反應過來，接二連三地造反。

首先是西藏地區面臨前所未有的物價飛漲，洛桑格列說，當時拉薩物價飛漲，拉薩地方突然來了很多人，他們沒帶吃的，但因為他們帶來了很多銀元，人數又很多，街上的東西全部都被他們買光了。

洛桑說，中國人沒來以前，一『克』（約相當於十公斤多）糧食（指的是青稞）要七點五兩左右，中國人來後漲到了七品（一品是五十兩），原來連個十兩都不要的，已經是幾百倍的了。如一般酥油原來只要三、四十兩，後來也是七品以上，到後來街上的食物只有中國人買得起，其他人都買不起。

十三歲時到甘登寺（拉薩三大寺之一）當喇嘛的洛桑更秋則說，中國部隊來時他正在寺院當和尚，一開始幾年都很安靜，除了物價上漲以外，在法律上懲罰的事幾乎是沒有的，他們不懲罰人，也不槍斃人、折騰人，只是物價上漲。一開始中國人還是有花錢，還算講道理，但後來就愈來愈兇暴，一會兒說好話，一會兒又說令人難以忍受的話。

還有藏人說，開始修路時，中國部隊每天給他們四塊大洋，後來愈來愈少。一九五九年中國掌握權力後，就再也不給錢了。

然而，當時愈來愈嚴重的物價上漲卻讓西藏瀕於饑荒的邊緣，達賴喇嘛二哥嘉樂頓珠說，西藏人民抱怨共產黨來後物價飛漲，老百姓都受到很大壓力，吃不飽，因為共產黨有很多軍隊（超過三萬以上）來西藏，要靠西藏本地出產的東西，平時西藏地方大、人口少，出產並不是太多，對於自給自足沒有太大問題，但幾萬的軍隊進來，東西物價漲了很多。

嘉樂頓珠說，一九五二年二月到四月時，他人在拉薩，那時局面已經混亂得不得了，但西藏政府對中國幾乎沒有任何動作，拉薩的人民不滿，天天寫請願書給西藏政府，希望中國共產黨裁軍、不要干涉西藏內政、以及宗教自由等。拉薩經常有遊行、示威，強調簽定十七條協議是中國強迫西藏當局所為，他們認為這是不合情理的。

而且，中國部隊來到西藏的時候，人民解放軍就好像是佔領軍進駐佔領區一樣，所有軍隊走在路上非常威風，晚上抱著機關槍、衝鋒槍到民間去檢查，讓西藏人非常反感。

在拉薩，由於西藏人不斷抗議不應在拉薩維持著這麼一支龐大、無必要的軍隊，甚至物價也讓西藏人面臨到饑餓的地步。因此，西藏反抗入侵組織接連成立，『人民會議』是其中較為顯著者。一九五二年三月三十一日，西藏政府和民間的菁英，利用在拉薩傳召大法會的機會，召開西藏『人民會議』，兩名『主戰派』司倫（代總理）魯康娃和羅桑札西是主要領導者，『人民會議』並推派出五位人民代表向中共駐藏黨政機關請願。

四月一日，『人民會議』組織僧俗民眾共四千多人上街遊行示威，沿路還向駐藏機關和外出人員扔石頭、吐口水，同時要求禁止駐藏機關和駐軍懸掛五星紅旗。當天晚上，部分藏軍和僧俗群眾包圍了中國駐藏黨政機關及中共駐藏代表張經武的住所，還向『主和派』的西藏噶倫阿沛阿旺晉美的家中射擊，拉薩局勢因而頓形緊張，他們並提出：『解放軍撤出西藏、西藏的獨立地位不容侵犯』等要求。

同時，『人民會議』還要求西藏政府應命令地方官員，禁止他們出售糧肉等一切食物及牛糞等一切燃料給中國軍隊。如果中國軍隊不走，就把他們餓死在拉薩。

面對這種壓力，張經武為此親自登上布達拉宮，拜見達賴喇嘛，要求西藏政府按照十七條和平協議辦事，必須立即制止拉薩發生的騷亂，解散反動組織『人民會議』，並要將在幕後進行策劃的兩名司倫撤職，同時要求達賴喇嘛限期答覆。

同時，張經武還宣布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任命十八軍軍長張國華為軍區司令員，十八軍政委譚冠三為軍區政委，命令駐藏解放軍為應付一切可能發生的事變，應作好一切戰鬥準備。

但是當這種情形上報到中國中央與毛澤東時，毛澤東認為以西藏的客觀實際狀況來看，實不宜展開備軍行動，為了緩和中國部隊與西藏政府間的緊張關係，爭取時間以利於進藏部隊，因而決定暫緩成立『西藏軍政委員會』，另外有關推行民主改革及整編藏軍事宜也一併暫緩。同時決定，為了爭取早日修通從四川到拉薩的川藏公路，命令十八軍首先投入修路工程。

而西藏政府也為了相應敷衍中國，不得不解散人民會議，並下令逮捕了五位人民代表，撤銷魯康娃和羅桑札西的司倫職務。

拉薩當時因為物價波動造成人民生活不安外，其實因為拉薩為達賴喇嘛駐錫地，當地又有重要寺廟，因此還算受到相當保護。然而，在金沙江以東的西藏東部，卻在中國入藏後，首先被迫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和『農業合作化』運動，西藏本有的宗教與社會制度受到最強烈的衝擊。

這項運動，即是所謂的『民主改革』，民主改革主要是展開『三反』（反叛亂、反烏拉差役、反奴役）、『兩減』（減租、減息），並且全面進行『土改』（就是將土地分給人民，在西藏的民主改革中，並不是要將土地分給私人，而是建立合作社，西藏在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後，某些地方也曾分配土地，不到一年就變成互助組，所以土改並非民主改革的重點）企圖打破舊西藏的農奴制，並且結束西藏固有的政教合一制。

一九五五年，前面曾經提及的康區人阿丁再次被派去救濟，他們到鄉下時宣稱缺衣少吃的都可以得到救濟，但首先要調查那些人需要救濟，上級並且要他們重點了解誰最具有民望，可能成為反抗的骨幹與領袖。不久阿丁成為重點培養對象，被保送到成都的西南民族學院，他們除了學習『我們偉大的祖國』以及憲法等科目外，還有民族宗教政策。

在這次所謂的學習中，老師告訴阿丁說：『中國是由漢族領導的各民族平等的社會主義國家，各民族可以保持自己的語言、傳統、宗教。』

但老師又進一步解釋說：『民族傳統分為有益的、有害的、以及無益無害的三類，有益的部分可以保存，無益無害部分的取捨由各民族自己決定，有害的部分則要進行改造，因為這些將會成為社會主義的絆腳石。』如藏人多食肉和黃油（即奶油），這些如果拌著蔬菜吃，一份可以讓三個人吃飽，顯然是浪費；藏人衣物寬大長袖，兩個藏人的衣服料子可以縫三個漢人的衣服，顯然也是浪費；藏人的歌曲中，舞蹈雖很好，但內容顯然是糟粕，應該改正；還有藏人花很多的錢買飾品，對生產和再生產不利，又無助於吃飯穿衣等，所以是有害的習俗。

在阿丁這名老師的列舉中，藏人除了舞蹈幾乎一無是處。這名老師同時在談到宗教政策時說：『雖然信仰自由，但在宗教上開支很大，非常的不好，而且宗教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個障礙。』老師並說當大家回家時，家鄉已經建立了農業合作社，並給他們介紹什麼是合作社，說初級合作社是人民將一切生產資料交給合作社，其他非生產資料可以用入股方式，然後按勞分配，幹多少年終就分配多少，口糧由政府統一配給，只要節約一點保證夠吃。

其中有學員問到，如果鰥寡或老人小孩怎麼辦時，老師回答說，可以各盡所能，老人可以幹手工活，幹不動的可以到地頭趕麻雀，小孩可以幹放牧等力所能及的活，總之，合作社是人人有活幹，大家一起幹。

藏人貢秋在這方面的回憶是：

『中國軍隊是在四九年時進入我們部落的，剛來時他們說：『你們是唸經信教的人，我們來與你們無涉，主要是部落附近有許多國民黨、馬步芳的殘兵敗將，以及土匪等，這些人對我們都不利，所以不過是經過你們的部落而已，不會傷害你們一根毫毛，我們要砍伐森林，每一棵樹木都會給付錢給你們，為運輸要修路，佔了你們的土地也會付錢，中藏各為一家，不會干涉你們。』藏人信以為真，說是要『解放』我們，但後來才知道完全是另一回事，於是西倉部落的頭官煥覺多登和喇嘛嘉以及丹增嘉等人領導部落的三百餘男子反抗。

以前，國民黨時期，由於反抗，我們寺院的幾十名僧侶被捕後以繩索穿過肩胛骨押送；共產黨來了，又只好繼續反抗。當時五世嘉木祥（活佛名稱）的哥哥洛桑才仁從中調解，才使中國人承認他們工作不當、藏人反抗也是受特務土匪的挑唆等，最後，中國人給了一些錢做為賠償。

當時在措尼等峽谷高山上馬步芳部馬良的土匪，台灣方面曾派來飛機空投武器，因此引來大量的中國軍隊，對藏人喇嘛給高薪和一些名號。等那些土匪被趕走後，又開始宣傳社會主義非常好、信教自由等。

一九五四年時，中國召集二百餘部落頭官、大喇嘛到中國內地參觀，西倉頭官煥覺多登也去了，在北京，中國人告訴他們：『明天要去見毛主席。』煥覺多登對同伴說：『是上師喇嘛可以說是去朝拜，是僧人可以說是去聽經，去見一個漢人老漢，幹什麼呀？你們要去就去，我就是不去。』

在船上，人家坐在凳子上，他卻說家鄉都是席地而坐，我坐不慣，而回船睡覺。像這類表示不滿的事有許多，後來他被捕時，稱毛澤東為『漢人老漢』和『不見毛主席』都成為他的主要罪行。

一九五六年，又出現反抗事件，最後中國人勸降，派拉卜楞寺的江瓦納日和嘉窩阿貢勸降，雙方約好次日繳槍，中國概不追究。但第二天，中國軍隊卻包圍已將槍收集一處的西倉和拉日貢部落，突然攻擊，打死僧俗男女共四百多人。嘉窩阿貢來到設在達參寺旁的解放軍指揮部，說：『你們怎麼能這樣欺騙我們？』並拔槍欲射，但被敵兵抓住，從此失蹤。當時，西倉部落有一叫達若的人，槍還在手中，拼死抵抗，打了很久，聽說打死了許多中國人，但最後還是飲槍自殺了。

到了一九五八年，戰事又起，那一地區絕大部分部落都起來反抗，藏人被打敗，死傷無數，活著的人有的逃入山中，有的被俘。

我十二歲入寺為僧，不會打槍，也未直接參戰，一九五八年，中國人在我們寺院（貢保納嘉）逮捕了一百五十餘名僧侶，寺院並未參戰。當時也不僅僅是我們寺院，到處都在捕人，被捕者中，我們寺院回來的不過二十餘人，我被關押在合作寺法座的經堂，開始關了三千餘人，我出獄時只有四百餘人活下來。其中中國人只有幾名而已。

那些死去的人，共產黨在寺旁挖了一個大坑，全埋在裡面，每天死十幾個人，都是因餓而死。冬天土凍，屍體就堆在寺院的馬廄裡，後來死人太多，馬廄也容不下了。我是五八年八月二日被捕，也沒什麼罪名，如果勉強算，由於我是一位大喇嘛的侍從，他們說我知道這個大喇嘛的財寶，其實我並不知道有他們所說的財寶，最後判了三年，由於年輕，才活了下來。

當時，有一個叫瑪吾夏嘉的人，在政治學習時說：『你們說政府和父母一樣，封建社會，帝國主義是壞透了，但以前藏人，不管是頭官或百姓，並不缺吃少穿，雖沒有許多大米，卻也不缺糌粑、酥油，雖沒有汽車飛機，卻也是上者有馬、下者有牛可供騎乘以代步，雖沒有許多綢緞洋布，卻也不缺皮袄、氈氍，你們父母般的國家和政府，每天卻只有一頓山上的牛兒不喝、門口的狗兒不聞的稀飯，一天死十二、三人，這是吃的好的緣故嗎？（幹部在會上常說犯人吃得很好），你們叫我們講衛生，晚上用罐子當尿盆，白天當飯盒，是這個緣故嗎？

話說完，此人隨即被捆綁，押在黑牢中，不久死去。』

『民主改革』的和平解放運動約是從一九五五年起持續到六〇年初期，不但因此引發各地抗暴事件，許多藏東地區的康巴人和安多人被迫離鄉參加戰鬥，最後數萬人擁集到拉薩，更是間接種下一九五九年拉薩事件的主因。

而在一九五六年底時，中國曾決定在六年內，即第二個五年計畫時間（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二年），西藏將不進行改革，也不改編藏軍，就是所謂的『六年不變』，和香港實施一國兩制後所謂的『五十年不變』，其實是同一個思考邏輯。但令人遺憾的是，中國卻很快在西藏各地強行推動所謂的『民主改革』，令西藏人陷入了高度的恐慌。

當時，各種奇怪的說法多了起來，會議也多了起來，會議中中國人不斷講解放的好處，並說解放後就幸福了。有時開會要求參加會議的人發言支持文件內容，不支持就說要做思想工作，要拖很久不能散會，藏人沒有什麼政治觀念，認為既然這樣就先支持再說吧，能早點回家就是了。

理塘人當札說，中國人在他們的家鄉『解放』時，首先要人們繳槍，然後說『三年不變』，說『解放』是要人民自覺等。而當時理塘幾乎家家戶戶都有槍枝，人都很強悍，槍枝有的是中國來的、有的是印度來的，沒有槍的幾乎沒有，最貧窮的也會備有一、兩枝槍。當札說：

『人們開會商量討論該怎麼辦，許多人都說中國人是在騙人，決定不繳武器，中國人則堅持一定要繳槍。當時地方縣長全部到中國開會，後來中國人讓縣長們回來，要他們勸藏人說：『繳槍即可，不解放了。』縣長回來，向藏人解釋，中國非常強大，是打不過的，不如投降等。

共產黨表明要談判，使者天天都來，理塘來了很多中國軍隊，藏人在此時問護法神，到底要不要與中國人和談，結果護法神吉祥天女說和談最好，不要打。當時也請喇嘛來唸經，也請他們算卦，都說是和為貴、戰不好。

但是中國軍隊卻包圍理塘寺，要藏人繳槍。藏人在寺院開會商量，有人不投降也不願交槍。有一叫登永阿成的，他說降也死，不降也死，要死的有名目，說罷起身就走了。其他有人主張投降者，也有反對者，群龍無首，吵成一團，當晚集中在理塘寺內的四、五千名不投降的藏人各自為陣，散亂的向外突圍，於是殺的殺，逃的逃，投降的投降，慘不忍睹。

五、六個月後，登永阿成招了千餘兵，開始與解放軍在理塘交戰，第二年，中國部隊大量增援，藏人終於被衝散。』

此外，讓藏人更無法接受的是，中國共產黨那時還到處宣傳僧人很壞，說僧人是在欺騙人民、剝削人民等，所以僧人每次都是以不安的心情出門，當時每個人都很不安，不知那一天災難會降臨。

讓娘寺加塞仁波切也說，當時那名懂藏語的漢人經常向藏人暗示今後共產黨會做什麼，他說寺院已經沒有用了，中共是不允許信教的，向佛像下跪磕頭有什麼意思呢？還給點酥油燈，幹什麼要浪費呢？把佛像放倒，他自個兒都翻不過來，擺很多的供品幹什麼？誰吃啊？

藏人氣得都說他是鬼。他還向藏人說：『有錢快花，有富快享，以後這些錢只會帶來災難，都要充公』等等。

加塞仁波切又說，到了一九五八年初，說是要開一個極重要的會議，於是叫各部的百長（百人之長）和部落頭官等都到結古，每天開會要參加會議的人響應建立合作社。眾人不從，開始公開反駁，慢慢的就對參加會議的人從開始的禮遇變成每人配一個警衛，早晨由警衛押著去開會，晚上回來就守在門邊，反正一定要支持合作社。

雍珠則回憶說：

『大約是那一年的藏曆五月，中國突然要各部頭領全部去結古開會，但去的就被抓走，沒去的就開始和中國人發生戰爭。有個喀納部落的百長開會召集部民說，我如果去開會，肯定是回不來的，現在有個選擇，大家是願意和中國人幹，還是願意接受中國人的統治？我認為這其實是同一種選擇，一個是背著槍戰死，一個是背對著背被鬥爭而死，反正都是死，大家願意如何的死法？部民同聲要求酋長不要去開會，他們寧願戰死。

有一天我們渡河時，山上兩個放馬的高聲叫喊：『中國人來了，中國人來了。』我們不知中國人在那裡，當時我們大部分已過河，見對面田地裡有許多穿藏裝的人向我們這邊奔來，快到河邊時，我們才見到跟在他們後面的是中國人，我們立即隔河向他們射擊，那些『藏人』也脫去藏裝，露出裡面的中國軍服，……。

打完仗後中國人開始抓人，不管是否參加過戰鬥，都一批批地逮捕，反綁著雙手被押往中國，幫曲寺在當時並沒有參加戰鬥，而且還在中國軍隊一到時就投降，但最後寺內全部寺僧還都被逮捕，活佛南喀堅贊被押到西寧，寺院完全被摧毀，人民還被迫參加拆毀寺院的行為。

其他沒有被抓的藏人被中國人強逼在牧區開荒墾糧，建立所謂的國營農場，每天只分發一點點食物，到後來幾乎沒有了，就紛紛挖野菜，但我們家鄉並沒有很多的野菜可吃，一般老百姓多在國營農場內餓死，頭面人物和地方上稍有名聲的、以及精壯男性全部被押到西寧和北方荒漠地帶，絕大部分都死了，只有零星幾個人僥倖活著回去。』

當時的情形令活佛也忍不住感傷，加塞仁波切接著說，由於死人太多，幾年過後，野外到處是累累白骨，也無人收拾，彷彿一堆堆白玉石。

此時，一些所謂的『積極分子』在中國人的督促下，也跟著說佛教是騙人的、麻醉人民的等等，讓人民幹拆毀寺廟的暴行，人民不敢不從，怕被說成是落後份子，遂使地方成為『米拉的故鄉』（指成為荒蕪之地）。

飢餓中，百姓只好撿拾敵人軍馬的馬糞蛋中未消化完的豆子，這些豆子看似完好，聽說吃了以後卻沒有一點營養，又或者是在敵人官兵、幹部倒在垃圾堆中的飯渣充飢，當時有個年老的寺僧叫白果南達，餓極了將小孩的屍體都給吃了，隨後他被人告發，後來就永遠失蹤了。

西藏禪古寺僧白瑪果牙提到，他們寺院每到藏曆五月有一個叫禪古策珠的宗教法會，十四號是跳神，十五號則給人灌頂，在灌頂的這一天，四周的信徒雲集，人員集中，中國乘此機會卻突然行動，中國軍隊包圍了禪古寺和禪古村，人民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不知所措，中國人於是開一條通道讓藏人過，一個一個的過，凡他們想抓的人全部被捕，因為人民是前來接受灌頂，當然誰也沒有帶武器，所以被抓時都是束手就捕。

白瑪果牙說，與此同時，中國人在結古行動，結古鎮中他們要抓的大部分人都被逮捕了，前後共有幾百人被捕，這些人從此就從這個世界消失了。也不知押到什麼地方，死在什麼地方，沒有人知道。

藏人雍珠說，一九五八年，當禪古寺院舉行次珠（六日之意）法會，結古和附近地方的人有許多人都在觀看，中國人突然行動，將參加法會有些名聲的、或較能幹的、家中有槍的人全部無故逮捕，並到結古的藏人家裡大肆搜查，收走了全部的槍枝，連舊火藥槍都沒有留下。

在這方面，班禪喇嘛在一九八七年三月人代表大會討論會上的發言中也談到：『青海的夏茸噶布和馬裡等地區的牧民等早已把部下的幾千枝槍收起來，上繳到政府，當時並開了大會表彰他們，還讓他們戴上大紅花。可是回到住處地一下車就全被抓起來，長期關押。』

班禪喇嘛說，在青海地區一個部落有一千到三千戶，人數約四、五千不等，每個部落被抓去的人數是八百到一千不等。

再以禪古寺而言，禪古寺當時並沒有去圍攻結古，在結古戰役結束後，中國人卻來攻擊禪古寺，禪古寺內沒有一枝槍，天亮才發現被包圍，就打了起來，反抗的僧人被打死六、七人，其他人全部被捕，幾個那天碰巧在外邊的得知寺僧全部被抓，就趕緊逃之夭夭了。附近的藏人又反攻了一次，敵人退回結古，藏人進入寺院時發現，除了三個僧人躲在角落僥倖未被發現外，其他寺僧已全部被逮捕了。寺院的門、窗、佛像等已被砸得面目全非，倉庫已被劫奪一空。禪古寺有七百餘名僧人，後來只有兩、三個人活著返回家鄉，其他全部死在監獄中，加上逃脫的，全寺所剩的僧人也不過十餘人而已。

拉妥人白噶成列也說：『在達賴喇嘛要去北京之前，我們家鄉有一叫格日茶卡的鹽場，由於白教喇嘛永格木金多傑認為不能開採而封場，已很久沒人開採了，中國人明知這些，卻派四、五人前來開採，鹽池中有一寶塔，因當地缺少石頭或不知什麼原因，整個寶塔是使用獸角壘疊而成，有牛、羊、鹿、黃羊等我們地方有的一切動物的角，人民甚為珍視，因年久寶塔的許多部分已埋入地下，中國人在採鹽過程中拆毀了這個寶塔，人民甚為不滿。』

當時有一個叫擦倉格日秋旺的人，是個有三十餘名士兵的小軍官，他和我哥哥無吉尼瑪商量後決定驅逐這些中國人，於是由他們率領，我們帶上袋子偽裝前去取鹽，暗中帶上刀槍。一直到中國人吃飯時為止，我們都慢吞吞地裝鹽，終於中國人在他們住的草皮房門前集合，唱歌吃飯，只留下兩個哨兵，槍枝也不隨著帶出而留在房內，我們七十餘人突然發難，敵人措手不及全部被俘，奪得四十餘枝步槍和許多子彈，其中除翻譯的槍是三八步槍外，其他全是七六二步槍。

我們將俘虜的衣服全部剝下來，將他們捆起來各抽了兩百鞭做為懲罰，最後討論這些人的處理方式，一些人建議殺掉，另一些人說不能殺，殺了就麻煩了。當時我們曾存有談判的念頭，最後訓斥他們一頓說他們不遵守喇嘛禁令，犯了採鹽毀塔等罪行後放行。

但中國人當時似乎不願意把事情鬧大，中國人一直這樣，他們會在最憤怒時後退向你示好，又在最友好、最沒有理由時突然動手殺人，他們肯定要考慮大局，不像我們只看到眼前的事實。

總之，中國人在做出出兵報復的樣子後接受了調解，並且希望我們交出j枝東西和兇手，但奪來的米麵我們早就分給人民吃光了，我們便收集了四十枝性能差的槍，還有他們的衣服等交給前來的人帶回，但是事情並未圓滿解決，因為中國人不承認『冬』，冬是藏人的一種賠償習慣，殺人後賠上一定的財產，即稱為『冬』。非要我們交出兇手不可，還要我們交出被搶的槍而不是頂數字的破槍，我們實在捨不得交出那些槍，就謊稱槍已被部落的強盜拿走了，當時我們部分人已躲在山上以防中國人的報復攻擊。

不久，達賴喇嘛從北京回來，我們已經沒有後顧之憂了，雖然與中國人的糾紛還未結束，但我們對交出兇手已經沒有誠意了，甚至懶得再編造理由搪塞。我們認為中國人遲早要收拾我們，不如大幹，並且決定切斷中國人的交通，但在討論何地切斷交通時，說在江達切斷，江達地方的人立即說不行，並舉出一大套理由，說在昌都切斷，昌都的人又是一套，反正是大家都希望反抗，但又希望自己家鄉能保住，不致在中國軍隊的報復中被摧毀或遭遇損失。

我們最後說：『那就在我們拉妥地方吧！反正我們已經殺了中國人，中國人也一直在追捕我們，我們中的許多人已不得不留在山上。』大家於是決定在我們的地面上伏擊中國軍隊。

當時在拉妥縣有四百餘敵軍，他們由於沒有後援，補給中斷，不久悄悄從伊曲喀繞道退回了昌都，拉妥王也在昌都，一直是中國人的幹部，敵軍在臨走前召集拉妥縣的人民開會說：『我們暫時回昌都，物資託當地藏人保管。』我們得知敵軍退出後，馬上進入拉妥縣搶劫中國軍隊留下來的軍用物資，燒毀敵軍的營房，告示全體百姓：『從今天起，要與中國人打仗，以後不許通敵。』並將幾名通敵的奸細抓獲後處決了。

我們回到家鄉拉妥，有些牧民想轉移到我們的陣地來，那些牧民個個人精槍好，裝備也相當不錯，但我們去迎接時，卻見他們扶老攜幼，趕著全部牛羊，不像是在打仗，而是在遷移牧場。也難怪，誰也不忍留下自己的親人獨自逃離，這也是我們藏人失敗的一個原因。實際上，在戰鬥中大批被打死的往往就是這類人，每次逃跑都是一群一群的，槍彈一掃射就是死傷一片。

一天清晨，我被槍聲吵醒，立即起來給馬備鞍觀察，只見蘇莽寺的僧侶一路逃來，只聞槍聲，不見敵人，不久敵又開始砲擊，那些僧侶中已有部分人倒下來，整個房子都在顫動，我們盲目打了幾槍，心中稍感恐慌。

當時很亂，寺僧死了約十八人，其他百姓死的也不少，一路我們和敵人亂打一陣，也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辦，該到何處去，傳說在結束已集中了七萬名敵軍，全是騎兵，因此我們在峽谷中四處躲藏，約七天左右，便向昌都雜夾瑪貢方向逃了去，當時有敵機空投下大量傳單，上面寫著：『立即投降，保證不打、不殺、不抓等，並講了許多無路可逃的道理。』

到昌都，得知薩迦派的臥擊寺已毀，該寺三十餘僧利用有利地形拼死抵抗，殺死許多的敵人，由於槍管發熱打不出子彈，在敵營中的一個囊謙女人聽到寺僧用藏語相互喊叫『槍不能打了』，便告訴了中國人，中國人趁機發起攻擊，寺僧被迫持刀與敵肉搏。除一幼僧裝死而倖免遇難外，全體寺僧全部壯烈戰死，其他藏人則遠逃到各地。

好多藏人藏在昌都雅倉後山的密林中隱藏，有一天我與弟弟去雅倉磨糌粑，突然遭敵軍包圍，因怕在寺院中戰鬥會累及昌都寺和印經院，乃將槍藏起來後在馬圈中偽裝成馬伕，但是沒有用，因為他們的許多提問我們不是答不上來就是牛頭不對馬嘴，明顯的還是在說假話，因此還是被捕了。

成千上萬的中國軍隊向囊謙方向開進，我們十餘個俘虜和由當地藏人收繳的四十餘馱槍枝，由其中的一個連隊負責押送。其他被捕的多是德格人，其中有一名俘虜不斷遭押送者的刀劈槍砸，身上鮮血淋淋，在翻山時，我們落在後面，在住宿時，有一個中國士兵走過來要取我馬上的馬鞍，我不給，發生爭執，我以馬鞍擊倒這個年輕的矮個子士兵，但最後我的馬鞍還是被搶，人還差點被打。

第二天繼續步行，幾天後快到香達時，我向翻譯要茶喝，翻譯說：『喝茶的歷史已經結束了。』

過河時，果然見河對岸有四、五十名滿面怒容的藏人，手持木棒在等待，一見我等便喊，你們這些反動派，為什麼不再『嚇咯咯』（藏人或主要是康巴人在發起衝鋒或壯聲威時，經常發出的一種吶喊聲）的叫聲呢？有一個男人突然過來一下打在一個囊謙俘虜的臉上，那人手中的尖石頭把那個俘虜的幾乎半個臉給撕了下來，慘不忍睹。我馬上說：『要打就打反動派，請不要打我們老實人。』他吼道，什麼老實人，人民解放軍已說了你們是反動派，還裝傻，說著向我擊來。

這時一些中國兵一擁而上，幾個藏人也在後面踢我，隨後中國人把我押到一間房子內，房內關著七百餘人，全是囊謙人，其中還有一個叫阿德日囊的人，是一名西藏等級較低的政府官員，他還哀求要我裝成不認識他。

隨後開始開會交待問題，有錢人家必須交待是怎麼致富的，若說是勞動致富是絕對不行的，必須說是怎樣剝削人民的。一些喇嘛則被逼迫交待自己是假喇嘛，曾與女人甚至同自己的妹妹、姐姐通姦等，有蘇莽拉雄寺的喇嘛氣急敗壞地在批鬥會上說：『呸！我怎麼會幹這種事情。』批鬥的人說：『拉卜阿旺則莫已經承認有這事。』他說：『拉卜阿旺則莫是我的上師，怎麼會像你們到處亂咬。』

又問：『你是否給反動派護身符？』他答：『不管是不是反動派，凡跟我要的人都給了。』於是那些人拿出刀子說：『看你是否能刀槍不入？』隨即從手臂上割下一塊不大的肉，頓時鮮血立即染紅了一半的身體。那些批鬥的人喊：『大家看，他的肉都不能擋刀槍，他的衣服怎麼會刀槍不入呢？』

隨後又逼迫一個僧人交待雞姦的事，他不斷地辯護沒有這回事，不承認便被打，打得那個僧人倒在地上起不來，然後叫我弟弟問：『你想不想當喇嘛？』他立即回：『不想。』就讓他坐了下來。

輪到我了，我想豁出去了，反正一死，就歷數他們的所作所為，說：『你們剛來時讓我們運送物資，說是會給錢，結果什麼也沒給；修公路從田野中間穿過，說是給補償，也沒給；修路炸藥爆炸，死了近百人，說是給補償，也沒給；說是信教自由，結果是殺僧毀塔，凡是聽你們的話就有信仰自由，不聽話就說是利用宗教的反動派；你們說的比杜鵑鳥還好聽，做的比餓狼還要兇殘，所以我要造反，不僅造反，還殺了你們四、五十人，又如何？』

立即有人跳上來問：『你想死還是想活？』我說想死，會議主持人說：『這人死不悔改，請大家幫助教育。』於是立即圍上來一大堆人，揪頭髮，拳打腳踢，我還打了一個人，隨後的暴打使我完全沒有還擊的機會，不一會兒我就被打得暈頭轉向倒在地上。

那天阿夏百戶也沒有屈服，他是一個白髮蒼蒼的老頭兒，他說：『我怎麼是反動派，我是阿夏百戶，是從小以十善佛法、十六人法約束自己的人，你們才是反動派，滅教毀寺、誣蔑三寶...』話沒說完早被擁上來的打手給打翻在地，即使如此他還是罵個不停，說中國人是賊狗，罵那些打他的藏人是狗。

如此我被管了十五天，打了十五天，我的滿懷勇氣也被打得差不多了，從第十六天開始，我再也不敢充好漢了，但阿夏百戶寧死不屈服，中國人要那幫打手在不打死人的前提下對我們進行『幫助』，不久他們決定送我們去中國。』

在共產黨入藏後，在金沙江以東，中國軍隊強迫僧人結婚，或是逼迫他們屠宰牛羊，不還俗、不殺生的就會遭到批鬥。

而且，共產黨在批鬥寺院喇嘛時，口中說『和尚是紅色的賊』，就是指穿著袈裟的出家人；而喇嘛則是『黃色的強盜』，意指上師等轉世活佛。

藏人才仁嘉措就說，西藏迪康寺的和尚凡是留在寺院裏的每個僧人都配了女人，這些女人有的是志願的，有的是被叫來的，有的和尚跑到山上的就算了，但留在寺院中的每個人都配了一個女人。

女人配僧後，第二天女人就要回報：『和男人發生關係了沒？』有些女人好心就謊報說：『已經發生關係了。』但壞女人若說：『和尚昨晚沒理我。』僧侶就會遭受又是打又是批的命運。

有些和尚到這般田地都還是不聽話要守戒律的，頭上會被人澆汽油點著，中國軍隊口中說：『你想做真正的佛教徒，就點火讓你成佛吧！』有的人就這樣燒死了。

當時在普巴本部有一戶人家叫拉欽貢保的，此人在迪康寺為僧，當時他因為堅持守戒律被燒得很厲害，但還沒死，家裏有一個女傭人不忍心，就說：『我們兩人睡過了。』這樣才能有逃脫的機會。於是他們二人冒充夫妻，過了一年後，就逃走了。

由於中國部隊入藏後於一九五五年開始推行民主改革，也因此藏人居住的地區造成過大的衝擊，就連當時已經投降中共的班禪喇嘛也深覺憤怒。第十世班禪喇嘛在青海視察時，發現民主改革使得藏人非常窮困，有的連飯碗都沒有，他曾大罵

地方幹部：『舊社會要飯的手裡都還有個破碗，蔣介石、馬步芳統治青海幾十年，藏族老百姓也沒有窮到連個碗也買不起的地步。』

第十世班禪喇嘛額爾德尼因此在西元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八日時，上書中國總理周恩來，這份七萬言書的正式名稱是『通過敬愛的周總理向中央匯報關於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區群眾的疾苦和對今後工作的建議』，班禪喇嘛在信中揭露了中國平叛與當時的民主改革的大量事實，這些指控更成為今日佐證歷史的重要史料。

在西藏，班禪是地位僅次於達賴喇嘛的重要活佛，而且，自從五世達賴喇嘛拜四世班禪為師後，五世班禪又拜五世達賴為師，六世、七世達賴喇嘛又拜五世班禪為師，自此形成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互為師徒的歷史系統。

而在五世班禪以後，清朝歷代皇帝更特別禮遇班禪，以貫徹既定的分削政策，因此西藏歷任班禪轉世系統與中原朝廷關係均極良好。

而在中國共產黨全面控制大陸後，立即進行籠絡班禪的工作，一九五一年四月班禪會見了當時的中國總理周恩來，五月又獲毛澤東接見，這些殊榮讓當時這個十三歲的孩子非常興奮。

當中國在一九五六年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時，就曾經請班禪代為宣傳，使藏人能夠理解自治區將來的運作。更早之前，中國本已於一九五四年九月選達賴喇嘛為第一屆全國人代常委會副委員長，選班禪為常務委員，同年底又選達賴為全國政協常委，班禪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兩人職位雖高，卻是虛職。

班禪喇嘛從此時擔任中國職務後，終其一生均與中國為伍，在一九五九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後，班禪更被提升為全國人代常委副委員長，任原達賴之職，實際負責了西藏自治區的推動，並配合中國政策，將西藏建設成為社會主義地區。

班禪喇嘛提到，民主改革本來應是為挽救宗教和民族利益而做，但是後來卻發生了一些錯誤。如很多人可能只是在叛區住了一下、或是給路過的康人和安多人借宿也都被認為與叛亂份子有勾結。而對於不得已支援叛亂團體的，也都戴上自願支援叛亂者的帽子。甚至還有一些人竟毫無原因地就被加上叛亂份子和反革命份子的罪名。他在七萬言書中指出：

『如在土地分配上，民主改革中對農奴主所有的土地和生產資料，按所有者參叛與否，加以沒收和贖買，分配給所有農區的人，廢除了西藏土地的封建農奴所有製，建立了農民所有製。但是，又因為調查不深入，以致又有很多人戴了黑帽子，很多不應該被沒收的家戶卻遭到了沒收。而中、富農奴如果在行動和言語上稍不加檢點，就會立即遭受打擊。

牧區方面的情形則大致和農業區相同。一些共產黨幹部在農業區搞完激烈的民改鬥爭後，頭腦正在發熱，因此一到牧區又對許多牧主和富裕牧民展開了激烈與尖銳的鬥爭。致使許多牧主和富裕牧民，只考慮如何保全自己的性命，無暇顧及牲畜的管理和繁殖。

同時，民改後，由於對糧食抓得過緊，以及對群眾留糧的標準太低，因而造成口糧吃緊。由於當時糧食缺乏，緊張與缺糧的人民難以從別處弄到糧食，以致在西藏發生了有人餓死的情況。這是非常不應該、拙劣的、嚴重的。過去西藏雖是黑暗、野蠻的封建統治社會，但是糧食並沒有那麼缺，特別是由於佛教傳播極廣，不論貴賤任何人，都有濟貧施捨的好習慣，討飯也可以完全維生，不會發生餓死人的情況。

因而，西藏人為了解決生活問題，只好吃掉許多牲畜，對發展生產帶來很不利的條件。民改時，由於禁止來往運送食物，並對人們在各地往來也嚴加限制，因此城市需要從農村運來的物資差不多都中斷了。而城市內對餘糧又大量收刮，甚至連香袋內的糧食和糌粑也收了。大多數人家都被搜查，居民自己庫存的口糧、青油、酥油等，差不多都被挖光了。

而且，由於政府對於城市的口糧、青油、酥油等未能及時供應，或供應欠妥，不少居民的口糧很緊，有的斷糧，肉類、酥油、青油等極欠缺，連燈油也沒有。甚至買不到燒柴，人們恐慌著急，叫苦連天，不安營生，致使城市情況緊張，名實兩損。另外，有一個階段由於全區的家庭紡織停頓，群眾在穿著方面也受到了影響。』

班禪喇嘛在這份七萬字的意見書中慷慨陳言，他強調，原本黨的政策應該是只對那些執迷不悟的叛亂份子、反革命份子、最反動的領主及其代理人實行專政，但，後來全西藏關押犯的數字竟達到了總人數的百分之幾，班禪喇嘛嚴重抗議：『這是歷史上所沒有過的。』

班禪喇嘛說到，在一九五九年時，毛主席曾經指示，由於西藏人口少，應採取不殺人或只殺極少數人的政策，比如叛亂頭子拉魯和羅桑札西不殺也可以。但事實卻與此相反，到處有犯人被關押，也出現了許多不應當得死罪的犯人的屍體，這會使得千百戶人家的父母妻子兒女親戚朋友十分悲傷，眼淚不斷這是不用說的。

關於西藏寺廟內的封建農奴制的特權和壓迫剝削，班禪喇嘛說，因為近一、二百年，尤其是近十年期間，西藏一些寺廟的統治者在各級封建政府的支持下，以各種特權對廣大僧俗進行殘酷的壓迫和剝削。班禪喇嘛說：

『但是在西藏各寺廟中，有各種不同的狀況，不能說百分之百的寺廟都是那樣。說每個喇嘛都是那樣是不對的，一般的喇嘛沒有那些罪過而且依教行事的善僧們更不會那樣。..以致後來在寺院發動『三反三算』運動時，在實際工作中『反對宗教』本身甚至成了主要的工作。對於應予保護的聖潔對象，盲目瘋狂地進行激烈的反對，因此在西藏的宗教寺廟問題上，發生使人們魂散神迷，傷心至極以致哀號的不好現象。

黨在寺廟中主要是依靠貧困喇嘛，基本上來說，這是正確的，但是貧困喇嘛中，也有一些是由於從前貪酒好賭等壞行為而變窮的。所謂『三反』，反對宗教是其一，即所謂破除迷信；消滅佛像、佛經、和佛塔此其二；千方百計的使僧尼還俗方其三。

在千方百計使僧尼還俗的時候，首先在各寺廟以所謂『學習』和『發動』的名義，將僧尼集中在大經堂和大房子內，不分晝夜地緊張的學習和強迫動員其互相批評。對公開表示信仰宗教的人，戴以迷信份子和不喜歡革命等各種帽子，進行無法忍受的、沒頭沒腦的鬥爭和打擊。

當時還會問喇嘛們：『還不還俗？』如果提出繼續當喇嘛的要求，就說：『你還沒有受到教育，沒有破除迷信。』而給予粗暴的鬥爭，甚至被管制和關押者也為數不少。

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除非是鐵打的人，根本就無法提出繼續當喇嘛的要求，從而使六、七十歲的老年人也請求還俗而回到家中，這些人既無法成家，又無力從事生產，加之都不願離開自己渡過前半生歲月的寺廟，但這些人之所以只好回家，就足以證明了發生在寺廟無法居住的嚴重問題。

此外，有些寺廟的工作隊除了在喇嘛中開列名單，要他們回家還俗外，更嚴重的竟叫喇嘛站在一邊，比丘尼和俗女站在一邊，強迫他們互相挑選。

但深山禪庵或寺廟中有許多從事終身悟靜修禪、嚴守教行的虔誠教徒，他們視紅塵諸事為毒素，悲觀厭世。由於革命事業也是紅塵之事，他們很少有對之表示歡迎或積極的態度，這是不足為奇的，但這類人卻受到了管制和關押。因此西藏大多數的寺廟沒有僧尼居住，就是有人居住人數也很少，而這些人的宗教修養水平也低。』

班禪喇嘛表示，發生了這些狀況，而有些人卻說：『西藏進行了民改，廣大僧尼獲得了解放和信教自由權，自願回家還俗，所以寺廟僅剩下了那麼一點喇嘛。』這種說法，是得不到包括我在內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西藏人民承認的。

在班禪喇嘛的七萬言書中，更強烈控訴西藏佛教被摧毀殆盡的情形。他說：『在消滅佛像、佛經、佛塔方面，從基本上來說，除去四大寺（哲蚌、甘登、色拉、札什倫布寺）等被保護的極少數寺廟外，在西藏的其他寺廟和廣大農牧區的村莊或城市中，有人盜用群眾的名義或戴著群眾的面具，掀起了消滅佛像、佛經、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無數佛像、佛經、佛塔燒毀，拋入水中、扔在地上、折毀和熔化。對寺廟、佛堂、瑪尼牆、佛塔等恣意進行瘋狂般的破壞。』

『而且，還公然無忌的污辱宗教，把『大藏經』用於施肥的原料，專門把許多畫的佛像和經書用於製鞋原料等，由於做了許多瘋子也難做出的行為，因而使各階層人民詫異透頂、心緒混亂至極，極度灰心喪氣，眼中流淚。口稱：『我們的地方成了黑地（西藏俗話中把沒有宗教的地方稱為黑地方）而哀號。』

班禪喇嘛說：『民改前西藏有大、中、小寺廟兩千五百餘座，而民改後由政府留下來的僅有七十多座，減少了百分之九十七之多，由於大部分寺廟沒有人居住，所以大經堂等神殿、僧舍無人管，人為的和非人為的損害、破壞巨大，淪於已倒塌和正在倒塌的境地。』

『全西藏過去僧尼總數約有十一萬人，其中外逃者可能有一萬，剩餘約十萬，民改結束後全藏僧尼就算以七千人計算，也減少了百分之九十三。住寺僧尼素質除了札什倫布寺稍好一點外，其餘各僧尼素質一般很低，寺廟已經失去了作為宗教組織的作用與意義。』

『同時，民改後有喇嘛的寺廟，大部分的例會、時會、和時祭都中斷了，集會和辯經沒有了，因而顯密理論的講辯、『教經讀經』、『傳釋教誡』、『編者經論』、『灌頂隨持』、『悟靜修禪』、『畫線設壇』、『獻供火祭』、『初十禮佛』、『廿五香會』、『還願供神』、『跳神練音』、『送鬼驅魔』等正常宗教活動基本上也沒有了，從而使『講辯者』和『聞思修』的甘露枯竭。有宗教學問的人逐漸死去，教事陷於停頓、學問失傳，因而使西藏土地上昌隆的佛教眼看著被消滅，這是我和藏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無法容忍的。』

班禪喇嘛的這封長達七萬字的意見書，為當時中共在西藏的民主改革做了鐵的見證，雖然因此為他帶來廿四年的厄運，但也因此使得外界得以有系統的了解中國軍隊入藏後的種種錯誤政策，也因此一直被中國視為機密文件，但在一九九七年時經過特殊管道才得以對外公佈。

十世班禪喇嘛從投降中國、到最後親眼目睹一生護持的佛教走向衰亡，他的一生涵蓋了從統戰到護教的兩極色彩。面對西藏長年的宗教黑暗，就連班禪喇嘛也一樣無能為力，而他不顧一切上書的七萬言書正充分反映他無處傾吐的內心世界。如今，這段宗教迫害雖然已經走入歷史，但想起這場宗教浩劫，西藏人依然忍不住傷心落淚。

第四章 展開護教救國運動

『民主改革』讓西藏翻騰，在西藏人痛苦的呻吟中，數以萬計的中國部隊來到西藏，這是他們完全不熟悉的土地與空氣，在還不能理解漢藏間弄不清的宗屬關係時，衝突已經遍佈雪域。

當時才六歲的藏人貢保當週，就坐在家鄉的河邊，親眼看著中國部隊大量進駐他的家鄉，而他最親的阿媽遭到中國部隊殘酷地射殺而死，自己也中了六槍。貢保當週說：

『一九五六年時，我六歲多，我的父母在我很小時離婚，並分別嫁娶，所以我是由外公和外婆養大的，我叫外婆媽媽、叫外公爸爸。那一年五月時，部落的男人集合在一起，都說中國人得寸進尺，如不早日預防，必定後患無窮，於是，西倉、唐龍等頭官決定不讓中國車隊通過部落領地，他們堵住許多車隊，汽車由帆布包著，沒想到裡面全是中國士兵，雙方於是打了起來。戰場距離我家很近，到晚上雙方都還在對峙。

天亮時，我外公趕羊出去，我和外婆正在喝茶，猛聽得幾聲槍響，不久便槍聲大作，子彈像雨點般飛來。中國人將我們牧場全部都包圍住，接著是大霧和傾盆大雨，在大霧、大雨、和亂飛的子彈中，因為牧場廿幾戶人家的牛馬尚拴在圈內，在槍聲中，這些牛馬成批倒下，我們住帳篷，子彈直接飛來，打得鍋碗瓢盆破片亂飛，我和母親縮蹙躲在灶旁。

一會兒，我聽到隔壁喊著：『母子倆，坐不住了，我們一塊兒逃吧！』我母親是個跛子，我才六歲，那裡走得動，我母親喊：『你們逃命吧！我們母子倆是走不動了。』又在灶旁縮了一會兒，實在待不下去，帳房已被子彈打得破破爛爛，母親一手拄著柺杖，一手牽著我，冒險往外跑，當我們母子二人一拐一拐的走到帳房外時，只見我們僱主一家九口人全部死在一塊，在一堆牲畜屍體旁，無一倖免。

我們母子倆一拐一拐的往河邊跑，我們住在平原上，只有河邊有凹地可躲藏，我們找到一個水溝，躲在裡面。我母親脫下我的一雙藏靴，把我裝到她的藏袍的懷裡，也不知何時，我就在母親的懷中睡著了。睡夢中，聽到母親在搖我，說：『中國人來了，中國人來了。』我驚醒時，見河對岸有兩個中國士兵，一人牽著一馬，一人平端著一枝槍，站在距離我們五十公尺的地方，也不瞄準，只是平端著槍射擊，打一槍，就再拉一下槍栓。

我母親向他苦苦哀求著：『阿爸羅羅！（西藏安多方言，表示乞求）我們是一個老婦和一個小孩，不要殺死我們，求求啦！保佑啊！』求了許久，那人仍不停地、不急不慢地向我們母子倆射擊。一會兒，可能母親已經絕望了，不再乞求，將我從

懷中取出，為我穿鞋，並將五世嘉木祥的照片也塞在我的靴子中，用靴帶綁住了。這時母親的臉上滴下幾滴血，當時她已經不能說話，張著嘴，頭向後仰著不動，我拼命叫著：『阿媽』，又搖著我的阿媽，河對岸那個中國人見我母親已死，也返身走了。

我不停地叫喊『媽媽』，喊到聲音嘶竭，那時，媽媽張開的嘴慢慢合上了，我以為母親還未死，又不不停地喊『媽媽』，但從此媽媽再也不動了。那個中國人可能打了幾十槍，因是平端著槍，射了好一陣才將我的母親打死，我也中了六槍，都是擦傷，頭部傷口較大，到現在頭部左側還有凹陷。

我守在母親的屍體旁，不停地喊叫著『媽媽』，叫累了，停一會兒，再叫，到了黑夜，我離開媽媽的屍體去解手，三寶保佑，我卻再也找不到媽媽的屍體，我在黑夜中到處亂跑，就是找不到，不久，我也趴在地上睡著了。

醒來時，天已亮，我從河溝中爬上來，見不遠處的路上，中國軍隊排成隊在行軍，我人小，就坐在河邊上看熱鬧，那些中國人不理我，不停地在走，非常地多。

我被一個好心人帶到他的家裡，他家的帳房已被打爛，倒在地上，他掀起帳房，見到被打穿的鍋還剩下不少的奶子，他瓢了一碗給我喝，奶子已發酸，雖然一天一夜沒吃飯，卻喝不下多少。他又從地上抓起很大一塊乾肉，塞在我的懷裡，對我說：『你先順著路向前走，我們收拾完東西就來。』

當時，我看到到處是屍體，牲畜和人的屍體，帳房都被打倒，一些沒打倒的也是一塌一塌的，連那些狗都不叫了。都悄悄地趴在地上，中國人連畜牲都打死。這期間，狗根本不咬人，叫都不叫一聲。

最恐怖的是，那些母牛奶漲得對我一直叫，我們家鄉原來有一個殘忍的方法，即將初生的牛犢從小殺死，以便可以擠更多的奶子，何況牛犢不易養活。現在這些母牛的女主人或死或逃，沒人擠奶，她們的奶子漲了，見只有我一個活人，就團團圍著我轉，不停地叫，那裡震耳欲聾的槍聲和二、三十頭母牛圍著我轉，我只好不停地嚎哭，真是恐怖。

後來據人們告訴我，那次攻擊，包括我母親共死了四十二人，絕大部分是女人、小孩，因為男人都在前一天上山打仗去了。』

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國在西康省道孚縣開始實行土地革改起，到一九五七年，包括青海、甘肅、四川等金沙江東部廣大藏區，在官逼民反的情況下，都發生了反抗性的遊擊戰鬥，中國軍隊亦隨即展開平叛的軍事行動。

而在地方上，稍有反抗力的，若不是在對中國軍隊的遊擊戰中被打死，便是逃到尚未實行土改的西部藏區避難，這樣才造成後來以拉薩為主的反抗入侵人士的大集合。

關於這方面，藏人丹增降巴也曾經提到：

『我是德榮宗（縣）人，德榮宗是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反的，起因是四、五十名中國人來我們家鄉組織批鬥會，於是藏人就造反了。我們境內共有七座寺院，四個格魯派、一個寧瑪派、兩個噶舉派。我們原將四、五十個中國人圍在縣城內，後來敵援軍至，我們只好退出。戰鬥到了一九五八年時，我軍已經是彈盡援絕，只好將部隊分散成許多小股，在各地打遊擊。

一九五六年，在一個叫塞查堂的地方我們與中國人交戰，我軍陣亡十八人，其中有兩人是在彈盡後砸槍投河而死的。半夜，我們前往戰場，到處都是鮮血，我們救活還未死的三名藏人傷員，敵軍被打死多少我就知道了，因為敵軍的屍體已經被他們運走了，那時我們有兩百餘戰力。

同年在格日噶堂，我們與一股敵軍激戰，敵人另一股繞到了我們背後，於是雙方在那裡打了一場惡戰，我躲在山洞中，敵人死傷慘重，死了差不多有兩三百人，我方死傷不過二十七、八人而已。在格日塘噶，雙方死了幾百人，後來人們說那個地方是鬼域，夜不敢行。

也是那一年，在松永地方，天未亮我們就與敵人交戰，藏人有八人陣亡，我軍未和敵人有很大的殺傷，但兩股敵軍誤會，相互投手榴彈，我軍在誤會中退出戰鬥，在退出時不僅帶出陣亡八人的槍枝，還奪得敵人四枝槍。

在宗雄榮，我軍又打了一次勝仗，我軍奪得大砲兩門，四挺機槍，另有許多的槍枝。

如此我們在各地打遊擊，在家鄉整整打了三年，一九五八年藏曆一月十五日，我們彈盡援絕，只好外逃，有些地方雖也重打了一下，但多是騷擾一下再逃回，本來當時我們也想去投靠普巴本（雪域護教軍總指揮），得知他們也缺少糧食供應。因為到處是敵人，真不知該怎麼打才好，於是人們開始越過怒江向西奔逃。』

在初期以西藏康巴人為主的反抗行動中，許多地方都是各自作戰，戰爭最早是發生在金沙江以東，正好是最早推動民主改革的地方。一九五六年後，理塘發生了戰爭，不久安多也發生了類似的戰鬥，一九五七年更蔓延到芒康、貢覺那一帶。

也因此，理塘、貢覺一帶藏人最早捲入戰爭，而且因為理塘、貢覺屬於『昌都解放委員會』的管轄，所以彼此間不僅不能建立聯繫，更談不上有組織性的併肩作戰，他們只能在自己的家鄉孤軍奮戰；理塘人然楚阿旺與貢覺人阿奈巴青，同時體會到藏人的束手無策。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廿五日，然楚阿旺到達拉薩，但是一九五六年一月在西藏東部，他的家鄉已經開始在進行民主改革了。當時中國提出兩種解放辦法，一種是和平的；一種是暴力的。前者是要求把槍、刀子都收下，這樣便不會傷害人民和財產，宗教和寺院都可以保存；但中國又用威脅的口氣說，如果不聽就採取暴力解放，就是兵戎相見，那後果是很難預料的。

這樣藏人便在理塘寺開會，研商是不是要交槍，上面的頭頭和喇嘛都說不交，因為這樣藏人甚麼都沒有了，有人主張還不如打吧！反正給他們好臉色看，他們還是會收拾我們，還不如打死算了。最後沒有一個人要交槍，大家都說：『不交了，打吧！』

但有一個叫阿木喀宗的喇嘛提議說：『我們不如先交一批性能已經不好的槍一千枝，延緩一下時間，看看局勢會不會有變化。』商量後大家決定先交五百枝槍，結果去了洛縣交涉後，中共卻強硬地說：『不行，槍必須全數交出，這是命令，不交，後果就是暴力革命。』

但藏人卻一致決定不交槍，阿木喀宗喇嘛回來後，有一個部落的縣長在參加會議時帶了七、八百個帶槍的人馬，會議完後碰到中國人在那裏埋伏，那地方有很多溝溝坎坎，一到那裏雙方就打起來了。藏人反擊後死了二十幾個人，中國部隊被打死許多，中國人被迫退出去。

這樣大家都開始接受打仗，人都集中在理塘寺，元月廿四日，中國人把理塘寺全都包圍起來，也開始進攻，第一天死的非常慘重，到處都是屍體，就這樣打了八天，理塘寺有很高的城牆，中國人拿了梯子過來，然楚阿旺當時還是個喇嘛，一生都在唸經，根本不會開槍，只能拿著斧頭躲在牆角，看到中國人爬在梯子上，很快地抓住他的領子，拿了斧頭就砍，這樣也砍死好幾個中國人。

理塘人當札也說，由於十八歲以上的人全部來作戰，召集五千餘僧兵，當時藏人的作戰人員約一萬人左右，在投降與否發生不同意見後，藏人不願投降的向外突圍，那真是死傷累累，屍堆如山，也不知道究竟死了多少。

然楚阿旺說，當時造反是理塘、傑塘、巴塘三個地方都造反了，三個地方本來是一個整體，但後來傑塘被劃到雲南。理塘有五千名僧侶，再加上各個部落的士兵，人數相當多。當時據說有個團長，人稱鷹爪團長，他讓中共受到阻擊，有整整七天不能攻進來。七天後，發現中國人突然用飛機進攻，三個寺院中因為理塘寺在山凹中，炸彈都炸在山腰上，但其他寺院卻被炸到天上到處亂飛，炸成了一片廢墟。因為藏人不懂，都往房子裏跑，巴塘人大部分都被炸死了。

因為藏人都在寺院都發了誓，要和寺院同歸於盡，決不離開寺院，但這時大家都慌了，都準備逃跑，人就從四面八方往外跑，解放軍開始衝進來了。但也有藏人在經堂（牆很厚），藏人躲在裏面不出來，中國人就在外面燒。

這時候理塘就失守了，很多突圍出來的都在山上打，打了好幾年。然楚阿旺後來人到了拉薩，每天都聽到這些事，心急如焚，向上報告好幾次要求發武器，西藏政府從來不給，藏人認為這是因為當時西藏政府和中國人關係很好，最後已經逃到外國的嘉樂頓珠認為他們可聯絡美國，要他們派人來，接受訓練後再空投到理塘進行戰鬥。然楚阿旺說：

『於是理塘就派人到美國去訓練，這是第一批派過去的，後來共有七人都裝備了很好的武器，再空投到理塘去打仗。這時，別的地方也開始打起來了，也開始派人到美國受訓，要大家一起來打。

這時候，來了飛機在理塘扔了三顆炸彈，但都沒有爆炸，第二天飛機扔下了許多藏文傳單、以及飛機、大砲、坦克的照片，一些如『以後會寬大處理』、『你們是打不過的』的傳單很多。當時一方面是藏人佔優勢，他們先佔據一個商店，公安局內有很多犯人，他們要攻進這個公安局救人，卻又攻不進去，後來因四週都挖了水壕，很多牛羊被趕了出來，也被炸得血肉模糊。

當時有一個地方叫窩郭嘉的，房子四週已修了四個碉堡，攻不進去，裏面有六十五個共產黨幹部，但都是藏人。那幾個藏人為了對共產黨示好，是對藏人最壞的，藏人特別恨他們，所以一定要攻，雙方互相打互相罵，都是零星戰鬥，那邊打死幾個，這邊又打死幾個，這項任務共有十八個年輕人執意要衝上去，到最後，只有四個人活著回來。

在理塘地方，二十五個部落中有三個部落先打、二個加入，其他二十個部落都沒有給任何援助。這時有一天，突然發現彷彿是中國人的屋頂上都插上了紅旗，藏人覺得莫名其妙，這時一個哨兵用望遠鏡觀察，才看到很多大車、小車，來了很多人，因為中國部隊都已進入村莊了。

一些大砲旁都是解放軍，藏人這才知道中國人的增援部隊來了，大家都只敢躲在民房中，不敢出來，結果大砲五、六分鐘就轟一次，男女老少都被炸得一塌糊塗，然後坦克忽然就衝上來，一邊掃射一邊摧毀，真是慘不忍睹。

西藏人根本沒有反擊能力，我人在山頂上，眼看已經頂不住了，大家就到處亂竄，剩下十幾個人都跑了。』

藏人四竄後，留下的僅剩殘破的家園。在戰鬥中巴塘寺院和恰城寺院完全被摧毀，理塘寺也是完全毀滅。然楚阿旺說，在清朝時代，曾把理塘寺摧毀過一次，後來大約是在一九三三年和國民黨打仗時，又把寺廟摧毀了一次，但那次是把人從寺院中趕出去，寺院不是完全被摧毀；等到第三次一九五六年中國軍隊來時就是完全毀滅，而且變成了田野，只是後來大家又從田野中把寺院重新建立了起來。

此外，恰城人次成丹增也回憶當時的情形說：

『恰城位於巴塘和理塘之間，現在中國人已將其列入理塘縣，恰城原位於巴塘、理塘、傑塘（現迪慶）的中心，從這些地方騎馬到恰城要五天的時間，如果快馬加鞭，也要奔跑三天才能到。

大約是一九五六年藏曆一月，當時我十八歲，那一年中國人讓上巴喇嘛當什麼主席，也讓那些恰城的頭面人物到中國去參觀、開會，乘這些人離去，在恰城組織那些貧窮的或要飯的藏人搞革命，鼓勵那些人反抗，並也給他們許多的名稱。由於我家鄉距離中國很近，對中國人幾年來的所做所為都大致了解，藏人意識到中國政府將採取的措施，於是大家決定反抗。

恰城不同於其他地方，在恰城只有一座寺院，寺院很大，是格魯派的，叫『桑佩林』，是原來一百一十三座小寺合併而成的，那些小寺以前是噶舉派的。恰城氣候冷熱適中，一年兩收，是塊寶地，人民富裕、團結。決心反抗中國後，許多人在桑佩林寺院中，決定造反。

當時，不遠處有中國人的兵營，有幾百人駐防，恰城人圍而不攻，切斷了他們的水源，困了一個多月，並告訴中國人，你們把我們的頭面人物誘騙到中國，我們絕不答應，寧死也要和你們拼。於是雙方在一個月後交戰，中國人分守兩個陣地，寺僧組成的敢死隊攻下了小一點的那個陣地，我方死了許多人，也打死不少中國人。

但那個大的陣地卻一直攻不下來，有一次中國飛機來轟炸寺院，一天投了八、九十顆炸彈，躲在寺中的藏人死傷累累。恰城打響後第五天，理塘打了起來，但傑塘在此期間卻一直按兵不動，中國人不停地對傑塘人說『不要跟著反動派走』，並且還採取了一些措施，使恰城人孤軍作戰。

中國發現『革命』的結果引起恰城、理塘的強烈反抗後，才又宣布『六年不革命』（改革），並放回了原來被騙去的恰城頭面人物共十六人。但那些頭面人物一回到家鄉，便率人逃到山上，分成小股，利用恰城險峻的地形打遊擊。

當時我也應『十六一六十歲』的徵兵令去參戰，那時我是個僧人，我參加了前期的戰鬥，但未隨他們逃入老林中，主要原因是，我有一個舅舅在拉薩經商，他從拉薩打電報要我去拉薩，當時，寺院已被摧毀，沒什麼可留戀的，所以我便在一九五六年藏曆八月到九月時前往拉薩。當時，通天河以東戰火已全面燃起，大部分寺院已被摧毀，男人全躲進深山老林中，中國人平時也躲在兵營中。

在我們寺院，有一顆大炸彈將幾十個僧人全部炸死。我們藏人有個毛病，就是遇到危險不知所措時，除了祈禱，就是等死，在寺院裡死的全是這種人。飛機一轟炸，都擠在寺院裡，結果一顆炸彈就可以把一房子擠得水洩不通的人炸得血肉橫飛，死傷無數。

我在當時就產生懷疑，寺院最壯觀，目標最大，人家就是希望要把人趕到裡面再炸，因此，每次轟炸，我是絕對不往寺院逃的。我還告訴藏人，寺院、佛像是擋不住槍子、炸彈的，當時。敵機還投下大量紅紅綠綠的傳單，傳單上用藏文寫的大致內容是：『要服從毛主席的領導，不要當美帝國主義的走狗。』

其實我們當時根本不知道美國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是中國人他們自己在瞎說。

我想去拉薩，為了途中的安全，從中國人那裡領了通行證，是通過親戚領的，我有許多親戚替中國人做事。我們康人為西藏的自由流了血，那是我們的驕傲，可是，同樣的我們恰城人和康人中有許多人為中國人幹事，這也是我們不光采的一面。當時，我也沒這樣想，想的只是有通行證好趕路。

過了金沙江（藏語稱為舟曲），中國人又是一付菩薩臉，甚少暴戾之氣，當然是相對於河東而言的。我到了拉薩後並前往印度經商，在各地朝聖後回到噶倫堡，當時大家正在為人在印度的達賴喇嘛應否返藏而吵個不停。在噶倫堡的商人們極力叫嚷要開戰，算是為四水六嶺起了個頭。當時成立的康巴人組織叫『康人四部』，後來安珠開始打造金座，藉機廣結各路人馬，當時和安珠有聯繫的在國外主要有嘉樂頓珠，國內有卡其管家和大仲聶帕拉等人，並開始組建『衛教志願軍』。

當時我們未經歷過現代戰爭，服裝及裝備現在看起來簡直是找死。我的藏裝、褲子等全是黃色的綢緞，僅護身盒就配帶了兩個，都很大，長短兩枝槍，長短兩柄劍、刀、狐皮帽，各種裝飾等等。看上去人變得高大，威武了，老百姓看了都很高興，認為兵強馬壯，敵人看了，會產生錯覺，十餘人看上去似乎有上百人，可威懾敵軍。

馬也是這樣，馱馬頭上豎一箭桿，纏哈達、綢緞等，掛上去的玲鐺不只一串，而是兩串、三串的，大小不等的掛在乘騎和馱馬的脖子上，馬鞍和墊子極厚，色彩又鮮艷，彷彿不是去打仗，而是去辦喜事。

這樣看上去那軍隊陣容很強盛，大家都喜歡這樣，真打起來，這不是找死嗎？人高馬大，走到哪裡，人民夾道迎接，說：『神兵』、『護教兵』來了，含著淚水說：『這下放心了。』寺院則不僅出迎，還長號短笛齊鳴。原來在竹古湖邊札營時，湖邊有各部的帳篷，山上有哨兵的帳房和做其他用途的帳房，竹古湖清澈，有敵人姦細，從遠處探查，湖邊及山上的帳篷和人倒影在湖中，使其以為我軍的帳篷有如天上的星星，回去便說有無數藏軍。

我們在聶木與敵交戰，打得真是過癮，我們衝過去和敵人混雜在一起，敵人也乘夜偷偷摸過來，天亮時，雙方大打，太陽升起後不久，就把敵軍全部趕了出去，到處是敵軍被撕破的棉花在到處飛。我軍和敵短兵相接時，有開槍的，有揮刀衝殺的，那真是熱血沸騰的場面。戰鬥後，聶木的女人們手捧香爐，高呼『佛教勝利』、『西藏永固』、『佛教永固』、『外道戰敗』等，真是讓人掉眼淚。』

貢覺則又是另一個戰況激烈的戰場。阿奈巴青是貢覺人，她的父親是貢覺邦達部落的頭官，她指出大約是一九五七年左右，從昌都到德格那一帶都有中國部隊在修路，當修路修到昌都時，當地藏人就打起來了。她因為是女孩所以沒有參加，但知道每個部落都抽了人參加，那時她的父親有病在身，這時有個百長叫欽美多傑的，率了四、五百人逃到貢覺，另外德格廿五個縣也率了七、八百人逃到貢覺，於是各部商量一起狙擊修路的以對付中國，他們也準備與芒康的普巴本聯合。

因為修路的部隊人太多，他們商量後就往札羊方向靠攏，札羊那邊有個『色雍』（色就是金，雍就是毯，類似平原，但並非真正的平原，是比較大的平地），大家就在那裡紮營，結果有一天早上醒來卻發覺已被解放軍層層包圍，飛機在上面轟炸，下面也在進攻，死傷非常慘重。

色雍那邊打敗後，他們就往貢覺方向跑，在這之前阿奈巴青並沒有打過仗，但因為父親過世，家中沒兒子只有她這個女兒，所以繼承了『頭官』的職位。不過因是女兒身，所以母親、奶奶、姑姑等都不讓她上前線，多是在後面指揮，做一些安排。有一天阿奈巴青就決定讓幾千個婦女、孩子一千多人先走，其他男人則留下來在各個山頭狙擊中國軍隊的追擊。

當時百長齊美多傑的妹妹也一起逃過來了，她的女兒叫德瓊的就和她一起開始參加戰鬥。阿奈巴青說，當時她們從山上看到敵人像螞蟻一樣，黃綠得一大片，並說今天一定要打一仗，不打不行，於是兩人下馬後就開始開槍。

阿奈巴青拿的是父親的手槍，德瓊拿的是大號的盒子槍，當時阿奈巴青是廿五、六歲，德瓊才廿一歲，她的槍不管用，但德瓊至少打翻了二個人，不過打了幾槍後因為子彈有限只好開始逃跑。那時眾人已跑得很遠，她們騎馬到夜晚才追上。

在德格那時曾聽說邊壩地方有四水六嶺護教軍的名稱很響亮，於是就往邊壩方向走，隊伍逃跑時都是晝伏夜行，白天藏在山溝中，派一些人去偵查，這樣終於到了邊壩。在邊壩看到很多逃來的家屬，還有牛、羊，老頭和老太婆坐在牛背上的兩個籃筐內，人非常的多。當晚大家聽到飛機聲，嚇壞了，以為敵機發現我們，是來追擊的，於是當晚又派人去偵查。

第二天天亮時竟然靜悄悄的，這時派去偵查的人回來說：『這下好了，昨天的飛機不是中國人的飛機，是美國人的飛機，是我們自己人的，投下了十幾個人都是我們自己人，有許多的槍，這要保密不能對別人說。』

雖說要保密，但人人一遍又一遍地說，最後還說要保密，人們互相傳，最後弄得老幼皆知。大家想這次不必再跑了，就往邊壩方向走。邊壩寺是一個很大的寺院，有很多寺院執事、高僧、以及些藏族官員都聚在那裡，每個部落都來了一些人。後來美國又扔了好幾次武器給我們，都是好槍。

大家都覺得好極了，有槍又有那麼多人，我們還怕什麼？西藏人要以此為據點再向外擴展，因為大家知道有美國的援助就不再逃了。

但突然有一天晚上卻被包圍了，阿奈巴青記得，當時中國軍隊人數非常多，天上有飛機，地面有大砲，戰爭只打了五、六天，藏人就完全敗了。大家往樹林子跑，敵人在叢林中四處搜查，逃亡的藏人一共是二、三百人，但當時妻離子散，有些子女找不到父母的被衝散後，子女跟著那一戶就走了，那兒沒兵就往那兒跑，根本沒有目標。

廿多天後，藏人決定往北走，越過喜馬拉雅山的北方無人區，有一天大家正在爬一座大山，才翻到山上天剛亮，突然聽到槍聲，然後看到四處冒出來的都是解放軍。彼此打來打去，幾個德格男人還要繼續打，阿奈巴青高喊說：『不要打了。』因為再打下去，婦女和小孩全部要死，只好投降，所以大家都變成了俘虜。

當阿奈巴青在八宿縣被俘虜時，她的奶奶、媽媽、姑姑都已經老了，這三個女人被認為沒什麼用處就被趕了出去，讓她們自生自滅，但她們聽說阿奈巴青要被押到昌都，就等在門口，被押出來時，三個人就喊著：『不要押，我們三個靠她養活，你們把她押走，我們就要餓死了。』中國當兵的不理她們，她們就說：『讓我們一塊走，求你們把我們三人一起押走。』當兵的還是不理她們，三個人就在後面追，當兵的煩了，就給一棒頭，踢一腳，她們被打倒後爬起來後滿臉都是血。

阿奈巴青當時走在隊伍最前面，看的直掉淚，後來她們三人沒趕上，卻聽得到遠遠的哭聲。

被俘虜後藏人的槍被集中起來，人則用繩子綁在胳膊上穿起來一起送到洛縣，看到山上一群主要份子也在那裡，中國部隊把藏人用手拷拷起來押著走，但只有阿奈巴青是女人，其餘全是男人。他們要被押到昌都，共有廿五輛車等在那裡，有部落人、喇嘛、軍官等，廿五輛車子全部裝得滿滿的，繩子編成的網子蓋在她們頭上，動一下就砸，就這樣把她們全押到昌都。

阿奈巴青說，這些藏人全被關在昌都寺，這是一個很大的寺院，有幾千名喇嘛，在大經堂內廿五輛車押來的人全集中在那裡，腰帶、鞋帶、護身符、還有藏人衣服的鈕扣只要是銅的也都被取下來。在房子各個角落都放了尿桶，解手都在那裡，但只有我一個是女的，在解手時很不方便，但也沒有辦法。尿桶一天倒一次，早上給一小塊炒麵、糌粑，下午給一個包子或稀飯，肚子好餓，就這麼關著十幾天也沒人理。

後來昌都解放委員會主任王其美來了，他要大家交待問題，並說交待後可以寬大處理，然後開始學習，因為阿奈巴青是女的就關在另一個養牲畜的房子內，裡面已有十幾個大大小小的女的關在那裡，天天都在鬥爭。有一天她和五十多歲的丹增秋吉（就是齊美多傑宮保的老婆）被扣上腳鐐，說她們罪行沒有交待清楚。如第一沒交待有多少財產；第二沒有交待槍枝到那裡去了；第三部落有多少槍也沒交待清楚；第四要交待她們的丈夫和父親幹過那些壞事等。

阿奈巴青不願講父親的罪行，丹增秋吉也非常勇敢，她站起來抖抖衣服（帶有詛咒的味道。西藏女人的衣服下擺被認為有經血，很不乾淨）說：『你們不害羞，你們中國那麼大，那麼多男人、軍隊，把我們女人這樣你們不害羞。』她很勇敢，始終不願說她丈夫的壞話，這樣鬥爭中也有好幾個人被槍殺了，但在整個寺院中也開始有人餓死。

在寺院中一個大經堂經常關著幾百人或上千人，每天都有人餓死，每天至少有一個屍體、多時有六、七具或十幾具屍體。每天放風時，屍體就會被拖到門邊，然後活著的回去，死的屍體就扔了，所以每天都可以知道當天又死了幾個。最後有一部分人被槍斃了，少部分人被放了，還有一部分人又被卡車押著送到昌都監獄，一直住到一九六五年，然後這一群人又被送到拉薩，阿奈巴青腳上拖著腳鐐整整拖了一年又一個月，後來竟在監獄中共待了廿一年。

白噶成列回憶當時的情況說：

『到處都有大小不等的戰鬥發生，雖然大家都認為應繼續進攻，但從山頂上往下看，山下有許多敵軍，我們用長槍打了一些子彈，但敵人理都不理，我們繼續討論接著該怎麼因應？當時有一拉妥覺雄人叫阿薩塔拉，自告奮勇願意去與中共談判，他持的是原來就和中國人談好的協議，即在拉薩沒有變化之前，拉妥與中共互不為敵。據說後來他被帶到昌都與王其美見面，他當面斥責王背信忘義，王於是答應遵守原定協議，不再繼續向拉妥進兵，雙方並且維持現狀以等拉薩的變化等。

他回來後，敵兵撤回，並到處宣傳說中國人與拉妥已決定維持現狀，這一下，四面八方的逃兵和頂不住中國軍隊進攻的人紛紛逃向拉妥。不久四水六嶺到洛宗，藏曆三月拉薩失守，昌都的王其美開始不停地來信要我們投降，並說明大家不要破壞國家的財產，不要枉費個人的性命，拉薩已經武力解決了等。

但我們還是沒有放棄戰鬥，我們在進攻時派了一個當地人帶部分人乘夜去打聽消息，那個人到自家門口，對來開門的父親說：『爸爸，我回來了。』

父親一聽兒子回來了，痛苦地說：『啊喀喀！（表示很遺憾的驚歎辭）我的好兒子，你回來做什麼？你難道不能跑到遠一點的地方嗎？』兒子說：『爸爸，我回來是有事。』

父親又說：『回來還能有什麼事，真是沒出息，他們會剝你的皮。』

兒子再說明已經帶了四水六嶺的人來了，父親一聽萬分高興，立即叫醒妻子讓他們母子見面，然後再說明敵情，當地有敵人約四百餘人，每天早上放羊出去後，就會玩籃球，一會兒再放牛上山，而這時藏人要去打掃牛圈、羊圈等，敵人主要是挖洞住在一山上。我們根據這一情報佈置戰鬥，並且組織敢死隊向敵小山包發起攻擊。當晚敢死隊就悄悄爬上小山包先藏起來，我們則負責衝擊被趕出來的敵兵。

因為拉薩已經失守，肯定是要通過暴力手段了，中國人到處派人勸降，當時北有蘇莽僧拉多拉部，南有貢覺以及察雅等部的軍隊，數量都不多，敵軍開始向我方進攻時，首當其衝的察雅阿旺巴登組織抵抗，敵人一路過來，見人見狗都要開槍射殺。察雅當措十六部以四水六嶺的名義招募十六歲到六十歲的士兵，當時拉妥附近凡能打仗的男人幾乎已經全部出動，投入了戰鬥。

敵人後退入康巴噶，康巴噶有寺院，寺院的主人康智仁波切已經逃亡，敵於是將三百餘名寺僧中選出強壯者趕入一房間中，奪取寺院的全部馬匹，後經苦苦哀求才留下一匹馬作為活佛的座騎。

敵人隨後進入大經堂，拆毀佛像佛具想做為戰堡和住地，有個僧人因為不滿動手打了他們，便因此被捆綁在柱子上，並將全部寺僧叫來欲當眾懲罰。

此時，突然有一寺僧亮出懷中的斧頭，一下子就砍死在身邊的敵兵，其他寺僧也取出各自找得到的刀棍斧頭等肉搏，經堂內頓時亂成一團，敵人見人就射，寺僧逃出的不多，許多人被俘後死在中共監獄中，被打死的寺僧則被敵人集體埋在寺院內，後來重建寺院時，從地下挖出許多人骨，才知道當時的一些陣亡寺僧被中國人埋在這裡的，共有八十八具骸骨。

由於我們沒有通訊設備，加上也不懂軍事佈置，特別是大規模的軍事佈置，人們誰也不知該如何，而且各自作戰，有些在打，有些在逃，雖然不知往那兒逃，但還是有人逃。

一天晚上九時左右，傳來飛機聲，我們經常遭敵機轟炸，但飛機都是白天來，晚上來這倒是第一次，飛機從我們的頭頂掠過，至邊壩，在邊壩轉了兩圈又飛往夏貢拉方向，馬上有拉妥仁波切說這是來支援我們的，我想這個時候有誰可以來支援？會不會是中國人從空中來了？

後來飛機向下空投人員，我們也看不清是不是中國人，正在這時，有人回報說是四水六嶺的人，當中有色頓月、然日益西等，我立即快步奔向邊壩，見到邊壩士兵正與空投人員對峙，我立即高喊是自己人，大家好高興，邊壩立即以最隆重的儀式進行歡迎，寺僧吹著長號持香迎接，其他人在旁燒香、煨桑？，算算空投人員一共十六人。

色頓月首先發言：『你們作戰辛苦了，我們是來支援你們的，不是指揮人員，你們有什麼需要，特別是武器彈藥，我們可以想辦法。』色頓月並要求報來實有人數。其次，是各部一定要守住各自所在的陣地，陣地失守了就無法空投武器；第三是建立軍司令部以及按縣建立軍隊編組，並強調指揮部由我們建立，他們只是支援等。第四，如果我們能守住一個月或十五天以上，就會有支援：『我們人能下來，就能讓武器也下來。』

當時空投人員還帶有黃金，他們向工作人員以黃金支付工資，甚至幫他們砍柴、清掃馬圈等的人也得到他們給的黃金，當時有人私下說：『共產黨以大洋在西藏鋪路收買貴族，現在美國人以黃金來鋪路了。』當然我們是希望如此，可惜並沒有。

這時總部命令我們前去波密，佔領波密全境。在翻山前進時，在山頂有十餘具我軍先頭部隊凍死的屍體，路越往下越難走，只有在懸崖絕壁中開出一條獨徑，稍微不慎摔下去的話只有粉身碎骨，每次只能過一人一馬。

我們幾乎斷糧了，士兵們個個饑腸轆轆，同時敵人也被我們圍困了七天七夜，他們絕對也是沒吃挨餓的。幾場戰鬥下來，各部都有大量傷亡，我們一些指揮官在巨石上開會，這時雙方已經交戰十四天了，於是有人建議部隊從另一路退回來，同時也使敵人可以退出被圍困的陣地，然後我們可以尾追到平原有吃的地方，但敵人會不會不退反進呢？

但最後商量結果只能退，這可能是一條出路，否則軍隊斷糧，雖然敵人被困，我們也不免處在困境中，於是開始退兵。但因有人不願退，我招集波密人的眾軍官正在商討，密林中有敵人突然向我們射擊，當場有四名指揮人員陣亡，另有一些人受傷，於是他們更不願撤出，說一定要拼個你死我活。在埋葬那幾個戰死者時，一個連長又說：『死幾個人就逃，這算什麼？』我說這是總部的命令，他氣憤地說：『真是一批敗類。』

在波密，我們幾千人擠在峽谷中，開始撤退。一些年輕士兵說他們寧願戰死也不願餓死，當時的情形也確實如此，那批年輕人總是反覆強調：『與其回去餓死在邊壩，不如留熱身子於波密冰冷的土地上。』

但因敵人在唯一的一條通道上修築了強大的工事，我們突破陣地的希望微乎其微，這時每天都有人不肯承認前面的陣地無法突破而發起攻擊，每次都有一些最英勇的官兵犧牲。我們缺乏爆破工具，只能用僅有的一些火砲和槍枝集中射擊，封住或壓住敵人的火力，使敵無法殺傷我突擊部隊，他們順利地撤了回來，此時我們若乘勝攻擊應也能攻占敵人的碉堡，但敵人仍有許多其他的陣地，放眼向下望去，敵人陣地到處都是軍馬，我們已無力一一攻取，加上敵人援軍一再換防和我軍食物告竭，使大部分官兵前進的意誌已有所削弱。

回到邊壩，談及此戰，真是死傷慘重，許多最勇敢的戰士喪失了生命，我們在波密有二百多人陣亡，有幾百人不願回邊壩，寧願餓死或留在當地做遊擊戰，空投人員看到我們狼狽而回，甚為不滿，大發雷霆之怒，一直認為我們應解決斷糧的困難。但嘉康果南卻責怪決策錯誤，並說我們被困時沒有一碗糌粑的後援，我們為了往後的戰鬥才返回，並非臨陣貪生怕死，軍中血性男兒都要留熱身於波密冰冷的土地上。

戰場上死的死，逃的逃，然日益西是從美國空投回來的，在一次戰役中他扛著橫射砲向敵人射，因為敵人也集中火力向他射擊，他被擊中時，整個下巴幾乎被打掉，然而他一負傷便立即吞食衣領上的毒藥而當場死亡。另外在山樑上的戰爭中，佔果、阿朵、與齊美公保一同併肩作戰，但過程中齊美公保對兒子說：『兒子，走，吃口糌粑再打。』但以後他倆就失蹤了。原來，吃糌粑只是個幌子，他是領著兒子向後逃去。之所以逃跑，是因為其他人覺得抵不住了，有一些人也提議投降，所以乾脆一走了之。

有一位叫仲囊嘉智仁波切以袈裟包頭？坐在戰場上，問他應該怎麼辦，他說唸頌一億遍六字真言就沒事。當時有一個叫額車羅嘎的人高呼說：『不要打了，我們投降。』還說：『為了德格王子、囊謙皇后，活佛的安全，只有投降，從現在開始，誰打槍誰就要為皇后、王子和諸活佛的安全負責。並高舉白氈和哈達，其他人不知所措，都停止射擊愣在那裡，一些人甚至將槍集中準備投降。』

但當時有一個專門打製佛匠的鐵匠，拿著工具，前後背著兩個小孩，他一看人們欲降，從收起的槍枝中拿起一枝美式步槍，將八發子彈都裝滿，邊高叫：『我也降，投降，投降。』但到了敵人附近突然向敵射擊，在射出八發子彈後他也被擊倒，由於他出其不意，使敵有好幾個人傷亡。他這樣一來，就有人跟著高喊：『我等也是男子漢，要打。』但也有人依然繼續逃跑。

當我們到達在長江源頭的當雄時，正好是當地藏人的營盤被敵人摧毀後不久，在戰鬥中，整個部落的男人以及外地投靠能打仗的男人幾乎全部陣亡，最後甚至一些女人也拔刀向敵衝鋒而死了。真是可憐，那些女人因見自己的丈夫兄長兒子等都死了，悲憤中亦但求一死，真是慘烈。

那時候，藏人毫無軍事常識，其中最大的缺點是行軍打仗都領著妻子兒女父老，不管瞎子、聾子一大堆都要領上，還有牲畜等也要趕著走，在邊壩、在其他地區都是這樣。其本意是怪可憐的，不希望家人分離，能夠同生共死。但每次戰鬥特別是飛機掃射時，死的絕大部分是那些老人、婦女和小孩，由於他們趕著牛羊一批一批的，從飛機上往下看黑壓壓一片，就專門向他們投彈，戰鬥中也是他們死的多，現在我們提的死亡人數都是不包括他們的，他們都是成群的死亡，真是慘不忍睹。許多母親死了孩子還趴在母親身上吸奶，幾天後轉到這地方時，孩子還是趴在母親身上，但是已經死了。這種事開始時還有點感覺，見多了就麻木了。』

事實上藏人打這場戰的決心非常強烈，藏人加松說，在一九五三年左右，熱振僧噶（攝政王熱振的貼身侍衛）有兩個弟弟在為中國人效勞，是中國的幹部，他們不斷揚言要殺死熱振僧噶，熱振僧噶也說要殺死他的兩個弟弟。後來他們在橋頭相遇，雙方決戰，熱振僧噶說：『我是哥哥，你倆是我的弟弟，今天卻要在這裡自相殘殺。因為你們是佛教的敵人，我消滅你們是為了保衛神聖的佛教，所以我是正義的，即使我死了也絕不後悔，可以讓你倆先動手。』

兩個弟弟隨即向其攻擊，於是雙方在橋頭格鬥，熱振將他的兩個弟弟全部殺死了，並說：『我殺的是佛法的敵人。』

從多名受訪藏人的回憶中可知，藏人是在絕望無助中才被迫與中國對抗，但最後都因為實力過於懸殊，不是被迫流離到拉薩，準備另一場戰鬥，便是遭到無情的監禁，與世隔絕。這些都是西藏人自發而起的戰爭，如美國等外國勢力介入都是很晚的事，但是，在中國的論述中，均將藏民反抗視為是受到帝國主義的蠱惑而起。

在這方面，中國國務院於一九九二年出版的『西藏的主權歸屬與人權狀況』白皮書中，為自己辯護武力進藏的原因。在這份資料文件中，中國表明當原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北平、湖南、以及與西藏相鄰的雲南、新疆、西康等省相繼以和平解放後，對於西藏一開始也是決定採取和平解放的方針。

因此：『在一九五零年一月時，中央即通知西藏地方當局派代表到北京談判西藏和平解放。但是，當時控制西藏的地方政府的攝政大札阿旺松饒等人，在某些外國勢力的支持下，不顧國家和西藏人民利益，拒不接受中央政府進行和平談判的號召。』

中國國務院表明，當時西藏還在東部昌都一線調集藏軍主力，佈兵設防，企圖以武力對抗。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中央才不得不於一九五〇年十月命令人民解放軍渡過金沙江，解放昌都。

中國方面也一直以『掃蕩國民黨與外國勢力』做為軍方的精神號召，在西藏抗暴運動中，曾有一漢人姜華亭從解放軍陣營中投奔到藏族人民的一方，在戰爭後期成了『洛桑札西』。人稱『漢人洛桑札西』的薑華亭，在他個人的回憶錄中，也提到中國當時一貫的說法。

姜華亭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二野五兵團十八軍五十三師一五五團的副團長兼砲兵營長，山東萊陽縣人，在抗日勝利後，國民黨軍第一次進駐萊陽，他的父親當時擔任糧食站副站長，於解放軍撤退萊陽縣之前，共軍曾命令他把所有糧食一概隱瞞。

等到國民黨軍隊到達時，他的父親怕瞞不住國民黨特務，便把四萬斤麥交給國民黨軍隊。因此在民國三十七年五月，當共軍再度回到萊陽縣實行清算鬥爭時，便在鬥爭中將他父親抽掉兩條肋骨並痛斃，從此結下姜華亭反共復仇的意念。

年輕時的薑華亭在砲校就讀，當時砲校的軍事專家和顧問，都是蘇聯人，他們這些低階幹部除了學習軍事課程以外，同時還要兼學數學、文化。姜華亭在瀋陽高級砲兵總校受訓期間，獲悉西藏毗連印度、尼泊爾，目前還未徹底解放，以西藏政

府為首的反入侵力量，相當堅強，藏民大多數擁護西藏政府，中國駐藏軍政人員，僅能控制點線，但點線之外，入夜就變成是反抗藏人的天下了。姜華亭心中從此認定，西藏是最理想地方，一定要去西藏。

因此，在砲校畢業、快要分配工作時，砲校召開大會，校長孔成周在會上做了動員報告，他說：『人民政府早有命令，解放四川後，立即進軍解放西藏。』

他又說：『一九五一年，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我方部隊進軍西藏，解放水深火熱中的西藏人民。可是西藏統治集團中的一小撮分裂主義份子和國民黨特務、帝國主義勾結在一起，竭力利用藏漢民族之間的誤解和隔閡，挑撥藏族同胞和我軍之間的關係。致使不少藏族群眾不敢接近我們，更不敢賣糧草和柴草給我們，妄想餓死我們、困死我們。』

『目前我軍剛到西藏，當地的一小撮反動武裝，不斷襲擊我軍駐地和糧草運輸，破壞我軍進軍西藏，鞏固邊防的光榮任務，在此緊要關頭，我們共產黨員起模範作用，要到西藏去，要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以實際行動支援我軍先頭部隊。』

他最後說：『同志們！為西藏勞苦大眾立功的機會到了。』

於是姜華亭寫了個志願書，表示自己願意去西藏，立刻受到校黨委的表揚。一個個年輕漢軍在軍樂和口號聲中，帶上大紅花，踏上進軍西藏的征途。

一九五六年，姜華亭隨著援藏部隊經河北、河南、湖北、四川、沿康藏公路到達波札木，他的部隊首先負責擔任保衛西藏工作委員會及西藏軍區司令部任務，並且駐防林卡薩巴。一九五八年三月，在他駐防林卡薩巴的最後一個月時，大陸內地反右派任務剛剛結束，但西藏整風運動卻正要開始。

事實上，這場普遍在藏族地方發生的戰鬥究竟有無必要，也曾經引發漢人部隊內部的質疑。一九五六年底，在大陸內地開展大鳴大放不久，駐藏十八軍內部的三個將級軍官，包括十八軍參謀長李覺、後勤部長秦志植、政治部主任洪流等少將級以上軍官，背著十八軍黨委，聯名上書毛澤東。

他們的主要意見為：

一、『西藏地區荒山野嶺，由內地調大批人員進藏，以現實國力，得不償失。

二、西藏社會政教合一，雖然妨礙進步，但現時並不影響黨的基本政策推行。

三、西藏反共勢力，是受內地藏民區的急進改革的影響，只要從事實上予以證明，西藏反共，逐步可以用政治手段予以瓦解。

四、鄰國印度、獨立不久，正在埋頭建設工業，改善國民生活，內政反共，外交中立偏左，並無擴軍戰略，不可能威脅西藏，故不必在西藏派駐重兵、浪費國力，並影響中印邦交。

五、對西藏最關重要者為設施教育與改革藏民生活，使藏民有了普遍認識，才可穩步的進行改革，否則引起全體藏民反感，西藏邊界線幾千里，無法徹底封鎖，改革不宜操之過急。六、鄰國在邊界上很少設防，我軍現時亦沒有設國境線必要，只擇重點的建立國防工事，足以適應喜馬拉雅山情況。

七、西藏一團人費用等於駐內地三師人，勞民傷財，違背我軍精打細算作風。

八、駐藏部隊，應實施輪換制度，使全體人民解放軍，對西藏地區均有實際體驗和認識機會。』

但上書期間正值大陸內地大鳴大放，接著又是反右派運動，所以一直擱置到反右派運動結束後，毛澤東以上書人士思想叛黨，有意擴大西藏地區艱苦，出賣祖國邊疆領土，密謀組織小團體等罪名，發回譚冠三，由張經武到西藏，主持整風運動。

最後中國十八軍軍委會，除將上書三人批判外，凡有不滿意中國政策的發言，都列為反黨反人民小集團，逮捕押送內地勞改，共牽連四百多人，這是中共進軍西藏十年來，黨政軍工作人員最大的一次整肅。

針對這場戰役，嘉樂頓珠認為，西藏抗暴是很自然的一種發展，沒有外來的勢力或是組織在鼓勵他們抗暴，但共產黨戴了大帽子說是國民黨特務、美帝國主義、印度政府鼓勵的，事實上並不是這樣。共產黨因為發生這些事無法向全世界交待，最好的方法找藉口說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等。

嘉樂頓珠說，從一九五四年開始最初是青海和四川的藏區組織，以後就變得很激烈。共產黨進軍青海，青海很多維族、藏族反抗，所以共產黨就鎮壓他們，殺了很多人，慢慢地所謂土地改革、民主改革，鼓勵農民去鬥爭地主、廟主，這樣發展出民間的公憤，因此民間自動組織。

達賴喇嘛也表示，當時被驅趕到山中當遊擊隊的康巴人從幾百人增加到上萬人，他們與中國軍隊狠狠打了幾仗，中國人則動用機關槍和轟炸機，而且轟擊受到猜疑的村莊與寺院人民，因此，村莊和寺院被完全摧毀。當時喇嘛和俗家領導人受到侮辱、監禁、屠殺、甚至拷打，佛像、經書、和對藏人有著神聖意義的東西受到摧毀、嘲弄、甚至偷盜，並且還揚言說：『佛陀也是反動派。』

一九五六年時，達賴喇嘛在印度，一九五七年當他回到拉薩時，整個西藏東部、東北部、和東南部人民都拿起了武器，只有西部和中部衛藏地區仍然平靜。

達賴喇嘛認為攻擊他們的宗教，是一項最瘋狂的政策。達賴喇嘛說：『中國人老是說，英國人曾經侵略西藏，但是英國人入侵拉薩時沒有摧毀過任何一間寺院。但中國人不管是侵略西藏也好、或是解放西藏也好，卻摧毀了很多寺院，中國解放軍來時摧毀了，之前清朝的趙爾豐來時也摧毀過一次，在青海一帶馬步芳也摧毀過寺院，在康區與安多有許多寺院已多次被摧毀。』

在很多藏人的生命中，自己的寺院第一次被摧毀、重建，中國人來又摧毀、再重建，到一九五九年時最後摧毀，達賴喇嘛說，半個世紀內，中國人曾經有計畫地摧毀過藏人的寺院，這些歷史都應該要寫出來。

第五章 喇嘛殺人

喇嘛是藏傳佛教中守戒律的僧人，但是在戰事發生後，誓不殺生的喇嘛反而成為戰場上最勇敢的一群人。

西藏人大多是虔誠的佛教徒，但為了挽救西藏，有許多喇嘛更是脫下袈裟成為武士，『喇嘛殺人』這件事在西藏歷史上因此變得特殊。

對西藏人來說，在這麼一個特別時代中，喇嘛殺人可以不算破戒。而且人們會為殺死一個中國人而感到高興，甚至有人宣稱殺死一個毀滅佛教的中國人也可能是功德一件。

所以有些喇嘛會說：『殺一個中國人，等於建一個寶塔，這樣離佛就更近了。』然而，一個在西藏殺人不眨眼的喇嘛，到了印度可能連一隻螞蟻都不敢踩死。

現在必須回過頭去理解西藏人的邏輯轉折，以認識西藏人如何在『喇嘛殺人』事件中得到心靈的解脫。

從佛教觀點而言，毀滅宗教是天下無與倫比的極大罪孽，於是為了保護佛法、防止對方製造更大的罪孽，以致於出兵打仗、包括殺人，都可以是符合教義的。特別是在佛教處於生死存亡之際，喇嘛更被認為有義務挽救佛教的滅亡而採取行動。

當時的西藏僧人曾經唱道：『若在和平寧靜的年代，我們是維護佛法的比丘僧；若遇到以佛教為敵的紛亂時代，我們是維護佛法的劊子手。』而西藏的俗語也說到：『若是佛法遭到危害，即使比丘也持矛。』這些都說明了藏人視佛教為一切之本，若是佛教遇到傷害，則其他一切均可變為次要或可以變通的一種思維方式。

也因此，當喇嘛在維護佛教的情況下殺了人，人們仍然會尊敬他們，因為大家知道喇嘛殺人是為了西藏，為了自己的民族、宗教。本來不該殺生的，殺生會妨害他們成佛。

對此達賴喇嘛指出，根據傳統與習慣，過去在西藏歷史上已有喇嘛出征的事，但臨行前要把自己的戒律先奉還，然後再出征，這當然是非常可悲的事。但這些喇嘛考慮時卻是為了民族、為了宗教，所以他們的軍隊就叫做『護教志願軍』。

按照規定，僧侶絕大部分在當兵以前，都會把自己的戒律先奉還，而且必須奉還給傳授自己戒律的師父、比丘，並且向自己的師父說明，原來從這裡接受戒律，但現在由於佛教已出現毀滅危機，需要弟子出力，可能會因此違反戒律，所以暫時把戒律奉還給師父，但也希望如果沒死，將來再來向師父領受戒律。

但有時師父已經過世了，或不在身邊在別的地方，為了變通，也可以在著名的佛像跟前如此發言，等於就是把戒律奉還了。

在戰場上，喇嘛都是敢死隊，他們會說：『我沒有妻子、孩子，可以第一個先死。』

事實上，在戰鬥中，喇嘛雖然勇敢，但是卻不太會打仗；有些喇嘛激動起來，十幾個人就開始衝，這群喇嘛左手拿著佛像，右手拿著一把刀，就拼命往前衝，跑到最前面時就被當活靶打；或者是一個個的衝鋒，等到前面的倒了，後面的又再一次左手拿著佛像，右手拿著刀，再往前衝，也因此喇嘛死傷非常慘重。當時還是喇嘛的旺青就說到：

『我原是僧人，拉薩事件發生後，我和一群僧人逃到山南加入四水六嶺，我們的軍官是達傑寺人，叫青才旺德，我們一路上收繳或撿拾藏軍潰兵的槍枝，另有一些人攜帶幾枝槍者，跟他要也會給你，如此，我們百餘人（多為僧侶）有三十餘枝槍，子彈很少，幾百發而已，選一些青壯，二人配一槍一刀，意謂著一人死了，另一人可頂替射擊。

我在拉薩是下密院的，仗打起來後，有個叫安珠的被大砲擊中，整個大腿被炸爛，但他極勇敢。邊喊：『阿旺雲丹，把槍拿去。』一邊把手中的槍扔過來。當時有許多僧人被打死，滿地一片紅，紅的袈裟和鮮紅的血。

上密院（小昭寺）打得相當不錯，他們先詐降，等敵兵進入，再一起開火，打死許多，小昭寺因此被打得殘破不堪。我們下密院嚷嚷說要拼命，往哪兒拼，滿街子彈亂飛，不見敵軍。聽說敏珠橋有中國人時，百餘僧衝過去，開始一個也沒有，過了橋，突然遭襲，百餘人中只有十幾個脫逃，其餘全死了。

我和一理塘僧嘎松尼瑪及一老僧在一起，到橋那頭，射來一陣子彈，在我們兩中間的老僧仰天倒在地上，我們分頭躲入叢林中，過一陣，沒動靜，老僧仍然躺在上，我倆慌張地抱他起來看時，已經斷氣。嘎松尼瑪取了老僧的護身符等物。當時，從遠處見拉薩城內硝煙瀰漫，布達拉宮在濃煙灰塵中時隱時現。

打仗時，我們僧人也只有拼命而已，絕大部分衝鋒時只提著一把刀，戰鬥中負了傷也感覺不到。我們當中有一叫丹達者，會打槍，算是會打仗吧！如果說打死了敵軍，他也許有可能，其他僧人第一沒槍，第二即使有槍也不會用。

聽那些有戰鬥經驗的人講，要打死中國人非常不容易，你一開槍他就趴下，藏人以為打中了，沒那麼容易。敵兵衝鋒時一閃一閃的，很不好瞄，我們又沒有很多子彈可以不停地掃射，三拖兩拖，對方已到跟前，一掃射，根本不讓你抬頭，只好跑。其實真正在戰場上並不害怕，炮彈呼嘯著落地爆炸時也如此，只想著要殺過去。

當時子彈就像金子一樣珍貴，我的那枝英式老破槍，子彈打出去，反而聽到啪啪的悶響，而敵方的槍聲是那麼清脆，讓人氣餒。更糟的是打幾槍槍筒便發熱。我逃到拉薩河邊，那時到處是屍體，幾乎每一步都是踩著鮮血和屍體，我指的是那些不時碰到了布滿死屍的地段。其中以老人和女人最多。』

由於寺院一直是藏人的精神堡壘，因此發起抗暴的很多地方，都是以寺院做為作戰中心，喇嘛與部落民眾都一起參加抗暴，『讓娘寺』喇嘛南塞說：

『讓娘寺有六、七百僧，當時，中國人經常召各部落寺院的頭面人物前去結古開會，說是要走社會主義路線，不久傳來蚌本（僧官之意，是由寺僧選出的負責寺院內外具體事務的僧職，一般有兩個蚌本，一個負責行政事務，一個負責宗教事務）在會上反駁中共的說法。在此期間，雪嘎政府（雪嘎即『翼』之意，是玉樹地區對部落的稱呼，約類似後來的鄉公所）有七、八個中國人也經常宣傳教育。

寺院開始商量該怎麼辦，一個卸任蚌本典瑪拉桑首先說，我們不走社會主義路線，社會主義不管貧富財產要充公，不許私人擁有，寺院不能當寄生蟲，不能坐食人民的供養，要參加生產勞動，要向寺院徵稅等。於是，有一些僧人前去攻擊雪嘎

政府，但這時中國人早已逃走了，於是他們搗毀房子，焚燒中共大量的文件，將有用的東西全搬回寺院，讓娘寺算是正式造反了。

不久，由於敵軍砲擊和援軍趕至，圍攻結古鎮的各部落藏人全部相率逃退，大部分結古寺和其他圍攻者逃到了薩年寧，結古解圍後，中共就派人到讓娘寺，問讓娘寺準備要怎麼辦？讓娘寺回答：『我們不投降，打！』並要各地僧俗回寺參加戰鬥，還派人到薩年寧向札武部落求援，因為聽說他們有大量的武器彈藥，並要屬於讓娘寺的隆寶上下兩部回來參加戰鬥，上部隆寶堆瑪、和下部隆保麥瑪共有百餘騎前來增援，農區的也來了一些，另外各莊也來了幾十人，讓娘寺僧不論老幼小全部來了，於是，近千名僧俗就這樣靜候中國軍隊前來攻擊。

我們與敵人交戰多次，有一次我們追著敵人，打死好幾個敵軍，第二次敵人又來了一股，被我們打死一些，幾天後，敵人大股到，從各個山頭蜂擁而來，我幾百餘騎在山上不停的開槍射擊，但效果不彰，當天在外圍各山頭的戰鬥中，先後有三、四十名官兵陣亡。第二天天亮，只見周圍各山頭已完全被敵軍佔領，寺院已處於敵軍的包圍之中。

我們將僧俗合編成四部，分守四面及各門，不久，敵人開始向寺院砲擊掃射，不分白晝黑夜從未停止，我當時躲在大經殿中，寺院下方的格日村和在寺院院牆外共百戶，隆保酋長的房子已被敵佔，並在上面插上了紅旗，架起了機槍。當時有一個小喇嘛報告說：『敵人已進札巴的房間。』札巴的房子在寺院內外牆之間，幾個僧人聽到後立即起身前去攻擊，這時敵已逼近大門口，以機關槍槍口對著內牆緊閉的大門門板向大院內掃射，在院內的人與狗被突然射來的槍彈打死許多。當時僧人喀吉兄弟，悄悄爬上門頂，拿大石頭從上向下猛砸，幾個敵軍頓時慘叫倒在門外的草叢中。

另有一人摸近門邊，突然以刀從門縫向外捅，聽到敵人大叫的聲音，我們隨即吶喊著開門，持刀矛想與敵人肉搏戰。但因為敵人已佔據四周有利地形，寺院外已經不能行動，於是官兵們將寺院內的全部房間打通後固守。當時有一敵軍從札巴房門口向外張望，正好被趕來的旺澤百長一槍擊斃，敵兵向前撲倒在牆腳小路上。一個外號叫然格、真名叫洛桑索巴的格古（格古為僧職，是負責維持秩序的，因常手持鐵棒，中國人俗稱其為『鐵棒喇嘛』）持刀想去拿那枝槍，快到跟前時，敵人快速閃出取槍後躲回，他跟著衝進札巴房間內，敵人從裡向外射擊，他被打得混身是窟窿，袈裟被打得破片亂飛，但他還是往前衝了幾步才倒下。

在戰鬥結束後，聽當時被趕去清理戰場的藏人說，僅寺院內牆就有九十名寺僧的屍體。俗人死了多少？沒有人知道。

『讓娘寺』活佛加塞仁波切也說：

『一九五八年藏曆七月的大約是七日，外圍陣地就已經完全失守了，第二天，敵人包圍寺院並開始步步向寺院逼近，這時，除了寺僧，各部官兵中有槍的大約只有三十餘人，而且每個人都只剩下十幾發子彈，有百發以上子彈者甚少，因此每一發子彈都要節約著打出，且要瞄準並在有把握時才打，在肯定可以擊中時才射擊，如此堅持了整整七天。

但敵人沒有子彈不足的問題，以此來看最後的結局似乎很明顯了，但敵人必須要花很多的力氣才行，後來敵人已開始用炸藥包進行爆破，一包包的炸藥送到牆腳、門口，隨著巨響，院牆一片片被炸倒，如此中國軍隊逐屋用炸藥爆破，我軍步步後退，最後大部分都集中在大經堂內，大經堂的門對著格日村，敵人從格日村集中火力向經堂射擊，子彈可以直接打進經堂內，佛像等被打得殘破不全，也有一些人員負傷，大經堂頂不住後，要退入孔覺坡章地下室時，途中遭敵掃射，死傷累累。十一日或十二日時，在大經堂內的三十餘僧坐不住，就向敵人發起自殺式的衝鋒，全部死在一塊叫然辛田地旁的寶塔邊上。

這樣陣地一塊塊失守，青壯多已戰死，只剩下一些老弱，藏曆十四、五日，一輪明月下，只有少數寺僧突圍逃出，當時讓娘寺號稱七百僧，少說也有六百人左右，其中逃出或活著的不過百餘僧而已。

有個叫協鬆的背屍體的僧侶，當寺院已經被敵軍佔領摧毀時，他過河向河對岸山坡上的敵崗樓衝過去，崗樓本是藏人建的，後被敵軍所佔，他衝進去第一個崗樓，口中邊叫：『我的多麼好的寺院，叫你們這些強盜給毀了，讓你們這些強盜給毀了。』他一邊奮勇砍殺，竟連續砍死了二、三名崗樓的敵軍後，在山頂的崗樓附近才陣亡。敵人衝進寺院後到處搜查，敵軍衝進經堂，以繩索套住巨大的佛像讓藏人積極份子拉下來砸碎，並將佛祖語錄『甘珠爾』鋪在地上，讓老百姓從上面踐踏而過，大部分寺院的財寶則運往結古，如此讓娘寺徹底給摧毀了。』

另外，章果寺喇嘛嘉洛則說到：

『我們的寺院先後被中國共產黨摧毀了兩次，一次是他們長徵時竄入我們的地方，寺院於是組織軍隊抵抗，先是出外迎敵，失利後退回寺院固守，中共軍隊將寺院圍攻了近一個月，當時的戰鬥聽說非常激烈，藏人一次就死了八十餘人，傷者更多，中國軍隊攻占寺院後，將寺院內部設施全部破壞，但未焚燒。

一九五六年中國人在我們地方進行革命，要消滅佛教，並將人民的財產收歸公有，槍枝要上交，以及引誘一批人鬥爭另一批人，人人自危，不得安寧，因此，寺院決定予以抵抗。做出這一決定的是寺院的會議，即由六十人到八十人不等的僧人組成的委員會，這一機構是寺院較大事件的決策者，當時寺院就開始與中國人發生摩擦。

當時有一件事，就是中國人在各部落建立民兵組織，因沒有人願意去參加，便以支差的方式強迫每個村莊根據大小抽人去參加，有一個叫曲瓦拉日貢旭的村莊，村民花錢僱了一個僧人去當民兵，寺院認為僧人不該去當民兵，不允許去，但由於該村沒人願意去，只有該僧人願意接受金錢替該村支兵差，於是部落還是派了這名僧人，寺院要處罰該村，中國人則偏袒該村。

而且，中國人在剛進入我們這個地方時，還曾對寺院執事說：『以往雙方發生戰鬥（指的是解放軍長徵時的衝突），雙方都有錯，大家都不要放在心裡，中國人說未來將會幫助章果寺院，寺院方面回答說不需要中國人幫助，只要維持原來的權益即可，在中國人滿口答應後，因為已知道中國人在中藏交界的達澤多（即康定）進行鎮壓和壓制宗教的事，所以得此保證後也就安心了許多。

但是那僧人後來還是當了兵，隨後中國人又向寺院徵重稅，我們寺院的吉瓦（負責為寺院做買賣等經濟事務的人）之一從印度買來大量的綢緞和從日喀則買來寺院自己用的長地毯，結果被中國人徵了重稅。此後中國軍隊愈來愈肆無忌憚，又說寺院的執事與國民黨有關，然後又藉口到寺院搜查，麻煩的事接連不斷發生，寺院被迫抵制，摩擦不斷升高。

有一天，中國軍隊突然包圍了寺院和村莊，寺院和藏人也立刻做出反應。僧俗都集中在寺院內，雙方終於又打了起來，共打了兩天左右，藏人被打敗，僧俗死傷慘重，寺僧就死了百餘人，俗人死了多少沒人清楚，反正到處都是屍體，有的則被槍決或關進監獄，後來沒有幾個人回來的。』

在這些反抗的戰鬥中，一開始的作戰主力是俗人，多數喇嘛仍在寺院中唸經，但到最後藏人已經頂不住了，許多喇嘛便開始參加戰鬥，而且表現得極為勇敢，甚至是敢死隊的成員。喇嘛洛桑更秋就記得戰爭爆發時，他們這些喇嘛人在寺院中，心情卻跟著寺外的砲火起伏，雖是個出家人，但最後還是投入了戰爭。

當時不論僧俗選擇固守寺院，最後玉石俱焚的事情極為普遍，由於藏人虔誠信仰佛教，許多人都接受與寺院共存亡的命運。但更多的則是被迫離開寺院，投入軍隊的行列中，以致『喇嘛殺人』到今天仍是許多出家喇嘛忘不了的回憶。洛桑更秋說：

『一九五七、五八年安珠貢保札西在竹古塘建立了兵營，那時我們在寺院都得到了消息，五八年藏曆六月，安珠在離我們寺院不遠處一個叫甲布桑多的地方負傷了，後來然楚阿旺在林周地區又建立了兵營，安珠負傷前就有藏人警告說不要再往前走，前面有中國人的軍營等，但四水六嶺卻把這些人抓起來問他們是不是特務？並不相信，結果沒走多久就挨砲火了，砸得很慘。

這些消息我們在寺院都聽到了，後來又聽說在貢嘎擊毀了十四輛汽車，其中有一、二輛車的以員跳到河裡，最後幾輛則跑回拉薩，西藏人也搶了很多武器。這時大家開始想到要到山南參加遊擊隊，並且秘密串聯，後來一共有一百六十多個僧人要去。但有槍有馬的人不多，我是沒槍沒馬，沒槍沒馬的人先走，但又派了四個有槍有馬的人去探路。

我們步行到四水六嶺處受到熱情招待，但就是沒有槍和馬可以給我們，還是徒手兵。後來噶登寺參軍的人全來後，便自成一部住在恰喀寺內，我們在那寺院開會，選了四個指揮官，二個人負責領兵打仗，二個人負責後勤照顧食物，軍隊雖建立，但多數人沒有槍。

有一個寺院的大喇嘛在當時給了我們兩頭牛吃，他問我們說：『你們都是喇嘛，又沒有槍打什麼仗，還不如到寺院唸經吧！』我想反正也沒打頭了，就去唸經。當時有二百多名四水六嶺的人正準備出發，說是要進攻澤塘（山南地區的首邑），他們都騎著馬，武器裝備也不錯，拿著旌旗，雄糾糾氣昂昂地要出發，我看了好羨慕。

大約是一九五八年藏曆十月吧！那時雪下得很厲害，我每天都要去背柴，有九個投降的中國人天天在那裡砍柴，和尚我就去把柴背回來。後來我又被調到恰卡寺去唸經，唸了二、三天後又聽說要去進攻澤塘的地方，這次我就跟著出發了。

但我還是沒槍，不過這時山南地區開始有空投的槍下來了，但大部分都摔壞了，多是木頭的槍柄給摔壞了，必須要請木匠修理。

澤塘那邊經常可以聽到大砲的聲音，一個恰城人率了十幾個人的隊伍，有槍有馬、還有望遠鏡，雖然子彈不多，但裝備還算精良。他們說準備晚上要去澤塘打仗，希望我們有一些人去扛砲彈，我們說好啊！就在晚上等呀等，也不見他們來，後來知道他們直接上前線去了。於是我們也拿著刀向前衝，到了前線看到前方有中國人，我們每個人都躲在樹後，如果中國人出現，就要把藏在身後的刀子拿出來，但中國人並沒有出現。

第二天我們又繼續向前推進，這時離中國人的兵營就很近了，我們一共有九十多人，為了不要驚擾敵人，就用毯子把馬蹄裹上，馬頭上的鈴鐺也取了下來，晚上就悄悄進入了澤塘寺。當時這個寺院還在我們藏人手上，但城市有很多部分就落在中國人手裡了。

當時澤塘地區一共有九百多名四水六嶺的士兵，其中一半有槍、一半沒有槍，有槍的子彈也很少，砲則有二門，是扛在肩上可以橫射的（火箭筒），裝備大概就只有這些了。每天我們派廿五個人去偷襲，組織廿五個人的遊擊隊，誰敢死就報名，但攻過幾次後，就只剩下十一人了。

當時我和兩個『多倉』（多倉是藏語，是指在軍隊中一起吃飯的人）都入選了，並且被安置在一個寺院中，當時還是沒有槍，但沒槍仍準備去突擊。一個多倉拿著鋤頭，當廿五個人衝到前面，卻沒有藏的地方時，他就馬上在旁邊挖洞，那些有槍的人馬上就鑽到洞裡射擊。如果再向前射擊，他就再向前堆土，為他們挖掩體。

我參加戰鬥前後一共十八次，沒有一次被打中，但有兩次差點被俘虜，被抓到衣領但身體一掙就脫逃了，後來他們發給我英式步槍，又給我一把衝鋒槍，是一次可以射很多子彈的那種。

我們廿五人是敢死隊，有一回藏人從澤塘寺的屋頂向下射了二砲，一砲射到前方某地，因為地形障礙看不清楚，另一砲射在敵人挖洞的山崗上，這兩砲射完後敵人馬上往後退，撤得很乾淨。我們去清點傷亡，卻發現我最好的同伴也死了，他的屍體就被我們扔到雅魯藏布江了。』

在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後，西藏人隨後在尼泊爾境內的木斯塘建立遊擊隊的武裝基地，總司令根益西便是一名喇嘛。

但是卻有曾在木斯塘打遊擊的西藏遊擊隊員提到，當有人違反軍令時，根益西喇嘛可以一邊唸著經文，一邊說：『把他們殺了。』然後又繼續冷靜的唸經。

此事一再受到流亡藏人內部議論，根益西指出，這件事他已向達賴喇嘛報告，因為他們當時的基礎非常薄弱，禁不起折騰，所以必須要有嚴法來壓，沒有嚴法人們會有各種念頭、慾望，所以他有點高壓。根益西說，當時西藏什麼也沒有，幾千人守在荒山中，必須要有嚴法，才能製止各種挑撥的話，只能這樣，否則兵營成立不起來。根益西說：

『僧人是不能殺人、害人的，喇嘛殺人談不上有什麼正當。但當時由於環境非常險惡，特別是毀滅了佛教，危害了達賴喇嘛，還有其他的暴行等，我雖然是個僧侶，但業障、貪、瞋、痴都沒有消除乾淨，所以冒火了，也就參加戰鬥。

另一原因是因為藏人很少，而且中共毀滅是以宗教為對象，僧侶也只好起來戰鬥。有些僧侶看到自己的經堂被毀，忍不住參加戰鬥，這種情形很多。也有些人是因為生活沒著落，就只好參加打仗。

而且，兵營內物質匱乏，沒有吃的，什麼也沒有，在第一年內幾乎沒有一餐飽飯，只是餓不死而已。所以一直有人到處偷盜，還到老百姓那裡偷盜，怎麼講都沒有用，最後才決定殺一儆百。做了決定後，也把這個決定公佈出去，公佈後還有有八個人去偷東西，於是殺了其中四個人，其他四個則是認錯，被抽鞭子。

此外，還有一些人不屬於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卻也跑到尼泊爾這一帶，在尼泊爾、西藏邊境遊牧，天天到西藏境內去搶劫一般牧民，弄得裡面的人都害怕四水六嶺，而且有牧民逃到印度後還告到達賴喇嘛那裡，說四水六嶺的人經常跑來搶老百姓的東西，結果還有命令來責問我們怎可搶老百姓的牛羊？

這樣不僅傷害了西藏的名譽，也危害了軍隊的紀律，在不斷提出警告、忍讓了很久後，沒辦法決定採取強硬措施。我不得已下令：『你們偷多少，我們就搶多少。』就把他們的牛羊都拿回來。但也把強盜部落各挑出兩個強悍的人槍殺了，這樣的強盜部落有好幾個。

當時有一個噶瓦人牽了兩匹馬、偷拿了武器當逃兵，此人和中國人有聯繫，還把自己的狀況告訴了中國人，並帶瞭望遠鏡、地圖、馬、長短槍等，要投靠中國人，希望中國人幫他還錢，債還清了他就回來。

但因他手上有那麼多東西，絕對不能落到敵人手上，特別是地圖，非常重要，於是我便派了四十多人，要把他押回來，不準備殺他，但是不管任何情況絕對不允許他進入西藏，也勸他投降。最後四十幾個人打了起來，不僅把他打死了，也打死了借宿家庭的三、四個人，母親抱著孩子在睡覺沒起床，也被打死了。』

根益西說，雖然他是一個僧人，但為了維護軍紀只能如此，他不能從僧人的角度考慮，而必須從軍隊總司令，維護軍紀，軍隊的聲譽等來考量。所以，他只好被迫殺人。但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命令，是大家一塊商量後決定的。

在西藏護教戰爭中，根益西不但是籌組四水六嶺的主要角色，後來更是木斯塘遊擊戰役的最高負責人，參戰經驗極為豐富。根益西說，他雖然是個喇嘛，但當時聽到中國人被打死也會非常高興的拍桌子，現在想想那些死去的士兵都只是一般士兵，他們也是很痛苦的，殺死他們沒有任何用處，更沒想到自己還會為殺死一個人感到高興，做為一個僧侶是非常不應該的。都是因為人的業障還未清，是因為貪、瞋、痴還未清理乾淨，才會這樣。

根益西說，他覺得非常遺憾，因此後來他去拜見達賴喇嘛，也談到這個問題，並且要求達賴喇嘛為這些人祈禱。

達賴喇嘛對根益西說：『你殺了人後，還為殺了人而感到高興，罪過是雙倍的，不管對方是什麼人，殺了人都是自己的罪過，即使是被迫而殺也要為這件事感到難過，為此而懺悔。』根益西覺得達賴喇嘛講得很有道理，於是向他懺悔。

喇嘛分很多種，在西藏有一種藏名叫『朵多』、俗稱『浪蕩僧』的喇嘛。這些人非常勇蠻，雖然是喇嘛，但都留著長頭髮，而且袈裟提的高高的，在他們腰上掛著鐵鑰匙，到處去打架，洛桑格列就是屬於這一類的。

洛桑格列說，他們這種人每次打仗都是衝鋒陷陣，宣稱不怕死，不論在任何時候都不能顯示出膽怯，是打仗中最勇敢的。在哲蚌寺像這類的僧人就有百人以上，但朵多都是單獨行動，比方他們到中國軍隊中去修馬鞍，軍隊一看他們就知道是敢死隊在前面衝鋒陷陣的，如果有人挑釁，朵多也絕對是裝著就是這麼一回事的樣子，絕對不能表示退怯。

原來也是喇嘛的然楚阿旺說到，打仗的『朵多』浪蕩僧平時到處浪蕩不唸經、不學習、只是打架，你說他不是僧人，可是他卻住在寺院裡，寺院需要出力時他們也會出力。若要打仗了，浪蕩僧大部分都會當兵；一些高僧很少去當兵，但也有些喇嘛很清楚中共要消滅佛教，沒有其他路子的時候只好對抗，是迫於無奈。

浪蕩僧當兵人們並不會把他們看成是合格的喇嘛，但後來大家都造反時就沒有高僧、低僧、男女之別，連女人都衝鋒陷陣，因為那時大家感覺遇到一個很壞的劫，連女人都被逼得沒辦法了。

朵多平時就是靠自己的勇敢吃飯，不能退，一般當兵後都非常勇敢，而且他們沒有任何知識，只知道逞勇，憑自己的血性之氣衝鋒。不是每一個護身符都可以擋住每一顆子彈，敵人用機槍掃射時，他們也不知道要躲避、退避，甚至他們把退避視為怯懦，只知道要往前衝，所以死了很多人。

而俗人家裡總是有妻子孩子，心裡會有牽掛，死者也不會瞑目。但如果朵多死了，他們自己也不會有什麼遺憾，死得其所，而且也沒有妻子孩子的牽連，在他旁邊的戰友也覺得沒有什麼好遺憾的，死了就乾乾淨淨，這可能是最大的不同點。

然楚阿旺說，在三大寺，是浪蕩僧人數比較多的寺院，比例約是百分之三至四，至於高僧佔多少比例他不敢妄加評論，但參加戰鬥開始入伍的絕大部分都是朵多，他們一般沒有佛法的實踐，只會唸些簡單的經文。雖然朵多在佛法的實踐上應是屬低層次的，可是他們卻為宗教、或是為自己的勇氣獻出了生命，也為西藏佛教立了功。

『朵多』洛桑格列就說：『從嚴格的角度來看，僧人是不應該去打仗的，但地方被水淹了，他雖是喇嘛還坐得住嗎？大水要我們的宗教、民俗、文化全都沖走，誰都坐不住，所以就去救援。中國人要消滅我們，讓後世沒有藏人這個民族，他們

要達到這個目的，首先要消滅的就是宗教，所以就顧不得什麼了。而且我們的修行不高，道行也不深，所以覺得與其乾坐著，遠不如去救老百姓或去拼命，應該是一種善行吧！不能說是符合宗教，但絕對不是惡行。』

除了『朵多』以外，在一九五九年拉薩造反後三大寺以及上下密院無數的密院等，一般都是比較正規的僧侶，一生唸經外沒學過開槍，很多僧侶沒有槍都是拿著刀子在那裡衝，喊殺喊打的衝，死了很多人，這些應是比較正規的僧侶，但他們也造反了。然楚阿旺說，高僧當兵的例子也有，也都領兵打過仗，這應該是沒有辦法之下的選擇。

然楚阿旺說，從佛法的角度來說並沒有什麼敵人，只有被憎忿心所迷惑的眾生，按道理不應有仇恨。但一些喇嘛因為道行不夠肯定會產生些仇恨心，將對方視為佛法的敵人，殺一個少一個，認為：『我一定要殺死他，我殺死它後就會產生一些歡喜心。』如此的心情當然是不對的，但這樣的也不少。

而且，各寺院為了西藏的自由和宗教，當兵可能是為宗教效勞的一個捷徑，也是最直接的，而且僧人也有國家觀念，願意為祖國效勞，由於這樣所以有很多人參與了，寺院被毀，佛像被打，當然也是很氣的。

格西強巴加措也指出，出家人打仗進入戰場，這種例子很多，有的出家人學佛能力不錯，有的出家人則是在寺院中擔任司機、會計的工作，但畢竟是出家人，西藏當時參加戰鬥的，小則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寺廟，大則要保衛佛教，所以才上場打仗，但不是說他們不想學佛。

而且，去參加戰鬥的都是年輕的喇嘛，快要得到格西學位而參加戰鬥的就比較少，但不管有沒有上戰場，其目標都是一致的，都是為了保護佛法。

強巴加措說，雖然殺生不合佛法，但主要還是取決於動機，他們不是為了殺中國人，而是為了不讓中國人破壞佛法，而去上戰場。但有一種想法，若在戰場上殺了三十個中國人，回來之後會覺得自己沒有資格再當和尚了。

強巴加措解釋說，西藏最有名的政治犯擁祿達瓦才仁是甘登寺的出家人，而且是甘登寺的活佛。一九五九年他上戰場，在拉薩的小昭寺來了中共的坦克，擁祿活佛就跳到坦克上，殺了一些中國漢人，後來他被捕，但現在已獲得釋放，現在他還是出家人，但不穿袈裟，他說：『我不穿袈裟，因為我殺人了。』因為他感覺自己沒有資格再穿袈裟了。

強巴加措說，出家人最主要有四個戒律，不殺生、不說假話、不嫖、不偷，但殺生以後就沒有資格穿袈裟，為了佛法而違背自己的戒律，這對一個出家人，是很難下的決定，去，會違背戒律，不去，心裡又很難過，是很痛苦的心情。

而且，佛教分大乘和小乘，出家人上戰場從小乘來說是比較違背佛法，是不可以的，但對大乘來說卻可以。因為大乘強調不是為我個人，為普渡眾生，他們參加戰爭，是為了整體的利益，所以如果參戰不是抱著仇恨、而是抱著拯救生靈以及保護佛法的動機參加戰鬥的話，應該是合乎大乘的。

西藏人也會說，在佛祖釋迦牟尼五百個轉世經歷中，有一次轉世為船長，他們要到一個島上時，有一個海盜頭子門那冬土，想把船上的五百人都殺了，船長發現他要殺五百人，有很大的罪過，還不如我把他殺了，只有一個人的罪過。因為這個殺人的動作不是出於害人，而是覺得慈悲他。

當時在西藏內部，由於宗教迫害事件不斷地上演，所以喇嘛出征的情形也愈來愈普遍，然而在此之前也不是沒有先例。在西藏歷史上，西藏喇嘛參加戰鬥已有將近千年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吐蕃王朝時代，所有西藏的歷史都記載了拉隆巴多傑行刺西藏末代贊普（國王）朗達瑪的歷史事實。

拉隆巴多傑是一個喇嘛，他在山中修行時，發現有一些穿著袈裟的人牽著狗、揹著箭囊、持弓前來打獵，拉隆巴多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後來才得知西藏歷史上著名的三大法王之一赤熱巴巾已被反對佛法的大臣所暗殺，並且擁護不喜佛法的朗達瑪為西藏國王，朗達瑪繼位後，大肆破壞寺院、迫害佛教徒、焚毀經文，就連那些持弓牽狗的僧人也是出於被迫。

拉隆巴多傑得知此事後，聲言為了佛法，於是前往拉薩行刺，終於殺死了朗達瑪，卻也使強盛的吐蕃王朝解體。拉隆巴多傑以喇嘛身分殺了人，但在所有由佛教徒撰寫的史書中，幾乎每一個作者都是以讚賞的筆調來描寫這段歷史，就連在民間對拉隆巴多傑也多所崇拜與信仰。

在吐蕃王朝解體後，西藏經歷了長達四百年的分裂時期，蒙古軍隊橫掃世界時，兵力曾經到達西藏地區，並由蒙古人扶持建立了統一的薩迦王朝政權。薩迦王朝政權後來由降秋監贊所擊潰，繼而建立了帕竹王朝。

然而，降秋監贊本身就是個喇嘛，在與薩迦王朝的戰鬥中，他不僅全盤指揮，還親自帶兵上陣作戰，但後世從未有人對此予以譴責。

西藏僧兵大規模投入戰鬥應是從十七世紀更藏嘎登頗章政權的建立開始的。西藏政權從帕竹王朝起，接著是帕竹王朝的外戚仁蚌巴奪取西藏政權，在仁蚌巴王朝後，原為其屬下的辛廈巴造反，並建立了著名的藏巴王朝。藏巴指的是雅魯藏布江中上游地區，即為現日喀則一帶，由於王朝定都於日喀則，所以藏人將辛廈巴稱之為藏巴國王。

西藏著名的藏巴國王信奉藏傳佛教的噶舉派，但當時由宗喀巴創立的格魯派得到長足的發展，成為西藏佛教界一股新興的力量。格魯派主要以拉薩一帶等衛藏地方為中心，擁有不小的勢力。其中的第三世達賴喇嘛到西藏康區、安多、甚至也前往蒙古地區傳教，進而使得蒙古的元大汗及其部眾皈依佛教。

隨後，格魯派又傳入蒙古其他各部，在第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後，接著轉世的第四世達賴喇嘛即為蒙古人，於是更強化了格魯派在蒙古的地位，也使得絕大部分的蒙古人成為格魯派的信徒。

格魯派的蓬勃發展終於引來以噶舉派為皈依的藏巴國王的不滿，當時，藏巴王朝的最後兩個國王對格魯派採取了暴力壓制的政策，並且頻頻騷擾位於日喀則的札西倫布寺，該寺是由第一世達賴喇嘛所興建，為班禪喇嘛平時駐錫所在地。

於是，藏巴國王和格魯派的兩股勢力水火不相容，進而發生了衝突事件。西元一六一七年，前來朝聖的蒙古部落搶奪噶舉派教主噶瑪巴的牛群。第二年，藏巴國王又率大批軍隊前來報復，於是蒙古人與色拉寺、哲蚌寺、以及信奉格魯派的一些藏人部落聯合抗擊，為了維護格魯派的安全，格魯派的喇嘛首次正式而大規模的參戰，並且有了『僧兵』的稱呼。但接著蒙藏聯軍突然潰敗，藏巴國王攻佔色拉寺、哲蚌寺，不論是參戰或未參戰的僧俗都遭到了殺害。

這次的戰爭最後以格魯派繳納巨額的贖金、以及許多格魯派寺院被強制改宗噶舉派才暫時告一段落。然而，藏巴國王並不滿足於此，心想格魯派雖受到重擊，但元氣未傷，最後必然復興，因此便與信仰噶舉派的蒙古喀爾喀部確圖汗聯手，並不惜與信仰西藏傳統宗教苯教的白利王相互勾結，三方約定同時出兵消滅格魯派。

在此危險關頭，格魯派領袖達賴喇嘛的管家向在新疆遊牧的蒙古和碩特部尋求援助，在和碩特四部領袖商討派誰前往解救格魯派，由於和碩特部部長是一個虔誠的格魯派，他自告奮勇領兵請往。他首先和準噶爾部聯合襲殺喀爾喀部確圖汗，接著又聯合格魯派僧俗攻滅苯教的白利王，然後開始準備攻擊藏巴國王。

因為藏巴國王當時略為鬆懈，在對方發動突襲時，藏巴國王軍隊措手不及，雖然無力組織反攻，卻又拒絕投降，並且立即轉進兵力固守各宗堡與寺院，格魯派僧俗和蒙古聯軍多次攻擊都沒有進展，格魯派便派遣一名南捷札倉（直屬達賴喇嘛的寺院，原來寺院即在布達拉宮內，達賴喇嘛的一切法事活動，都有南捷札倉參與）的喇嘛為間諜去了解敵情，結果了解到除非斷糧或自動投降，否則絕難攻下。

此一消息使得主動引來蒙古兵的達賴喇嘛管家索南無沛驚慌失措，原本試圖請求達賴喇嘛出面調解，為達賴喇嘛所拒絕，因為格魯派引來蒙古兵已為眾所週知。

就在左右為難時，哲蚌寺的僧兵成為關鍵，他們首先在很短的時間內攻下了一個拒不投降的城堡，從此威名遠播，大軍所到之處所向披靡，藏巴國王只好投降，終於結束了統治西藏的藏巴王朝，西藏歷史也從此進入了由格魯派或達賴喇嘛統治的噶登頗章政權。

喇嘛出兵穩定政權的例子還包括在一六七九年時，印度拉達克軍隊攻入西藏，西藏政府在當時派遣已經在札西倫布寺出家為僧的蒙古貴族嘎登才旺出征，先讓其奉還戒律，然後率兵趕走拉達克人並攻佔拉達克的首府列城。嘎登才旺先奉還了原本自上師領受的戒律，成為不受戒律約束的人後，才率兵打仗，這是喇嘛出兵最正規的方式。

到了二十世紀初，僧兵又再一次成為西藏反抗外族入侵的主力。英軍入侵時，西藏政府組織了大批的僧兵投入戰鬥。而在一九一一年中國發生辛亥革命時，當時西藏政教領袖十三世達賴喇嘛正在印度流亡，西藏處於滿清軍隊的軍事佔領下，隨

著滿清政府的垮台，在西藏的幾萬名滿清官兵分裂成『保皇』與『共和』兩派並發生內鬨，西藏政府立即組織僧俗與中國軍隊交戰。當時，集中在拉薩的中國軍隊攻打色拉寺，色拉寺喇嘛於是奮起反抗，並組織起來攻入拉薩，在隨後的戰鬥中，喇嘛更一直是作戰主力。

由於喇嘛作戰勇猛，在迫使中國人退出西藏並迎接十三世達賴喇嘛自印度返回西藏後，十三世達賴喇嘛特別嘉獎這些從軍的喇嘛，其中位於康區的大金寺甚至被達賴喇嘛賜予代本（西藏軍隊中最高的軍隊編制，相當於團長）職，大金寺是五世達賴喇嘛派人建立的，在拉薩的戰鬥中，大金寺在藏學經的三百多名喇嘛全部參加了戰鬥，受到達賴喇嘛十三世最高的肯定。並決定將大金寺按照藏軍編制進行整編為僧軍，授予青獅白象軍旗一面、銅號一個，並發給英式步槍五百枝，子彈二十五萬發，同時任命該寺喇嘛恭布次仁為代本（團長）、青澤為副代本（副團長）、協嘉為路波（參謀長）等。

固然西藏的僧兵歷史由來已久，但並非常規的僧兵卻終究是緊息狀態時的臨時軍事體制，如果再擴大看一般藏人，西藏政府一向沒有對人民施予常規性的軍事訓練，在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傳記中談到藏人的兵役制度時說到：『西藏政府原來的傳統是發生戰爭時，西藏政府除了徵召喇嘛、以及十六歲以上、六十歲以下的男性帶口糧自動出征外，沒有任何的訓練與作戰經驗，甚至沒有統一的服裝，同時也沒有組織，老老少少混雜在一起亂哄哄的出發，在作戰時便使出全部力氣發出『咯呵呵』的吶喊聲，由吶喊使敵人誤以為對方人數眾多而懼戰，這是他們最有力的手段。但戰後就各自鳥獸散，自尋生路或藏匿。』

寺院除了在緊急時提供兵源而有喇嘛從軍的歷史外，同時也成為西藏政府存放軍械的地方。在西藏的許多寺院中，都存有備用的軍械，如『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先後兩次奪取西藏政府的武器都是從寺院拿走的；第一次是到香嘎曲秋克林，第二次是八宿寺。

在一九五一年中國進軍昌都時，西藏政府曾經組織並派遣一些僧兵前往增援，只是增援的僧兵還未到戰場，藏軍就已經在昌都戰役中慘敗。而中國也在其編輯出版的『西藏文史資料選輯』中提到當時西藏政府確實曾派遣數量不多的僧兵前往作戰。

中國入藏後，喇嘛們不但組織成僧兵抗暴，『喇嘛殺人』事件更在西藏佛教歷史上，烙下民族最深的傷痛，西藏人對中國人的仇恨，多因此而起。安多人索南嘉則說，在他們的家鄉有一個木門，木門一邊是中國人，另一邊全是西藏人，雙方從不同化。西藏有一句話說：『不給中國男人叫舅舅、不叫中國女人為姑姑』，意即不通婚。

同時敬神時藏人也會對神說：『希望佛祖不要錯了，成為殘暴中國人的保護者。』

索南嘉指出，打死中國人時，西藏人口中喊著的是：『佛教勝利！佛教勝利！』。

因為這樣，比丘尼阿奈巴青難過地說，她們西藏在歷史上是完全獨立、自由的國家，她們有自己的宗教，也過自己的和平日子。但中國人搶她們的土地，滅她們的佛法，毀她們的寺院，劫奪她們的佛像、藝術品、珍寶等，屠殺她們的喇嘛、格西、僧人等，去看哲蚌寺的廢墟就可以知道有幾千個寺院被摧毀了，造成這樣我們還有什麼辦法？西藏人被逼迫得無奈了。

阿奈巴青說，喇嘛殺人第一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宗教、文化，第二是為了人民的自由和幸福，這就是佛法，佛法是為了利益人民，逼到這個地步了，還分什麼僧俗男女呢？很多女人都拿著槍去打仗，藏人有句話說：『逼急了尼姑也會帶佩刀。』這是逼急了的，而且喇嘛打仗並不是因為他們想殺人，他們是因為連螞蟻都不想踩死而出家，逼得沒辦法才出生入死，這其實也是佛法。

第六章 雪域護教志願軍

從一九五一年中國軍隊入主昌都後，很快出現藏人被抓、喇嘛被鬥的各種漢藏衝突，此時藏人心知戰爭已是不可避免之事，從此西藏各個角落開始出現零星戰鬥，中國也因此展開平叛的軍事行動。但這些零零散散的自發性遊擊戰卻因多數缺乏組織與軍事訓練，又缺乏現代武器支援，因而只能在點上做騷擾式的突擊，很容易就被中國部隊所殲滅。

與此極不相同的是，從一九五一年到五九年間，『雪域護（衛）教志願軍』與『四水六嶺護（衛）教志願軍』這兩支藏人遊擊團體，卻能以組織型態結合藏人進行長期戰鬥，給中國軍隊帶來極大的威脅，因而成為西藏反侵略意志的兩股主要像徵。

成軍最早的『雪域護教志願軍』，在康區與中國人民解放軍纏鬥長達十年，藏人承受最慘重的傷亡，最後解放軍以絕對多數鎮壓了這支民兵組織。雖然敗勢已定，但僅存的西藏戰士在彈盡援絕、糧食不繼的情況下，卻依然堅持在自己的土地上流完最後一滴血，他們沒有逃亡，有許多人在被俘前服毒自殺，臨死都不願屈服，留下西藏歷史上悲壯的一頁。

西藏康區包括囊謙廿五族，即現青海省玉樹地區和已併入中國四川的甘孜地區、木里縣、以及併入中國雲南省的迪欽地區、還有劃在西藏自治區內的昌都全部地區、那曲大部分地區等均是，人口約佔西藏民族三分之一強，地域也約佔西藏總面積三分之一左右，康人（或稱為康巴人）多為牧民。

西藏人一般認為他們的民族常因地域而形成不同的天性。如說：『虔誠信佛的衛藏人、強悍勇敢的康巴人、勤奮精進的安多人』，由於個性剽悍，抗暴中勇猛的戰士多為康人。一九四九後中國軍隊到達康定（藏名是達達澤多，中文音譯為打箭爐，康定是清末趙爾豐在攻占康區後所取，意指康區底定之意），就整個康區而言，長江（又名通天河、指金沙江段）以東地區在國民黨時期就已經受到國民黨的統治，長江以西地區藏人為防國民黨部隊入侵，過去亦曾經組織民兵，而且因為都穿黃色制服，所以被稱為『色熱』（黃衣軍之意）。

芒康地區的黃衣軍曾經長期駐守在長江以西的丁青一帶，在得知共產黨軍隊已經到達康定後，芒康黃衣軍的首領普巴本，慈戾尖贊又組織起一千名民兵，就連駐雅安的國民黨殘兵敗將也向黃衣軍陣地逃來。當時戰敗的國民黨軍隊中有一名軍長、兩名師長及兩千五百名士兵，這些國民黨軍隊擁有無線電台，裝備的槍枝全是『色楞布然』（五三式步槍）。

他們表示，如果藏人要打解放軍，他們願意一道抗擊；如不行，則要求借路前往緬甸，或給他們食物，只要藉條路，他們願將武器全部交出，同時還可以向台灣求援，請台灣方面空投武器給藏人。

當時，芒康黃衣軍的首領普巴本認為這主意不錯，中國的共產黨部隊正在逼近，應該準備抗擊，因此，便將此訊息向駐芒康的西藏政府軍第九團團長首領德格王子匯報，德格王子表示要向昌都總督阿沛阿旺晉美請示，但藏人當時並不知道，中國與阿沛及德格王子已經私下有聯繫了。

德格王子和阿沛於是下令，要求藏人不要捲入中國內戰中，不管是國民黨、共產黨、還是其他黨，抓到一律送回，雙方各守邊界，互不侵犯，而且也不許取國民黨的一槍一彈。

國民黨那些軍隊得知後非常不滿，藏人好言相勸，並給他們派了一個嚮導，表示歉意後打發他們上路。當這些國民黨軍隊正要過瀾滄江時，一半人已經過河，一半尚未過河，而且正在河這邊埋鍋作飯時，中國軍隊就已經趕到了，結果未過河的部分不是被殺是被俘，只有軍長和一名師長率廿五人從原路逃回，其餘的則可能逃到緬甸了。

不久，中國軍隊來到長江以東的西藏土地上，並且從四川、雲南兩省調集軍隊向前逼近，普巴本立即向西藏政府要求增援兵力，或者也應將存放在昌都倉庫的武器配發給康人。當時的康人內心非常著急，又沒有發報機等現代通訊工具，傳遞消息時只是在信使上的腰帶打上印泥，以證明他一路上快速傳遞消息並未寬衣解帶。

但這樣得到西藏政府的回音卻是，有關中國軍隊入侵一事，官方藏軍即足以對付，不要黃衣軍，也不配發槍枝，並且要黃衣軍就地解散。德格王子和阿沛隨後也將西藏政府的狀況全部都告訴了中共。

當時解放軍部隊即將入侵的傳言滿天飛，人心恐慌，德格王子因此下令說：『不准說解放軍來了，那是謠言，違者割唇，解放軍不會來，來的是他們內戰中的敗將等。』德格王子同時也寫信給當地最高的政教領袖貢噶喇嘛，叫他不要抵抗中國部隊的入侵，說藏人打不過人家等。

藏人並不清楚中國人的內戰，國民黨敗軍來時，貢噶喇嘛還領了軍與他們交戰阻擊，但等到共產黨軍隊逼上來時，他的軍隊卻已經解散。

等到中國軍隊來時，德格王子以前往前線視察為由，在離開指揮部後就與中國軍隊互獻哈達，西藏政府德格王子所部第九代本也即第九團所屬第一、二營的軍隊未放一槍一彈，在無抵抗的情況下讓解放軍入藏。唯有藏軍第三營卻在長江渡口和解放軍隊打了六天六夜，讓解放軍無法渡江，解放軍沒有辦法，只好逆流而上，從上游以木排橫渡長江，並且將第三營打敗，大部分藏軍都戰死，只有少數幾個逃了出來。

解放軍在江邊繞道得手後，又連夜奔襲，突然將第三營駐地包圍，藏軍從此解體，就連廿里外的地方都聽得到激烈的槍聲與爆炸聲，三營營長逃到黃衣軍首領普巴本家中，得知德格王子已經投敵叛變，抱著普巴本痛哭。三營營長說：『西藏政府病了，我們以白雲為證，向土地起誓，拿政府薪俸，守土護教，平時苦了許多老百姓，關鍵時刻卻投降了。』邊說又邊放聲大哭。

普巴本說，西藏政府官員已經和中國互獻哈達，並引導中國軍隊前來，因此要三營營長逃到昌都去。果然沒多久，中國部隊就進入芒康縣城嘎拖，既然政府官員已經投降，大家也只有跟著投降了。

中國人進城後，立刻通知普巴本到嘎拖，普巴本遵命前往，中國將另外芒康地區一些較有名的酋長和大喇嘛召來，並分別任命為解放委員會的各種官職，普巴本、慈戾尖贊被任命為主任，副主任是塞巴喇嘛。

沒多久時間，到芒康的中國部隊來到昌都，另外有中國部隊從昌都東邊的德格進軍，卻遭到德格藏軍的激烈阻擊，並且打死許多中國人，但因為當時阿沛已經向解放軍投降，並且到察雅地區幽希山腳的鐵橋上去迎接中國軍隊，互贈哈達。敗局已定，隨後解放軍在昌都成立解放委員會時，並令幫達多傑為第一主任，主任是帕巴拉，普巴本等五人為副主任。

一九五四年起，中國開始在通天河以東劃歸中國雲南省的康區迪欽等地進行民主改革。在民主改革之後，有關強制僧人還俗、不得進行宗教活動、沒收財產等消息不斷傳來，河東的藏人不斷向河西方向逃來，引起藏人極大的恐慌。

河東與河西的藏人隔著通天河（指長江上游），卻有著不同的際遇。昌都、芒康、貢覺、都是在通天河以西的地方。在河西，雙方因為有十七條協議，一開始中國似乎顯得相當和善，但時間一久，中國人態度一天比一天惡劣，引起藏人的不滿，而江（河）東地區民主改革的情況以及江東表現藏人感受和順口溜的歌謠，也隨著那些逃亡者傳到河西地區來。

例如，說中國的政策或統治方式是：『中國人就像溼牛皮帽子，開始戴著舒服，但愈來愈緊』；以及說中國人是：『開始像神鳥杜鵑，悅耳又動聽，其次像善言鸚鵡，巧言狡辯多變，然後像不祥的貓頭鷹，白天睡而晚上示惡兆（指暗中活動，挑撥離間），接著像繇？鷹，開始行搶掠，最後像惡狼，連皮帶肉都要吃』等等，愈發增添河西藏人的不安。

同時，中國在河西也徵召許多藏人去修路、又徵稅，以往藏人可以自給自足，現在卻日趨窘困。普巴本經常與中國人爭論，如修路所發工資太少，稅額太重，解放了，應該讓人民享福，而不是趕去勞動和增稅等。

由此慢慢引發了通天河西岸的反抗，芒康於是打響了武裝反抗的第一槍。

一九五五年，達賴喇嘛從北京返回途經理塘、德格來到昌都，雖然沒有經過芒康，但是達賴喇嘛的經師赤江仁波切和噶倫索康等人卻來到芒康找普巴本，並且對普巴本說：『民主改革在六年內不會實施了，各宗縣要安心工作，要嚴格執行十七條協議，中國人說長江東西岸有區別，東岸之事也是工作人員的錯誤，中央有少數民族政策，而且六年以後民改與否也要視藏人的意願而定，這些我們已經在北京談妥了』。這些話甚至公開向藏人做了宣示。

但私底下，赤江仁波切卻對普巴本說：『十七條協議他們根本就不遵守，一年比一年霸道、惡劣，其政策如溼牛皮的鞋，是很難說的，如果出現這樣的事情，西藏中央政府無能為力，因為那裡有達賴喇嘛、有大昭寺等重要寺院，不能亂。但中國人很可能為了給其他地區做榜樣，而首先在昌都採取民主改革，如實施了，堅決不能答應，若實在不行，應以武力抗拒。』

沒想到，赤江仁波切走後不久，一場所謂的『民主改革』宣傳就開始塵囂飛揚起來了，中國人不斷地向藏人介紹民主改革的好處，並且從藏人中挑選出一些人，然後問他們的看法，一些藏人也鸚鵡學舌，中共就馬上大肆宣傳，說這是人民的意願與要求。

果然，中國在一陣宣傳之後，便開始宣稱長江以西各宗縣要邁出第一步，如有人自願進行民主改革，中國將給予特殊的獎勵與照顧，不但各酋長喇嘛可以保持比原來更多的職權，對人民的現狀也會給予照顧和救援。

當時昌都也召開有關民主改革的緊急會議，十八軍政委王其美並且發表演說，然後就要大家表態，表明對民主改革的看法。會上，首先是帕巴拉（昌都寺大喇嘛，一直在北京任中共人大或政協委員）之父表示贊成民主改革，接著八宿縣和昌都縣全部代表也跟進支持，普巴本看情形不對，就趕快站起來表示反對。

普巴本說：『解放委員會根據十七條協議工作，但回顧過去幾年是名不符實，給我們帶來很多困難。一方面，中央說六年不變，一方面卻問明天成立還是後天成立（緊迫之意），我們芒康開會後認為不應進行民改。』

另外又有一個芒康代表叫普隆倉秋的說：『解放軍剛來的時候是給了一些大洋，此外沒有帶來任何利益，但卻要這要那的，藏人宰了牛要交給解放軍，割了麥子也要交給解放軍，我們吃什麼？石頭和土不能吃，還剩下什麼？只好吃野草。芒康歷史上從未有這樣的事情，長江以東那樣的民主改革我們堅決不要，我們絕不答應。』普隆倉秋在會上邊說邊拍胸脯邊跺腳地講了許多。

接著一些發言者也都表明了反對的立場，有人建議舉手錶決，結果竟是反對者獲勝，支持的只有八宿和昌都。王其美最後卻說：『明天休息，再好好考慮一下，後天再說，但改革是肯定的了，不是和平的改革就是強制的暴力改革，兩條路，何去何從自己選擇』。

王其美平時老謀深算，但那天卻氣得臉紅脖子粗，一付氣急敗壞的樣子。王其美把普巴本找了去，說：『我可從來沒有想到你會說這樣的話，真是沒有想到。』

普巴本回說：『那是人民的意見，不是我要這麼講。』王其美又說：『你指責中央代表，實際上是在說我在背後操縱，說那些不是中央的政策，其實，那不是代表們要這樣做，那是中央的政策和策略，這條路是非走不可，任誰也逃避不了，我是對你實話實說，而且，自治區籌備會就要成立，在此之前，一定要做出決定。』

王其美說：『要知道，指頭是頂不破天的，達賴喇嘛到北京多麼順利，陳毅到拉薩也做了許多指示』。普巴本說，如要民主改革，請給我們西藏政府的命令，否則人民不會答應，我們也不同意等。

其後，普巴本等認為從王其美的口氣看，絕不會善罷甘休，由此大家開始討論武力抗拒。於是，芒康地區的各部酋長、喇嘛，都在佛經『般若波羅密多經』跟前發誓：『中國如強制民改，何處開始，就從那裏發出戰役。』貢覺、德格、札羊、芒康等四地首領從昌都返回時，又到一處叫曲尼孫多的地方（在德格與貢覺交接處），宰殺一頭牛，發了『紅皮滴血』之誓。

所謂『紅皮滴血』是將新鮮牛皮舖在地上，並將牛心臟的血滴在上面，上面再以槍枝交叉為人字，發誓者從牛皮之上、交叉之槍枝下鑽過。發誓說：

『如強制民改即造反，一人造反，其他支援』。

在此同時，通天河以東地區情勢極為緊張，吊打、竹簽釘入指甲縫中、以油澆頭點火焚燒等方式烤問的事不時傳來，一些頭皮被燒焦的人也逃過河來，使藏人完全絕望，由此，巴塘首先打了起來。

由於巴塘、里塘、傑塘（現雲南迪慶之一部）決定聯合攻打在巴塘的中國兵營，他們集了三千多人攻巴塘，一直很順手，也攻占了一個中共據點，多有擄獲，但在分配繳獲的武器時，三方發生一些摩擦，當時巴塘有許多武器儲藏，巴塘曲德寺的人想獨吞攻占巴塘後的戰利品，因此打發理塘和傑塘兵回自己的家鄉，彼此發生矛盾。

理塘、傑塘等人在打了十一天後各自返回自己的家鄉，隨後，巴塘集一千五百餘人連續六天進攻縣城，前後衝鋒五、六次，殺死許多中國人，藏人也有不少損失。

當打得精疲力竭之時，由於一時攻不下來，巴塘軍只好截斷水源後圍困。中國部隊更慘，因斷水只好喝尿水過日子。在巴塘僅剩下二百餘中國軍隊和三百餘藏人組織為民兵，中國部隊向圍攻者詐稱：『請緩攻三日，我們已向上報告說我們頂不

住了，要投降了。三天後，我們一定繳槍砲。』巴塘人攻了許多時間，也累了，就答應了。這時，中國人從康定遣一師援軍快速趕來，過理塘時，理塘竟坐視敵軍通過而未阻擊。

三天後，中國軍隊的飛機飛臨上空，開始對藏軍猛轟濫炸，向中國守軍拋下水等補給品，飛機炸彈將曲德寺的三層彌勒佛經堂全部炸毀，三架飛機輪番轟炸了幾天，把藏人炸得昏天轉向。藏人不懂現代化戰術，全躲入房間內向空中射擊，飛機一顆炸彈就將房子炸毀了，使駐有藏軍的村莊和曲德寺全炸成廢墟。

在轟炸的第三天，飛機繞到芒康地區，投炸彈威脅。隨後又有一個叫李代表的人，專程跑來『道歉』，說將曲德寺與芒康的洛然寺弄錯了。但三顆大炸彈投在山後，加上機槍掃射，損壞了寺院的一些建築，並有一僧受輕傷，一些牲畜也被弄得雞飛狗跳，飛機飛得很低，機上有中共小紅旗飄揚著。

藏人非常氣憤，於是普巴、麥巴、和洛然寺領袖在一起商量，他們商量後認為未來的結局只能是曲德寺的下場，不能再坐以待斃了，於是，一同立誓並重建軍隊。

自此，芒康地區開始備戰，並認識到組織的重要性而秘密建立了兵營，正式名稱為：『雪域護教志願軍』，軍旗取材自象徵西藏主權的雪山獅子旗，只是將中間的雙獅託法輪改為一隻雪獅踩在中共軍人身上，象徵征服佛教的敵人，而官兵們的標誌為在一方塊黃布上以藏文寫著『雪域護教志願軍』，四角有『白雜達然』的梵文，乃『在這個世界至高無上』之意。背頁有白布，上書姓名、所屬部隊番號等，這些是模仿當時的中共軍隊而來。訓練工作則是由原藏軍士兵負責訓練，主要是號音的各種識別。

這時，中國又在芒康縣城逮捕了當時在昌都會上抗議的人民代表普龍倉秋等五人，其他各部落酋長或首領以及人民代表聞訊後全逃出縣城，並全聚在查下（傑措牧民之牧地，現為傑措鄉屬地）起誓決定起兵反抗，於是十八部的酋長和各寺院代表等共四百餘人全聚在一起，旁立『甘珠寺』經典，眾人憑經文起誓說：『死如同樣花紋的佳嘎烏，患難如烏鴉同樣黑（意即同生死、共患難）。要麼藏人勝，要麼中國人勝，男盡女絕，使這世界無燒火之痕亦在所不惜等（無燒火之痕意即後人看不出這起方曾經有人類生存）。』

另外又訂了幾條紀律，大家還簽字劃押，並規定『十六—六十』歲徵兵制，每戶出一兵，佃農（不向政府納稅者）兩戶出一兵，如此秘密徵兵，共招募了千餘兵，俗人部的總司令為普巴本，僧部的總司令為札巴喇嘛。

當時的誓辭或紀律中確定：

一：『雪域護教志願軍』之基礎或原則為，在保衛佛教之國的政教和領土的基礎上，保衛和敬仰西藏之『三個特別之寶』，並為此而不惜流血犧牲。

（西藏的三個特別之寶為一、佛教與政教合一的國家；二、雪域佛法之主神聖的達賴喇嘛；三、虔誠信仰佛教與達賴喇嘛的人民。）

二：在反抗侵略與保衛國家的鬥爭中，不分上下貴賤一致拋棄私人恩怨，團結一致，不分教派地區，相互支援。不管以往有任何怨仇，那怕是殺父之仇，暫時都不許計較，那怕在獨木橋相逢亦不得仇視。戰爭結束後，由政府做出公正處理，如有違者，嚴懲不貸。

三：官兵喇嘛的財富散諸窮人或充為軍資（後來此條多未能實施）。

四：凡難於起兵之部落，須將武器交給『雪域護教志願軍』，而不得交給敵軍，並積極籌措軍需品，靠近敵營之部落，要設法刺探情報。

五：對自願以物力資助『雪域護教志願軍』者，戰爭結束後，從物質和待遇等諸方面給予嘉獎或補償。

六：凡差巴戶（向政府納稅、並領種政府土地者）每戶出一兵，其他每二戶或三戶出一兵。在需要時，從各寺院徵調僧兵，行『十六至六十』徵兵制。

七：『雪域護教志願軍』必須保護人民的利益，不許行搶劫、盜竊等惡行，如需徵用，須按價付資，無資金則由部隊統一派三人以上去（向民眾）乞討，不許在外鬥毆，回營須詳細稟明外出情況，不許以兵營之名在外欺騙。所得戰利品一律繳公，不許私藏。

八：對立功將士給予升級及物資等獎助。凡叛國投敵，洩露軍事機密、將我聯絡人員出賣給敵軍者，一律處死。對被迫投降或因不支而被俘者，不予斥責和處罰。為了分化敵軍，對被俘官兵給予來去自由。

一九五六年藏曆九月，『雪域護教志願軍』已有作戰準備。當時在鹽井有一團的中國軍隊，已做好『強制民改』的準備。駐芒康的叫六一一團，團部在芒康縣城內，但其所部則分散駐守各地，其中在桑巴竹卡的絲竹渡口有守軍，中共聲稱有一加強連，加強連應該最少有一百五十人，實際上並不到此數，約只有近四個排、九十餘人而已。

另外在容許有一營的兵力，職責在守衛那裡的彈藥庫，當時，巴塘和里塘還沒有公路，物資要繞一個大圈，是從昌都運到距容許一日腳程以外的地方，然後人背畜馱運到容許儲藏。雪域護教軍決定先從這兩個地方同時開刀，以偷襲吃掉他們。

在做出作戰準備後，便通知貢嘎喇嘛，貢嘎喇嘛表示支持，但同時聲明無法隨同起兵，因無裝備，但保證阻擊在其土地之上中共軍隊增援。貢嘎喇嘛的士兵驍勇，當時西藏與中國軍隊對峙的邊界，戰事頻頻，因此在當地，每家每戶都不僅有槍，而且，和槍枝一塊還有一個便於攜帶的布包，內裝乾糧，只要一聲令下，就可帶上槍枝、乾糧，出發作戰。

當一切就緒後，雪域護教軍兵分兩路，突襲容許的是由秘書丹巴所率的尼迪寺軍隊和覺拉、瓦當三部，人數共三百餘人。突襲桑巴竹卡的由普巴本、慈戾尖贊親自帶隊。突襲容許的軍隊由於軍情洩露而落空，但突襲桑巴竹卡渡口的卻得手，他們偽裝成百姓，在當地藏人的支持下埋伏好，等天亮中國軍隊不帶武器出來在院子內排隊唱歌、吃飯時突然攻擊，戰鬥很快結束，雪域護教軍旗開得勝，打死幾十人、俘虜十七人，其中有兩人因傷重留在當地藏人的家中，並繳獲許多武器。

當時，除六一一團而外，駐芒康的都是雅安軍區和來自雲南的解放軍，有獨立師、獨立團等編號。

隨後，普巴本又將其他十五名戰俘全部送回中國人的兵營中，一九五六年七、八月間，中國方面有信使來言：『王其美欲見普巴本。』至於見面地點，中共方面表示王其美是到不了你處，並不是不相信你們，而是路太遠，所以，雙方最後確定在距兵營較近處見面。

那一天，普巴本帶了二十五名騎兵前去會面，到會面處，將隨從留下後獨自前往，隨王其美的還有譚冠三。譚冠三問普巴本：『你現在打算幹什麼呢？認為這樣能幹得出什麼結果嗎？五三年我們派人前往內地參觀學習，當時沒有派你去是我們的失誤，如你到內地去看看就好了。』普巴本對王其美和譚冠三說：『我去不去內地都一樣，我知道中國非常的大，但我是吃糌粑、右衽繫腰帶的藏人，我要維持自己的事業，你們是吃大米、穿漢裝的，你們也要維持你們自己的事業，因此，我雖知你們非常強大，但不能不守衛自己的土地與傳統，這是無奈的。』

譚冠三聽後回說：『算了，今天不談這些，本來只想和你閒談一下，但我不慎把話題引到這方面，很抱歉，我主要想和你談的是，你需要什麼幫助，我們將會盡力而為。』隨後他又笑著說：『你喜歡槍砲彈藥，這我知道，但這個忙我們幫不上，其他什麼都可以幫，你喜歡馬，我們從西寧運來的馬個兒高、尾巴長，好威風，我可以幫助你。老王你們是老熟人，可以談』。

如此，雙方談了許多，其間普巴本說：『我們知道藏人成不了氣候，但一切都是你們逼的，彷彿這片土地的主人是你們，而我們是你們的奴隸，還有本來說好有十七條，卻完任不遵守，十七條也沒有了....。』譚冠三馬上說，十七條沒有完，如果十七條協議完了，上次陳毅副總理到拉薩，達賴喇嘛和他們就不會互相獻哈達、握手，和雙方很親熱啊！如十七條協議被撕毀了的話，不會這樣啊！

譚冠三並叫左右拿當時的照片為證後說：『你仔細看，你不是非常看重達賴喇嘛和西藏政府嗎？你看看文件，達賴喇嘛和西藏政府有什麼指令都在裏面，還有，跟在美帝國主義的後面跑是愚蠢的，目前中國與尼泊爾、緬甸的關係非常好，西藏政府和中國政府團結一致，陳副總理與達賴喇嘛關係多麼友好，中印關係很好，在這種情況下，你還想幹什麼？你又能幹什麼？』

普巴本回答：『是這樣。但我以為為家鄉、為人民有一份責任，要為此盡職盡責。』譚冠三又說：『你有什麼甚於達賴喇嘛和西藏政府對人民負的責任呢？沒有啊！如果你也和嘉樂頓珠、雅康娃等帝國主義份子勾結在一起是不好的，這事你也知道，在朝鮮，我們和美帝國主義打仗的結果怎樣，你當時是主任，我們一塊兒慶祝過，你是很清楚的，因此，和他們聯繫是絕對不好的。』

最後，譚冠三說：『再不用多說了，如你所言，你可以為西藏和佛教的事業做你的事，如果有一天普巴本死了，那是你大丈夫得榮譽的事；但如果有一天普巴本被俘了，那是很不好意思的，也許那時我們會見面。』

總之，那天談了三個小時後結束，普巴本回來時，王其美等也返回，一會兒，到處傳來軍號聲，只見會談地四周的山脊後面走出無數中國軍隊，都順山路返回了軍營，也不理會正在返回途中的普巴本，原來解放軍在四周佈置了大量伏兵以防萬一。

然而，這次會談卻反而提醒普巴本必須與外界進行聯繫，特別是譚冠三一再強調不要和帝國主義及嘉樂頓珠、魯康娃等聯繫，更啟發了普巴本，因此決定派人與他們進行聯繫，另外又再次派人與噶倫魯康娃和達賴喇嘛經師赤江仁波切、侍從官帕拉等西藏政府官員聯繫，要求支援武器彈藥。但西藏政府回稱沒法與印度的嘉樂頓珠聯繫，西藏政府幫不了你們任何忙，而且中國人經常找麻煩，西藏政府已被迫稱你們為反動派，但請不要生氣等。

當時西藏政府分成兩批，有人主和，另有人主張反抗，赤江就是其中之一。因此，赤江仁波切又以許多密信告訴普巴本，一切全靠你們自己的努力，西藏政府無法給予一槍一砲的支援，且因為你們的努力與勇敢，在自己的家鄉打仗，使拉薩這方面也安靜了許多，找麻煩的事少了許多，他們會說『反動派』並傳達那類文件是不得已的，請諒解，並特別寄來達賴喇嘛的斗蓬，以及瑪哈神像等，以示殊榮。

隨後普巴本繼續派人和印度聯繫，後來從印度噶倫堡派了人來，他們還帶來了嘉樂頓珠的一封信，雪域護教軍當然高興萬分。信中通知要選派一些人前往接受訓練，同時也要查詢一九五七年第一批空投到理塘人員的下落。於是先派了兩名代表在一九五八年時去印度，印度方面後來又傳話說：『至少派二十五個年少之人，從拉薩也可，最好是從康區當地派遣，要年少能幹的。』這邊於是準備從康區直接派人。

一九五八年，局勢對西藏人愈來愈不利。在這之前幾年的時間裡，藏人只是打打遊擊，並守住本土，從無進攻中國大本營的力量，中國軍隊做了許多防禦工事，山被挖空，營房四周掘溝並插上尖木樁，圍上鐵絲，軍隊經常一半住營房、一半宿野外，因此，雖過去了較長的時間，但藏人根本沒有進攻的機會和能力。

中國軍隊開始從四面進攻，中國部隊五十三師加上雅安軍區等的部隊不斷進攻，『雪域護教志願軍』雖嚴陣以待，無奈根本不是對方的對手，中國軍隊從各方攻來，打了十五個日夜，藏人根本就無法在家鄉站住腳。不管去到那兒都看到中國人拉的大片的糞便，以往中國人是不敢進入森林的，但現在森林、山河到處都有糞便。

在這樣的情況下，由於護教志願軍僅剩兩千人，槍也只剩一千五百人有槍，人少槍也少，實在無力友撐，只好放棄陣地，讓無槍無馬之人前去投降，或回村負責收集情報、送食物等工作。有槍無好馬的則叫他們分散進入森林、打遊擊，能打就打，平時就躲著，這樣或許可以牽制一部分中國軍隊，剩下的千餘精銳則開往北方貢覺等地。

在戰鬥中，有許多中國人被藏人殺死，中國人於是將怨氣發洩到百姓身上，更因此殺了許多百姓，如仲達家的母親和四個孩子在田地種田，卻無辜遭敵軍開槍掃射，三個孩子和母親被打死，只有母親屍體下的一個三歲多的孩子倖免於難。其他全被殺死並向牲畜亂開槍，還在飛機向人群亂扔炸彈。

由於這些原因，為防繼續傷害鄉親，雪域護教軍晝伏夜行，進入貢覺，再到察雅，約一個月後，敵軍才知我們已離開芒康。當時也參加戰役的普巴本之子才仁多加回憶說：

『中國部隊不斷追來，當時，敵軍在芒康的洛然寺成立一指揮部，其中有一支部隊，全是騎兵約有六百餘人，都配長馬刀，像電影中的日本刀，馬鞍是皮子的，邊上有皮袋可裝子彈，有轉盤機器和卡殼時替換的槍管等，都馱在馬上，總之裝備很精良。在騎兵之後有三千餘人，並用騾子挑著大砲等，騎兵在前、步兵在後，分幾路前來追我們。』

一路上，我們若遭逢中國部隊，雙方就一陣對抗，經常整個山溝都在顫動。在戰場上，札巴喇嘛是總指揮，人們不讓他上戰場，有一次，他拿著望遠鏡觀察，突然說：『看，看呀，敵人來了。』接著，一些中國騎兵從山口衝過來，身上的大衣被風吹得像老鷹的翅膀，正在爬上山頭的我軍士兵立刻向他們射擊。

此時，再也聽不到槍聲，只有一些砲聲能分清，不管是藏軍或解放軍的槍，槍口不斷冒出白煙，只見白煙，卻聽不到槍聲，煙霧的塵土到處飛揚，當中國軍隊兇猛的衝來，藏人心中確有一種說不清的感覺。

當時，總指揮札巴喇嘛在此之前一直維持僧人身分，沒有摸過槍，這時他對左右說：『喂喂，把槍給我。』左右給他一枝卡賓槍，他端槍瞄了一下後又說：『算了，有許多我們的士兵，容易誤傷。』』

有的藏人後來回憶說，真不忍打死那些中國人，和核桃一樣（意謂很年輕，稚氣未脫）。還有人說，在他打死一名石堆後的敵軍時，那名敵軍竟一面用一隻手掃射，一面用一隻手抱著頭。這些被打死的敵軍騎兵的衝鋒槍全是新的，彷彿剛出爐，連那些黃油都還在。

戰鬥仍在進行，但情況愈來愈不利，普巴本之子說，後來藏人決定撤退，以防敵軍大量增援後脫不了身，當時，在藏人手中的尚有三個山頭，藏人決定確保兩個山頭，以備部隊從中間穿過撤退，放棄另一個山頭及另一個山腰（因山頂已被敵佔領），於是開始吹號聯繫並傳達命令。才仁多加說：

『但因號令全是原藏軍的那一套，中國軍隊有一些懂藏軍號令者，還有隨德格王子投降而改編成中國軍隊的部分藏軍，他們被分散在敵軍各排連，做為翻譯，由於他們也懂藏軍的號令，知道藏軍要放棄的山頭，於是三十餘敵騎突然冒險插入兩個山頭的溝中，想阻擊撤出的藏軍。

藏軍尚未及撤出山頭時卻見溝中有敵騎插入，只好繼續固守山頭，並從兩邊向下攻擊那些插入的敵騎，敵軍處於極不利的地形加上藏軍佔絕對優勢，不一會兒將二十七敵騎全數擊斃，另三騎奔逃。另外又見十七名解放軍在溝中圍成一圈，面朝外而死。藏軍不得不承認，有些中國士兵極為勇敢，拼死抵抗，絕不逃跑。

藏軍被迫從一山頭剛退到一山頭，經常立足未穩，追兵已至，未及抵抗，又棄地後退。而且，中國部隊的重機槍和三門小鋼砲把人打得暈頭轉向，藏軍惱火了也想集中火力還擊，當時集中藏軍的三枝機槍，嚴陣以待，不料七六二機槍竟無法連射，打一槍再裝一子彈。

原來，前一天幾個士兵沒事幹，竟將機槍的轉盤彈盒取了下來拆開，拆開後又不曾安裝，只是將彈簧隨意塞進轉盤彈盒中，另有兩個空彈盒，沒有人會裝子彈，拆彈盒的是一個從西寧逃出來的回人，謊稱懂原理，結果弄成這樣。

另一挺機槍射了七顆子彈就卡殼了，身邊又沒帶替換的。第三挺機槍是在偷襲桑巴竹卡時奪來的，只射了一會兒，槍管竟又飛出，這枝槍原來在竹卡槍管也曾打飛，槍管叮叮噹噹地順崖掉了下去，如此倒霉的事一出，人人覺得氣喪，再加上敵軍的攻擊，而我們自以為有利的岩石地帶，根本不利守衛，子彈和碎石到處亂飛，防不勝防，於是，我們全線潰逃，敵軍一直尾追。

戰鬥中，有兩架敵飛機，未向我們轟炸，但卻將炸彈投在拉宋的牧民，他們除了給我們食物外是無辜的，那些牧民剛起床，飛機便飛過來，又是轟炸，又是掃射，打死百餘頭牲畜。

藏軍的人數日趨減少，解放軍卻日日有增援，如此集中決戰，只能吃虧。這時有人帶來消息，說是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十月間，美國將會空投武器，在此期間，盡力擴充人馬，沒有武器也不要緊，同時將現有武器的型號、數量、以及步騎兵人數等報往印度大吉嶺，以便他們支援，來信還叫我們挑選精壯青年赴印轉送美國受訓。

另外留在芒康的零星人員跑來報信，稱在家鄉洛然寺的軍隊指揮部已趁夜撤走，後才知是因四水六嶺圍攻札木，因此迫使敵軍撤走。但當時我們並不知道敵軍撤走的原因，因此，派信使前往察雅各部，要求他們於一九五九年五月立誓並正式起兵。

另外，我們則返回芒康，一方面勸原投敵之部再次起兵，對有槍者也促他們起兵，如不願者則請他們將槍給我們而不要交給中國人等，當時較亂，一些人順利地交出槍枝，有些人不交，有些則是我們強制收繳，總之很混亂。

當時中國部隊從成都調來大量軍隊，敵軍稱有十五萬人，事實上沒有那麼多，不過也不會少於五萬人，西藏軍區的五十一師則退回，只留了六一一團，五十一師所以撤走是為了圍攻四水六嶺，而將攻打我們的任務交給了成都和中國昆明的部隊，各部敵軍雲集，加上原有的獨立師、團等部敵人戰力大增。

同時，還向德格、芒康等地分線進攻，空中每天有五架左右前來偵察、掃射。當時貢嘎喇嘛部有一間強悍的寺院叫嘎達寺，寺僧和查哈的康民集中千餘兵，固守寺院。激烈交戰五日後，敵軍用砲、飛機狂轟濫炸，守兵與寺院同歸於盡，無一倖免。

藏軍不知空投何時能來，但當時卻已聽說，在理塘方面已空投了武器和人，空投的七個人剛落地即被中國人打死。有鑑於此，他們暫時停止了對我們的空投。因此，我們又派人通過邊境前往印度，並給嘉樂頓珠寫了信，說明在整個芒康內有近二萬兵，被十餘萬敵軍圍攻，但我們缺乏武器，如有武器，我們可以堅持住，何況召六、七萬兵並非難事，但前提是必須有武器供應等。

信中並要求明確指示是要退到國境外還是就地戰鬥，如繼續戰鬥，我們一定要使燒火處有灰燼（意謂一定使做的事情有成績）。

那時，通過雜域和拉薩邊境等各種途徑派了許多人回來，但未能到達芒康，有一次將派往芒康的人先空投到了邊壩，而不是到芒康，因為當時芒康局勢非常危急，為防止武器落入中國軍隊手中，就將空投人員先投到邊壩，當時邊壩地區有雪、達、洛三部之兵和各處逃來之人共七千餘人，四水六嶺圍攻札木時也在邊壩建立了一些組織。

當時解放軍尚無力顧及邊壩，都在對付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和雪域護教志願軍，空投人員成了藏軍當時的希望。但是，有三個空投到邊壩的人，本來是希望他們一到邊壩就立刻步行到芒康協助雪域護教軍，當時他們帶來全套的發報機，無奈他們三人卻天天在邊壩玩牌，飛機兩次前來都未能聯絡上。而當時已先空投了兩次武器，在第三次空投時，因他們三人顧著玩牌，飛機只好又將武器帶回去了。

而兩次空投的武器，第一次是發下去了，但第二次的卻存放在邊壩寺內，拖著一直沒有向下分發。沒有多久，中國軍隊就開始向邊壩地區發起攻擊，邊壩被打得一塌糊塗。空投的人中有的被中國軍隊打死了，電台則被繳獲，當時應有兩名報務員到芒康地區報到，但他們背著電台卻失去了聯繫，從此沒有下落。』

芒康地區的藏軍急需武器，卻一直未見有人前來聯繫，在槍絕彈盡時，俗人總指揮普巴本首先陣亡，於是整個部隊只好在深山裡面邊打邊躲，有時集中伏擊共軍，有時則需化整為零，分散各地。藏軍中有很多也由騎兵變成步兵，化整為零地分散在森林中。藏軍步兵們分為小股，到處針對共軍小股部隊和工作隊進行襲擊，除非與敵正面相逢，否則一般是不參戰，而只是在森林中來回移轉。

一九五九年底，藏軍人人都已非常失望，大家知道西藏政府已經完了，拉薩也已經失守了，邊壩也已遭覆滅，四水六嶺部隊甚至已經逃到外國去了，但是由於印度方面一直沒有明確的指示是空投武器還是不空投，所以雪域護教志願軍還無法決定下一步的行動，只好繼續努力。

當時中國已經開始在芒康進行民主改革，在洛然寺和縣上到處都是駐紮的軍隊，藏軍不得已必須派人到鄉下找糧食，但解放軍幾乎在每一個村莊都設有駐兵，並且還嚴格控制糧食，誰家每天磨了多少糌粑，誰加磨了，怎樣消耗的都要監視，使藏軍在找尋食物時更加困難。才仁多加說：

『到了一九六〇年五、六月間，藏軍心想與其被動挨打還不如主動襲擊，於是決定將僅剩的人員分為四部，每部約為五十人，先後四次主動襲擊或伏擊共軍，但卻因此令解放軍大規模集結，下令非殲滅藏軍不可。

於是西藏軍區五十二師、五十三師和成都軍區又加派三八八團及特種部隊等，加上一直駐紮在嘎拖（芒康縣城）以南的獨立師、還有昆明軍區的部隊，從昌都到雜域，寬廣的地域上到處佈滿了中國軍隊，各重要山頭也都有共軍，人數約有十萬人。不管白天晚上，信號彈此起彼伏，看得藏軍只好放棄乘騎，不分僧俗官兵，就連總指揮札巴喇嘛也是徒步步行在森林中，隊伍人數僅剩五百人。

藏軍隊伍出發時，都有人在後面負責毀滅足跡，人人只能吃野菜，有時一天只能吃一勺糌粑和一把野菜，人人都疲憊不堪，平時晝伏夜行，又不敢離開森林。中國人則在每一個村莊都駐有軍隊，還宣稱要把藏軍餓死、困死，並且到處發傳單，特

別是在藏軍官兵的親屬和家中、以及與藏軍較親近的人家和路口都留下了大量的傳單。內容多是：『札巴喇嘛和普巴本趕快投降，你們已經無路可逃了，只要你們投降，保證給予優待並恢復原來的職權。』

傳單中又說，西藏政府已經滅亡了，逃到印度的又多已經餓死或熱死了，帝國主義救不了你們，只要你們投降，將執行三不政策（即既往不咎、不關、不沒收），但另一方面又要求藏軍官兵的家屬、妻子、母親等抱著孩子，隨中國軍隊在山下哭叫，要他的親人快快向人民政府投降。

當時，在長江以西一帶，有很多部落均已被消滅，有一部分藏軍被迫逃亡到緬甸，到現在都不清楚他們的下落。從六〇年到六一年，四處都是中國軍隊，察雅五部的牧民都在戰鬥中遭到覆滅，或死、或降、或被俘，雪域軍所剩的四百人已是軍力最強的一部了。原來在各叢山峻嶺中還有七、八百名義士，但有很多人均在向外移出時被殲滅，到六一年時已經所剩無幾了。雖然他們從幾年前到死為止，沒有得到美國方面一顆子彈的援助，卻並不完全死心。而札巴喇嘛還在等印度方面的消息，但已有赴死的打算了。

藏軍心裡清楚，要戰勝敵人已經是毫無希望的了，既然在戰鬥前藏人已立了多次誓言，現在許多人已經死了，還活著的也必須忠實履行諾言，慨然就死。幸好，西藏政府和達賴喇嘛已經脫險到了印度，算是為民族和宗教的復興留下了種子，除非有國外叫我們過去，否則我們不能過去，更不能投降，唯一的道路就是根據我們立下的誓言去赴死。』

一九六一年三月，藏軍與共軍遭逢，藏軍被團團包圍，共軍甚至還在森林中裝上喇叭，用喇叭高聲叫喊著，要藏軍趕快投降。藏軍立刻以射擊做為回答，整整一天，兩邊軍隊從這個山頭打到那個山頭，札巴喇嘛等兩百人還是殺出了一條血路，衝了出去，但仍有一半的人受傷被俘。

剩下的人更少了，整個西藏境內的反抗運動大體上已被中國人鎮壓下去了，堅持到最後的僅剩下芒康地區的戰士而已。僅剩的人又多次與中共發生戰鬥，凡是被押來的俘虜幾乎都是傷員，共軍也意識到最後的藏軍非常頑強。

剩下不到一百人時，因為缺少軍糧便到一個牧民處，不料卻被兩個牧民發覺，中共後來也因此得知藏軍就在不遠處，於是立刻電告其他部隊，從四面八方將山頭團團圍住，整整一個晚上，中共不停地調兵遣將，到天亮時，數不清的中國軍隊將整個山頭給圍了起來。

藏軍最後被困的地方叫久措，靠近察雅，天亮時，共軍用擴音器敦促藏軍趕快投降，並從四面慢慢地逼上山頭，於是戰鬥又打響了。在中午十二時以前，解放軍共進攻了五次，都被擊退，開始解放軍想抓活的，但因為共軍發起攻擊的地面毫無障礙物，以致死傷慘重。最後則改為密集向山上掃射，以掩護其他部隊進攻。

戰鬥到中午十二時，中國軍隊雖然仍攻不上山頭，但藏方官兵已意識到這是最後一天了，這次是在劫難逃、毫無勝算了。於是便讓六個人投降，這六個人中，有五個是隨軍家屬，另外一個是排長，因為他的手臂被打斷，慘叫連連，因此就叫他前去投降了。當藏軍高喊：『請允許我們投降』時，共軍馬上就停止了射擊，但等發現只有六個人下來投降後便沒有動靜時，又開始發起攻擊。

到一時左右，札巴喇嘛召集剩餘的士兵說：『今天我們已經是無路可走了，只能戰死，但臨死前我們也要痛痛快快的打，如能堅持到天黑自然好，這可能是我們雪域護教志願軍最後的末日，因此不要再抱逃脫的希望，為死亡做準備吧！』

每個人都分配了毒藥，但大家互相囑咐，不到最後一刻不吃毒藥，能多打死幾個敵人賺幾個。共軍持續進攻中，又有一些人陣亡了，札巴喇嘛到戰死者的屍體邊去尋找子彈，發現屍體身邊的子彈幾乎是一無所有，當時環繞在他身邊十八具屍體，竟無一人有剩餘的子彈。

最後他們終於在一個喝毒藥自盡的空投人員身上找到廿餘發子彈，札巴喇嘛得了子彈後非常高興，他對在自己身邊的兩個隨從說：『打仗一定要留一些子彈給自己，敵人要活捉你，不會打死你的，所以必須要留一些子彈給自己。』札巴喇嘛又說：『死也要好好的死，先吃點糌粑吧！』

就在這時，解放軍的機槍又響了，開始了又一次的攻擊，望著漸漸逼近的解放軍，札巴喇嘛起身掃射，幾乎將子彈全部打光，解放軍的攻擊也因此緩和了下來。此時已是下午二時左右，解放軍已不再射擊，戰場顯得出奇的安靜，這時一旁突然有人叫出：『喇嘛圓寂了。』他們看時，只見札巴喇嘛盤腿坐在那裡，頭微微低著，鼻中有稍許紅色和白色的液體流出。

一旁的戰士有人哭著想擁抱札巴喇嘛的屍體，這時解放軍卻撲了上來，但解放軍並不知道札巴喇嘛已經圓寂，還喝令他站起來，並用刺刀在他們的額頭上捅了一刀，又用小刀在他的左手拇指上割了一圈，但只見白白的肉，不見血流出。

中國軍隊問：『山上還有多少人？』一旁的人回答：『已經沒有人了，就只剩我們兩個人。』但中國人仍繼續向柏樹林中搜尋，猛聽到一聲中國人的叫聲，隨即傳來叭叭的幾聲槍響，中國人又是一窩蜂地逃回去。

接著又有兩聲巨響，兩顆手榴彈在中國部隊中爆炸，當場有六、七人被炸翻。隨著一陣叫喊，中國軍軍全部都衝進柏樹林，共有七人被俘，另外有一人正在發報，但手中握有毒藥，在掙脫共軍手後再將毒藥塞到嘴裡，共軍忙得用水灌、用手指拼命往嘴裡摳都沒有用，服毒的藏軍已經兩眼翻白、陣亡了。

當時被空投到芒康的布桑也參加了這場戰役，布桑回憶說，當他們被空投時，西藏已被中國佔領，不過札巴喇嘛還在堅持，並且和中國軍隊打了好幾場轟轟烈烈的仗。當時芒康因為來了很多中國軍隊，大家就在山上打遊擊，單是四月九日那天就打了九次仗，雙方戰事很激烈，每天從早上六點一直打到下午四點多，解放軍和西藏遊擊隊互相喊話要對方投降，到十五號時已被解放軍重重包圍。

布桑說，當時大家手持的是美式M1步槍，也有固定的聯絡時間以電台設備向美國報告情況，十點鐘時，眼看又死了兩個人，大家決心要打到最後一顆子彈，後來沒有辦法，決定集體吃藥自殺。但布桑說他來不及吃，正把藥含在嘴裡時，藥被解放軍從嘴巴中打了出來，從此被俘虜，有很長時間變成啞巴無法說話。

最後一場戰役共有十七、八人被俘，其餘的全部自殺或陣亡。自此，西藏芒康地區的『雪域護教志願軍』遭中國軍隊全部消滅。

第七章 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

以雙叉刀尖為旗幟的『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是當時西藏地區組織最嚴密的抗暴團體，抗暴行動受到康、安多和衛藏三區藏人全面的支持。在它成軍兩年的時間裡，『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轉戰西藏各地，鼓舞各地遊擊隊繼續與中國對抗，更經常牽制解放軍三分之一以上的兵力，最後還護送達賴喇嘛成功逃往印度。

在西藏坎坷的近代史中，『四水六嶺』是西藏人的驕傲，這段歷史說明藏人曾經憑著毅力，對抗中國強大的武力威脅，寧死不屈，表現出藏人最高的民族韌性。

一開始誰也沒想到，和談後的西藏局勢，反而讓藏人陷入絕望之境，在中國強制進行民主改革、敵視與消滅宗教的情況下，強調組織反抗的聲音愈來愈大。東邊的西藏康區首先發生戰爭，藏人在戰爭中死傷非常慘重。因此在拉薩做買賣的巴塘、理塘、傑塘的商人非常著急，他們商量停止做買賣，並湊錢買槍買馬，然後便十個、廿個返鄉參加戰鬥。

當西藏東部康區受到迫害後，也有許多康巴人逃到拉薩來，使得拉薩成為另一個戰爭根據地。這些逃亡到拉薩的康巴人在安珠貢保札西的領導下，終於促成了在西藏反抗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的創立。

安珠貢保札西（以下簡稱安珠）是康區理塘人，早年在拉薩經商，在拉薩的康巴人間，以及在巴塘、理塘等地都具有很高的威信。當家鄉受到戰火波及時，安珠便開始聯絡印度大吉嶺的藏人以及和西藏政府若干官員（如達賴喇嘛的侍從管家帕拉），同時也廣交與招攬因戰亂而逃亡的康巴人。

另一理塘人然楚阿旺後來成了四水六嶺的右翼總指揮，他說到，當時在拉薩時，大家經常去找安珠貢保札西，要他想想辦法。他們每次找安珠，安珠都是說：『不要著急，會有機會。』但大家都很著急，因為家鄉每天都在死人。

一九五七年時，達賴喇嘛、班禪喇嘛都去了印度，藏人計畫達賴喇嘛先留在國外，然後接著就在拉薩起事。那時在拉薩已湊了不少槍馬，是理塘地方二百餘家商號湊的。當時的計畫是根益西等在印度噶倫堡的藏人阻止達賴喇嘛回藏，然後印度噶倫堡的人在卓木起事，在西藏的人在拉薩起事。

不料後來從印度捎信來指出：『你們先動手，我們還不行。』安珠認為印度方面『言而無信』。不久，達賴喇嘛返回西藏，拉薩與卓木均未能起事，安珠貢保札西只好逃匿，在噶登寺靜修了五、六個月，眾人皆不知其去向。

後來也是四水六嶺主要戰將的根益西則說，他在拉薩時，安珠曾經和他等人一起討論，大家說到家鄉已經完了，在拉薩的人如果一天到晚只做買賣不做準備的話，下一次就輪到拉薩要遭殃了。而且因為家鄉死了很多人，所以決定舉行宗教儀式。

當時很多拉薩商人都覺得達賴喇嘛去印度、中國等地，路途往返非常辛苦，於是決定為達賴喇嘛祈壽，後來行動擴大為希望所有的商人都能參與，於是各自去聯繫自己熟悉的商人來加入。

在準備期間，大家聚在一起商量時，又覺得僅僅祈壽不夠，應請達賴喇嘛講授和主持時輪金剛大法會，並要奉獻一個前所未見的供禮。大家商量過來商量過去，覺得達賴喇嘛平時沒有黃金寶座，於是決定開始募捐。在當時因中國實施民改，人們也不知道財富對自己是福還是禍了，因此捐獻的人非常多。

商人把資金獻了，並且講好，以後如果情況好就歸還，情況不好就算了，當時康巴人有十八戶大宅在拉薩，所以有人建議把這些抵押給中國，從中國那裡得到錢，如果最後能把中共趕走，房子就收回來了。

共有五十六名金匠負責製造達賴喇嘛的黃金寶座，另外，拉薩八廓街有一叫羌然瑪的跳神的地方（屬政府所有），在裡面成立了辦公室，開始登記所有的捐贈物品。當時貴族、人民、拉薩、山南各地的捐出物很多，還有無數的婦人當場取下耳環、金手鐲以及康巴婦女取下金鈕扣等。這些黃金除了一開始有一些用買的，其他都是捐獻得來的，所獻黃金像鐵一樣堆著。

拉薩大昭寺內到處都是念經祈禱的人，從噶倫堡買來幾十馱布，製成到處都可見到的經幡。

一九五七年藏曆四月十五日舉行時輪金剛大法會後，結帳時才知道一般人家所捐獻的竟遠遠超過貴族的捐獻量，使貴族大丟其臉。單是計算這些就花了很多時間，黃金按多拉計算，（五十多拉約為半公斤，三多拉為一兩三錢），打製黃金寶座共用了約四千零五十多拉；另有五個金盆，各有十三多拉；金大燈一盞，有一千三百餘多拉；小金燈則更多。

而銀子由於實在太多了，堆積如山，在此期間未用完的銀子，就在請時輪金剛時熔成銀磚獻了上去。另有九眼珠，以及上有自然顯現獅子的綠玉等，均鑲在黃金寶座上。

當達賴喇嘛坐在黃金寶座上講經說法、傳授時輪金剛大法時，獻貢品的人達二百餘人，時輪金剛大法會後，共算了廿三天的帳，都是不分日夜地算。剩下許多錢財，於是決定成立基金，為達賴喇嘛祈壽。

在這些宗教活動熱烈展開的同時，主張抗暴者便利用眾人打製金座時，開始買槍買馬，準備打仗。

四水六嶺老戰士嘉瑪阿楚說，在拉薩起誓造反時，是安珠先一個個和大家聯繫後，問大家是不是願意同生死共患難、為西藏、為宗教而戰，一起抗擊中國人？如果願意，那邊有達賴喇嘛的佛像，每個人就在達賴佛像下說：『我們願意！』剛開始有些人願意，有些人還在猶豫，但後來沒有辦法，因為能往那裡去呢？家鄉打得一塌糊塗，大家都覺得這是迫於形勢，都起了誓，而且起誓的都是領袖人物。

不過在宗教儀式結束後，也有些人退出了。因為這些人自認參與打製金寶座是純宗教行為，他們對打仗不感興趣，甚至有些反感。但多數的康巴人則由於家鄉一直在打，所以心中有苦，大多踴躍參加。藏人便以此名義開始廣交各路人馬，於是康和安多的人都在時輪金剛的名義下聚在一起。次成丹增說：

『當時內部商定，要聚合康人，使藏人有個中心，而為達賴喇嘛打製金座，更是打動人心的。無數的康巴人將護身符、戒指等凡屬金銀的紛紛獻上，大昭寺內的廣場上，金銀堆積如山，並藉此機會，聯絡各地來的康人獻金座，中國人也無話可說。而康人在家鄉經歷殘酷戰爭，多已不留戀財產，捐獻時極慷慨，說交給中國人，不如獻供。』

如此，以黃金打製了金座、金案，並在大昭寺放了一盞大金燈，也是完全用黃金打製的。其重量一個人很難抬得動，現在聽說已經叫中國人給拿走了。即使如此，金子仍然用不完，又向三大寺等寺院獻了許多。並請求達賴喇嘛講授時輪金剛大法會。

兵營建在竹古塘也是神諭的，我們並不知道竹古塘在何處，查訪許久才知道。當時，在拉薩一帶的康人多知道要在竹古塘集兵，知道的人多了，本來容易走露消息，但中國人一直未察覺，可見當時的藏人就是這樣齊心。安多首領津巴嘉措是後來到的，他有五、六十人，安多有錢有勢的人大多沒有來，來的多是朝聖者，他們沒有槍馬，是最弱的一部。安多部和恰城部的營地在一起，他們多持刀、矛，那也是津巴嘉措去籌措來的。安多人雖然武器簡陋，但在戰鬥中都極勇敢，沒有勇氣的是不會來參軍的。』

有關『四水六嶺』這個名稱，在西藏古代就已經存在，所謂『四水』就是指黃河、長江、雅魯藏布江和瀾滄江；六嶺指的是在這四個江河流域的西藏地區；四水六嶺也泛指整個西藏。但『四水六嶺』如何成為反抗組織的名稱，藏人有各種不同的說法。有藏人指出，在獻金座時，達賴喇嘛曾說：『這是四水六嶺的』，由此有了『四水六嶺』這個名稱。

但另外有一些人則說，大家在商討組織名稱時，達賴喇嘛的經師赤江仁波切說：『就叫四水六嶺好了。』其他大喇嘛也表示贊成，四水六嶺的名稱就這麼定了。於是再以地區為別來任命負責人，宗教方面的負責人是格西哲蚌吉索，總管是安珠貢保札西。

當時參加四水六嶺的洛桑諾布說：

『我是安多卡加人，原來是個喇嘛，五一年我還俗娶了媳婦，後來在拉薩雖然非常緊張，互相僵持著，但沒有發生太大的戰役，這時有一些藏人包括安珠、根益西等已開始在串聯，秘密地互相連繫。藏曆三月時，來了很多信，提到要建立四水六嶺，如果有願意參加四水六嶺為西藏打仗的，請到竹古塘會面。

我們要出發時抓到三個中國人，他們說自己是國民黨，後來我們也把他們帶到竹古塘，到那兒時四水六嶺已有八、九百人了，就開始任命瑪吉、百長（連長），並發佈了一個廿七條的軍紀。當時並不叫『四水六嶺』，先叫『南北護教志願軍』，南指的是康巴，北指的是安多，後來又改成『多康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

當時每個人胸前有黃布，寫著志願兵的縮寫，上面還有四水六嶺蓋有印章的布掛在胸前，說我們要為西藏獨立決死戰，絕不後退退縮，還規定不許內鬥，有仇有冤者等戰鬥結束了再算，現在一切停止。』

安多人索南嘉則提到：

『安珠等人一開始建四水六嶺時我就去了，四水六嶺一開始叫『護教志願軍』，後來成為『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一開始我們以為台灣會空投武器，因為青海省的地方都知道有國民黨，或說美國會空投武器，有各種說法，但後來都沒有。後來則改叫『多康四水六嶺』，一開始時我們安多人只有三十五人，後來集中到三百四十七人，但是只有十幾枝槍，安多津巴嘉措打造了三十幾把長矛，配發給我們。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在安珠與康巴頭人的籌備下，在竹古塘正式舉行成軍儀式，正式組織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總部，預備與駐藏中央工作委員會、西藏軍區司令部展開有計畫、有步驟的戰鬥。有許多商人在離家時，都已給家人留下遺囑，他們對妻子說：『我如果因為保衛宗教、國家而死，是沒有什麼可遺憾的，請妳好好撫養子女。』

六月十六日，吉日，藏人按習俗開始煨桑（也就是燒香，常在宗教特別節日時舉行，燒香可以去除任何不潔之物），當時軍隊分為左右翼，右翼從左轉、左翼從右轉，然後豎起軍旗。軍旗是戰鬥目標的象徵，上面用兩把拐頭刀交叉，一把上繪火焰圈，表示神刀，代表雪域之神的紅與黑護法神；另一把刀未繪火焰圈的，代表民間的組織力量。

刀的上方中央，繪一個太陽，象徵著整個藏民團結在法王達賴喇嘛的領導下，堅定奮鬥，前途光明。旗幟四角，繪四顆鬼頭，表示要征服一切邪魔。

由於軍旗在拉薩時就已確定為雙刀交叉，底子黃色則是在竹古塘決定的。中國尚紅，藏人尚黃，因黃代表宗教，在水木土火金五元素中又表土地，意指為西藏（土地）和宗教而戰。

另因中國國旗上有鐮刀、錘子，四水六嶺軍旗上則是雙刀，刀之柄是金剛，即黑持金剛（神名，為一護法金剛神的名稱）。因他們是護教軍，刀為文殊菩薩之義？，蓮花為觀世音菩薩，三者合稱『日松貢保』，意謂人神共同抗擊佛教的敵人。

之前在五月十三日開會，點人數時包括康和安多人共有兩千兩百人。安多人多無槍，僅持刀矛等。隨後任命了十八名『馬吉』（相當於司令官或將軍），總指揮為安珠貢保札西，安多領袖為津巴加措。十八個馬吉的軍隊分為左右兩翼，然楚阿旺是右翼指揮官，恰成人阿並次成是左翼總指揮。

『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大部分都是在藏東家鄉嘗過敗仗苦頭的康巴人所組成，另外還有少數的安多人。其實當時還沒有康巴、安多的說法，西藏人說，康和安多就像頭上的兩個角不分長短；像臉上的兩個眼睛沒有好與不好的差別。而衛藏人因為家鄉就在那裡，如果他們一參軍，中國部隊很容易找家庭的麻煩，因此大多不方便參加，但很多糧草、馬草都是衛藏人提供的。

西藏人是後來到印度有了三區的劃分，才開始分康巴、安多，也才開始有一些屬於藏人地域觀念的糾紛。

安多人洛桑格列說，安多在四水六嶺的山南時期可能有一百人左右，另外有五十多人跟著安珠貢保札西走了。家鄉沒打仗前安多人可能加入，但後來沒能逃出來的就不可能了。因為安多非常遠，他的家鄉到拉薩步行就整整要走五個月，那時又沒有車，所以很多安多人都在自己的家鄉逃走了。

而且，在當時安多能夠騎著快馬僥倖逃出來的非常少，很多人都是一路打，還沒到拉薩前，就已經被中國人消滅了。

原名姜華亭的漢人洛桑札西則說，四水六嶺準備成軍時，在山南地區的竹古塘已有各地康巴軍陸續集結，並且搭起了數百座的帳棚，人數約達一千五百人。漢人洛桑札西說：

『在我投向藏軍後，當時各地的康巴軍隊陸陸續續集結到山南，並且在這裡搭起了數百座的帳棚，來自西康、拉薩等地的康巴人約一千五百人已經集結在這裡。』

在安珠與康巴頭人的籌備下，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六日，組織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總部，預備展開有計畫、有步驟、與駐藏中共工作委員會、西藏軍區司令部的戰鬥，四水六嶺總司令是安珠貢保札西。

由於各路反抗英雄的公開會師，山南竹古塘便成了草木皆兵，藏人反抗中國人入侵的情緒，此時達到最高峰。

一九五八年春季駐西藏中國軍隊，為了對付迅速發展的藏民反抗運動，首先清除流落西藏的大陸內地漢回各族反對共產黨人士，以防他們參加反抗軍組織。

在四水六嶺於山南建立總司令部前，安珠等領導人物早已在拉薩有了秘密組織，制定誓辭並約法三章：『一、大家齊心合力反共到底；二、中途投降與逃亡者，全家誅頭；三、流落青康一帶的藏人，都要參加護教志願軍，否則嚴懲不貸。』

秘密組織的各領袖宣誓後，寫信分別通知居住在西藏各地的青、康藏民，自備槍馬到山南竹古塘總司令部報到，當時自動報到的這種自備槍馬戰士約有八百多人。』

四水六嶺右翼指揮官然楚阿旺也說，他們向人民介紹自己時都說：『我們是自願從軍以保護佛教、國家，希望民眾可以提供糧草，對提供的糧草我們盡力付款，如果目前無能為力以後局勢好轉時也不會讓你們吃虧等。』

然而，『四水六嶺』這個軍事組織很快就引起中國軍隊的注意。當時的噶倫尼烏夏說：

『一九五八年時，他們開始商量向達賴喇嘛獻金寶座，而實際上卻是密謀在竹古塘建立兵營，在他們分批前往竹古塘時，中國人問噶廈說：『目前有許多康人騎馬背槍到拉薩，到底是怎麼回事？』

噶廈回答：『康巴人不論富裕與否，都極看重槍馬，平時出門即騎馬背槍，這是他們的習慣，沒有什麼特別的。』

後來中國人也聽說了竹古塘建立兵營的事，又來問噶廈：『那些康巴人在竹古塘建立了兵營，對此噶廈不管嗎？有沒有阻止或驅逐他們的計畫？』噶廈說：『地方出現紛亂對誰都不利，因此我們一定會管，包括發佈告示等都要進行。』

中國人要求噶廈一定要貼告示，要衛藏地區的人不許給康巴人任何幫助，驅逐他們的事由中國人來辦等。於是噶廈發佈告示說：『對過往的康巴人，除了公平合理的出售糧食外，不許給予任何支持。』

噶廈將寫好的告示給中國人看，中國人說：『叫你們不要幫助康巴人你們卻寫成要幫助。』噶廈回答說，如果不公平合理的出售糧食，那些康巴人餓急了就會搶劫。

後來中國人又說他們驅逐康巴人的中國軍隊人數不足，需要藏軍的幫助，但噶廈說明因為藏軍大部分已遣散回家，在拉薩有一兩個兵營，其中一個警衛團是保護達賴喇嘛的，警察團則要維護拉薩的治安，扎什兵營有一些軍隊，派他們去他們會向前開槍還是向後開槍，噶廈不敢保證，因此派兵非常困難。

但後來噶廈同意派十幾個熟悉地形的人支援中國人，由中國人負責驅趕的工作，不過後來中國人又改變做法，說他們負責保護公路和各機關單位，驅逐康巴人則是噶廈政府的事。中國人會改變做法，是因為中國人想：『康巴人沒必要驅逐，他們會搶劫山南而逼得人民走投無路，然後康巴人再轉往衛藏地方，在那裡又搶劫，到那個時候，我們再來驅逐是會受到人民歡迎的，因此現在不急著趕他們。』

達賴喇嘛的侍從官帕拉則說到：

『當時噶廈還是召開了一個所謂設法讓中國人消氣、讓康巴人的騷亂平息的會議，最後結論是說要平亂必須恩威並施，首先派人和談，和談不成才進行戰鬥，但中共必須提供武器，如此則不但可以使中國人的憤怒消除，又可平息康人的騷亂。』

但有些噶倫認為政府真的要與康巴人自相殘殺嗎？實在太不可思議了。帕拉解釋說：『現在這裡沒有外人，說了也沒關係，我想中國人是肯定不會給我們武器的，這樣我們可以說我們已經盡力而為，是中國人不支持等。如果中國人給了，到那個時候我們再來討論要怎麼辦。於是我們先派了政府代表和三大寺代表前往山南和談。』

不過，當時一切行動都在秘密進行中，當西藏政府內部獲悉康人決心組織戰鬥之事時，就派了十餘名代表要求見安珠貢保札西，但安珠要別人說他不在，只派了幾個人負責接見。

這些政府代表無奈地表示：『請你們不要在西藏政府的直轄地面建立兵營，在這裏設立兵營和中國人打絕對沒有好處，中國人不停地找政府的麻煩，希望你們將兵營遷到康區或其他地方去。』

因為政府代表有幾次要見安珠都沒見到，最後四水六嶺代表向他們說：『康區正在打仗，如果政府願意和中國人商量有關停戰協議，我們可能會考慮，除非中國人停止在康巴的殘酷行為，否則我們實在做不了決定。』

當時康巴人雖然曾經經由哲蚌寺的總管聶巴與西藏政府有秘密聯繫，並且開始要求提供武器以便打仗，準備起來救自己的國家。但四水六嶺的成員認為，由於當時西藏官員都拿了共產黨的薪水，對於軍事行動都是採取『先暫行壓下』的行事原則。

因此，雖然當時的各區藏人都有聯手抗擊中共的秘密軍事行動，但政府的態度卻讓他們相當失望。針對這點，帕拉指出，西藏政府相當理解四水六嶺是為西藏的民族和宗教利益而工作，也非常同情，但想要提供支持卻非常困難。帕拉說：

『西藏政府當時處於非常為難的狀態，雖然西藏社會從政府到民間人人都有『若能抵抗中國人就應抵抗』的想法，但西藏政府卻因為需要與中國人合作，很多行為絕不能過分。』

因為這樣的顧慮，所以政府從來沒有向人民明確指出要做什麼，而且進行這樣的討論實在太危險，也可能有害無益，因此有關反抗中國一事，從未公開在會議上正式討論過。

公開上，西藏政府並未支持抗暴組織，但是在達賴喇嘛還沒有去北京之前，已經決心組織戰鬥的康巴人卻多是與我聯繫，因此我也被中國人列名為『反動分子』。但是由於西藏政府是負責處理政務的，而官員中只有我一人不須受其他同僚的牽制（帕拉為達賴喇嘛侍從官），因此與康人雙方的聯繫一直是由我一人在進行，對於中國，我在外表上也是儘量客客氣氣。

和四水六嶺秘密進行聯繫的事我從未與噶廈談過，噶廈方面也從未詢問過，因為如果知道四水六嶺與噶廈有聯繫恐會擴大紛亂。如果有中國人找噶廈的麻煩，噶廈與達賴喇嘛可以說完全不知道，如此一旦事情成功了對民族、國家宗教均有利，不成功也只能追究我們少數幾個人的責任，出於這樣的考慮，才沒有聯繫。

我從來沒有利用政府名義告訴西藏反抗軍政府要如何如何等，但可能因為我對這些反抗軍的想法相當重視，而使他們產生了政府是同情與支持他們的印象。』

帕拉說，噶廈的立場非常難為，如果設法與中國人合作，藏人看了就不順眼；和人民在一起，中國人也有可能突然製造暴亂。

這個以康巴人為主的西藏正規遊擊隊，一經成立即兵分兩路，一路以山南地區為根據地進行抗戰，另一主力七百餘人（或號稱一千）則由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總指揮安珠貢保札西率領，取道曲水縣向北前往香嘎登曲克林寺，奪取西藏政府的軍械庫。因為四水六嶺的人數雖然不少，但許多都是徒手兵或刀矛兵，即使有槍，子彈也是寥寥無幾，因此獲得武器對四水六嶺的未來成敗極為關鍵。

在有關四水六嶺護教軍的武裝問題上，在沒有建軍以前，達賴喇嘛的侍從官帕拉，就曾與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首領安珠貢保札西討論過這件事。帕拉提醒安珠，四水六嶺在竹古塘，每個人手上只有百餘發子彈，但是中國人卻有幾十、幾百萬的子彈。安珠聽完後說：『請政府馬上給我們武器。』但帕拉表示實在沒有辦法給。

安珠貢保札西為了奪取武器，曾經計畫突然襲擊拉薩，然後奪取政府軍械庫的武器，但帕拉立刻表示反對，因為這樣會引發動亂。帕拉要求安珠不要這樣做，然後告訴他，在拉薩東方的香嘎登曲克林有一個政府的軍械庫，如果設法去取那裡的武器，會比較方便。本來安珠擔心那裡的都只是過時的武器，後來派人探聽，得知那裡的砲和槍枝都非常的好。

在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編製完成後，首先挑選精壯，由安珠親自率領。然而，前往接受武器的北路軍由於軍情洩露，在聶木地方便遭到中國軍隊一五九團和一五五團的伏擊，解放軍以優勢武力打死四水六嶺前衛二十餘人，其中包括左翼總指揮恰城雍佩次成等指揮官。但四水六嶺也進行反擊，殲滅共軍重機槍班，雙方激戰半天。右翼指揮官然楚阿旺說：

『安珠有交待，在未取得武器前，遇到敵人要繞開，但有些軍官的看法完全不同，他們說，我們是前衛精銳，遇敵不戰難道不羞嗎？還有曾納阿噶與熱巴布瓊等人則咆哮說：『逃跑不羞嗎？見敵不戰不羞嗎？』於是最後大家決定繼續前往，但遇到敵人就打戰。在前衛順著山溝繼續進發時，發現中國軍隊在山上修築了七處工事，沿著山溝分佈，正在埋伏等待我軍。

左翼最高指揮官恰城雍沛次成率幾十人走在最前面，與其他部隊拉開了一定距離，當他們從溝口進入敵第三處伏擊點時，遇到露出地面的電話線，有一人想砍斷電話線，雍沛次成阻止並已預感到已中伏，當即令部隊後撤，他們一撤，河對岸一聲炮響，敵隨即發起攻擊，雍沛次成的二十餘人立刻下馬抵抗，後續部隊也分別與第一、第二伏擊點的敵人打成一片，頓時山溝中槍聲、吶喊聲響成一片。雙方打了一天一夜，我軍陣亡四十九人，其中恰成雍沛次成和貢覺阿聰都陣亡。統計負傷約六十七到六十八人，敵軍損失更慘重，雖無具體的數字，但從一共繳獲七百餘支步槍、機槍判斷，死傷應在六百人左右。我軍也損失四十餘支槍，全是步槍。

在戰鬥中，敵軍有許多在走投無路或負傷後，大多跳河自盡，人槍全部被沖走，我軍陣亡者也只能投入水中，結果有一陣子河水變紅，當地人形容此役打得河水變紅，確實不假。

左翼總指揮所率二十二人中，只有四人逃脫，十八人就地陣亡。

戰鬥結束後一陣趕路，路上走了好幾天，但無戰事，終於到了噶登曲科林寺院。到寺院附近，我們兵分三路，一路有我和普巴成列率領去佔領山上的宗（縣）政府城堡，白多率另一部佔領寺院，另一部則佔領山腳下的村莊。我向噶登寺的代表表明希望見到宗本（即縣長），並介紹自己是多康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對方聽了後表示不管是誰都不能進入宗堡，但我們表示自己是軍人，上頭下令我們進入宗堡，讓其他人進入寺院。我們受命而來，不進則死，那有退路，還望見諒。但對方還是不讓我們進去，並說政府來函說到，世局混亂，不得讓任何人進入宗堡或寺院。

我見多說無益，叫多數人直衝宗堡大門，見門已關閉，便以大石頭擊之，並高喊快開門，裡面的人乃開門並恭恭敬敬，低頭彎腰的。我們也虛張聲勢，以槍指著幾個嚇得面無血色的老漢問到：『中國人在那裡？』對方連連搖手稱：『沒有！沒有！一個中國人都沒有！』衝進去時見約有二十餘名守宗堡的男人，老年人和年輕人都有，都空著手驚慌地站在那裡，我以槍頂廿一個年輕人的胸膛，喝令他將槍交出來，他慌社慌張指給我們看的卻是他們的配槍，並無西藏政府的軍械，問之才知道是在寺院內。

我當即在宗堡上插上四水六嶺的旗幟，並告訴俘虜來的兩個頭頭，告訴他們我們是不偷不搶，希望他們了解。但是白多率領進佔寺院的部分就不是那麼順利，寺院在宗堡下方的山腰上，僧人強悍，不許他們靠近並威脅說：『你們還是安靜地坐著，如欲強行進入，可能要迫使我們開槍。』

寺院四周有圍牆圍繞，共有八個大門供進出，白多無奈，只好退入村莊內從長計議。這時螺號悠悠，望眼可及之處，我大部隊踏著塵土飛揚而來，等我軍全部抵達噶登曲科林以後，安珠讓寺院派人前來，寺院因此派來了兩名代表，安珠向他們介紹我軍為護國、護教之軍，非危害人民打家劫舍的強盜，寺內留存有西藏政府的武器，希望能交給我們，你們留著也無用，但那兩個代表根本不聽，言無政府命令，他們無權交出，且政府命令他們不惜作戰也要保護槍枝，故難從命。

說來說去，雙方毫無進展，安珠於是召集眾軍官研究對策，安珠下令說，如果寺院拒絕繳槍，說什麼也沒有用，今晚全軍將寺院團團圍住，明日拂曉進攻，破門而入。

在我們回去佈置進攻寺院事宜時，許多官兵流著淚要求不要把槍口對準寺院，還說護教軍怎可攻打寺院？我等又去找安珠，安珠說，攻之無妨，或許不需要交戰。

果然，當我們衝破一門，我率幾個人直接衝入寺院執事的僧舍時，無一人抵抗，我請寺院執事外出，他竟示意要我把他綁起來，於是我們將寺院幾個執事捆綁起來，押到寺外，附近老百姓見我們捆綁寺院喇嘛，都大驚失色，紛紛湧來求情，我們則故意喊殺喊打，最後雙方達成協議，對方答應繳槍，留一百支步槍和一些手槍做為保衛寺院之用，但在取槍時他們又言留一百支槍對他們毫無用處，願意全部交給我們，對中國人則以被反動派劫奪做為搪塞。』

黃昏時候，四水六嶺的急行軍前往並且接收了西藏政府存放在香噶登曲克林寺院內的英國製造武器。清點後得知共接收到的藏軍秘密倉庫所儲藏的英式武器，共有壯筒輕機槍廿挺，加拿大衝鋒槍四十枝，八一迫擊炮一門，炮彈七十二發，步槍五百枝，各種子彈七萬發。

『四水六嶺』在獲得如此大量的武器後，專門成立了軍械部，並給沒槍的士兵補給槍枝或更換子彈不多的槍枝。但又因為缺乏馱運武器的牲畜，因此又派兵劫奪了大戶人家在附近的一個牧場，共獲得八、九十批馱馬，然後起程回山南。當他們到了一個叫烏玉藏堂附近的地方時，前衛傳來報告說從日喀則方向和羊八井方向分別有中國軍隊正沿著公路前來。

安珠當即下令：『現在有槍用了，打！』所有士兵本來正在吃飯，一聲令下，戰士們扔下飯碗上馬前去戰鬥，四水六嶺軍共分三路，一路守總隊，其他兩路分別伏擊從公路兩頭趕來的車隊，也就是史上有名的聶木戰役。安珠他們在香噶登曲克林取了武器後，沒想到竟能藉著這批武器，在歸途中又在聶木宗（縣）把中國部隊打得鼻青眼腫，這場戰役更是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成軍以來，打得最成功的一次。漢人洛桑札西回憶說：

『接受武器後的遊擊隊，個個歡天喜地，稱得上是人強馬壯武器好，雖然還缺乏火砲配備，但因藏人不打攻堅的正規戰，所以不甚重要。而敵人所使用的武器都是瀋陽兵工廠製造的，其性能根本不及英式武器，再加上藏人多半是父子同兵，沒有官與兵的分別，都是為了護教挺身而出的自然結合，因此打起仗來特別勇猛。

反觀解放軍從一九五六年底，整編新軍，優勢是火力強，戰士年紀輕，但缺點是沒有實際的戰鬥經驗。解放軍當時都是廿五歲以下的青年，毫無實際作戰經驗，那能敵得過飽經戰鬥鍛鍊的康巴老戰士？常常看到情勢不對，都舉槍高呼『喇嘛投降！』但因當時敵軍大部分霸占山口，在整個形勢上還佔優勢，藏軍為殺一敬百，敵軍都成了刀下鬼。

取得武器後，在藏軍折回山南途中，經過拉日公路，不幸卻被敵人發現，中國部隊立刻由拉薩抽調出一五五團兩個步兵營、和一五九團的一個步兵營，共計戰鬥兵將近兩千人，秘密以汽車運到曲水，再步行到聶木宗，企圖堵擊四水六嶺南進。

這次解放軍共有三個營，人數和四水六嶺相比是四比一，火力比約是三比一。共軍到了小河南縣政府附近，就暫時停止前進，把大部隊隱藏到山地，進行敵前休息。而四水六嶺軍則在行抵縣政府北部小河岸時，亦因天晚休息。但另外又派遣五十多人，埋伏到橋的北部，用五挺英式輕機槍或壯筒機槍火力，封鎖橋樑。

第二日北京時間凌晨三點半鐘，中國部隊展開進攻，卻未料到四水六嶺軍已有了準備。當解放軍尖兵一排多人甫抵橋上時，五挺輕機槍火力齊發，只聽到嗖嗖的聲音，瞬息間便把解放軍全部殲滅。接著四水六嶺軍反攻過去，又把後續的一連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大部分又殲滅了。

下一個目標便是攻擊指揮部，當時敵人的前進指揮所是設在縣政府對面的民房。指揮所內的解放軍看到部隊被殲，知道已身陷重重包圍，無法脫逃，曾在房頂舉槍請求投降。但因當時康巴人未看清敵人指揮所動作，開動機槍向上射擊，因此將屋頂上的解放軍壓縮到屋裡頑抗，最後以汽油灌注燃燒，人屋全部付之一炬。

這一天從拂曉前打到天黑，打得敵人死傷遍野，在這場戰役中，總計打死解放軍二百七十多人，打傷的則超過一倍以上。事後藏民看到由曲水裝運死屍的大卡車，如裝死豬般一樣的運到拉薩去，傷兵則由部隊押送擔架隊，抬了兩三天才抬完，曲水民房，到處是傷兵血跡。而且，當時還繳獲了步槍一百多枝，衝鋒槍七十枝，重機槍二座，輕機槍三十七挺，迫擊炮三門，各種子彈千多發。

但同時，四水六嶺在這場戰役中亦有傷亡人數達四十七人。有十餘名知名的康巴青年，為了殺敵紅了眼，都是在敵人密集的火力攻擊前，揮藏刀衝上去才犧牲的。』

然而，漢人洛桑札西說，這次戰鬥卻是在西藏多年戰鬥中，打得最成功的一次。四水六嶺竟能以五百多名遊擊隊，創下打勝將近兩千人的中國新國防軍的奇蹟，從此護教軍名聲傳遍西藏民間，以山南為基地的護教軍之所以發展壯大，應是得力於這次聶木宗的戰功。

經過這次戰鬥後，中國解放軍十八軍軍長張國華開始認識到以康巴人為主的抗暴軍戰鬥力，從此下令駐防西藏各地部隊，修築堅固的防禦工事，在沒有任何援軍的情況下，不準擅自打攻擊戰。

而當時的軍事情勢是西藏方面除了拉薩、日喀則、昌都等少數城市已為中共控制外，其他各地多有遊擊隊四處流竄。四水六嶺心知遊擊隊本無後防的明顯界線，因此，四水六嶺自聶木宗獲勝後，便決定撤退至藏北經藏東，最後再回藏南，準備打一次長途遊擊戰，以支援各地的反共勢力。

四水六嶺從此展開一場長途行軍，但因為在藏北無人區給養極缺，四水六嶺士兵一路上吃盡了苦頭。漢人洛桑札西回憶說：

『我們在藏北時給養極缺，一路上盡是山嶺砂崗，幾天內見不到一戶人家，真是縵無人煙，我們所帶的糧食，早已吃得一乾二盡，全軍都靠打野獸活命，過著茹毛飲血的生活。而更艱難的是，在這裡的怒江上源拉喀池到嘉黎宗的一段，地形特別的高，沿途多浮沙地，這是青康藏高原的獨特現象，在其他地區是沒有的。

表面上，一點也看不出來，待人馬走到上頭，一下子就陷進地裡，馬匹四蹄，愈拔就愈陷愈深，如此活活埋藏了幾隻馱子彈的騾子。同時，敵人則分別由拉薩、當雄、里河三地，派兵跟蹤，好在是步兵追騎兵，始終保持著一段距離。

由於長途行軍，食糧特別困難，唯一能買到的是牦牛，再加上以打獵到的野牛、野馬、野羊等充飢，每人分些鮮血淋漓的肉，還掛在身上邊吃邊走。行軍到念青唐古拉山東北，大家已經精疲力盡。但跟蹤的敵人步兵，通訊設備完整，又能得到食物補充，所以其行軍速度很快，已經很接近我們了。

由藏北到藏東，沿途沒有敵人軍政據點，但一路上因缺糧使我們損失了一些戰士。我軍抵達念青唐古拉山脈的東部主峰區時，敵人由黑河方面派遣來的跟蹤部隊，因大雪山地帶難行，自動撤回，另外由拉薩派遣來的部隊則尚未趕到，我軍便利用這個機會尋找食物，因為飢餓難受，所以反而把拉薩方面的來敵看成次要。

就在我們兵疲馬憊時，突然一營敵人兵力趁我軍在忙於補充食物的飢餓狀態中實行偷襲。偷襲的敵人一直衝到我們司令部的地方，我們倉促應戰，把敵人打退，但總司令安珠不幸負傷，總指揮然楚阿旺則被衝散。當時敵人並未發現我軍高級人員的受損情形，認為我們戰鬥力還強，所以就回拉薩去了。我軍才因此得以從容退到林孜，那裡糧草更多了。

在四十多里長途的遊擊戰後，又被敵人偷襲，我們必須先作兵源補充才能恢復攻擊力。藏人打遊擊優點是人強馬壯，適宜流動生活，擅長打各自為陣式的麻雀糾纏戰術。其弱點則是由於藏民過慣自由生活，無法接受有組織的嚴格軍事訓練，打勝仗勇上加勇，打敗仗就很難掌握。』

『四水六嶺軍』要不斷衝破中國軍隊的圍追堵截，千里轉戰後，雖然部隊由於衝散或陣亡而不斷減損，但也不斷予以尾追而與解放軍發生戰鬥。在瑪雄一戰，四水六嶺軍陷入解放軍伏擊圈中，最後雖苦戰逃脫，但總指揮安珠貢保札西負傷，右翼總指揮然楚阿旺也被衝散。然楚阿旺回憶安珠受傷的情形時說：

『當時敵人砲彈像雨點般射來，我用望遠鏡觀察，見敵人已從隱蔽的山脊後翻出，但由於太遠雙方並未對射，只有砲彈不斷落下來在四周爆炸，我看到安珠營帳處濃煙滾滾，心想不好，立即奔過去時，見幾個隨從抓再站在那裡，冉冉渾身是鮮血地對我說：『阿旺，不行了，安珠被打傷了，現在該是好好地赴死的時候了。』我至安珠處，見安珠半臥在那裡，渾身是血，眼睛已被鮮血蓋住，我以安珠的帽子擦去污血，安珠睜開眼見到我說：『阿旺，我沒事，我有護法神的保護，沒事的。』』

其他有幾個隨從均已負傷，其中有一叫道傑的約四十餘歲的芒康人，他的腿已被炸斷，他一手推著槍，高叫：『別碰我！』別留下槍。因為藏人相信沾上他人的污血，護法神就不會保護自己，否則可以刀槍不入。

安珠說他要喝水，然後掙扎著起來到一山彎處，丹正旺傑、索南朋措和我三個人點火焚燒柴薪，準備溶油熬傷口止血消毒，安珠不讓我們碰他，只是叫我挑一些人上後山控制制高點，還說如被敵人佔領山頭就完了。我想安珠可能快死了，不能讓敵人發現屍體，否則會被運到拉薩在藏人面前炫耀，故未從命。安珠再一次強調說要設法搶佔山頭，否則這個山彎中的人都會死，還要我和夏樂才沛帶一部人上山去。

我們向佛祖起誓，絕不扔下安珠，不管他是活是死，安珠又說：『請儘快上山，我絕對沒有事情。』我乃說：『如陣地失守，則必是我戰死了。』當時我身上全是鮮血和腦漿，這是因為在叢林中近距離擊殺敵兵所濺，當時我已不相信什麼護身符了，為什麼不傷別的，偏偏傷了安珠，我的隨從朵朵索南頓珠已負傷，他有一匹好馬，我向他借了馬轉身對後面的官兵說：『大家隨我來，如不能佔領此山頭，我們大家都完了。因為山頂有敵，大家要不管死活的向前衝，如果山頭失守，則山彎中的我軍都會死，我先衝，我死了大家不要停，一定要衝上去。』』

當四水六嶺軍在聶木宗嘗到勝利的滋味後，安珠貢保札西成了眾所擁戴的領袖人物，昌都境內的南北各路遊擊隊一致擁護安珠為他們的指揮，更希望能夠聯合起來，攻打札木，以消滅敵人在昌都以南的軍事重鎮。但沒有料到的是，瑪雄負傷後痊癒的安珠率領四水六嶺軍以較多兵力攻打札木，卻反而吃了敗仗。

札木位在青藏公路上，為昌都與拉薩間由中共新開闢的城市，公路東南通緬甸，西南通印度，為對付緬北與印東的秘密樞紐，是中印緬邊區的戰略要地，形勢非常重要。

札木當時修築了大批房屋，分為政府機關、駐軍營房、物資倉庫三區，而以軍分區司令部所在的磚瓦建材建成的三層大樓為核心，但四周都有地堡網連繫。

駐在札木的中國軍隊僅一百多人，安珠卻率領了八百多人進攻，把札木層層包圍得水洩不通，中國軍隊一些新修的房屋差不多全燒完了，就只剩下那個司令部，但解放軍卻憑著堅固的工事死守。遊擊隊人數雖然多了七倍，但在武器上因無炮無炸藥，所以始終不能解決。另外還有一點是因為遊擊隊聲勢浩大，心理上有點輕敵，才給死守的中國部隊得到待援的機會。

那時中國部隊從拉薩方面抽調兩營兵力，從昌都方面抽調一五四團、一五七團部隊，分兩路趕來。拉薩方面的援軍，因為知道遊擊隊聲勢浩大，因此一到附近波密區，就化裝成藏民，偽稱是四水六嶺的援軍，最後竟然讓他們混進遊擊隊中，當時這些中國軍隊從穿著藏式長袍中掏出衝鋒槍，打了個措手不及，讓四水六嶺損失非常慘重。

四水六嶺在受到猝不及防的兩面攻擊後，立刻分成南北兩路撤退，北路由安珠率領的則退到邊壩、拉日一帶，略加整頓，很快就恢復戰力。不久，在幫助當地藏人組建了強有力的地方遊擊隊以後，安珠貢保札西便率領主力取道貢波江達返回山南，在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後不久即與在山南的部隊會合。在瑪雄衝散的右翼總指揮然楚阿旺與主力失去聯絡後，便潛回了色拉寺，又連絡了從噶瓦、理塘等地逃來的藏人以及部分四水六嶺軍的散兵約六十多人，準備回山南時，發現共軍由一五五團第三營營長杜效模率兩連兵力護送二十七輛軍車前往澤塘，他們便在地勢險要的貢嘎宗喇嘛廟附近埋伏起來。

左邊就是滾滾獨流的雅魯藏布江，右邊則是居高臨下的喇嘛廟，增援澤塘的中共軍隊並不知道前面有埋伏，他們分坐廿七輛車（西藏平叛紀實記載為廿七輛，但其他藏人說的都比這更多）到達時，完全陷入埋伏，五十多支步槍火力齊發，一下子打壞汽車六輛，其中有一輛車被打急了，司機著慌開進雅魯藏布江淹沒了，一輛車則折回逃走了。

藏人認為這場戰役打得非常成功，是繼聶木宗戰役後的最大勝利。共奪獲了重機槍兩門、輕機槍五挺、衝鋒槍七支、步槍廿四枝、手槍兩枝、子彈兩千多發，然楚阿旺也一戰成名。

就在然楚阿旺伏擊中國軍隊時，四水六嶺留守山南的部隊接到然楚阿旺的命令前去增援，中途在札囊地方正好與由澤塘趕來增援的兩支共軍相遇，中共軍隊再次遭到重創，兩個連的兵力傷亡過半，汽車被燒毀，共軍一五五團副團長殷春和也在戰場上被擊斃。在此之前，留守山南的四水六嶺軍曾先後三次圍攻在山南地區唯一的中共據點澤塘兵營，但由於四水六嶺缺乏炮火器具，加上沒有訓練，雖造成一定人員耗損，但也未能攻破。

此時，西藏首府拉薩的局勢也日趨緊張，中國的強暴和藏人的疑慮終於導致拉薩之戰的爆發，由人民組成的反抗軍和西藏政府軍聯合在拉薩市區擺開陣勢，雖然藏人決一死戰，但在中國以絕對優勢的砲火摧毀下，幾等於烏合之眾的藏人在兩天內即告瓦解，大部分藏人開始四散奔逃。

拉薩會戰後，四水六嶺護教軍和西藏政府軍從此會師，結集山南。另外中國西藏軍區，十八軍軍長張國華和前線政治委員會周仁山，率領了兩師援軍、五百公安部隊、及十八軍的一部分，分成三路，向山南進行決戰。當時四水六嶺約有三千多人，加上從拉薩戰役中敗退下來的六、七百名藏軍和幾萬名士氣低落、灰心喪志的僧俗人民，成為藏軍方面的基本力量。

漢人洛桑札西認為，各路反抗軍會師年縣的覺拉寺，當時人才濟濟，有著身經百戰的遊擊領袖，也有受過英國軍事教育的藏軍代本，無奈彼此間意見卻極為分歧。四水六嶺護教軍方面的意見是主張進攻澤塘、乃東，在中共山南分工委會所在地，給敵人來一次嚴重打擊，若形勢不利，再退出國境。

另外以藏軍為主的政府軍則主張保存實力，他們認為西藏反抗軍，已經勝利地完成掩護達賴喇嘛，率領僧俗高級官員，平安脫離中國的天羅地網，在政治上已給中國無法彌補的損失。又認為西藏人民的反共，是全球民主與極權鬥爭中的一環，今天不能逞一時之勇，投敵人所好，打無前途的決戰，所以不如整軍退出國境，意義較為深長。安珠看到大家意見不一致，對堅持攻打主張，亦有些動搖。

但是，四水六嶺當天晚上就接到錯那縣來的報告，說到由江孜方面來了一營敵人，已經用奇襲手段，佔領了唯一退路的要道，封鎖了通達印度的山口。因此各部隊及隨軍、三大寺喇嘛研究結果，認為後防發生問題，只有馬上撤退的一條路。而此時正面的解放軍，還在吸引各地遊擊隊出戰，四水六嶺軍於是決定撤退，並儘量避免走寬敞大道，以使敵人佈置的陷阱落空。

雖然四水六嶺已經決定不戰而退，但一路上還是不斷與中國部隊發生大小戰鬥，當藏軍退到錯那山以北、隆孜縣以南地區，四水六嶺軍與張國華指揮的三路敵人，形成決戰態勢。張國華大軍浩浩蕩蕩的從三麵包圍上來，心想大雪山橫互在前，四水六嶺軍前無進路，後有追兵，只有與之決戰一途。

當時張國華的進軍口號是：

- 『一、殲滅山南敵人，根絕美、蔣、印度破壞西藏的代理人；
- 二、不允許帝國主義和國民黨，長期干涉西藏的徹底解放；
- 三、殲滅康巴反動派，以雪達賴逃出拉薩的恥辱（由此亦可得知達賴喇嘛不是中共故意放的）；
- 四、打好山南殲滅戰，結束西藏戰爭；
- 五、發揚昌都戰役的光榮歷史；
- 六、新軍要創造新的勝利。

但四水六嶺軍竟全軍跋涉雪山成功，只損失了一部分驃馬而已，在他們已經退達到山頂時，趕到雪山下的敵人，立刻用排炮向山頭鳴發，但因為積雪萬丈，炮彈一點也發揮不了作用。四水六嶺軍亦用機關槍回敬。

四水六嶺軍得意的在山頂上高聲喊著：『張國華，趕快回去好了，你的佈告上說達賴喇嘛是神，真是走得神不知鬼不覺，你們整天派的飛機，都沒有偵察出來。但我們四水六嶺可都是人，你這次又撲了一場空，世界上那有第二個阿沛阿旺晉美，再來一次束手讓你報戰功？』

中國軍隊一波波湧來，但因為給大雪山擋住，也無可奈何。

整體而言，在西藏人抗暴中，四水六嶺軍曾在不少戰役中獲得勝利，並佔領山南地區，確實給中國部隊帶來極大的威脅。前西藏噶倫尼夏烏談到四水六嶺時曾說：

『中國人對四水六嶺的建立好像不甚害怕，在竹古塘空投武器等事中國人也非常清楚。有一次中國人對噶廈說：『美國在竹古塘空投多少武器我們都歡迎，以前國民黨的武器全部都是美國供應的，我們除了石頭和木棒外什麼也沒有，後來美國支援的武器對我們幫助不小，因此我們非常歡迎美國人空投武器。』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時，我們噶廈去中國人的地方，中國人中有一個高個子軍官對我們說：『你們噶廈期待四水六嶺是錯誤的，他們頂多不過幾千人，再增加也不過幾萬人而已，我們共產黨根本就不把他們當一回事。國民黨的八百萬軍隊被我們消滅了，你們噶廈將希望寄託在這些人身上是錯誤的，我們根本不會放在眼裡。』

他話雖如此說，但同時中國人卻非常警惕人民會不會站在他們那一邊，所以在拉薩中國人的住處全部在圍牆上拉上鐵絲網，也挖了戰壕、修了碉堡、杏眼等，到了一九五八年時，雙方關係已經極為惡劣，中國人不信任藏人，時刻做好戰鬥準備；藏人見了中國人就辱罵，甚至鬥毆、捅刀子等，騷亂會發生不過是時間因素而已。』

四水六嶺軍雖然成功護送達賴喇嘛到了印度，但在達賴喇嘛流亡後，四水六嶺幾乎是不戰就退入印度，也讓四水六嶺英勇的歷史留下遺憾與爭議。對此然楚阿旺認為，雖然四水六嶺也很快就退到印度，但若沒有四水六嶺，達賴喇嘛根本就到不了印度，現在西藏問題就根本談不起來，現在想要恢復寺院、恢復宗教、恢復文化都可能只是夢想，這是四水六嶺最大的貢獻。然楚阿旺說，當時在印度境內噶倫堡那兒有一些藏人，而中國和印度關係非常好，印度政府已準備遣返那些藏人，並把他們準許定居印度的證件都沒收了起來，正在談什麼時候送他們回去，就在這時達賴喇嘛到達印度的消息傳來了，沒過幾天又把證件還給他們了。

四水六嶺成員相信，如果達賴喇嘛沒有到印度，印度政府會和中國政府合作，把西藏人全趕回去，西藏人就會被全部集中在西藏，怎麼被欺負外界都不會知道。現在世人會關注西藏人，是因為在外面的西藏人監視中國政府在西藏的所作所為，並告訴全世界，使全世界關注西藏，重視西藏，否則這個世界不可能有西藏問題。

漢人洛桑札西則說，與中國軍隊相較，西藏各地的抗暴隊伍，憑著政教合一傳統，拿著幾乎是與戈矛差不多的武器，前仆後繼，與中國軍隊打了六年多的仗。而其中的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更從一支七百多人的隊伍，發展成一萬人以上半正規軍，在西藏戰鬥兩年，共有一千多人犧牲，最後四水六嶺各部九千多人，能對抗三倍以上敵人的分進合擊，且掩護僧俗，安全退出戰場，整軍打出國境，英勇事蹟，傳遍中外。

洛桑札西說，四水六嶺護教軍經常牽制中國部隊張國華十八軍兵力的三分之一，同時又吸引了其它三分之一，使其僅剩下三分之一對付藏軍。鏖戰兩年雖犧牲了一千多人，但消滅了中共駐藏黨政工作人員五百多人，軍隊官兵六百多人，擊傷和擊壞運輸汽車一百多輛，並奪獲不少物資。

同時，四水六嶺使中國地方幹部，只能在少數點線上孤守，他們把中國從縣政府到村為止的行政系統，完全予以摧毀，而由護教軍取而代之。藏人從共軍手裡繳獲的內部文件中，看到這樣的記載：

『在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的策劃、支持下，流竄到西藏地區的以安珠貢保札西、夏格、朗吉多傑、甲馬、桑培等為首的康區叛亂頭子，於一九五七年五月在拉薩組成了四水六嶺反動組織。所謂四水六嶺是泛指西藏及川、滇、甘、青等省藏族居住的地區。該組織一成立，即以向達賴喇嘛獻金寶座為名，展開大規模的捐獻活動。在召開捐獻活動的籌備會議時，西藏噶廈的噶倫柳霞、土登塔巴、夏蘇、居美多吉，都出席了他們的會議。』

七月四日，四水六嶺向達賴喇嘛正式獻金寶座的儀式在布達拉宮舉行，噶廈以達賴喇嘛名義向參加儀式的藏、川、滇、甘、青五百多名四水六嶺組織成員回送了禮品，他們向達賴喇嘛呈送了一份報告，要求達賴喇嘛領導四水六嶺地區。

接著，在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的支持下，他們成立武裝並不斷擴大其力量，炮製了『保衛宗教、西藏獨立、反對改革、反對共產黨』等反革命綱領和口號。

又經過一段串聯、醞釀活動後，在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日，由鄰省竄入拉薩的近五千多名叛亂武裝的頭目和藏軍以及哲蚌、色拉、噶丹三大寺的代表秘密聚會，結成同盟，將所有武裝力量統一於『四水六嶺』組織之內，並正式簽訂了同盟書，各自承擔了將來叛亂時所擔負的任務。六月十五日，安珠貢保札西等帶領兩名藏籍美特和部分叛亂武裝離開拉薩到山南地區的竹古塘，建立叛亂根據地。廿四日召開有廿七股叛亂武裝的大小首領參加的會議，宣布成立『四水六嶺衛教志願軍』。由安珠貢保札西擔任總司令，夏格、朗吉多傑、甲馬、桑培等任副司令。

『護教軍』一成立，就得到外國勢力空投、陸運武器彈藥等物資的援助，噶廈中多數官員更是明裡暗裡全力給予支持。早在三月他們就給各宗（縣）、溪（相當於宗的莊園）寺廟下令，要大力支持『四水六嶺』組織，為叛亂份子籌備糧秣。噶廈在山南地區打開拉康、多宗等地的糧食，向叛亂份子發放糧食，打開軍械庫為叛亂份子提供武器彈藥。叛亂武裝有恃無恐，氣焰囂張。

在這種形勢下，西藏實行適當收縮後，只是保點、保線、自衛。七月廿一日就在拉薩以東僅八十餘公里的爭莫寺伏擊了人民解放軍的一輛運輸汽車，打響了在西藏噶廈管轄區武裝叛亂的第一槍。接著又在麻江、尼母、羊巴井、貢噶、札朗等地伏擊解放軍過往車輛，使副團長殷春和、營長杜效模、分工委副部長沈鳳樓等軍政人員一零九人被殺害，三十二人致殘，十餘台汽車被焚毀和破壞，並且奪走大量武器彈藥。

到一九五九年初，武裝叛亂活動加劇升級、愈演愈烈。叛亂份子不僅洗劫道班、襲擊兵站，伏擊車輛、炸毀橋樑、截斷公路，而且圍攻人民解放軍和黨政機關駐地，並妄圖一舉加以消滅，佔領各地。澤塘中央山南分工委、札木中心縣委、丁青中心縣委和駐各該地的解放軍先後被叛亂份子圍攻，山南分工委被圍攻兩次共七十七天，丁青縣委被圍攻達九十天，被叛亂武裝打死打傷我軍政人員共計兩千多人。』

在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後，『四水六嶺護教軍』也跟著退出孺西藏。

西藏正式淪陷。

第八章 從拉薩事變到拉薩戰役

雖然『雪域護教志願軍』與『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拉開了藏人抗暴的戰線，但卻挽回不了敗亡的頹勢，就連居首邑地位的拉薩也產生山雨欲來風滿樓的不祥之兆。果然，從『拉薩事件』到『拉薩戰役』發生僅僅只有一個禮拜的時間裡，西藏問題在中國軍事強權之下潰堤而出，這是當今回溯西藏問題時，最關鍵的一刻。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西藏拉薩群眾憤怒的吼聲驚動了遠在北京的中國，藏人積壓已久的不滿情緒，在中國入藏八年多之後，終於藉著中國西藏軍區邀請達賴喇嘛看戲的偶發事件引爆。藏人心恐達賴喇嘛將被挾持綁票而不斷集結，數以萬人的群眾誓言保護他們的最高領袖。達賴喇嘛倉促逃亡，中國下令武力鎮壓，西藏人的命運從此轉折。

這一天，西藏人永遠難忘。

即使過了在四十年，負責保護達賴喇嘛安全的達拉朋措札西，回憶起當時那一幕時，仍免不了驚心動魄。

達拉說，三月十日上午凌晨三、四時，老百姓在聚集在羅布林卡門口，很遠都聽得到叫聲，有關人士打電話到他家傳達這個緊急的情況。他到樓上一看，大概約有一、二千人聚集在那裡，後來還不斷增加，估計已有一萬多人（達賴喇嘛的自傳提到人數不可計數，有人說有三萬人）。

藏人高呼口號，要求達賴喇嘛不要去中國西藏軍區看戲，一旦去看戲可能就回不來了：『你們這些負責達賴喇嘛安全的，為什麼不負起責任呢？』群眾都高聲吼叫著。

老百姓又抗議說，平時開會可以帶武器，為什麼這次不能帶？為什麼要限制保鑣人員？這當中一定有問題，西藏軍區必然有企圖。

另外一個原因讓老百姓不斷聚集的是，當時雖然噶廈已經下令十日當天不必派軍隊去西藏軍區，達賴喇嘛將在沒有隨從的情形下進入中國軍營。但在西藏自治區工作的藏籍幹部已一再傳言：『漢人準備了飛機，要把達賴喇嘛劫持到北京。』這個消息也很快散佈到民間。

藏民大量集中後，又高呼：『今天達賴喇嘛去軍區絕對不行』、『不要去』、『噶廈要平息人民的紛亂』等口號，帕拉秘書長說，當時並沒有任何西藏官員發起任何密謀或計畫（中國曾經懷疑西藏政府介入策畫暴動），但當時包括婦女在內都舉行了示威遊行。

羅布林卡的大門被迫關閉，所有噶倫在宮內不停密商。

前一天噶倫就已經不斷反映，希望達賴喇嘛不要去看戲，但達賴喇嘛認為不必多疑，仍準備前往中國軍區。一些公務員得知這個消息就到拉薩說：『明天達賴喇嘛要到軍區，中國人說不能帶警衛，特別是演出是在中國人的軍營中進行，這絕對不是好兆頭。』

於是一傳十、十傳百。十日一早當尼烏夏和代理噶倫辛格一起乘車前往羅布林卡時，見許多人也正在前往，他們以為是要去拜見達賴喇嘛的民眾，但在恰果橋時，尼烏夏的隨從跑來說：『羅布林卡集中了許多人，正門已經被關閉。』在那附近，又遇到幾個孜仲（秘書）說：『兩位如果不下車，恐怕藏人會因為不明究底而起哄。』兩人於是步行前往。那時藏人正在高喊：『達賴喇嘛請不要去中國人的軍營』等抗議口號。

由於群眾集中在門口，噶倫康索便以大喇叭廣播說：『你們不必擔心，達賴喇嘛今天不去軍區了，已推辭前往，我們噶廈會去向中國人說明，因此你們不必集中在這裡，可以回家了』。

現場的藏人便回答說：『既然如此，汽車出來時請空著車出來。』噶倫開車出來時，藏人懷疑他們會將達賴喇嘛帶走而進行秘密搜查，現場也看到一些腰上別著長刀的婦女。藏人告訴噶倫說：『你們見了中國人不要縮頭縮腦的，也不要被大洋迷惑了』等等說了許多。

門外的狀況愈演愈烈，不少西藏婦女聚在一起舉行示威遊行，這些婦女不斷責罵西藏官員是廢物，說西藏全部都叫你們換成了大洋，現在是不是也準備拿達賴喇嘛去換中國人的大洋等。

目前在台灣定居的藏人丹巴說，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他人就在拉薩現場，那時他才廿幾歲。由於藏人很擔心達賴喇嘛去看戲可能會被軟禁，知道達賴喇嘛人在夏宮便不讓他出來。

後來藏人說羅布林卡周圍都要由藏人來保護，否則這些西藏官員會偷偷把達賴喇嘛帶到西藏軍區。這些負責包圍的藏人不讓噶倫外出，來來去去的人都要由這些戴有識別證的西藏人驗明身分。除非有噶廈的命令，老百姓才讓他們進去，但只准進不准出，羅布林卡不讓任何人出來，因為擔心出來的人會把消息洩露給中國。

在羅布林卡的內牆是僧俗官員和警衛團官兵，外牆四周是第二、三、六代本的官兵，但藏人自告奮勇者甚多。

藏人不滿的情緒逐漸升高，當時有一個噶倫叫桑泊次旺仁增，老百姓把他誤認為阿沛阿旺晉美，便向他丟石頭，因為桑泊與阿沛都是西藏軍區的副司令員，桑泊因此負了傷。

發生此事後，羅布林卡的官員請老百姓不要再鬧了，因為他並不是阿沛，桑泊被送到羅布林卡旁的德古林卡療傷，這是印度領事館所在地，裡面有醫護人員。

此外，平時在羅布林卡有一個習俗叫『叢呷』，就是指所有僧官每天早上一起茶敘、吃早餐，參加的人只有僧官、沒有俗官。其中有一個僧官叫帕波拉堪瓊，他在叢呷結束後回到拉薩，平時因為僧官是穿袈裟，但他再回到羅布林卡時卻是穿藏服，又帶著口罩，老百姓以為他是中國の間諜，所以丟石頭，他當場被打死，這件暴動事件又使得當時的情況無法平靜下來。

所有噶倫因此又拜見達賴喇嘛，請達賴不要去，那是三月十日中午的時候。後來達賴喇嘛接受了大家的建議，但達賴喇嘛要噶倫去西藏軍區解釋，說明為什麼今天不去的原因。

於是三名噶倫一起乘車到了中國軍營，看到許多拿著花朵的小孩在排著隊，他們三人於是在接待室等著。一會兒中國軍官譚冠三來了，當時中央政府代表張經武、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兩人都在北京，不在西藏，所以譚冠三便扮演這個角色。他們二人喊譚『三號』，就是第三號人物。

譚冠三和阿沛阿旺晉美坐一邊，他們三人坐另一邊。坐定後，索康向他們解釋達賴喇嘛本已決定前來，但羅布林卡各門已被人民包圍，因此無法前來，對此達賴喇嘛深表遺憾，希望以後有機會等等做了說明。

譚冠三是個矮個子，他聽完後憤怒地說：『怪不得達賴喇嘛，主要是你們噶廈，什麼時候都不能把事情做好，今天而言，是故意將已準備就緒的演出給破壞，什麼時候你們都是這樣聲嘶力竭地在喊。』

譚冠三又說：『在此之前，扎什軍營的藏軍和中國軍發生鬥毆，雙方都死了幾個人，其後又有幾個漢藏軍人互相殘殺，今天又在羅布林卡外將昌都堪瓊由人民以亂石擊斃，你是負責治安的，要在三天之內交出殺害堪瓊的兇手，否則我們雖不會暗殺你們，但要在人民中宣傳並予懲處』。

尼烏夏回答：『是這樣，如果昌都堪瓊是一兩個人打死的，可以調查、緝拿，但這次是人民亂石打死的，要找一個明確的兇手是不可能的...。』當時康索在旁邊插嘴說：『不要再說了，算了』。

幾個中國軍官紛紛站起來發言指責，說西藏官員被康巴人迷住了是錯誤的，最後譚冠三說：『不怪達賴喇嘛，以後還要見面，達賴喇嘛的安全要由你們噶廈負責』等。

他們三人回來後，又向達賴喇嘛報告此事，轉達譚冠三說此次達賴喇嘛不能來，以後進一步再談。

達賴喇嘛隨後也要求老百姓趕快回去，並說明他已不會去西藏軍區，但老百姓還是不聽。那天打死堪瓊後，人民拖著他的屍體到拉薩八廓街遊行，高呼：『中國人滾回去』、『西藏是我們西藏人的』、『驅逐中國人』、『我們不承認十七條協議』等。

一個名為『西藏獨立運動』的組織，也在牆上及中國人住的房子門口張貼這些標語。很多藏人並要求中國軍隊先撤退，再來談西藏與中國的關係，不管是文官還是軍隊，首先要全部撤退。

達拉解釋指出，『西藏獨立』組織的其中一些人秘密編寫了憲法等許多文件，並且發起運動、散發傳單，那個憲法在拉薩事件中被藏起來了。這個組織與他有聯繫，也曾向軍營進行聯繫。但當時的秘密組織大約就是這些，另外一個則是『人民會議』組織，其他就沒有了。

這些組織並沒有廣招成員，都是找可靠的人再串聯起來，這樣如果讓中國人抓到也是一個人，就不會牽連到其他人。而其中『西藏獨立』運動組織的首領是羅桑益西，在當時曾向印度、尼泊爾的代表提交文件。

另外還有一些婦女聚集進行運動組織，後來並將三月十二日做為婦女會的創建日，在西藏女英雄更松拉、噶林夏由拉、白貢丹卓瑪、達烏倉卓嘎、德莫其美、從康滅滅、噶嘎夏嘎桑、日色央金、從康倉拉等人的領導下，在布達拉宮前的廣場集合，共組織了幾千名西藏婦女。

他們開會後提出的決議有：『中國人返回中國去，西藏的主人是藏人，藏人可以管理自己，中國人沒有統治西藏的權利，如果中國不停止，我們將決心繼續進行戰鬥』等。這些文件後來寄給中國政府，而且在遊行中給了印度在拉薩的辦事處、尼泊爾的辦事處、不丹的領事館、以及喀什米爾人的代表，要求他們進行支援。

當時譚冠三從西藏軍區寫了一封信給達賴喇嘛，信中提到：一、達賴喇嘛如果想外出的話，是不可能的事；二、不可以把達賴喇嘛住在羅布林卡的那一個寢室，以秘密方式告訴西藏軍區；三、有沒有辦法可以用信得過的噶倫以秘密方式帶達賴喇嘛到西藏軍區。

譚冠三的意思是說，他非常關心達賴喇嘛的安全，因此邀請達賴喇嘛到他的軍營去避難。

因為有這封信，大家覺得情況不妙，西藏政府懷疑有大砲對準羅布林卡，大家商討後就有兩個想法，希望達賴不要住在羅布林卡，搬到布達拉宮去，或是離開拉薩到別的地方。當時噶廈把這個想法轉達給達賴喇嘛時，達賴認為他住在羅布林卡和住在布達拉宮是一樣的，且西藏人民有任何困難他必須留在這裡，不能離開，不能不管西藏人民，達賴還一再強調不會有事。

當時譚冠三和達賴喇嘛共有三次相互書信往返，其中譚冠三還向達賴喇嘛與噶倫抗議西藏人不應在拉薩北部通往中國的路上設立障礙物，並且要求立刻搬走。但是，架設這些障礙物的群眾領導人卻拒絕這項要求，因為設置障礙物的目的正在於把中國援兵堵在城外，以保護羅布林卡。如果中國人要把這些搬走，正足以證明他們是想要進攻以逮捕達賴喇嘛。

由於達賴喇嘛在信中以『反動派』稱呼聚眾的藏人，口氣也表現出禮貌與難堪，因此這些信件後來都被中國出版並做了宣傳。達賴喇嘛對此非常震驚，他表示，即使他知道將來這些書信會被引用來批評他，但在當時最緊迫的時刻，他有責任去阻止這場衝突發生，因此才會寫那些信。但是達賴喇嘛說，後來他會離開拉薩，完全是出自他自己的心願，並非為周圍的人所誘拐，因為當時拉薩的每一個西藏人都知道中國正準備炮轟羅布林卡，如果他還留在那裡，他的生命一定處於危險之中。

達賴喇嘛還說，在中國人出版那些信件時，卻沒有說明還有一封阿沛阿旺晉美寫給達賴喇嘛的信。阿沛為當時噶倫之一，他主張與中國談和，被藏人譏為『藏奸』，因此在拉薩事件發生後便一直留在中國西藏軍區內。阿沛在信中除了建議達賴喇嘛努力摧毀反動份子的陰謀外，並說明中國已採取最嚴格的措施，以阻止達賴喇嘛出逃。

阿沛還在信中說：『如果您佛爺帶幾個可信任的衛隊官隊員，留在內牆裡面，固守一點，並告知譚冠三將軍你房屋的準確位置，他們肯定會留意，使這棟房子不要被摧毀。』

因為這些字句所暗中透露的訊息，讓達賴喇嘛相信：『阿沛已經知道中國人企圖摧毀宮殿和人群，同時不願傷害到達賴喇嘛。』

當時宮殿外已經十分緊張，在內牆外盡是聚集的廣大群眾。多數人手上拿著棍棒、鐵鍬、刀子等武器，另外還有些戰士甚至拿著步槍、機槍、以及十四、五門迫擊炮。三月十六日，中國準備摧毀宮殿的消息在群眾間傳了開來，藏民不斷發現，有各種跡象顯示中國軍區正在為安排重砲轟擊宮殿而做測量。另外又有人不斷傳言，說是中國空軍又空運來新的部隊，驚慌的藏人集體情緒十分高漲。

十六日下午四時，揣測成為事實。西藏人聽到從中國軍營發射出來的兩枚迫擊炮彈巨大的聲音，當炮彈落在北門外的沼澤時，發出的巨大聲響讓藏人的驚慌和憤怒達到最高點。

第二天，達賴喇嘛在神諭的指示下出亡，他說他並不怕死，但那一刻，他深覺到留下來並不能為自己的人民做些什麼，現在最好是到別的地方去，為西藏人民保持一個不滅的希望。

在達賴喇嘛離開拉薩後的四十八小時，已是一觸即發的拉薩終於爆發了流血衝突。在這次『拉薩事件』中，藏人對中國軍隊做出最猛烈的反抗，但最後卻在中共『平叛』的強大武力下遭到平復。

藏人俊嘉在當時也曾經參加守衛的工作，俊嘉原來是嘎登寺的喇嘛，在中共準備誘捕達賴喇嘛時，他在羅布林卡擔任守衛，但俊嘉說：

『當時四周都是百姓，政府還發了三、四車的武器給人民。發下來的四十餘挺機關槍中，很多槍都用不成，在戰鬥真正開始時，竟只有四挺機槍可以射出子彈。』

而且，戰鬥在半夜打響，整個夜晚都是轟炸聲，但都是中國軍隊在向藏人狂轟濫炸，藏人雖然手上拿著槍，但除了挨炸，都找不到還擊的目標，中國部隊都是躲得遠遠地轟擊，極為密集的砲彈劈頭蓋臉炸過來時，就只見中國軍隊的砲彈不斷在四周炸開，藏人不停地倒下卻無力還擊，到處都是死屍。

羅布林卡與布達拉宮都受到敵軍猛烈的轟炸，原來守羅布林卡東、南門的百姓想要越過拉薩河逃亡，結果被中國軍隊成群殺死在河中或河邊，屍堆如山。而平時在羅布林卡開會的房間內堆滿了傷兵，我在逃出時看到一名醫生在那裡忙碌

得很，但有什麼用，屋內根本找不到落腳的地方，全是傷兵。眼見裡裡外外，到處是死屍和哀號呼喊的傷員，幸虧自己的護身符好，我一直在如雨點般的砲彈中待到天亮，由於留下來是死，逃也是死，但逃或許還有一線生機，於是便拿了長短四枝槍和四百發子彈逃亡。』

十三歲就去當兵的才仁多傑提到當時拉薩打仗時的情形。那時他廿九歲，擔任機槍手，但機槍根本沒有地方射，只見中國的大砲砲彈像雨點般落下來，但因為雙方軍事力量過於懸殊，西藏人死傷慘重。回憶當時，才仁多傑說話時看著遠方，難過地說：

『我們守在布達拉宮的頂上，有一些大砲架在那裡，只能向大概的方向轟擊，也不知道中國人在什麼地方，到處都有砲彈，頂了一陣子實在頂不住，大家就開始逃，我扛著機槍也跑了，反正在拉薩的經過令人傷悲，簡直是束手無策。

看不到人，打不了仗，砲彈又不斷落下來，中國軍隊一直沒進城，光用大砲轟，西藏人受不了就逃了，大砲轟過來的濃煙把布達拉宮都遮住了。

我想，完了，布達拉宮可能已經被轟癱了，慢慢煙散了，布達拉宮又出現了。又一陣轟，又看不見了，本來很想堅持一陣子，但一下子又堅持不住了，實在無法堅持。中國人的砲彈好像沒有限制，他們又不需要節約，所以只好逃走。』

已經來台灣弘法多年的昂念仁波切當時正是色拉寺一名年輕的喇嘛，他提到中國軍隊先是從遠方發射砲彈，爆炸後土石噴灑，周遭有許多人喪命，剩下的人全在砲彈的威脅下被迫集中逃向羅布林卡。昂念仁波切說：

『這時對面的山上陸續傳來隆隆的槍炮聲，面對這種情勢，原先所懷的雄心壯志和勇氣都已經消失了，又聽說達賴喇嘛已經逃出西藏，於是我和同伴商量逃走。原本想沿著雅魯藏布江逃走的，但江邊已死了很多人，我們大部分的僧人都不會游泳，只好待在林中休息，等到晚上時再回羅布林卡。夏宮裡人已剩不多，進到大殿後才發現已有些僧人聚集該處，大家體悟到生命的威脅已然逼近，有人認為這是業力，逃也沒用，因此決定在大殿持誦『瑪尼』而不走；有人則主張投降。我跟隨大部分人離開大殿，然而外面的砲擊並未暫歇，僅剩下的七、八位同伴，在吃下護法米後，大家開始分頭逃亡。

我決定沿著夏宮的外牆逃走，砲彈在我身後爆炸，有人因正處在砲彈擊落的地點而喪生，有的人因為肢體被炸傷，逃亡一小段路程之後，已無體力再逃。由於身旁的砲彈四處散擊，當時只能拼命地向前跑，根本無法把握下一移是否能夠安然存活。我一路逃到夏宮外戰火稍歇的林中時，只見一位同學抵達，等待許久後並未再見到其他同伴前來，內心悲愴之餘，只好逃回色拉寺。

所幸色拉寺裡只有幾處被砲彈擊中，戰火尚未漫延過來，寺外有幾位寺僧持槍在巡邏防守。我當時提議大家立刻追隨達賴喇嘛逃亡，由於天色已晚，大家決定天明後再走，於是我回到僧房中，才剛坐下喝了一杯奶茶，便聽到陣陣砲轟聲響起，原來中國部隊已將炮火集中轉向色拉寺攻擊。我立刻跑到寺外，緊急得連茶碗都來不及帶走，就僅有身上的僧服，便孑然一身和全寺的僧人倉皇逃離。』

從『拉薩事變』到『拉薩戰役』，中國解放軍在西藏平叛工作從此宣告底定，而藏人的另一場苦難卻從此開始。然而，這個重要日子在歷經四十年的歲月後，卻仍有許多疑點，到現在依然是各說各話。

所有的事件發展都是從達賴喇嘛要到軍區看戲起，但中共的資料說，這是達賴喇嘛主動提出來的要求，因此，中國方面因此認定，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在拉薩發生的全面武裝叛亂，就是精心策畫出來。

中國無論是在『西藏平叛記實』、或是『西藏的主權歸屬與人權狀況白皮書』中，都指出當年藏曆二月七日（西曆三月十六日），是達賴喇嘛主動向西藏軍區副司令員鄧少東等提出：『聽說西藏軍區文工團在內地學習回來後演出的節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請你們安排一下。』鄧少東當即表示歡迎。

但達賴喇嘛卻在他『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自傳中，提到這是中共的一項『邀請』，他完全沒有拒絕的餘地。達賴喇嘛說：『在我通過最終的格西考試（約為三月一日）的所有儀式和籌備期間，我得知有兩名中國官員要見我，他們被領了進來，是兩位宣稱由譚冠三將軍派來的次級官員。他們告訴我，將軍要我去參觀他決定在中國軍營上演的戲劇。我

已聽說這項計畫，並答應去，但我當時確實無法集中在這件事上，因此，我告訴兩名官員，等十天儀式結束，我即安排日期。』

另外，拉薩戰役第一炮究竟由何方先發，到現在也是個爭議性的話題。針對拉薩戰爭的第一發砲彈，其實是西藏政府方面射出的說法，達拉表示完全是中國人在造謠，事實上是中國部隊先向藏人攻擊，藏人才反擊的。

但達賴喇嘛在他的自傳中，卻沒有說明是誰先開炮，只說到，炮擊是在三月廿日凌晨兩點開始，也就是在他離開四十八小時，當時解放軍還未察覺達賴喇嘛的出走。達賴喇嘛說：『他們整天轟炸羅布林卡，然後把大砲轉向拉薩，羅布林卡內外便可見到幾千具屍體。羅布林卡內的一些主建築物實際上被摧毀，所有的其他建築物都受到程度不同的毀壞，只有馬哈迦拉經堂才奇蹟般地倖免於難。』

而且，根據達賴喇嘛的自傳提到，拉薩城裡的房屋遭到毀滅或者縱火，主寺的金頂都穿了洞，旁邊的許多經堂夷為廢墟。布達拉宮西側受到嚴重的毀壞，達賴喇嘛曾經使用過的部分房間被毀壞，被摧毀的還有政府學校、正門、軍隊指揮部以及月收索爾村的房屋。

同時，一塊砲彈甚至落到安放十三世達賴喇嘛的黃金陵靈塔的房子裡，西藏醫學院幾乎完全倒塌，色拉大寺也被同樣徹底的摧毀。

中國國務院在一九九二年出版的『西藏的主權歸屬與人權狀況』中則說，在達賴喇嘛離開拉薩後，叛亂份子調集約七千人，於三月廿日凌晨向黨政軍機關發動全面進攻。人民解放軍在忍無可忍、讓無可讓的情況下，於當日上午十時奉命進行反擊。

台灣『蒙藏委員會』的專題研究『西藏歷次反共抗暴事件發展經過及未來展望』中，也指出是拉薩軍先發動攻擊，中共繼而命令駐藏部隊血腥鎮壓：『達賴喇嘛離開拉薩的第三天，即三月十九日夜，抗暴軍向中共駐拉薩部隊和機關，發動了全面武裝進攻。三月廿日，中共中央命令中共駐西藏部隊施行血腥鎮壓，拉薩市區從上午十時起發生激烈戰爭，戰鬥達到最高潮，抗暴武裝多次向中共『西藏軍區司令部』施行猛烈攻擊，印度駐拉薩領事館曾中流彈。』：

『三月廿一日，巷戰繼續進行，雙方發生肉搏戰，傷亡慘重。西藏兩個大寺色拉寺與哲蚌寺喇嘛及拉薩市民與中共軍對抗。據稱，西藏地方政府發給色拉寺兩百五十枝槍，十多箱子彈。色拉寺喇嘛都脫了袈裟，換上俗裝，參加戰鬥。』、『抗暴隊伍繼續攻擊中共西藏軍區司令部，中共出動飛機助戰』、『三月廿三日，達賴喇嘛的夏宮被炸彈夷為廢墟，哲蚌及色拉兩寺被炸起火』、『中共在拉薩市實行戒嚴』、『三月廿七日，中共清理戰場，焚化遺骸。』

『三月廿八日，中共發佈命令，取消『西藏地方政府名義』，改組所謂『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新華社並發佈『關於西藏叛亂事件的公報』，據稱：『截至廿三日止，已俘獲叛軍四千餘名，繳獲了各種槍八千餘枝，輕重機槍八十一挺，八一迫擊炮廿七門，山炮六門，子彈上萬發。許多叛軍為我包圍並投降。』

此外，在死亡人數方面，三方面提出的數字均不相同；中共方面隻字未提傷亡數字；達賴喇嘛的回憶則說，『沒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拉薩人喪生，但在羅布林卡內外便可看到幾具屍體。』

反倒是『蒙藏委員會』提出的資料，死亡的人數最多：『估計約有兩萬名藏胞被屠殺。』

拉薩戰役第一槍為誰所發已無法查證，死傷人數也不可能有正確的數字出現，但無疑的是，西藏人卻在拉薩戰役中經歷了戰爭殘酷的一面，卓瑪尼瑪回憶拉薩戰役當時的情況說：

『一整天羅布林卡都在打，我們並沒有打，當時砲轟得很厲害，男人在打仗，女人走動四處亂跑，都想找個較堅固的房子蔽身，就這樣來回奔跑中，許多女人和小孩被打死，滿街都是屍體，都是小孩和女人的屍體。

後來有人在大昭寺方向喊要投降了，接著中國人的廣播也響了，說要藏人投降，當時我的馬拴在中國民警單位的窗戶下，因此馬沒有被牽走，我丈夫給我留下的槍，是支好槍，槍上有人獅子徽記，我將槍埋在馬糞堆。

當時跟我在一起的有一個人，三天後，中國人通知他們去開會，開會時要男女分開，我覺得不妙，就讓我的男傭人將長袍放下，繫成女人裝束（藏人男女長袍大致相同，只是男人繫的高，女人繫的低而已）而倖免。隨後聽說要挨家挨戶搜查男人和武器，這樣就無法躲下去了。因此，我對男傭說：『反正是個死，落入他們手中還不如試試能否逃走。』

晚上，我們悄悄給馬上鞍，中國人端著槍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音，不停地來回走動，他們從窗口往外吐的痰都吐到我們身上，令我們一陣心驚膽顫，以為被發現了。我們悄悄給馬備上騾子後，敞開大門，在院內騰上馬後，猛抽一鞭，馬匹便向前一路衝出了大門，只聽到『呸』的叫喊聲，隨後便是一陣槍聲，我們一路往前跑，馬匹養得非常膘肥，根本沒問題，只聽到耳邊不斷有子彈『嗖嗖』的飛過去，但並未射中。

不過十天左右，中國軍隊又來了，天上是飛機，地面是螞蟻般的軍隊，於是又打起來了，天上地下都在打，手忙腳亂，到處亂跑，跑到山上，遇到阿勇嘉丁然傑，他是安衝阿勇部落的人，在另一個山樑上，有阿勇部落的首長和和他的三個兒子，中國人開始通過時，阿勇首長父子和他們的看似約有廿至三十人的部民與中國軍隊打起來，打的非常激烈。和我們在這山樑的阿勇嘉丁然傑也和中國人打響了，我看到許多中國人倒下，我當時打了幾槍，打得不多，只是短暫地參戰。由於阿勇首長父子等打得很頑強，中國人向他們圍去，本來衝我們來的中國人也向他們的方面過去，阿勇首長父子三人與和他在一起的部民全部在這一天戰死了。

中國軍隊依然不斷湧來，我從山上，看到無數的婦女自知逃不掉以後，手牽著小孩的手或是背著小孩、抱著小孩跳湖自殺，看到她們成群結隊地往湖中跳，真是慘極了。』

除此之外，拉薩戰役後，中國對參加運動的西藏婦女進行無限期的監禁和虐待，而且當成很大的罪惡加以無情的打擊，許多西藏婦女都因此失去了生命。

一九五九年的三月十日由此被認為是西藏問題的起源，更是藏人永遠紀念的日子。他們將這一天稱為『抗暴紀念日』，每年的三月十日，流亡在外的藏人都會舉行各種紀念活動，哀悼當時不幸為西藏罹難的人。

第九章 潰敗

慘烈的拉薩戰役讓更多的西藏人興起逃亡的念頭，在中國軍隊翻動一個個屍體，似乎在尋找某一個特定人士時，已有更多的藏人知道，他們最後的希望—達賴喇嘛，已經逃離拉薩了。

但，這並不表示達賴喇嘛已經安全，整個西藏到處都是中國的軍隊，唯一的淨土僅剩下山南地區，以達賴喇嘛的困境來看，肅清山南後必要時才可以後撤，否則達賴喇嘛將永遠走不出來。雖然山南地區有很多四水六嶺的軍隊，但因為達賴喇嘛必須要通過中共在山南唯一的軍事據點—澤塘，而且中國士兵都有著較好的槍枝，達賴喇嘛就在他們的射程之內。

四水六嶺軍得知亦已得知澤塘聚集了一百零五輛車的軍車和彈藥，計畫消滅四水六嶺在山南的根據地，要肅清山南，澤塘成為最關鍵的障礙。

當時美國中央情報局已派阿塔諾布和噶塞洛才二人為電報員，負責與美國方面進行聯繫，他們到此已一年多，為了保密，『四水六嶺』將他們置於一偏僻的村莊內，另派廿人為護衛。他們和美國聯繫時提到在澤塘有五千餘敵軍佔據，因此急需美國提供軍援。

而四水六嶺手中握有美國在一九五八年空投的兩門無後座力砲，另外還空投了五百枝『札西喀仁』（吉祥的長管槍之意，每次可裝五發子彈）炸藥廿箱、手榴彈一百顆，威力比中國人用的木柄手榴彈還要強。為了攻打澤塘，四水六嶺戰士共帶了五箱炸藥、和五十顆手榴彈前往。

中國軍隊也已全部進入地下坑道內，澤塘雖有解放軍的營房，但軍事陣地全在坑道內，在坑道中備有大量的柴草糧食彈藥、煤油等，因此使得澤塘一仗非常難攻。

當時參加圍攻澤塘戰役的洛桑更秋說：

『藏人都在地下挖了洞，共挖了一個多月，後來想，中國人從房子內挖了很多坑道，人就躲在坑道內，我們就想沖到房子裡面。因此就從樹林中砍了很多很長的大樹，一棵樹要十八個人才扛得起來，然後在樹上面釘上木板，做成一個大的梯子，這樣人可以從上面沖，於是有一天，我們組成了敢死隊，三十六個人扛兩個梯子，後面又跟著幾個人拿炸藥包，還有幾個拿槍掩護，悄悄往房子方向走。

中國軍隊在屋頂修了一個很高的瞭望哨，哨兵在藏人快接近房子時發現了他們，照明彈便一個接著一個的過來，機槍也開始掃射，但因角度不對，他們趴在地下沒有造成太大的傷害。

不過壕溝中出中國士兵卻不斷去扔手榴彈，手榴彈一直打轉、冒煙，半天蹦起來才爆炸，開始他們還撿起手榴彈往回扔，但因為手榴彈實在太多，頂不住了只好往回跑，梯子、炸藥包就放在那裡。過了一會兒照明彈、機槍沒有了，我們又悄悄摸過去，想把炸藥包拿回來，因為炸藥是很珍貴的，結果到那兒發現已經被中國人拿走了。』

甘孜章果寺的喇嘛嘉洛也說，在澤塘時，雙方挖洞，有一間多傑家的房子被敵佔據，他們從阿佳拉的房子中向多傑的房子挖洞，敵也往回挖，可以在挖洞時聽到敵挖洞人員休息時唉呀的嘆息聲，同時，大金寺部也從側面同樣向多傑家挖洞，但卻挖錯、挖歪了。但當時他們以為可以了時，便放置炸藥，躲在掩體內等敵人被炸上天空中。一聲響，大地都在顫抖。

嘉洛說，當時他從掩體中探頭看時，只見空中飛舞著被炸上天空的木頭等，以為爆炸成功，心中大喜，即躍出掩體準備沖鋒，不料卻被同伴阻止說：『你看清了，被炸的是我們自己的崗樓。』仔細一看，真是洩氣。

然而，圍攻澤塘的四水六嶺戰士，最後終於利用美國支援的有限炸藥，炸塌中國軍隊所挖的地下坑道，不少中國士兵因此遭到活埋，山南的解放軍才因此得以肅清。當時領兵作戰的然楚阿旺回憶說：

『敵外圍鐵絲網，鐵絲上掛著空罐頭盒，一碰就嘩嘩亂響。而且敵也在鐵絲上掛了手榴彈，一碰就炸，加上不停地向外射擊和扔手榴彈，我從山上觀察，只見我軍敢死隊的一些人已沖通鐵絲網，接近敵據點，但敵手榴彈、機槍的火網、灰塵、濃煙不久將我軍官全部遮住了，整個岡布山一片火光，我暗自想敢死隊完了，但後來還看到受傷的敢死隊中有人不斷撿起敵扔過來的手榴彈回扔，眾人皆贊嘆戰士們的勇敢。

晚上我們悄悄撲向岡布，在鐵絲網上掛上繩索，在遠處一拉就響，一響敵之手榴彈機槍就掃個不停，消耗彈藥而已。澤塘內雖有許多敵軍，而敵軍營中並無住人，全部轉入地下，並在四周挖了壕溝。二十九日夜攻澤塘，也奪得許多武器。在戰鬥中，敵之炮彈似無耗盡時，不斷地在轟擊，每夜發射百餘發。

從藏歷十二月十日開始到三月十三日止，期間拉薩多次謠傳澤塘已被攻破，在這三個月中，由於我們沒有攻城器具，只好一直挖洞，從東、南、西各挖了一洞，澤塘的地質多沙，我們的洞必須挖深以便從敵壕溝下穿過，我們一邊挖一邊立柱，不久可以聽到敵人也在挖洞，由於敵挖土聲愈來愈大，挖土民眾和士兵恐敵反施爆破而建議置炸彈。

當時我軍從敵人手中奪得三、四十箱炸石方的普通炸藥，我們在洞中放了四箱炸藥和美國空投的一些炸藥，然後堵了兩天，並在凌晨點火，還準備了突擊隊，準備在爆炸成功後沖擊。一聲悶響，大地在顫抖，炸藥爆炸了，但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只是將敵往回挖的洞炸塌，在裡面的敵兵應沒有倖免的。

總計在澤塘的三個月間，我方陣亡三十六人，傷一百六十餘人，斃敵數不知，我方號稱殺敵甚眾，其實敵在洞中，殺之頗不易，後據說在澤塘烈士陵有千餘敵兵的墳墓。』

同一時間，拉薩政府方面送來了四、五箱茶葉，並沒有彈藥，說是運送彈藥極困難，在擺渡時若被中國部隊發現，拉薩方面將面臨困境等，因為藏人士兵嗜茶，將茶葉分與眾官兵後，官兵們都很高興。

而重要的是，和茶葉一道還有一封信，信中提到拉薩方面甚為緊張，希望然楚阿旺能到羅布林卡來一趟，但當時然楚阿旺負責全盤指揮山南，難於脫身，因為澤塘是重地，一旦失利影響太大，於是便派人帶了然楚阿旺的信去拉薩，說明山南地區已肅清。

在達賴喇嘛逃亡到澤塘以前，澤塘戰爭已經打了好幾個月，而且，由於四水六嶺士兵在山南澤塘地區進行長期圍困戰，才使得中國部隊在江孜、澤塘、與乃東的部隊自顧不暇，失去堵截的力量。

當時送信的人還未到拉薩，在半途就碰到達賴喇嘛一行人，達賴喇嘛從『四水六嶺護教誌願軍』右翼指揮官然楚阿旺的來信中得知山南已清，已經沒有中共軍隊時非常高興，立刻叫益西才仁牽馬帶路，另外有人立即快馬回澤塘告訴然楚阿旺達賴喇嘛已到的消息。然楚阿旺立即召集眾軍官，告訴他們達賴喇嘛將至，要他們不分晝夜，加強警戒，大家將前去迎接等。

在札希的寺院中，然楚阿旺等八名軍官見到了達賴喇嘛，他們瞋頭、獻哈達，並表示內心無比的高興。達賴喇嘛要他們就坐，說他們的努力已有具體成果，但是拉薩情況卻很危急。達賴喇嘛還問澤塘的中國人不會出來嗎？然楚阿旺表示不會，達賴喇嘛又問到還有什麼要說的？

一時間，四水六嶺軍官不知道要說什麼，但想到達賴喇嘛也要受如此的勞苦，不禁放聲大哭，其他人也一樣哭了起來，達賴喇嘛不停地安慰他們不要哭，並讓他們與帕拉商量路途事宜。出來後仲聶？讓大家先吃飯，然後開會，仲聶叫四水六嶺的軍隊留在原地駐守，之前達賴喇嘛已要然楚阿旺和他一起走，另外只讓六、七騎做好準備出發，隔日天不亮就起程，當時和達賴在一起的除了家人，還有一些官員。

出發後到瓊結南拉時，達賴喇嘛看到然楚阿旺佩戴的美式手榴彈和槍枝，深感興趣，問他使用的方法，然楚阿旺取出手榴彈，示範使用方法，仲聶（秘書）在旁急得叫快拿開。

當時從拉薩逃出來達賴喇嘛及其隨從共約百餘人，包括三大寺堪布，他們每人均領十餘僧，四水六嶺的眾官兵有許多人都拜見了達賴喇嘛，理塘阿塔他們兩個人帶了發報機，隨時把消息傳到美國，現在也在雅拉扎堆拜見了達賴喇嘛，一路隨行，最後達賴喇嘛一行人順利通過山南。

達賴喇嘛離開羅布林卡兩天後，拉薩就打響了，本來四水六嶺部分戰士準備前往支援拉薩戰鬥，但到距離甘登寺不遠的甲瑪囊時，拉薩已經失守，難民像潮水一樣地湧來，只好就地留下掩護人民撤離。

然而，喇嘛和人們像潮水般逃過來，解放軍一方面用大砲轟，一方面掃射沖針。他們只好也繼續向南走，這期間達賴喇嘛私人寺院南嘉札倉的七個僧人，也從那裡逃了過來。這些人腳下全起了泡，因為他們從來沒有走過路，是很享福的僧人，但現在再累也得逃命，七個人騎著馬一起走，僧人因為瞋睡，累得從馬上摔了下來，後來還有一匹馬從懸崖摔下去死了。

雍珠說，在澤塘時他們當中有一個叫丹巴的懂中文的人，他以銅管做成的喇叭，高喊著要對方投降，對方說，拉薩已被佔領，叫他們盡快投降。他們則說我們已佔領了北京等，我們在窮開心、吹牛，沒想到他們講的是實話。

洛桑更秋說，這時又有一個人逃了出來，他們看到人就用中國話問：『餵？』對方也『餵！』的喊，但聽起來好像是藏人，後來改用藏語問，才知道原來是色拉莊的一個僧人，他說其他五個僧人全部都被打死，只有他一個人逃出來、於是我們便領著他走。

這時可以看見澤塘山了，在山頭的高山一直有槍向溝中射擊，誰也搞不清哪一邊是當兵的，哪一邊是自己人。天快亮時才知道山上是中國人，山下是自己人。過一會兒寺院執法的僧人潤珠只披著一件衣服，拿著沒有刀鞘的刀氣喘喘地跑過來，那時全是死傷累累。

飛機也開始在天空出現，飛機後面有機槍，開始向藏人掃射，扔炸彈，後來炸彈沒了便扔石頭，把藏人打得一塌糊塗。逃走時有人引好幾條路，我選擇了最難走的路，飛機仍在上面掃射，一路過去只碰見一個老太婆，並向她要茶喝，後來又走到雍布拉宮，這是西藏第一個國王建立的王宮，碰到在附近山腳坐了噶登寺十幾個僧人，個個肩上扛著英式步槍，正坐在那邊休息。

再過去又看到上千個四水六嶺的士兵逃了過來，其中有一個大鬍子是寺院執事，拿著木棍趕那些人，口中直說：『往回走！』、『往回走！』也就是回去打仗的意思。但大家都說打不住了，到處都是敵人，怎麼打？人潮也堵不住了。

才仁多傑表示，他們走到了達宗靠近不丹的地方，碰到了四水六嶺二百多名士兵，雖然這裡地勢很險峻，但大家信心都來了，覺得可以打一仗，他們也算是藏兵，就歸四水六嶺的人指揮吧。於是大家便開始分配工作。那時藏軍最好的武器是一挺重機槍，旁邊有一個倒水的地方要不斷加水，可能是俄式或英式的重機槍吧！一扣板機，二百五十發子彈就彈出去了，是最好的槍。另外他們還有好幾挺機槍，會用的人很多，他也是機槍手，打的也不錯，把中國人打死了許多。

才仁多傑說，這是他第一次和中國人面對面打仗，覺得中國人好像沒有『死』的概念，前面一批被打掉後，後面一批馬上跟著前面的屍體沖過來，完全不怕死，才幾下子他們就沖到了門口，打了三天，最後實在頂不住就退出來了，但槍他們全帶走，沒有給中國人留下一顆子彈，中國人也因為死傷太多，沒跟過來。

阿旺札西則回憶說：

『我們真是倒霉，如果早先打，可以逃到拉薩，我們是在拉薩戰役完全結束後才開始打的，打敗了就無路可逃了。因敵已散佈在整個西藏，於是只向北邊無人區和邊壩地方逃，許多人則待在家中束手被捕，就如傳單中所說的，彷彿真的無路可逃了。

一九六〇年我們到邊壩，並建立了龐大的兵營，當時邊壩集中了來自各地的大量人馬，共有約兩萬餘。在邊壩，美國空投過來不少人員，也空投了許多武器，但由於我們沒有訓練，集中在一起也不過烏合之眾，當時空投下來的有德格布吉、理塘旺傑、甘孜羅松扎巴等電報員，如果我們知道戰略戰術，如應該是幾百人一股地分散打遊擊，但我們集中在一起，沒有訓練、沒有組織、沒有後勤供應、沒有多少武器彈藥，甚至雖相聚在一起卻沒有相互協調、配合，而是大家各自作戰，...甚至有的在戰、有的在逃....。以這樣的水平卻與中國有訓練、不必節約子彈炮彈、有通訊、有訓練、有組織、有軍事知識和經驗的龐大軍隊正面交鋒，當然是打不贏的。

當時邊壩也空投下不少的武器彈藥，僅子彈就有幾十箱，大約是從藏歷一月十三日到十八日止，給了許多好槍，有五發裝、八發裝、沖針槍等，當時我們也有一個掛名總指揮邊壩喇嘛，並分配了各自的防區，但我們什麼任務也沒有，根據現代軍事，那簡直不是在打仗。

大約從藏歷三、四月開始，敵兵做好準備後從四面八方向我們進攻，那真是非同一般，天上有飛機，地面上的各個山口都冒出無數的中國軍隊，打不勝打、防不勝防，他們互相用電話聯繫，我們除了目力所及而外對其他的狀況一無所知，因為戰爭剛開始，我軍就完全被打散，敵人從各個山口湧來，我軍兵力不知該怎麼分配，也不知該怎麼打。逃吧！逃到那裡都會碰到敵軍，於是只好繳槍投降，我們部每兩個人有一枝槍，戰鬥中大部分戰死了，部分逃到北方。』

雍珠說，他在瓊結受傷住院時，達賴喇嘛已經離開拉薩來到瓊結，當時全體傷兵都去拜見，當時有個人叫益西什麼的，由於不懂軍事常識，站在無後座力砲後面，雙眼已經被無後座力砲的火焰燻成瞎子，滿臉是麻子，達賴喇嘛對他甚為關心反複進行加持，經達賴喇嘛加持後，第二日那人即可看見一些物品，其他人則給了一些護身符。

雍珠說，在他們家鄉，男人走後，中國軍隊佔領他們的村莊，建立人民公社，將全部糧食幾乎一粒不剩地收走後集中在邦布寺的大殿中。人們實在餓壞了，只好去偷，被守糧倉的中國軍隊打死了許多藏人。隨後是整個西藏的饑餓，在他們家鄉更多的人死於饑餓，很多人絕戶了，更多人死在野外的田地上。

而雍珠的妻子則被七、八個人強姦，不分白天晚上，不答應就用鞭子抽打，其他許多女人也遭強姦，由於男人大部分被抓，那些中共的漢、藏官員住在村裡肆意踐踏那些女人，誰也不敢不答應。

有些人吃狗肉，如加桑兄弟倆有四個兒子，在饑餓中等母狗離開後將小狗抱回家吃掉了。另外，邦布西瓦倉的卓瑪才措，為了給兒子留下口糧，而絕食至死，兒子終於活了下來。

德欽人加松說，他們部落也組成了護教誌願軍，由雍巴央比丘、熱振僧噶等六人為首，各領幾十個人在山上抗擊中國人，各部隊通稱為護教軍。但到了後期，已經無心應戰了，加松說：

『後來敵軍像螞蟻般湧來，我們射砲後開始逃，逃到某處，見到恰城噶松求增在堵潰兵，不許我們逃，但那時候是打罵由你，反正要逃命，當時我們已無鬥誌，在被堵後，趁其不注意開始三三兩兩地逃走。

在指納山上，只見橫屍遍野，到處是僧人和幾十個俗人的屍體，鮮血和袈裟看上去一片紅，還散著許多其他物品，有一老僧未死，卻被中國人挖去了雙眼，在地上到處亂爬，身上到處是他自己與從地上沾上的鮮血，像個血人在那裡悲慘地來回爬行、喊叫。

我們向洛札方向走，首先看到中國人的糞便，還有幾個中國人的背包也扔在那裡，再過去時，見雪地中有敵軍黑壓壓地一片，我們繞過去到措納以東後山，見一牧圈中有百餘名噶登寺僧在那裡休息烤火，我們也就地休息。突然見一騎白馬者叫：『快走。』我們乃起身就跑，敵已至跟前，我們一出羊圈就遭到猛烈攻擊，但我們先走一步得以逃脫，噶登寺僧沒有槍，沒有馬，又被包圍，無力反抗，只好隨中國人射殺了。他們大多死在那裡，我們逃出很遠後還聽得到中國人射殺那些僧侶密集的槍聲。

我們在雪中患上雪盲，到處都是敵人，我們無法回家鄉，於是又回到竹古塘，這時敵汽車已追到了。我們一路向北奔逃，途中即使敵軍只有一條狗來追，我們還是會頭都不回地跑，真是驚弓之鳥。又繼續逃，到羊卓雍措湖邊，見幾百名藏人陳屍湖水邊和附近的草灘上，死者主要都是僧人，此時已看不見敵軍，死難者的鮮血將湖邊的水也因此變紅了。

那裡的藏人告訴我們，有一個西藏政府的貴族是中國主要的暗探，我們就等他前來，不久那個貴族果然來了，我們說我們是四水六嶺的人，他還偽裝嘆息著說：『我們把事情給搞砸了，達賴喇嘛已經去了印度，這可怎麼辦呀？』我們起身將他逮捕，搜查見其馬褡子內裝的全是勸降一類的信，這名貴族姦細就被我們處死了。

後來我們到了不丹邊界，時為藏歷五月，這時，大家已安心，但看到每個人身上都爬滿了蝨子。不久遇到不丹兵，他們一見我們望風就逃，我們當中有人拿著美國空投下來的美式步槍，便把這槍送給不丹國王為禮物，不丹國王才給了我們『沿途不準騷擾』的命令，說這些人是達賴喇嘛的警衛兵，還以很高的代價買了我們的螺馬等，派人一直把我們送到了印度。到印度後就去岡拖當苦力，開始當難民了。』

在逃亡的路上，達賴喇嘛聽到他的政府被中國宣告解散，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立刻成立一個臨時政府，由於山南的隆孜縣還是藏軍的控製區，便在此成立臨時政府。達賴喇嘛在他發表的演說中，談到由於四水六嶺的努力，才使大家到了這裡，從現在開始，西藏將建立民主的新政府，並宣布，西藏政府在山南儲存的糧食供官兵們為軍糧，並賜安珠貢保札西為拉薩的封爵，而且自己會留在山南某地。法會後，阿塔和羅才要求表演射砲，並且電告美國達賴喇嘛已到的消息。

後來他們在隆孜縣舉行盛大法會，以慶祝新創建的臨時政府，達賴喇嘛和許多喇嘛們一起誦經祈禱，所有噶廈的噶倫也都聚集在一起，在很短的時間裡，人們暫時忘掉已經到臨的苦難。

但是，很快地，中國軍隊準備移動的消息又不斷傳來，本來的計畫必須改變，噶倫們都要求達賴喇嘛立刻退到印度。

也是四水六嶺成員的恰城久美說，一九五九年他陪達賴喇嘛的經師赤江仁波切在印度拉莫等了兩天，主要是等印度方面的同意入境。兩天後達賴喇嘛先走，第二天兩位經師也走了。因為那裡的路非常險峻，他就陪著兩位經師走到邊境，還和印度士兵住了一天。

過邊境時達賴喇嘛已經在那裡等，兩位經師和達賴喇嘛見面後談了三個多小時，然後達賴喇嘛繼續出發，這時印度士兵排成兩列，列隊向達賴喇嘛致敬，藏人見印度士兵對自己的領袖這麼尊敬，滿眼都是眼淚。

他們在邊境見了達賴喇嘛，達賴為他們加持後要他們聽兩位經師的話，恰城久美和另外十二人一起見經師時，經師告訴他們：『達賴喇嘛和我們逃到印度，絕對不是我們自尋出路、不管別人，我們出去後絕對不會安安靜靜地待在那裡，我們一定會多方向國際求援，向世界人民求助，所以你們留在國內的要團結，要設法保住性命，人民逃命時你們一定要保護他們，能逃來多少就算多少，逃來愈多愈好。你們要打敗中國人是非常困難的，到了一定程度你們也一定要逃出來。』

恰城久美說，在這之前他們已談到要回西藏繼續打仗，經師並沒有叫他們不要回去，但那時人們都開始往印度跑，經師只說：『你們要回去是非常勇敢的表現，但要注意保住生命是很重要的。』

第二天就要進入印度境內了，四水六嶺的士兵在邊境時請達賴喇嘛為他們加持，他們說自己到印度毫無用處，願意再返回西藏作戰。達賴喇嘛看到這些人如此有勇氣傷心難忍，因為他知道這些人可能會死去。

在達賴喇嘛前往印度前，達賴喇嘛的警衛、札西兵營一百多名藏軍、和四水六嶺廿四人一起去見達賴喇嘛，當時四水六嶺的人向達賴獻哈達與要求做法事等，然後向達賴喇嘛表示要回西藏去戰鬥，不去印度。他們說：『我們不去印度了，我們要回西藏戰鬥。』

達賴喇嘛給了警衛和藏軍一點錢和護身符，那些士兵和警衛當天就翻山回西藏了，另外恰城人廿四人中也挑了十二人，一起到邊境去了。

達賴喇嘛臨走的那一天，大家眼睛都哭得很紅，視線都看不清楚，有一個肩上有兩顆星星的印度軍官對恰城久美說：『你回西藏幹什麼？西藏國王都已經離開了，你回去等於找死嘛！你都已經到印度了，還是留下來吧！留戀那個槍做什麼（因為進入印度必須要交槍）？槍已經沒有用了。』

恰城久美回答說：『我們不是留戀槍，要回去是為了保護我們自己的老百姓，到印度去我們就沒用了，西藏才是我們自己的地方。』印度軍官聽了他的話也掉眼淚，握住久美的手不能說話。

第二天恰城久美等人就回去了，回程路上一開始還好走，但後來就非常困難了，路上擠滿了逃難的百姓，每當戰士在戰場上正準備打時，後面就又湧來了一大堆老百姓，士兵不得已只能往後退，後退到一個地方，而側面的敵人又湧過來，不得已又再後退，最後只好逃跑，就逃到印度來了。

那時美國電台來電要藏人堅守陣地，還說明美國會空投武器支援。但是，當所有戰士得知達賴喇嘛已經離開西藏時，士氣幾乎同時崩潰，四水六嶺等於是直接逃到印度。達賴喇嘛在面對這個問題時淡淡地說，當時藏人並沒有任何希望可以趕走中國人，現實是西藏人除了逃跑以外沒有別選擇，『四水六嶺』也是迫於無奈，而且逃跑還可以避免很多人的死傷。

但達賴喇嘛很遺憾地說，有些四水六嶺的人有馬可騎，他們將拉薩步行逃亡來的人民和三大寺的僧侶阻截說：『不許跑，要打仗。』本來應讓步行僧侶與人民先行，有槍有馬的留在後面，但在中國人來的時候他們卻騎馬先跑了，害得當時人民落在後面，這種事出現了一些，是相當令人傷心的，但在當時也無可奈何。

這些往事令西藏人不堪回首，洛桑格列還記得他們護送達賴喇嘛、並讓達賴喇嘛越過邊境進入印度後，他們又回到西藏。但那時拉薩已經失守了，到處是潰逃的人群，人像天蓋地般逃過來，已經沒有回去的地方了。所以四水六嶺就跟著人群向後退，軍心動搖，退到了印度。

昌都也有一個倉庫是四水六嶺守衛的，當時僧侶都在逃，人人把馬放在一個村莊裡，第一道戰線一退後，大家就往有馬的村子跑，然後騎上馬就奔逃，敗一次就控制不住了。

洛桑格列說，四水六嶺軍確實曾經阻擋逃出來的人，希望他們留下來打仗，但那些難民回答說：『我們不是來打仗的，我們打不動了，我們只願意逃跑。』他們一心想逃跑，但四水六嶺則要他們把槍留下，因為有人不願意，結果四水六嶺開槍，也因此造成一些不幸的傷亡。然楚阿旺說，從這以後就是『留槍放人』政策，凡是逃出來的人都把槍留下來，人再走。

洛桑提到，中國軍隊真正湧來時，是從四面八方到處都來，更糟糕的是中國部隊派來很多的間諜，到處散佈謠言，軍心就不穩，只好跑了。

另外洛桑諾布則說，他們退出戰役後就開始跑，很多逃跑的人說到處都是散兵，山上天天在打仗，槍聲不斷，但卻不知道四水六嶺的人在哪裡。山很險峻，都是高山，山溝非常陡，兩邊是懸崖，山坡上有很多的寺院、村莊，他們是騎兵就在山溝中順著水走，山上看不清楚，一直到天完全黑後，才被人看到向他們開槍，但也是盲目打槍，後來男的、女的、滿山滿谷成千上萬的人。

然楚阿旺也口氣迷惘地說，當時一直有人在說這個山頭失守了、某某山頭也失守了，這樣一聽大家想，既然兩邊山頭都失守了，那我還在這裡打什麼？於是趕快跑，大家都跟著逃，後來證實那些應是共產黨放出的謠言，到以後已經沒有進攻的心了。

然楚阿旺說，解放軍在拉薩大肆轟炸，坦克橫沖直撞，但是不知達賴喇嘛已離開，在羅布林卡的死屍中翻看僧裝屍體，三大寺、上下密院、市民等逃難的人民紛紛湧向山南，幸好各渡口都有人守衛，使解放軍無法立即截斷人民的逃路。問逃跑的人，竟沒有幾個人願意留下來打仗。

大砲轟擊和坦克使藏人喪膽落魄，藏人對這兩樣東西完全是束手無策。因此都說：『怎麼打呀？怎麼對抗啊？只見天上有無數炮彈落下，地上只有鐵殼子坦克在轉，只見死人，不見敵人，這仗怎麼打？』

曾任昌都白日縣縣長的洛尼說到：

『我當時是僧人，在拉薩，當安珠組織『四水六嶺』，秘密招收軍隊時，各部的頭面人物到安珠家的經堂中起誓共赴國難，但真正要出兵時，卻有許多推辭，這個說我的妻子病了，那個說有一些買賣關係未釐清等。....

不久，達賴喇嘛從拉薩逃出，四水六嶺立即在各個交通要道佈置兵力，掩護達賴喇嘛及隨行人員出逃，在瓊結日吾德欽宗，達賴喇嘛接見我們各部的長官，給我們講話、給護身符等，我等因見領袖被迫逃亡，國破家散，只是一味地流淚，竟說不出一句話，達賴喇嘛說：『不要悲傷，我們還是會見面的，我不會有事，我這一走，中國人會尾隨前來，要小心。』

達賴喇嘛出發後，我們挑了一百名最精壯的官兵護送到邦錦，再過去就是印度的地方了。我部官兵旋即返回準備投入戰鬥。我當時駐防在一個渡口，沒幾天，敵軍趕至，當時有阿爾達哇部的一群官兵也與我們一齊抗擊，抵抗了半天終究擋不住，乘著戰鬥間隙，我們橫渡雅魯藏布江，並一路退到拉嘉日地方。隨後又集中在隆孜縣，大家爭吵不休，一部分說要拼個你死我活，魚死網破，一部分認為沒有意義。

總之，最後是一路奔逃，沒有人回去迎擊敵軍，在逃跑路上，翻越馬郭拉山時，死了許多的人、馬，因那兒只有一條路，互相踐踏，特別是馬、騾等一倒下，人們也不等其斷氣，便踐踏著走過。

在途中，有安珠貢保札西派來的使者阻止我們逃跑，要青壯者留下來作戰，但此時兵敗如山倒，已無人服眾。當時並沒有好好地打，連『敗』字也無從談起。本來是可以好好打一仗的，但達賴喇嘛一走，人們便全無鬥誌，認為達賴喇嘛出走，可能戰爭沒有打贏的希望，因此還未交手，心中便已經敗了。』

然楚阿旺指出，達賴喇嘛通過山南不久，中國軍隊約有五百餘人攻來，藏方守軍卻一路敗陣，圍攻澤塘的藏軍軍官開會後決定撤軍，後來總部遷到雅隆頗章，他們到了該處時，見此處匯集許多從各處退來的軍隊，叫軍官們下來與敵交戰，卻無人回應。

當時因總部又遷，藏軍於是且戰且退，官兵們已無心作戰，軍心動搖，軍隊已開始失序，許多人不聽從指揮，有的人在後逃，有的則待在陣地上準備戰鬥，到竹古塘時，有信使奔來說安珠已到隆孜縣，然楚阿旺立即率十餘騎前往，留大部在竹古塘，見到安珠，兩人悲喜交加，涕泗縱橫不能言語。

安珠部四百餘人又繼續佈置陣地，並派然楚阿旺等人增援措納縣，不久措納縣又失守，守軍退到印度境內的門達旺，他們從山上見到措納已被佔，只好返回，當時根益西和許多士兵患有雪盲癥，在瑪果拉山腳碰到安珠，牧人在積雪中為他們開路，於是四水六嶺才過了瑪果拉山，到了印度邊境。但印度不讓他們入境，只好在邊界多待了七天，期間給印兵送禮，包括鞍叉備齊的馬一匹。後來印度邊防軍獲總部指令，才允許他們入境。

漢人洛桑札西記得：

『當西藏人為局勢所逼，不得已退出國境時，藏人不分軍民，每個人都紅著眼圈，銜恨出國，其心理之難受非身歷其境不能體會。解除武裝後，印度負責收容難民當局，對各族難民，分別安置。藏人退到印度後，首先到達門達旺，按國際法規定，把槍械全部交給印度政府。

交槍以後，印度政府分兩批處理。一批是藏民，送到民索馬日，我們漢、回共有三十二人，其中十二人是回民。在門達旺住了十多天後，台灣的馬紀遠派人把十二名回民接走了。我們二十幾個漢民仍住在門達旺，住了一個多月後，才被送到砌地拉。』

在這場戰爭中，藏人因極度缺乏通訊設備，大部分的通訊都是靠人騎馬傳信，旺青然丁在戰爭中主要負責送信，他是馬不停蹄的通訊兵，沒想到，最後卻送信送到了印度。

旺青然丁被交待一定要克服困難，到達目的地，辦好、辦妥事情等，並交給他許多的信件，這些信有很多是要送給達賴喇嘛和安珠貢保札西的，瓊波嘎日本也派了四個人同行，邊壩喇嘛給他們護身符，叫他們對此事保密，不要給任何人講。

他們兼程趕到拉日宗，但拉日宗的宗本（縣長）不太理睬他們，叫他們趕緊走，說中國人快來了，他們會給他添麻煩，於是旺青然丁等人連夜走了幾天，到處是人去樓空。他們一直往西南方向走，途中一路碰到從拉薩逃來的僧侶一群一群地湧來，那人潮也說不出有多少，反正漫山遍野都是，他們對我們說：『達賴喇嘛已經去了印度，拉薩已經沒盼頭了，你們還去那裡？』

送信的旺青然丁口頭應付著，但仍往拉薩方向走，但再也不敢走正道，而是一直順著山梁走，到了烏噶增昔地方，從山上看到縣城已經被中國人佔領，四周全是被繳獲的牛馬群。他們再到一山岡上的小寺院，有個老僧在那裡破口大罵，說中國人已經對他們講了，見到反動派或抓或殺，不許藏匿，你們來是害我們，快走等難聽的話。這時，另有一僧乘老僧不注意時，悄悄示意我們快離開，等夜半再悄悄來。

半夜，旺青等前去時，那個年輕的僧人給了他們許多的食物，總之，在途中藏人都會給你食物，同時又叫你快離開，都唯恐連累了他們，他們都說達賴喇嘛已經平安到達印度了，你們還去那裡？快走，讓中國人知道了，你我都完蛋了。

他們一路走，但也見到一些人不願逃了，說如此逃還不如一決死戰，戰死算了。旺青一行人在敵人槍炮轟擊下一同向北奔逃，然後專門走山頭，恐中了敵人埋伏，在途中遇到敵人的偵察分隊，本來想要擊殺他們，後來敵人卻逃走了。

他們又趕到一個村子，正好村裡的人正與中國人激烈交戰，村子已經被完全包圍，敵人非常多，旺青說，沒有人幫得了忙，而且當時藏人也沒有協同作戰的思想，只是各顧各的，現在想來當然是錯誤的，但那個村子是沒救了。從此，他們一直走荒無人煙的北方原野，避開有人的地方，只有一次遇到敵軍，隨即奔逃，大部分人連馬鞍都未及備上，是騎著光馬背逃來的。

他們除了人馬槍外，其他東西全部都損失了，旺青等人後來是從南木措以北地方逃到尼泊爾，再從尼泊爾逃到印度，終於見到安珠貢保札西，將信交給他並提出要去見達賴喇嘛。

安珠貢保札西告訴旺青，沒必要了，信給他就行了，並連聲嘆息。

第十章 木斯塘的遊擊歲月

達賴喇嘛出亡後，西藏內部的遊擊抗暴行動漸行瓦解，共有幾近十萬藏人跟著達賴喇嘛逃到印度與尼泊爾，失敗已是註定的命運。但是，西藏人民不甘心，他們隨時在等待另一個反撲的機會。

印度這個鄰國收容了大部分的藏人，雖然印度與西藏雖然兩相鄰，但卻是地形氣候截然不同的兩個地方。西藏是寒冷的高原地帶，印度卻是酷熱的平原，藏人從西藏寒帶退到印度熱帶後，有不少人受不了熱而死亡，所以第一件事首先就是要避熱。基於這樣的考慮，印度政府於是安排很多藏人去氣候較涼爽的錫金修路，當時有很多流亡藏人都希望到錫金修路，除了較易適應錫金的氣候外，更因為那兒距離家鄉較近，藏人心裡老是想著，說不定那一天可以從這裡回西藏。

但因為修路非常累，沒出路，大家就想不如去打仗，這時有些年輕人表達如果有機會願意接受軍事訓練再回去打仗。一直致力抗暴運動的安珠貢保札西和嘉樂頓珠也認為就這樣修路下去，實在太可惜，因為退出來的都是年輕人，又很勇敢，他們決定在尼泊爾繼續建立武裝組織，並計畫把這些年輕藏人送到尼泊爾北方的木斯塘去打遊擊，但一定要有人支持才辦得到。

嘉樂說，當時西藏人一無所有，只有勇氣。而美方有錢、又反共，所以彼此之間是相互需要的。美國可以提供武器，西藏方面出人，但如果西藏成不了事，就很難得到美方的援助。

而在嘉樂頓珠開始積極與美國方面聯繫時，達賴喇嘛並不知情。達賴喇嘛說，有關美國援助一事，他並不清楚，直到一九五八年時才聽到與美國有聯繫的說法，但並不了解詳細的情況。一九五九年他從拉薩出來時，才知道隨行在身邊的兩人是曾在美國受訓的戰士，他們有一門砲，到了隆孜縣時，他們還表演發射大砲，那次他是第一次親眼看見，當時也聽說他們和美國有電報聯繫。

但達賴喇嘛關心的不是軍事，他認為既然能從美國那兒得到軍事援助，能不能將這些經費轉為蓋學校、蓋個藏人定居點等。一九六〇年，『四水六嶺』獲得達賴喇嘛接見，當時達賴喇嘛曾經與四水六嶺總司令安珠貢保札西密談，達賴喇嘛的目的是強調人民需要安置，學習一些工作技能，因此希望能將原要運用在軍事上的錢，轉到安置人民、辦學校等，而且也提到要以西藏政府的名義要求美國提供援助等。

但美國一口拒絕了，美國說他只支持遊擊隊的計畫，和西藏政府沒有關係，他們只願意和『四水六嶺』接觸。最後藏人商量說，因為美方表示不願和西藏政府接觸，但這些錢藏人又非常需要，所以只好跳過政府層級，直接和『四水六嶺』接觸。

退到印度的『四水六嶺』主要成員包括安珠貢保札西、南嘉多傑、仁欽才仁、倫傑札、安多津巴嘉措、恰城格桑瓊增、根益西等共七人成立了決策核心，並一致接受嘉樂頓珠的領導。大家開會後決定安排老人去老人院、僧人去寺院，另外嘉樂頓珠還要他們挑一些年輕人，最後把二十五歲左右的都留下來。但曾經警告這些年輕人說，這是秘密，不能到會議上亂說。

人人都在追問安珠支援何時會來，有一回安珠被問得不耐煩了，要大家不要再追問了，他表示美國的支援肯定有，但他們只給遊擊隊，其他如建立醫院的就不給了。

當時美國中央情報局已經給他們具體承諾，決定支持他們在尼泊爾境內建立兵營，地點並且選定在尼泊爾北方靠近西藏的木斯塘。木斯塘之所以被選為武裝遊擊根據地，首先，是因為這裡是使用藏語的地區；其次，這裡接近交通線；第三，在木斯塘北方中共部隊的據點很少，雖是必經之路，但也比較容易躲避。而且，以前在北方做買賣的人，都說木斯塘是個好地方，進可攻、退可守。當時負責與美方接觸的拉莫才仁回憶說：

『所以，我們就和美國C I A連繫，要求美方提供經濟、武器的支援，C I A的回音是原則同意支助，但計畫中如多少人在那裡、怎麼派人都要有詳細的計畫，安珠於是提出一個『木斯塘計畫』。安珠說他從前去過這個地方，因為這裡三面靠西藏，都是牧民，山邊有野獸，如果沒有食物還可以打獵，也可向牧民要奶喝，所以木斯塘最好。

一九六〇年三月間，雙方在加爾各答談，C I A派來的人先在加爾各答以私人身分找房子住，但他們不常在房子裡。我和安珠二人去談時，都是先決定時間，然後在車上談，平時他們在街上都會拿個報紙做掩護。

在車上時，我把計畫書交給C I A，計畫書上寫著：『遊擊基地共分四個部分；六個連隊堵西方，六個堵東方，六個堵北方，三個連隊在木斯塘。』原來計畫中需要的遊擊部隊人數高達五、六千人，主要是從錫金派人，然後再是從達拉豪斯、千巴、西姆拉（靠近尼泊爾邊境的印度城市，當時也徵召不少流亡藏人在當地修路）等地方找人。C I A也覺得木斯塘很好，但認為遊擊隊員人數只能有二千一百人。

於是我們便決定募集二千一百名遊擊隊，但當時四水六嶺有些人年紀大了，於是我們也向美國要求為這些老人提供養老資源，因為這些人已幹不了活，修不了路。最後美國方面同意給三十二人工資，但要求絕對保密，只有我們核心的七個人知道。

有一次我們七個人開會，決定派廿六個人到美國去進行受訓，我們認為要派腦子比較靈活、會講話的人去，另外還要派一些人去學習爆破，這些人要從印度西里古里到巴基斯坦，然後再分批前往美國受訓。

計畫定好後，『四水六嶺』廿七個部共派廿七個人、電報人員四人先培訓，這些人就被送到美國受訓。一九六零年四月，決定先派一百人去美國，雙方言明一切行動機密，如果消息走露，救援就停止。因為這個工作牽涉到印度、尼泊爾兩個國家，又是武裝組織，在國際法上並不合法，所以一定要保持機密。

前後加起來，當時共派了三百多人從西里古里經東巴基斯坦到美國訓練，當時印度和巴基斯坦不和，但巴基斯坦和美國關係好，因此藏人必須先通過巴基斯坦，然後在巴基斯坦坐飛機再到美國去。那時根益西他們在大吉嶺的一個叫『SAFEHOUSE』的地方開了七天的會，連印度也不曉得，因為印度當時才剛剛獨立，根本注意不到藏人這部分來。』

原來的計畫是，指揮總部設在印度。第一批先去四百人，四百人到達木斯塘後，美方會派人和武器來領導，但因四百人人數太多，容易引人注意，必須二百、二百分兩批走，特別要防止不要讓印度人知道。

七人小組決定先派遣根益西到木斯塘去探路，根益西和三個電報員先行出發到木斯塘時，電報員在山中立刻和美方聯繫，美方人員對於已經有人到達現場表示讚許，原是喇嘛身分的根益西後來成為木斯塘的軍事總指揮。

一開始和美方約定時，本來說先來二百人，但當第一批人選定時，不料這些被選定的人在臨走前，有些人向他們的父母寫信說：『我們現在要回到西藏打遊擊。』父母知道後又和親戚朋友講，結果消息走漏，以致有許多人跟著湧到木斯塘來，木斯塘計畫成了公開的秘密，其他人都知道他們要去木斯塘打仗，結果藏人全來了，一下子就湧來了二千三百人。

恰城久美說，大約是在一九六〇年藏曆四月一日，突然傳來消息說是安珠貢保札西的命令，安珠、嘉樂頓珠、拉莫才仁傑等共同商議決定，藏人不甘心，要重新再打一次仗。但因為在修路的藏人報名的太多人了，沒辦法只好抽籤，被抽中的就先走，恰城久美沒被抽中，就跟著排梯次。

也有些人沒被抽中卻不願等了，他們說：『為什麼我們就沒有打仗的機會？共產黨是他們的敵人也是我們的敵人，他們能打仗我們也能打仗，他們能獻身我們也能獻身，為什麼我們就沒這個機會？』

於是很多人就開始往前走，印度、尼泊爾士兵就到處擋，路口被堵他們就爬山，橋被圍他們就涉水、游泳，因為都是徒手、和平的兵，印度和尼泊爾士兵也無法開槍，就這樣印度大吉嶺一下子湧進了千餘人。恰城久美本來是第三批的，但一直沒人通知，最後也跟著人群走了。

當時因為突然有二千多人湧到尼泊爾木斯塘，引起印度議會發覺竟被蒙在鼓裡的議論，印度方面並且通知了尼泊爾政府。尼泊爾政府問西藏人，是不是覺得印度太熱所以跑到他們這裡來？木斯塘的遊擊隊員則回答說，他們是來找工作的；另外的則說是來尼泊爾的佛教聖地朝聖。因此當時尼泊爾政府並不知道西藏人到木斯塘是來建立兵營的。

當時的指揮總部是在大吉嶺，有辦公室，為了解決這些木斯塘士兵的入境問題，指揮總部便派嘉日尼瑪到尼泊爾邊境，當時有五百人等在邊境，嘉日的任務便是設法讓他們入境。於是嘉日哭著向尼泊爾邊境守軍說這些人都是去拜佛的，雖沒有錢，但都是好人，他邊說邊哭著，沒想到用這個方法竟讓大家都入境了。其他一千多人也是以類似方法偷渡入境，多是以朝聖為理由，從公路坐車到加德滿都，外表看不出有什麼不同。

尼泊爾政府不知道流亡藏人是要到木斯塘建立兵營，印度政府也被蒙在鼓裡。當印度在一九六〇年六月獲悉此事時，西藏人已到尼泊爾了。

恰城久美說，當時正是最沒有飯吃、最苦的時候，本來美國只說要給四百人的飯，但一下子來了二千多人，吃的東西一直不夠，訓練項目又非常多。但大家的心情都非常好，雖然是既暈又累，然而大家都覺得此刻有機會打仗真是太好了，於是不分你我，如果我有一條毛毯而你沒有時，毛毯就撕開給兩個人用，一人一半，人們是團結又勇猛，士氣極端的高昂。

這些藏人來到木斯塘後什麼都沒有，總指揮根益西因為擔心藏人會酗酒、鬥毆，又為了保密不能住在村莊，所以都把他們安置在山上。但山上什麼都沒有，反正那裡凹一點，有些容身的地方就塞一些人，再加上木斯塘地勢高，氣候寒冷，什麼吃的都沒有，食物極端缺乏，大家苦不堪言。

因為兵營是秘密設的，如果去買大量的糧食會被發現，而且買後只能在夜晚搬運也是非常困難，所以往往只能用當地的山羊一點一點的拖。

這麼多人沒得吃，每天早上只有一碗湯，湯非常稀，碗一沖不必洗就乾乾淨淨，因為沒有吃的，大家就把好的衣服都換成食物，兵營一週只給士兵二點五公斤的麵，有時偶而十一個人給一條牛腿，別的什麼都沒有，很多人都生病了，也有些人

離開軍隊走了，還有一些人因為飢餓，出去找食物時在雪中凍死了，但當時這群飢餓的藏人並沒有指望美國給吃的，只希望美方給武器就好了，藏人拿了武器就好好的去殺一場，死了就算了，很多人都是這種心情。

由於美方非常生氣藏人走漏消息，另外又認為藏人欺騙他們，他們不相信木斯塘已來了二千多人，因此原先承諾要支援的武器遲遲未來，藏人沒有辦法，只好砍木頭作木槍開始訓練，後來木斯塘把訓練的照片送去，美方才恍然大悟。

木斯塘方面表示如果美方再不支援，他們只有搶劫一途，到時還要在報紙上發表。更何況，現在兩千人已經在那裡，應該可以有所作為。在一九六一年三月以後，木斯塘總指揮根益西先和美國聯絡，然後美國才再將武器空投到西藏。

總指揮根益西回憶說，當時美方極不高興地指責藏人洩露秘密，因為建立軍營的事被太多人知道了，還說藏人不誠實、成不了事，那麼點秘密都守不住，印度方面已經知情。美方並且通知根益西，美國決定不給支援了。

美方話一說完就沒消息了，已到木斯塘的藏人也不知該怎麼辦，就和印度總部聯絡，但因為實在太苦了，已有一百多人受不了又逃了回去。總部設法向美方說了很多好聽的話，最後總算從美國派了十二個受訓人員前來支援，其中四個是空投、八個是步行來的，等到第一批援助來時，大家已在木斯塘一年多了。根益西說：

『沒有援助時苦不堪言，得到援助後更難。美方的命令一個接一個，要他們打又要他們進西藏，天天在那裡催，西藏人沒有辦法，只好聽他們的話。

但木斯塘士兵也不知道那裡可以打仗，美國又一直要他們派人去，有一回派去的人摧毀了中共的軍隊，馬上又退回來，美國問車號，藏人說不知道，也沒有把中國人帶回來，美方話又說得很難聽。

在北方只能步行，每一個人都背了很多東西，行李、幾百發子彈、步槍、又只能帶七天糧食，帶多了就走不動，其他都要在當地尋覓，沒有一匹馬，要背著走一、二個月，但這些向美國根本說不清，美國當然不相信。

我們於是向美方說明，到西藏後要深入到很遠的地方才能行動，即使有俘虜又怎麼背得回來，美方應該要再多給一點錢，好讓藏人去買馬。後來美國於是又給了三千盧比，因為這時從西藏逃過來的人比較多了，馬價也比較便宜，一匹上好的馬只要三百元左右，東湊西湊齊了四百匹馬，但堪為戰馬的只有廿五匹，而且沒有馬鞍子，就用布佈置了一些馬褡子。

這廿五個人騎馬深入藏區，他們去了很遠的地方，結果剛好碰上敵人的兩輛大車，襲擊並打死了中共男女共十六人，得到敵人的肩章、車牌、帽子，還有一駄半的文件，文件中有很多是軍官的日常記錄。報到美國後美國非常高興，總部也很高興，說是美國遊擊隊在那裡已幹了十三年多，從沒有得到過如此重要的情報，都非常高興。

不料後來又發生了一些意外，當時有一個美國新聞記者，把西藏人在木斯塘的活動全都拍攝了下來，並且在美國報導，這件事又觸怒美方，指責藏人洩密，不但要求嚴懲那些士兵，又決定中斷支援。但我不願意懲罰士兵，我很生氣地說，這些人奮不顧身，潛回西藏去摧毀了幾輛汽車，回來時還有人受傷，美國人說要切斷就切斷，既然不給就算了。

美國整整斷援七個月，後來因為有拉莫才仁幫忙，支援才又恢復。』

隨後根益西曾和兩個電報人員去見美方人員，雙方做了溝通，這時美方的態度轉變，還送給根益西一個手錶、一個收音機，又承諾將來會給大力援助，又問根益西還需要什麼。於是根益西提了一份包括馬鞍子、食物、帳篷等的物質清單。

根益西提到，又有一次木斯塘共有三十五個人要到西藏去拿援助，說是有四個連的裝備被空投在那裡。但後來得知裝備中只有八袋外國麵條，美國人要西藏人帶這些東西到西藏內去打仗。美國人主要是要木斯塘遊擊隊到西藏去打仗，按道理不應回木斯塘，但因北方全是荒野，十幾天內根本見不到人影，只有八袋糧食根本不夠，即使過去了回來也是沒得吃的，所以木斯塘士兵又退回木斯塘。

美方知道後，回電全是罵人的話。

當時參與建立木斯塘武裝遊擊基地的核心成員拉莫才仁說，木斯塘主要工作在於蒐集情報，訓練的時間很短，從一九六一年三月美國第一次空投後，同年的十一月就開始打遊擊了，訓練時間等於只有三月到十一月短短八個月的時間而已。

訓練項目先要教導藏人如何使用武器，當時武器有步槍、衝鋒槍、輕機關槍、重機關槍、高射砲、八〇砲擊砲、六〇砲擊砲等。接著是最重要的學習使用炸藥，藏人要學習在爆炸後再攻擊，然後要趕快逃跑，前後時間最多只有十分鐘。

恰城久美說，木斯塘士兵受訓時一會兒爬山、一會兒涉水，一開始因為美國空投一直沒有來，大家手裡只拿著木棒訓練。等到空投有槍來後就好多了，我們開始訓練射擊、各種槍枝的使用方法，並且學看地圖、爆破技術等。

當時在木斯塘，美國先後共三次空投武器；第一次空投足夠裝備四百人，第二次和第三次一共裝備二千人左右，其中重武器有火箭筒、迫擊砲八門、另外還有非常多的地雷和充足的彈藥，很多藏人一生中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多的子彈。

雖然三次空投後，一千六百人的武器大約都有了，但並不是說每個人手上都擁有武器，因為一門大砲可以分配給十個人，其他有的人裝地雷、有的備彈藥、反正每個人都有活幹，不會空手，所以才說二千個人幾乎都裝備了。

但後來支援逐漸減少，美國人一直抱怨西藏人為什麼不到西藏去打仗？光是躲在這裡，所以美國人就不再給西藏支援。而且，美方都是根據地圖說話，他們言明第一次空投的四百人是駐在西藏，而不是在尼泊爾境內，這是美方根據地圖規定的。

尼泊爾與西藏間隔雅魯藏布江，冬天時江面結冰，木斯塘士兵才能騎馬過江去打遊擊，但夏天就只能裝成老百姓過河去蒐集情報。拉莫才仁說，因為藏人很同情藏人，所以蒐集情報很容易。十四年來新藏公路在木斯塘士兵的突擊後完全停止使用，以後才恢復。解放軍後來新修了一條公路，三個團約一個師的兵力被牽制在當地，這些消息都是從破獲的情報中得知。

遊擊任務每次約是十至廿人一批，絕不是打正規戰。但木斯塘遊擊隊卻發現，那時中國人已經在那裡紮好營盤了，一些據點、要地都駐有中國軍隊，公路每隔十、十五公里就有一個擔任修路工作的解放軍，也看到一些幹活的苦力，是軍隊經營的，後來才知道也是解放軍。本來要佔領的地方已經讓中國人給佔領了，而那時藏人還沒有武裝，武器是後來才給的，但有了武器裝備後美方所指定的地方已經去不了了，只好退回來，但美方又不高興，所以才不給藏人任何支援。

同時，美國人之所以沒有支援武器是因為對於人數表示懷疑，調查後才第一次空投四百多人的武器，但初來四個連的武器卻讓木斯塘吵得一塌糊塗。當時共有十六個連，每個連都想接收這批武器和槍，最後沒有辦法就裝備了八個連，等裝備後粗具規模時，敵人已經把邊境大的據點都給佔了，除非把兵營建在山上，但兵營建在山上就什麼吃的也沒有，村莊已經讓敵人給佔了，變得只能打小遊擊，然後再逃回來。

由於美方一再要求西藏遊擊隊員進入西藏，否則將不再提供武器支援，藏人一急，就派六十幾個人騎馬去突擊西藏，據這些遊擊隊員說，他們那次行動一共碰到廿幾輛車、共六十餘名解放軍，他們把十幾個士兵和指揮官全部打死，並且奪來了很多武器和一箱文件，這些文件好像是在說中國士兵士氣非常低落、很怕康巴人等。

木斯塘把這些文件交給美國，美國知道後很高興，空投增援就多了，什麼都給，西藏人有吃的、武器也有了，後來他們又潛入西藏許多次，並且炸了兩輛車。情形都是先埋地雷，然後步行，遠遠地躲在一個山頭上，再用望遠鏡觀察，但無法過去看，因為一旦過去，敵人追來跑都跑不掉。

有一次去的人騎馬，共有十二個人在宗巴縣設伏，藏人把馬放在比較遠的地方，敵方有五、六十人，後來還跟來大部隊。到了一特定地方後，藏人突然一陣射擊，十幾分鐘後看到地上八、九個人躺在那裡，是死是傷並不知道，反正是打到了，其他的都逃開了。射擊完後他們就跑到有馬的地方，然後頭也不回的跑了。

木斯塘的遊擊戰役被認為並沒有太大的功蹟，唯一最大的一次便是有次奪獲中共大批文件，藏人俊嘉便參加了那一次的遊擊戰。俊嘉說，一九六一年木斯塘兵營建立後，一九六二年藏曆九月，木斯塘已經有四十餘匹馬，分過去後平均每個連隊有兩匹馬，於是當時便組織三十餘騎準備返回西藏，過去都是步行。俊嘉說：

『我們過了雅魯藏布江上游，來到一個叫拉桑的地方，繼續向北走就碰到中國人的公路，那地方是屬於北方地區，沒有森林或高山，只有砂土原野和芨芨草，藏人一共設伏了六天六夜，卻一直不見敵軍出現，因此大家商量該怎麼辦。有些人主張回去，有的則建議劫奪附近一個屬於中國軍隊的牛場，爭執不下時，阿成列叫我扛上機槍，率兩個廈額（軍職，相當於排長）為助手，再沿公路向西走一段。

中午一時左右，在最前面的阿成列搖動紅旗表示有中國軍隊前來，不久便看到原野中有一輛中國軍車揚塵而來，汽車玻璃的反光讓人遠遠就可以看見這輛車子。我們在路邊挖了坑，將機槍架好，頭上、身上與槍上都綁了一些芨芨草做為偽裝掩護，再取出配發的十盒子彈，每盒是一百發，擺放在旁邊，靜候敵車。

當這輛中國軍車進入藏人設好的伏擊圈後，藏人壤壤首先開槍，中國軍車當即停了下來，所有人開始向敵車掃射，只有一些零星還擊。在掃射了一個小時後，木斯塘士兵『咯呵呵』的吶喊著衝過去，見到男女軍人共十一人倒在車內，有的已經死了，有的還剩一口氣。

木斯塘的士兵這時揮刀砍殺屍首，並且高喊：『把毛澤東領來吧！』在收拾一陣後，通過望眼鏡看到大約有四、五十輛草綠色的軍車開了過來，木斯塘士兵立即離開戰場，起身回逃，原本是兩天的路一天就過來了。』

拉莫才仁說，那次奪取文件是立了功，藏人後來進入西藏做的主要都是些破壞行動，但在一九六七年以後工作重點轉為蒐集情報。

過去藏人對情報工作並不在行，有好幾次犯錯的例子。拉莫才仁舉例說，冬天時，在中國境內有一個縣，因為電台損壞要重新換零件，木斯塘便派兩個負責聯繫的電報員去修零件，雙方約好每天的幾點幾分在某地接頭，各派電報員來接受。但是木斯塘的電報員穿的都是印度巴塔製鞋廠的鞋，這家廠膠鞋很受歡迎，但在中國的工作人員穿的都是中國鞋。

有一天下雪，在下雪中雙方仍派人交接情報，時間約達半個鐘頭，但因為很冷，電報員直跺腳，然後又各自回去。很不巧那時剛好有中國的巡邏員通過，巡邏員發現有很多腳印，而且兩邊腳印不同，於是這些中國巡邏員認為一定有特務潛入，結果在西藏內的電報設施被發現，人也被抓起來了。

另外有一次是在拉薩有一個負責電台通訊的電報員，木斯塘給他寄去一種藏人很喜歡的印度布料，是一種絲質衣料，在舊西藏很流行，過年時就把這件衣服寄到西藏。在中共十月國慶時，這名電報員便把這件衣服穿上出去看戲，拉薩警察發覺當地沒有人穿這種衣服，判斷這個人一定是從外地來的，就把他給抓起來了。

還有一次是一名電報員在房屋地下室進行發報工作，只有房屋主人知道他人在那裡，有一天那家人出外工作只剩下小孩在家，不知怎麼的這個三、四歲的小孩走進地下室，工作人員就給小孩戴耳機聽音樂，大家想這應該沒什麼。結果晚上父母回來，家裡也來了很多人，那小孩子就拉著外人說地底下有音樂可以聽，一傳出去人就被抓起來了，那一家人也被抓了。

拉莫才仁說，曾有一個電報員被派到沙日村一帶，白天大家都出去工作，他以為村子裡沒有人，就爬到屋頂上去照相蒐集情報，結果偏偏給一個老太婆看見，這個老太婆到處說她看見鬼了，因為她從沒有見過那個人，這事傳開後，這個電報員待不下去就只好搬回來了。

因為木斯塘是秘密武裝行動，美方要送錢給木斯塘遊擊基地也煞費周章。有時當月不能送，有時兩個月、三個月一併送，木斯塘只能到時再找可靠的人去拿錢。拉莫才仁說：

『一開始都是從加爾各答拿錢送到木斯塘，路途很遠，每次大多是帶十二萬的印度盧比，專門有一個組織負責送錢，在加德滿都有兩個旅館是聯絡點，錢都會送給旅館經理，然後他再送錢給木斯塘，有時是從邊境送到波克拉。從領到錢到送達木斯塘十分困難，要通過兩個國家的檢查，但十四年中僅丟了三萬元。

有一次是有廿五萬元的錢分別被裝在罐頭中，送錢的人要從印度的西里古里出發，在一九六四年以前是從西里古里送，六四年以後就改從德里送。那個送錢的人很小心，從西里古里上火車後，錢就放在位子下，因為錢太多太緊張就不時低頭看一下，確定錢還在，不料這些動作引起旁座的人懷疑可能是走私，結果被檢舉，人被帶走後把罐頭的東西挖出來發現有廿五萬元，還有很多信件，得知是個秘密工作人員，但不知是屬於那個組織。

正巧那時我和嘉樂頓珠到加爾各答，兩個人走在路上，買了份報紙，看到報紙上有一個間諜被捕的消息，沒想到正是自己的人。我於是立刻到德里和印度情報局聯繫，在廿四小時內，這個人就交保了，錢也拿回來了，沒有什麼損失。

但還有一次三萬元卻損失了。有二個送錢的人要坐火車到加德滿都，結果在尼泊爾邊境的旅館住宿時，那家旅館正好發生竊案，飯店已經報案要警察來問話，對每一名旅客的身分和行李都會查問。當時旅館外面是稻田，這兩個送錢的人擔心機

密外洩，因而趁警察不注意時把錢扔到稻田裡，身上只留了三萬元，事後又趁警察走後旅館不注意時把錢撿回來，那兩個人說三萬元是要給加德滿都的西藏辦事處，但後者說不知道，後來這兩個人被押到加德滿都。

眼看送錢時間已到，我卻沒有獲得通知，我猜想一定是出事了，於是馬上從大吉嶺派人去了解情況。那個派去的人正好坐在火車站一個茶館內喫茶，火車剛好停在站旁，兩個藏人坐的位置旁的窗戶正好對著茶館，兩人一看到是自己人，趕快叫他過去，就把扔在稻田裡的錢給他了，但三萬還留在身上，會這麼巧真是是佛祖保佑。

但因為西藏辦事處向警方表示並不知情，這兩人於是又改口說錢是做生意用的，因為交待不清坐了六個月的牢，三萬元也因此被沒收了。』

在美方提供武器與經費的支援下，木斯塘的遊擊行動成為西藏抗暴運動的另一個延伸。拉莫才仁說，他們會堅守木斯塘，是為了要讓西藏人心中知道在木斯塘還有藏人的軍隊，可以鼓舞藏人鬥志，另外也希望能爭取國際支援。但藏人心裡也了解，美國之所以幫助西藏是為了要阻止共產主義蔓延，還有則是為支持少數民族的獨立與收集情報，所以才支持木斯塘的武裝行動。

依照藏人的意志，遊擊戰絕對要繼續下去，不能撤退，但後來美國卻告訴藏人，因為他們的國家政策轉變，要和中共建立關係，所以軍事援助要宣布停止。木斯塘武裝抗暴必須結束，美方從一九六九年開始復員工作，全部軍隊要變成良民。

西藏人無可奈何，這時木斯塘內部正因為總指揮根益西私自將軍款納入私囊鬧得不可開交，總指揮的職務由甲德旺堆所取代，根益西率領他的支持者離開後，卻將木斯塘的軍事機密全盤向尼泊爾政府揭發，尼泊爾政府因此要求木斯塘軍隊必須尊重他們的國家主權，儘早交槍。

尼泊爾政府在木斯塘還未解除武裝前，要總指揮甲德旺堆把所有的非法武器交給尼泊爾政府，旺堆表示同意，但要先讓他了解復員（退除役轉業等輔導工作）的詳細情形，他才願意讓軍隊解除武裝、交出武器。尼泊爾政府內政部秘書長於是要旺堆先做一個復員計畫，旺堆就要拉莫才仁到尼泊爾進行這個計畫。

拉莫才仁說到，沒有想到正在做這個復員計畫時卻遭人密告而被逮捕，尼泊爾視他為麻煩人物，因為他有兩次到木斯塘，尼泊爾政府竟然都不知道。審問時拉莫才仁被問到：『你到尼泊爾來有什麼合法文件？』、『是哪一個人派你到尼泊爾來？』、『是誰授權給你做復員計畫？』拉莫才仁回答：『是你們秘書長讓我來做復員計畫的，我沒有文件，是你們請我來的。』

後來拉莫才仁被關了七年，他們先把他關在警察訓練中心的招待所，三年後又關到監獄中重新審問，並且完全禁止家人探望。

尼泊爾政府又派人向拉莫才仁說：『你要寫信調動十六個連的負責人到波拉開會，再寫信給旺堆要他交出武器。』拉莫才仁說他只在經濟方面負責任，只向嘉樂頓珠負責，並沒有權要人交出武器或要人開會。

在重新審問時，他們說已曉得拉莫才仁是木斯塘的負責人，當然他們知道嘉樂頓珠是最高負責人，但嘉樂不在尼泊爾。拉莫才仁被問到：『你說良心話，你是不是錯了，尼泊爾是個獨立主權國家，你在獨立主權國家的土地上集中很多人，供給很多武器去攻擊我們的朋友中國人，這是合法還是不合法？』

拉莫才仁當時回答說：『可以說是合法、也可以說是不合法；為什麼合法？是因為木斯塘軍隊成立十四年，你們也有軍隊、警察在當地，十四年來大家互相請客吃飯，這還是小事，旺堆還送了一匹馬和禮物給你們的國王，我們又為你們修飛機場，這看起來似乎是合法的。但因為尼泊爾是一個獨立國家，我們藏人在這裡成立武裝基地，以這個觀點來看則是不合法的。』

木斯塘遊擊成員恰城久美指出，拉莫才仁被捕後，尼泊爾就開始今天一百、明天五百、後天三百的趕人離開，並且要藏人交槍，尼泊爾的軍隊也一直增加。但藏人想到若真要作戰實在非常為難，尼泊爾境內有很多藏人，拉莫才仁又在他們手上，如果發生戰爭連藏人都要陷入困境。但若是交槍，以前大家受了那麼多的苦、費了那麼多的勁才組成的軍隊，都將化為泡影，所以非常為難。不過最後大家還是決定交槍，且交槍的條件就是要換回拉莫才仁，但大家也做好戰鬥準備，嘉瑪阿楚也說，當時他在尼泊爾的波克拉時，拉莫才仁被捕後，尼泊爾政府認為拉莫才仁不但在尼泊爾土地上建立自己的軍隊，還私設七個電台，簡直是罪大惡極。

一個尼泊爾警察也對嘉瑪阿楚說：『你們該交槍了，在以往的十三年裡，我們認為你們可能會有所作為，但是十三年你們什麼事也沒幹出來，現在山的那邊是老虎（中國），山的這邊是豹（印度），我們尼泊爾是羔羊，我們誰也不想得罪。你們在我們的土地上建立軍隊，是不是要反抗我們尼泊爾政府？如果不是你們就應該要交槍。』

嘉瑪阿楚回答：『我們不是反對尼泊爾，我們可以交槍，但是我們藏人的軍隊不像其他的正規軍，槍說放下就放下，我們的槍都是藏人自己從西藏帶過來的，屬私有財產，而且軍令也不是那麼嚴的，所以請延遲交槍。』還說了很多好話。

這時甲德旺堆要嘉瑪阿楚去印度達蘭莎拉向達賴喇嘛請示該如何做，於是嘉瑪阿楚秘密跑到加德滿都，再坐車到印度德里，德里那裡正好在罷工，找不到車，後來好不容易找到一輛車到達蘭莎拉，他先向流亡政府的內政部長旺德多傑說明此事。旺德第二天就安排他去見達賴喇嘛。

嘉瑪阿楚向達賴喇嘛報告了一切，達賴喇嘛問：『是不是甲德旺堆要和尼泊爾打仗啊？』嘉瑪阿楚回答：『不是，他只是把軍隊集中，一則威脅尼泊爾軍隊，同時想如此可以促使他們釋放拉莫才仁。』

達賴喇嘛說：『不能打尼泊爾，和尼泊爾是絕對不能打的，尼泊爾國家很小，中國那麼大，尼泊爾的困難連我們都看得清清楚楚，你們應該把槍交了，我知道你們做了非常大的努力，費了很大的勁，才有這個槍，這個槍對你們是很寶貴的，要你們交槍你們一定是感到遺憾痛苦。但不要擔心，如果真要用槍，槍從任何地方都可以得到的，不要把它看得很重，你們應該是交了好，明天我要錄音，再派一些人過去處理！』

第二天，達賴喇嘛決定派他的姐夫達拉朋措札西去處理，達賴喇嘛並且把他的意見做成錄音帶，讓達拉和嘉瑪阿楚二人帶到木斯塘給當地的士兵聽。達賴喇嘛在錄音帶中說，跟尼泊爾作戰沒有意義，尤其是現在已有數千名西藏難民在尼泊爾定居，戰爭勢必會連累他們，何況藏人本來應該要感謝尼泊爾政府。因此現在木斯塘應該要放下武器，開始和平的定居下來，西藏的奮鬥絕非一蹴可及，必須從長計議。

兩人坐飛機到尼泊爾後，達拉先去西藏辦事處，嘉瑪阿楚先去波克拉，就把達賴喇嘛的錄音帶託百長丹巴與慈仁納祿二人送到木斯塘，到了木斯塘甲德旺堆就把錄音帶放給大家聽，士兵們聽了錄音帶後都哭了。錄音帶內聽到達賴喇嘛要大家交槍，然而一旦交了槍，沒有槍後就再也不是士兵了，但大家又不敢違背達賴喇嘛，於是哭了好一陣子。最後就把一小部分的槍交出，大部分的槍卻藏在外面。

當時有一木斯塘遊擊士兵叫巴青，木斯塘讓巴青負責去交槍給尼泊爾政府，尼泊爾警察把他全身上下都搜了一遍，交槍後他自己在尼泊爾商店買了一把刀，回來後在房子內喃喃自語的說：『錯了，錯了，這次我們錯了，我們怎麼能交槍呢？達賴喇嘛是觀世音菩薩，他在任何時候都會說不要殺人、不要打仗，怎麼會下打仗的命令呢？噯呀，我們錯了，我們錯了。』

他說著說著，突然拿出刀子，用左手使勁一割，脖子後面的筋和皮全被割掉了，差點整個頭都被砍下來，滿屋子全是血。

但槍交得愈多，尼泊爾的態度就愈強硬。代總指揮甲德旺堆已把部分的槍收起來，帶了人先離開，他並且要二個連不要交槍，一個是恰城久美的連，一個是壤壤的連。尼泊爾軍隊已經準備要抓這名總指揮。

有一天突然來了四百多名尼泊爾士兵到附近村莊，恰城久美馬上派人去阻擋，希望他們不要再往前走。尼泊爾軍隊要求談判，恰城久美心想這一趟非常危險，可能一去回不來，所以腰間別了一把手槍，外面別了一把劍，帶了二個村長，另外帶了七個士兵，把袖子捲到上臂纏上紅帶子。尼泊爾士兵只注意到他們八人根本沒有作戰準備，並不知道另外六十四名藏人已悄悄把附近有利地形全掌握了。但村民害怕會打起來，都在那邊發抖，又不敢說。

去了後，兩個村長坐中間，四面坐的都是尼泊爾軍官，一名尼泊爾軍官開口說：『我們感到很遺憾，到目前為止我們走的地方都沒有碰到任何人阻攔，我們只尊重尼泊爾國王的命令，因此你們命令我們不要前進我難以遵從，而且其他地方都已經交槍了，你為什麼不交呢？我們一來康巴軍官都獻哈達來見我們，你為什麼沒來？你不來就是違法，不讓我們過去也是違法，你是當兵的，戰爭是怎麼回事你也相當清楚，所以我建議你把槍交了。』

之後恰城久美就說：『到目前為止已十幾年了，沒有遇到一個人來，我也不知道你是否真的是尼泊爾代表，現在我知道後，我不是也拿了糌粑和茶來招待你嗎？我吃的就是這些，多的我也沒有了，而且槍我不知是否應該交給你，槍是旺堆交給我們的，所以我必須交給他，再由他交給你，這樣才對，希望你等三天，三天後旺堆來了就交。』

對方又說：『我有妻子和三個孩子，我拿尼泊爾的薪俸已有廿一年了，我非常想念我的妻子和孩子，但是我今天只能忠於尼泊爾國王來執行他的命令，就是要你們交槍。』

恰城久美又說：『好得很，你確實應該忠於你國王的命令，就像我應該要忠於我上司的命令是完全相同的，我雖然沒有廿一年吃薪俸的歷史，但是從一九五四年開始，我就一直和中國共產黨打仗，我也是一個遵照命令、聽從命令的軍人，而且我沒有妻子、也沒有孩子，我想的就是西藏的獨立，如果在上面的旺堆和尼泊爾政府已經在和好，我們下面的人卻打起來可能不太好，所以我才說要等三天，並沒有其他的意思。』

『我們這麼多人，如何等三天？』對方講得很兇。

『三天又有什麼關係？和平解決的結局最好，戰爭解決可能很快，但尾巴會拖得非常長，所以還是等的好。』恰城久美說。

『三天後如果旺堆沒來，我再來這裡，我們再商量，我會來的，我的敵人是紅漢人、紅色中國，而不是尼泊爾人，所以我一定會來的。』久美再說。

最後兩個村長保證恰城久美會如期回來，雙方保證後，臨走時和尼泊爾軍隊握手，其中尼泊爾軍隊中的藏人和恰城久美握手握得很緊、很緊。

甲德旺堆領了四十多名有槍的人開始逃跑，恰城久美和壤壤騎著單馬在後面追，最後在一個山溝中追到了，旺堆問他們是要留下來還是逃？他們二人說留下來雖然會被抓，但他們要和當地士兵一起共患難。另外還有一個叫札欽國切的也不願意走，於是三個人就騎著單馬回來了。

甲德旺堆逃到多波，還屬於尼泊爾境內，眼看再翻一個山梁就到印度邊境了。當時他們一共有四十個人，但當時已有八個尼泊爾軍、和七個根益西的人正在山梁埋伏，甲德旺堆在前面率了五個人要過去時，立刻槍聲四起，雙方展開一場槍戰，甲德旺堆中彈身亡。

雙方打起來時後面的包括昌都才多傑、安多降巴將近四十個人在後面休息，一聽到前面打起來也不支援，轉身就往後面跑，跑到山溝中將三十多匹騾子的貨物全部翻出來，背起來後翻山逃跑。這時甲德旺堆的一匹馬從原路逃回來了，馬褡子上有二十萬盧比，他們又把這個錢背上翻過山逃跑了。

有一個叫阿夏瑪的負了傷走不動，他們就留了一匹騾子給他，沒再管他。阿夏瑪騎上騾子到甲德旺堆死的地方，結果尼泊爾軍隊和根益西的人早就跑走了，五個屍體就躺在那裡，甲德旺堆死時，槍還一直拿在手上。

還有一個叫丹增才仁的，是死在另一處，另外二個年輕牧民和馬屍死在一起。阿夏瑪沒有辦法，只好走原路回到尼泊爾軍隊那裡投降，結果尼泊爾知道已經沒人了，於是派人去屍體現場，最主要是確定死者身分。

旺堆被殺後，這時尼泊爾內政部秘書長、一個將軍、警察總長、西藏駐尼泊爾辦事處主任南嘉等人來都到宗薩巴，並且通知壤壤、恰城久美、札欽國切、丹增朋措來開會，當時他們手上都有槍。

藏人知道情勢不妙，很可能要入獄，於是大家決定一定要團結起來，要設法保住在當地財產。回來後尼泊爾人向恰城、壤壤還有嘉瑪阿楚說，你們去看看給你們安排的定居點是不是滿意？於是壤壤共三人乘直升機到波特拉去看定居點，他們先是被安置在一個旅館中，然後趁此機會把他們逮捕。另外札欽國切也被抓了起來。

被帶到監獄後，連進了三道門，大家看到拉莫才仁，所有人就關在一起了。大家都被押到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每個人的兩邊都有人警衛著，後面有一些人胸前有星星的拿著槍非常的威嚴，幾天審訊後就分別關押。

當時木斯塘軍隊有多人先後被關押，有的關押幾個月、有的關押一年就釋放了，但拉莫才仁等七人卻一直被審訊了大概六年左右，並且有一年多的時間沒人理會。

這七個人分別是恰城久美、拉莫才仁、貝卡、札欽國切、理塘壤壤、嘉瑪阿楚、阿夏瑪共七人。罪名是『違背尼泊爾王國憲法，非法建立武裝』，本來應處死刑，但因他們是外國人，所以判無期徒刑。

其中壤壤和恰城久美被關在另一個監獄中，一年二個月根本沒出過門，見不到太陽，他們猜想可能是由於他們二人沒有交槍的緣故吧！尼泊爾不讓他們學藏文，他們二人又拒絕學習尼泊爾語，後來才讓他們在太陽底下十五分鐘，太久沒有見到陽光了，第一天是頭昏眼花。

在另一個監獄關的是札欽國切、貝卡、嘉瑪阿楚、阿夏瑪、和拉莫才仁，大約五年後，才又把他們所有人關在一起。

就這樣關了七年多後，西藏政府和中國關係好起來了，據說嘉樂頓珠曾向鄧小平說：『我有七個人還在尼泊爾監獄中，希望你把他們釋放。』鄧小平笑著說他沒有權力干涉尼泊爾國家內政，但可以寫信告訴他們他不反對釋放這七人。

後來據說尼泊爾也收到這封信，這時人民法庭先判他們無期徒刑，然後要他們上訴，他們上訴到高等法院，在尼泊爾算是獲釋了。

尼泊爾政府要求他們七人離開尼泊爾，但因為組織在這裡，有些人不願意離開，結果阿夏瑪、理塘壤壤、札欽國切又被抓起來了，理塘壤壤後來得了癌症死在獄中，其他人後來則被放出來了。

拉莫才仁出獄時已是一九七九年了。

已經年老、身體愈形虛弱的拉莫才仁說，木斯塘當初整個邊境都被藏人佔了，他真覺得很對不起尼泊爾政府，當然在西藏是為了西藏的民族獨立，這似乎是合情合理，但藏人在木斯塘有武器、有電台、沒有尊重別人的國家，確實是非法，所以難怪尼泊爾政府會解除他們的武裝。

同時，木斯塘遊擊行動只能向中國軍隊進行騷擾行動，藏人社會在當時並不認為這個遊擊隊有什麼能力可以對付中國，甚至達賴喇嘛也提到，因為木斯塘的後勤補給未能有妥善規畫，以致多次狙擊行動並沒發揮太大的效果。

但曾經參加遊擊戰的嘉瑪阿楚說，藏人心知僅木斯塘兩千人是不可能打敗中國人的，即使能打死一些中國人，西藏也會有很多的損失，這不是他們的目的。但當時他們潛入西藏奪得很多文件，這些文件對美國也很有利，美國才因此加強支援，加強支援後對西藏就有利。

嘉瑪阿楚說：『我們的目的是讓世界人民知道，還有西藏人的武裝在抵抗中國人的軍隊，這點非常重要。』

嘉瑪阿楚記得，美國人在實施訓練時也曾這樣告訴藏人：『不要奢望打敗中國人，也不要奢望可以靠自己打仗而解放自己的土地，你們的目的是表現，讓人知道達賴喇嘛的軍隊在那個地方，仍然不甘心自己的國家民族被滅亡而在作戰。』

你們沒有多少人，死一個就是一個，沒有後繼的，如果和中國人硬拼就像老鼠咬大象的腳，沒什麼效果的。但要定期騷擾，讓世界的人知道你們在那裡一直有事，中國也一直有很多軍隊牽制在那裡，那樣對他們是個損失，而且更重要的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西藏人民還在進行反抗，這才是至關利益，而不是打死幾個人。』

嘉瑪阿楚認為，如果有人認為把中國人趕出西藏是他們應有的目的，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但讓全世界的人知道西藏人到現在還沒有屈服，以及讓西藏內部的人知道還有一支西藏遊擊隊在那裡反抗，這些目的是達到了。

成為西藏老兵的旺青多傑說，他們為了西藏和中國打仗，每次出征前都會在文件上簽字：『如果戰死不需要政府任何的撫卹金，若有剩下財物願全數奉獻給達賴喇嘛與貧窮的人。』但是政府卻把這些事給停止了，大家都受過訓練，有很多人願意奉獻自己的一切，為什麼會做這樣的決定他並不清楚。旺青多傑說：『這是我們最重要的人生，也是最遺憾的。』

關於木斯塘這個武裝組織的結局，達賴喇嘛說：『絕大部分遊擊隊都放下了武器，但少數人，大約是一百人無視於我的請求，結果被尼泊爾軍逐出國界，最後他們遇到埋伏，壯烈而死。』

達賴喇嘛說：『這可能正符合他們的心願，而西藏流亡史上最悲慘的一頁也於焉結束。』

第十一章 美國的介入

在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後，大規模的抗暴行動形同瓦解，西藏內部只剩下零星與小型的遊擊戰，彷彿已知大勢已去。但就在中藏戰爭即將終息之時，美國中央情報局卻承諾提供武器與訓練，使戰爭又延續了將近十年之久，西藏因為美方介入增強了武裝的力量與信心，誰知最後亦因美國退出，落得飲恨接受戰敗的結局。這是西藏抗暴歷史上既悲壯又無奈的一頁，藏人的失落，讓人不得不去回顧美國介入的是非與利弊得失。

美國實質介入武裝行動後，確曾為西藏人提供了強力奧援，但起實質作用的時間應是在西藏抗暴運動的後期。然而在中國一貫『反帝國主義』的論調下，整場抗暴運動都成了帝國主義的陰謀，從最早的昌都戰役起，美國便已開始介入西藏抗暴運動。在中國這種說法的解釋架構下，抗暴全是『外力煽惑』，藏人毫無自主性可言。

中國國務院於一九九二年在北京發表的『西藏的主權歸屬與人權狀況白皮書』中提到，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前，第一批美國槍枝彈藥已經悄悄地運到西藏。

中國國務院說，在一九四九年前後，美國人勞爾·湯姆斯以『無線電評論員』名義在西藏探索『華盛頓給西藏以可能援助』的可能性，並在美國報刊上報導：『美國已準備承認西藏為獨立自由的國家。』一九五〇年上半年，一批美國槍枝彈藥經由加爾各答運入西藏，用以對抗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藏。

這份白皮書又提到到，同年十一月一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公開誣衊中國解放本國領土西藏是『侵略』。同月，美國還指使他國在聯合國提出乾涉中國西藏的提案。

並且，中國還根據美國人諾曼·C·霍爾著的『美國、西藏和中國』一書中所披露，一九五七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從旅居國外的藏人中挑選六名青年，送到美國的關島，接受識圖、發報機、射擊和跳傘訓練。此後，美國又在科羅拉多州海爾營地分批訓練『康巴遊擊隊員』達一百七十人，經訓練的『康巴遊擊隊員』被分批空投或潛回西藏，以『建立有效的抵抗運動』、『反對中國人的佔領』。

另外，中國又根據一九五七年九月五日『遠東經濟評論』所載『美國中央情報局對西藏的陰謀』一文記述：

『一九五八年五月，首批受美訓練的兩名特務攜帶電台到叛亂頭目安珠貢保札西設在山南的總部與美國中央情報局聯繫。

不久，美國即在竹古塘地區空投一批武器彈藥給叛亂份子，計輕機槍廿挺、迫擊炮二門、步槍一百枝、手榴彈六百枚、炮彈六百發、子彈近四萬發。這一時期，美國還從陸路偷運大批武器彈藥供給盤踞山南的叛亂份子。』

中國的指控令外界感覺到美國在整個西藏遊擊戰爭中，扮演了相當關鍵的角色，但達賴喇嘛二哥嘉樂頓珠卻表示，他與美方聯繫才導入美國的介入，在這之前，藏人的遊擊行動全是自發而起。『四水六嶺』成員洛桑丹增指出，當時達賴的二哥嘉樂頓珠是與美國聯繫的主要人物，美國曾經空投包括食物、槍枝、機關槍、火箭筒等各式補給品給西藏人，但這些行動應是在嘉樂頓珠秘密逃離西藏與外界展開接觸後開始。

當年的嘉樂頓珠是個廿來歲的藏族青年，年輕的他被父母送到中國南京學習中文，還曾經得到蔣介石的獎學金補助，很早就與國民黨政府有過接觸。一九五二年他回到拉薩，當時拉薩正因為中國軍隊入藏而發生通貨膨脹等政治經濟問題，藏人因此走上街頭，要求『中國人離開西藏』，幾個主張『西藏獨立』的團體也在此時醞釀而生。

嘉樂頓珠看到民間對中國極度的反感，情緒也很高漲，他覺得情況非常危險。在那個時候，共產黨也很希望能藉助嘉樂頓珠在西藏做些事，他們向嘉樂頓珠說：『嘉樂你回來了，我們非常歡迎你，我們支持你、支持達賴喇嘛，但其他所有不喜歡份子都要收拾乾淨。』

嘉樂頓珠說，共產黨那時常說藏族和老百姓之所以會反對他們，都是因為美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所導致。而且那時達賴喇嘛年紀輕，有兩個攝政王（魯康娃與羅桑札西），共產黨就罵那兩個人是美帝特務和國民黨特務。但嘉樂表示，如果那

一天把這兩個攝政王請來，大家一起問他們：『美國在什麼地方？』恐怕他們連美國這個國家在世界那一個角落、在西藏的東西南北方都不知道。

但是中國還是說：『他們是特務，所以要殺他們、抓他們。』嘉樂說他一直勸共產黨，勸了好幾個月，但是沒有任何效果，中國的態度很惡劣，軍隊又不斷鎮壓殺人、抓人。嘉樂感到非常為難，他說：

『我的父母送我到中國去唸書學漢文、漢語、看內地的情形，主要希望將來可以幫助藏族人民建立漢藏兩個民族的關係，但是共產黨卻反而想利用我來鎮壓人民。

我不能違背良心，被共產黨利用做為一個工具來鎮壓人民。但另一方面我又實在沒有什麼力量來反對。現在共產黨大軍早已來到，藏族人民如此可憐，卻沒有能力與知識來反對共產黨，有什麼辦法呢？

因此，最好的方法是不要讓共產黨利用，但如果我牽涉到反對共產黨的民間活動中，共產黨會懷疑是達賴喇嘛派我去做這些事情，為了不要為難達賴喇嘛，想來想去最好的辦法，只有安安靜靜、秘密離開西藏，逃離到印度去，到印度去也許可以做一些事。

首先，我希望印度尼赫魯總理能幫忙勸勸中國；其次，現在西藏和外界什麼關係都斷掉了，假如和共產黨搞得不好，發生大混亂，連逃難的地方都沒有。而印度雖是西藏的鄰居，雙方若毫無關係，將來便不會同意我們入境，因此我想先與印度政府、老百姓聯繫，慢慢把西藏的困難講給他們聽，讓外界可以知道西藏的情況，將來若真的發生混亂，西藏人民要逃跑時，便可以退到印度。』

當時是一九五二年八月。在臨走之前，嘉樂和媽媽、弟弟（達賴的哥哥，名為洛桑桑旦，已過世）三個人商量，其他人誰也不知道。嘉樂說，不讓達賴喇嘛知道是擔心假如共產黨問他，曉不曉得你哥哥離開的情形，達賴喇嘛不知道的話還可以否認，所以事前並沒有告訴達賴喇嘛。

為了保密，其他西藏官員也全被蒙在鼓裡。嘉樂說，當時很多西藏官員和貴族是與共產黨合作的，因為共產黨拿了很多國民黨離開後的袁大頭，運到西藏來發薪水給西藏的政府官員，所以西藏很多高級人士，都是與共產黨合作的，當然也有些官員是很忠心於西藏人民的，情形非常混亂。

嘉樂頓珠雖不能代表西藏政府，但因為他是達賴喇嘛的二哥，因此在他還沒有逃出來前，那時印度有個領事館在拉薩，他曾經在那裡秘密地打了個電報給印度總理尼赫魯，一九四九年當嘉樂頓珠初次從南京來到印度時，兩人就曾見過面，已是彼此認識。嘉樂要求能讓他住在印度的大吉嶺，並且到了印度後能夠與總理聯絡。

結果尼赫魯馬上回話，表示了歡迎之意。尼赫魯還問嘉樂，邊境那麼長，要從那個方向來？嘉樂就說大概會從西藏南部入境進入印度，這條路徑就是後來達賴喇嘛出走的逃亡路線。

嘉樂說，曾有人認為他是去先探路的，但事實並不是這樣，因為從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九年共七年的時間裡，他們從來沒有想到，會發生這麼多的事情。

所有西藏對外聯絡全是從嘉樂到了印度後才展開；同一時間在西藏內部，西藏自治區、青海藏區、四川藏區都發生了抗暴運動，但是因為在武器裝備上不如中國，藏民也缺乏軍事訓練，一路漸漸敗下陣來。因此，到一九五四年時，有很多遊擊人員與組織到印度找嘉樂頓珠，希望嘉樂能設法提供武器以持續戰鬥。

起先嘉樂都是勸阻的態度，畢竟這不是他來印度的目的，而且西藏人也沒有能力去反抗共產黨。但是同為藏人，他了解到西藏人的感覺很絕望，遊牧民族本有的槍是很落後的，那有力量對付中國現代化的裝備？藏人終究已經走投無路，於是他便寫信給台灣、美國和印度政府，開始做牽線的工作。

嘉樂和印度、美國的聯絡，主要偏重在政治接觸上，至於軍事細節，如有關如何接頭、派人訓練、空投、美國中情局如何幫忙等工作，都是由他的助理拉莫才仁在做。

嘉樂說，美國會同意提供協助，是因為他們想搞清楚西藏裡面的情形，才決定秘密訓練部分藏人，因此一開始都是通訊訓練，訓練完後的藏人遊擊隊就被空投到西藏境內，進行情報蒐集工作。嘉樂說，那時西藏已經鬧得很厲害，青海、四川打得很厲害，也打死很多藏族人，美國訓練了相當一部分藏人，他們從四川、青海派到美國去，訓練後又空投到西藏。

從一九五七年開始，第一批受訓者連阿塔在內一共有七人被派到美國學習，一開始時只知道要接受美軍訓練，訓練的地點正是被美軍佔領的琉球。經過八個月的學習後，阿塔學會報務，另外又學了埋地雷、炸毀橋樑、各種槍枝用法、空降、及如何當一個情報人員等。一九五七年時阿塔空降到拉薩，另有二人空降到山南，四人空降到康區。

一九五九年情況轉為緊急，阿塔說，達賴從山南被護送到印度時，他每天以發報機和美國聯繫，告訴美國護送的情況。透過這些現代通訊器材，美方當時曾經及時掌握西藏內部達賴喇嘛的逃亡情報。

另一『四水六嶺』成員色德月說，一九五九年四月時，他被派到美國科羅拉多州學習，當時一共有十八人一同前往，最後十八人都被空降到西藏康區。返回康區後他們便與當地的遊擊組織進行聯繫，當地自行組成的武裝民兵共有一萬多人。後來他們又與美國聯繫，美國提供了槍枝彈藥、高射機槍、輕機槍等武器，槍枝發下去後他們又在不同地區與解放軍搏鬥了一年。

西藏人布桑則提到他在六〇年代初與其他廿人到美軍駐地琉球受訓，『林園』是訓練基地的代號。布桑是在一九六〇年三月廿二日從大吉嶺出發，六一年三月又從琉球出發到日本，然後從日本到泰國，三月十五日被空降在西藏昌都以南的芒康地區。

布桑回憶說，當他們被空投時，西藏已被中共佔領，不過『雪域護教志願軍』的札巴喇嘛還在堅持，當時芒康因為來了很多中國軍隊，大家就在山上打遊擊，單是四月九日那天就打了九次仗，雙方戰事很激烈，解放軍和西藏遊擊隊互相喊話要對方投降，到十五日時已被解放軍重重包圍，也留下服毒自盡或被俘的悲劇。

藏人旺青多傑從十八歲就加入四水六嶺組織，在西藏軍事失敗後，他於一九六二年被派到美國受訓，與他同行的一共是十四人，等他到了琉球這個訓練基地時，他算了算，西藏戰士一共是一百三十餘人。

阿塔說，據他了解，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二年間，康巴人曾經到美國受訓的共有三百多人，這些訓練人員首先都是在太平洋上的琉球島訓練，後來改成先在琉球檢查身體，再送到美國科羅拉多州，然後直接空降到康區的十一個地區，直到一九六三年都與中國部隊保持作戰，美軍也一直支援不同的武器和彈藥。

負責軍事接觸的拉莫才仁則說明，美國一共採取了八次的空投行動，空投地點全是在西藏境內。拉莫才仁說：

『第一次是一九五八年期間，美國派阿塔、洛蔡等電報員空投到西藏的澤塘，任務是到拉薩與西藏政府建立聯繫。緊接著第二批空投到理塘、第三批空投到北方的南木措、第四、五、六次都是空投到邊壩，第八次空投到芒康是最後一次。每次空投成員包括電報員、醫務人員與遊擊戰士等。

另外還有一些在接受完美國中情局訓練後，是從地面進入西藏，而非空投，這些受訓隊員的目的是要在當地建立反抗軍等地下組織。

在山南四水六嶺成軍時期，美國共空投三次，那時嘉樂頓珠和美國接頭，要求他們給予支援，但還不是正式支援，不能公開，所有武器都是從外面買（如從捷克、日本、德國等），然後再空投給四水六嶺，表面上美國並未公開介入，但已給予支援。

自從一九五九年達賴喇嘛離開西藏後，美國才公開支持，然後開始供給美國自製的武器。美國的目的是在阻擋共產國家蔓延、支持少數民族獨立運動、以及蒐集情報。在西藏蒐集情報對他們當然相當重要，這是他們當時的主要目的，這個世界都是互相利用，他們不可能是完全同情，也有自己的目的。』

有部分『四水六嶺』戰士開始被送到國外受訓，嘉瑪阿楚是被派到美國受訓的其中一人，他提到他們主要從大吉嶺出發，然後進入印巴邊境，巴基斯坦的邊防軍會在邊境等候，然後再用車把他們送到飛機場，有美國人在飛機場接受訓人員。

飛機先降落日本的琉球，住一個星期檢查身體後前往美國。美國人找了一個和西藏類似的地理環境（科羅拉多州海勒營地），山上有許多岩石和森林，嘉瑪阿楚等四水六嶺戰士學了射擊、保密、爆炸、看地圖、測製地形、研究遊擊戰術。嘉瑪阿楚談到當時訓練的情形說：

『在美國訓練時早上起來馬上就吃飯，吃完就出門，根本不讓你閒著，要不就是打球、學習藏文，有時就把自己的行李全部背起來然後爬山，那個山高就爬那個山，下午再回來，反正都不能休息。有時炸鐵軌、公路、橋樑，讓我們用炸藥炸，子彈根本用不完，只要願意打就拼命打、射擊，規定的子彈沒打完就被認為不及格、不努力。

我們被教導，一次突擊行動必須要研擬三條退路，如果沒有三條路可退就不要去。

所有四水六嶺的受訓成員不僅學藏文，還要學數學，如測量、繪製地圖、因為受訓的人中有文盲，如果不會藏文，得到情報也不知如何記錄、發放情報、或在地上標地名等。除了空投的以外，其他人都是步行回來的。按照過去路徑先從東巴基斯坦，然後偷越國境進入印度、再秘密進入尼泊爾，一路上秘密行事，並沒有碰到大麻煩。』

另一四水六嶺成員卡列降巴說，他認識安珠貢保札西，於是他到大吉嶺，和嘉樂頓珠、拉木才仁見了面，也得到機會到美國受訓。卡列降巴說，前六個月他們被訓練如何使用軍械，後來分班他被安排在炸彈組，學了各種名目的炸彈、拉雷那一類的彈藥；還有的是學習如何保密、聯絡；課程中也有政治學習，全部共學了一年又四個月。

據嘉瑪阿楚指出，美國先空投了四個連的武器，要四個人去指揮四個連。後來又空投三個連的武器，一共給了七個連的武器。美國的計畫是七個連去打仗，其他人在後面補充，如果前面的人死了，武器就由後面的人取用。

但到木斯塘時每個人都想要有武器，大家擠來擠去，吵鬧很厲害，不得已只好將武器一分為二，四個連的武器分到八個連手中，三個連的武器分到六個連，一半有武器一半沒有，但總部的武裝是另外計算的。

拉莫才仁說，四水六嶺軍過來時人人都沒有槍，因為槍在逃亡到門達旺邊境時，都交給印度了。在美國空投了三次後，總計有十個連是完全裝備，六個連一半有槍、一半沒槍，錢方面，美國從一九六二年後在每個月會定期給錢，到一九六九年復原時錢數都沒有改變，至於服裝、帳房、醫藥費、騾馬等費用都是另外計算的。

一九六一年三月空投後，四水六嶺軍就先渡過雅魯藏布江潛回西藏進行遊擊戰，但雅魯藏布江夏天水太急，只能冬天過，四水六嶺打遊擊時就設法先破壞新疆到西藏的新藏公路、破壞橋樑、哨站、也破壞他們的汽車運輸。美國人把他們在越戰中的經驗拿來訓練藏人，另外的一些遊擊戰術如聲東擊西、速戰速決、攻擊敵人的薄弱點等，再破壞他們的補給線，這些美國人都教了。

但因為四水六嶺並不是正規軍，幾次的突擊行動下來，木斯塘遊擊部隊從解放軍那裡得來的武器並不多，而且在西藏主要工作是蒐集情報，以為下一次的遊擊戰做準備，例如經常要刺探情報如公路修到什麼地方，公路是如何修的，有時也會進行一些伏擊，但也是打了就跑。大部分工作還是在探聽消息的情報工作上，並著眼於未來成立地下組織，當時這些以電台為主的遊擊據點都已建立，電台設備也是美國空投得來的。

然而，就在木斯塘繼續遊擊行動時，美國卻在一九六九年突然通知嘉樂頓珠要停止接濟，他們說美國正在與中國建立關係，所以不能再支持了，希望藏人能以三年的時間輔導士兵退伍，並做好計畫。木斯塘總部接到這個訊息時非常不高興，大家覺得美方沒有任何理由這麼做，但又能如何呢？

拉莫才仁說，那時有兩個人在得知止接濟的消息後，表示絕不投降就自殺了。這些人很激動地說，五年內藏人可以頂得住，每一個連都可以抵抗、自己生存。這兩個人很激憤，後來一個上吊、一個跳河自殺。

嘉樂頓珠則說，一九六九年時美國政府出賣西藏，那時美國政府說明之所以無法繼續支持遊擊行動，是為了建立中國與美國的外交關係，而且當時中國政府共提出兩個條件：一個是與台灣斷絕外交關係；另一個則是停止一切對達賴喇嘛的支持。

美國當時提出的軍事援助，也並未提供足夠的力量協助西藏人進行遊擊戰，至今仍令藏人耿耿於懷。嘉樂頓珠難過地說，他實在沒想到美國人只是隨便給他們一些槍而已，美國前中情局副局長曾經問嘉樂對這件事情有什麼評價。

嘉樂說：『這個代價太大了，美國人說要幫我們的忙，答應了我們的事情，最後不管是政治也好，武器方面也好，通通都沒有做到。』

嘉樂說：『美國後來在政治方面出賣我們，武器也出賣我們，比如在西藏南部有數萬個遊擊工作人員，美國人卻只給我們四百五十枝槍，而且更因此驚動了中國共產黨派大軍來鎮壓，這不是開玩笑嗎？西藏死了很多人，又讓我們西藏人一千年來辛苦建立的宗教文物，通通都燒掉了，這代價太大了，你們還能說幾萬人的地方給四百五十枝槍是好的嗎？』

拉莫才仁也說，在攻打澤塘期間，美國方面除了第一批說明為訓練用的少量武器外，一直沒有及時空投，反而向色東月、堂巴倉旺青、扎噶布魯等空投遊擊隊員所在的碩達洛地區扔了大量的武器，他們散發了一些，據說也有未及散發而被敵繳獲。

美國人都只是口頭承諾嘉樂頓珠，從來不曾給書面承諾。嘉樂說，美國總統艾森豪曾經派人來說，達賴喇嘛若能逃出西藏，他們一定會支持西藏的獨立運動，會支持達賴到爭取到獨立的那一天為止。嘉樂頓珠說，美國曾說他們在軍事、金錢都會支持，這點美國人答應過很多次，一九五〇、五一年答應過一次，五八年又答應過一次，都是總統派來的工作人員（外交部、情治人員、國務院），這些都是他經手的。

但一九五一年達賴沒有出來，一九五六年時美國本來希望達賴訪問印度時能住下來，但那時候達賴喇嘛又回去了。到了一九五八年時美國第三次要求達賴喇嘛離開西藏，並說絕對會在經濟、軍事上支持，會一直支持到西藏獨立、達賴喇嘛返回西藏時止。

後來嘉樂頓珠告訴美國人，大家好來好去，是你們主動來說要幫忙的，今天你們說有困難，要承認共產黨，非要把西藏出賣不可，那沒有辦法了，吵也沒有用，現在我們說再見，也許不久的將來可以重新握手也說不定。

對於這段歷史，過去藏人曾經向美國保證絕不外洩，但現在隨著時間與國際局勢流轉，這段往事在美國與西藏都已開始解密。藏人俯思既往，心中都有許多感慨。

在西藏抗暴的血淚記錄中，除了最終因為美國停止援助，使得抗暴行動被迫中斷外，另外卻也由於有美方提供的金錢支助，造成西藏內部發生流血內鬥事件，讓西藏人在英勇的抗暴歷史上，留下恥辱的烙印。

嘉樂頓珠說，原來美國給木斯塘的錢，分別是由美、印度、西藏三個地方發出，再送到木斯塘給工作人員，錢到了木斯塘，即是由總指揮根益西一人負責，不料最後卻發生錢都給根益西（又稱巴哇益西）拿走的爭議。

拉莫才仁說，內鬥是因錢而起，他們寄給根益西的錢都他扣起來了，又不願意存在銀行內，所以引起木斯塘十三個連起來反對，根益西把錢放在兩個馬褡子內，出行時帶來帶去，就是不交給銀行。十三個連長聯合要求嘉樂頓珠出面處理此事，另外的三個連則支持根益西，大家手上都有武器。為了解決紛爭，嘉樂因此派他去清點帳目。

拉莫才仁清點後發現有三十多萬的錢沒有報帳，被根益西保存起來了。根益西向他解釋說，錢他是保存了，但因為他在木斯塘殺了很多人，積了很多罪孽，他要用這些錢來整修寺院，將來他會把錢交給嘉樂頓珠，然後買地皮等。

但是拉莫才仁不接受根益西的解釋，他說這些錢是軍費，根益西卻一直不把錢交出來，他從一九六四年派人去問還有多少錢時，根益西回答說沒有錢，嘉樂想不應該沒有錢啊！才開始懷疑的。嘉樂當時認為眼前是有美國幫忙，但錢不能完全用掉，因為美國中情局幫忙是根據利害關係考量的，如果環境轉變、政策改變這些援助就會停止，所以一定要儘量節省，錢一定要好好保存。

拉莫才仁說，美國中情局在建立電台後，如果剛交十萬元，就會馬上打電報給根益西，美國人知道全部的帳目，但美國人也覺得亞洲人很會吃錢。只有根益西可以打電報表示收到，但怎麼用是他決定的事，美國人不曉得，他們也不曉得。

拉莫才仁問根益西，從六四年到現在到底存了多少錢，為什麼不講真話？根益西說，如果嘉樂知道他存了那麼多錢，恐怕會停止接濟。拉莫才仁要他交錢，他不交，所以雙方便衝突起來了。結果反對根益西的十三個連聯手將他驅逐，根益西就帶了那三十萬走了，一行廿多人逃走，但繼任的木斯塘總指揮旺堆主張把錢追回來，雙方再起衝突，廿個人在山裡繼續武裝抵抗，又不肯投降，最後被旺堆那方打死，還有一個在山上凍死了。

隨後又發生一些衝突，根益西到加德滿都後，支持根益西的第十二連連長和百長，佔據聶香據點，雙方又在聶香發生衝突，有兩個人被打死，另一方有一個人落水後被沖掉了，這是大家不小心碰上的，根益西那時被任命為安全部助理部長，但他沒有到達蘭莎拉，所以西藏流亡政府派了一個代表團來調查。

根益西本人在被作者問到此事時並不願多說，現在木斯塘遊擊隊員對於此事的看法也是分成兩派，大多不願多談，有些木斯塘隊員則認為，根益西的事，是丟臉的事，錢在他自己手裡，領頭的也是他，其他人誰也不了解美國究竟給了多少錢，但必定按照人口給了很多錢，當時當兵的人很苦，費用都不夠，於是一些教官就開始反抗，並要求改善生活，有些了解的人便支持教官，但不了解的人就說大家是為了權力而爭，和根益西過不去，並說根益西為了這個兵營立下了汗馬功勞，所以要支持根益西。

根據部分不願透露姓名的藏人指出，由於衝突擴大，後來嘉樂頓珠和拉莫才仁遂派賈德旺堆代替根益西，鬧出很多糾紛，根益西最後湊合地交帳了，大家還開了宴席歡送根益西。但最後根益西並沒有前往達蘭莎拉去擔任安全部助理部長，而是跑到支持他的寧香，即第十二連的駐地。

事情鬧大後，有一個追隨根益西的人晚上逃跑，大家看到他逃出去就把他攔下，但他卻自殺了。另外也有一些人被逮捕，因為聽說他們準備在各地鬧事，先後一共逮捕了廿一人。後來大部分人都寫了保證書，保證不鬧事、效忠西藏政府就回去了。但也有四個人不認帳，後來就被叫到法庭內，根據西藏習慣每人抽一百個馬鞭，把他們關起來，他們認錯後就把他們調到別的連隊。

但當時在爭執中，因為雙方互相開槍，也有一些死傷。有些藏人談到開槍時非常後悔，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當時不打不行、打也不行。打了違背達賴喇嘛的意旨，不打兩面已經交手，覺得一切都將毀於一旦，心中非常非常的痛苦。

衝突是一九六八年開始的事，佔領十二連也是同一年，整個事情是發生在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四年間。

拉莫才仁說，大家在尼泊爾加德滿都開會，也希望根益西參加，後來考慮到木斯塘遊擊隊是非法組織，因此把開會地點改到印度北部流亡政府所在地的達蘭莎拉，但請了三次根益西都不來。後來根益西又把情報洩給尼泊爾政府，但當時又不能把這些扯出來，否則印度、美國、巴基斯坦、尼泊爾很多國家都牽涉在裡面。這件事根本不能曝光，所以在當時無法解釋，也不能解釋。

另外一名木斯塘遊擊隊員則說，根益西從木斯塘到寧香十二連，逃跑時他們在後面追殺，當時殺死了二個人，凍死了二個，還有兩個人自殺了，後來在山上互相衝突打仗，又打死了六個，共十二個人在此事件中失去生命。而他們這邊也死了兩個人，雙方在寧香打了幾天，根益西就向尼泊爾政府投降了。

這名戰士說，他覺得這段歷史沒必要說，真不知西藏後代會怎麼想？他們這一代曾經為西藏流了不少血、吃了不少苦，而且確實有為西藏人獻身的精神，但後來卻自己人打起來了，而且打起來的理由僅僅是為了錢，實在是太丟人了。當時也是迫於無奈，為了錢理智也被淹沒了，這些內鬥是醜聞，曾經是併肩作戰的戰友，一個鍋內吃飯，後來卻自相殘殺，實在是太丟臉了。

第十二章 台灣角色

台灣介入西藏問題，幾乎就是在拉薩戰役之後，但是，隨後而起的西藏獨立問題，卻因為象徵著藏人新興的民族主義，深深觸傷當時在台灣中華民國政府。即使台灣政府面臨著國共決裂、大陸領土被竊據的傷痛，卻與北京一樣無法接受西藏希望獨立的事實。於是，台灣政府在同情藏人反共、卻又極力反對西藏獨立的前提下，自身立場倍顯尷尬。

拉薩戰役發生後，當時已經將國民政府播遷到台灣的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在一九五九（民國四十八）年三月發表了一份『告西藏同胞書』，這篇文告並且將西藏內部抗暴，視為國民黨政權反共的前哨戰。他提到：

『西藏同胞們！

你們這次奮起反共抗暴，浴血作戰，乃是我中國大陸全體同胞反共革命最莊嚴光輝的歷史第一頁開始，今日我雖身在台灣，但我這一顆心，乃是與你們始終一起反共作戰。尤其是這次拉薩戰爭，我藏胞僧侶，壯烈犧牲，更使我關懷倍切，時刻難忘。我中華民國政府，正在集中一切力量，給你們以有效的援助。並號召海內外全體同胞，共同一致，給予你們以積極的支持。

你們不是孤立的，你們的反共抗暴行動，不僅是為了藏族全體的生存，為了藏胞個人的自由，發揮了大無畏的精神，並且對於自由亞洲各民族，各宗教的自由與安全，擔當了英勇無比的前鋒。所以世界上一切愛好自由、主張正義的國家和人民，都站在你們這一邊，支援你們！禱告你們的成功！

我中華民國政府，一向尊重西藏固有的政治社會組織，保障西藏人民宗教信仰、和傳統生活的自由。我現在更鄭重聲明：西藏未來的政治制度與政治地位，一俟摧毀匪偽政權之後，西藏人民能自由表示其意志之時，我政府當本民族自決的原則，達成你們的願望。

西藏同胞們！朱毛共匪的傀儡政權，對於你們反共抗暴的革命運動，使用殘忍、狂暴、恐怖、屠殺的手段，企圖加以鎮壓和控制。我深信共匪的武裝暴力，縱能一時破壞你們的寺院，劫掠你們的城市，絕對不能毀滅你們革命的意志，和宗教的信仰，只要你們更加堅決，更加勇敢，繼續不斷的奮鬥到底，我必領導全國軍民，很快地與你們在大陸上約期會師，共同作戰，來完成我們反共抗暴，救國家救民族同胞的神聖使命。』

蔣介石的這份文告，後來成為台灣各有關單位處理西藏問題時的最高指導原則。

當時的台灣，『反共』是基本國策，年年花費龐大預算整軍建武中，目的都是為了伺機反攻大陸。在西藏抗暴運動成為國際關注焦點後，很容易便被台灣納入成為反共政治的一環。『反共』的時代背景拉近了台灣與西藏的距離，另外，台灣民眾也以實際捐輸，表達對流亡藏人的關切。

在西藏反共抗暴事件發生後，台灣方面經由『中華民國各界援助鐵幕內人民爭取自由委員會』發動『支援西藏反共抗暴募捐運動』，捐款共超過七百萬元台幣；在民國四十九（一九六〇）年八月一日國民黨中常會議報告中，得知全部捐款已超過八百萬元。

從國民黨在最近幾年解密的中常會內部資料可看出，從一開始台灣在西藏問題上，很快就陷入『西藏獨立』意識的困擾中。在達賴喇嘛逃出西藏後，國民黨中央黨部第八屆中常會曾就西藏問題進行討論。會中指出：

『達賴最近曾表示：『一、要求西藏獨立；二、成立臨時政府；三、將西藏問題提出聯合國討論。』根據種種跡象，國民黨判斷，達賴可能直接或要求第三國將西藏問題提到聯合國進行討論，會中因此希望就此一情勢提出因應對策。

這筆出於人道援助的民間捐贈如何送到西藏人民手中，在國民黨內部也出現許多政治上的考量。例如：國民黨內部考量到達賴抵印度後，西藏境內之反共抗暴運動與達賴之領導關係已逐漸變化，而現在西藏反共抗暴軍之實際領袖與達賴亦存有若干歧見：『因此為兼顧發生實際效用，該項捐款應以下列原則處理：一、以全部捐款的一半作為直接支援現在西藏境內的反共抗暴軍之用；二、以另一半給予達賴及救濟逃印來台之西藏難胞。』

這份資料似乎透露，在一九五九年間，達賴喇嘛與反共抗暴運動領袖間已有若干歧見，但資料中的反共抗暴領袖又是指誰也未明言。以後中常會在民國四十八（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五日的第一四九次會議中，則又提到：『已有捐款可直接用以支援西藏之反共抗暴軍，如由達賴轉送難民，則應再加研究。揆諸達賴最近態度，我政府不必過於勉強寄送，否則亦有損於政府之尊嚴。』

當時西藏問題的主管機關包括國民黨中央黨部第二、三、六組、情報局、外交部、大陸災胞救濟總會、蒙藏委員會等。在援助西藏內部抗暴軍方面，中常會記錄顯示當時的國民黨中央黨部第二組第一次撥交美金一萬元，第二次撥交美金二萬元，兩次都是由國民黨中央黨部第二組負責轉交。

國民黨中央黨部第二組又在中常會會議中報告指出：

『在達賴喇嘛脫險抵印後，西藏境內抗暴義軍主動約七千八百餘人亦均於四、五月間相繼撤退來印，當時本組為適應情況，策動藏胞擁護中央，以配合國際宣傳起見，乃著本組駐藏邊區工作同志與抵印義軍義民加強聯繫，並設法策動其具有代表性之領袖秘密來台，以加強運用。

其間經過縝密部署進行，於去年八月（一九五九年八月）與抗暴軍總指揮安珠貢保札西、副總指揮津巴嘉措及嘉瑪桑佩等正式取得聯絡，除策動安珠貢保札西與津巴嘉措聯名上書總裁，表示擁護及效忠政府....，而後嘉瑪桑佩來台，則由國家安全局負責接待。

同時，以嘉瑪桑佩為義軍代表，授予少將官階，主持義軍在台辦事處業務，透過該員與在印義軍聯繫，瞭解區內外抗暴軍動態，並設法聯絡運用，俾使藏境之抗暴武力能繼續持久戰鬥。

而在救濟金的支用上，四十八（一九五九）年一月時，曾將美金一萬元，由本組轉交抗暴軍總司令安珠貢保札西、副總司令津巴嘉措具領；四十九年八月要給美金兩萬元時，並於十一月攜款赴印後，適安珠被印政府調查傳訊，本組駐印同志不便接觸，本組又將款收回。

而在援助西藏抗暴專款運用上，該款項是由葉幹中同志向中央負責具領後，以用於支援抗暴為原則，但為免印度政府注意，引起麻煩，以使用藏名化為宜，並對外保密。

而且，援助會於五十（一九六一）年四月撥發美金一萬元、五十年六月本組派員到達蘭莎拉發放救濟金共達印幣一萬五千八百廿五元、五一（一九六二）年元月又在印度大吉嶺、噶倫堡、錫金共發放印幣三萬一千九百五十元。但此次發放時，因藏胞已有傳聞均來請求救濟。唯我方在發放救濟過程中，曾前後受到嘉樂頓珠所派人士之幹擾，彼等曾鼓動藏胞反對照相領款，並開會決議請求達賴明令藏民不得領取，及要求印度政府迫令發放人員離境等。』

從國民黨中常會的資料可以了解，西藏抗暴事件在國共兩黨對峙的當時，等於是一個極佳的國際宣傳，台灣在救濟西藏時不忘策反，對於西藏抗暴軍並且給予『義軍』的稱謂，政治計算遠高於人道救濟。

儘管由於歷史因素使然，台灣在處理西藏問題上或許缺乏彈性，但在國民黨中常會提出的許多資訊卻明顯與事實不符，這些錯誤資訊出現在台灣執政黨最高決策會議上，不但一直誤導決策高層，更使得台灣在西藏問題上，從一開始就陷入無法精確掌握真實狀況的困局中。

在事隔近四十年之後求證這些事，根本無人聽過當時四水六嶺領袖安珠貢保札西等人曾被策反效忠台灣政府，而當時為西藏抗暴尋求國際援助的嘉樂頓珠，更不記得安珠曾經告訴他拿過台灣方面的一萬美元捐助，但他也不清楚，津巴嘉措是否曾接受這筆錢。

更離譜的是，被台灣視為抗暴藏軍代表的嘉瑪桑佩，在西藏抗暴組織中，卻完全沒有擔任任何職務，西藏抗暴歷史中，也從來沒有聽過這個名字。然而，嘉瑪桑佩卻被台灣奉為義軍首腦，台灣還送給他一棟房子、封他為少將，國民黨第二組還能透過這名與西藏抗暴軍並無任何關係的人去：『與在印義軍聯繫，瞭解區內外抗暴軍動態，並設法聯絡運用，俾使藏境之抗暴武力能繼續持久戰鬥。』

嘉樂頓珠說，嘉瑪桑佩當時與國民黨情治人員有若干接觸，但是他個人與西藏抗暴組織沒有任何聯繫，他的一切行動完全是為了配合國民黨的宣傳，並且是以其個人身分到了台灣的。嘉樂說，當時在印度、尼泊爾有太多的國民黨情治人員在那裡活動，但這些人員與西藏自發的抗暴運動，沒有任何關聯。

嘉樂說，葉幹中是一名華僑，在當時主要代表台灣情治單位工作，但他從未與葉幹中有任何來往。同時，資料中提到有關嘉樂曾經阻撓台灣支援事宜，嘉樂在現在是第一次聽說，也完全否認。

由於救濟對象錯得離譜，加上一筆筆龐大金錢紛紛送入奇怪的人口袋裡，使得台灣一再成為藏人指責的對象。不少藏人指責說，台灣錢只是圖利少數的投機份子，根本沒有幫助到許多貧苦的藏人，因此對台灣當局非常不滿。再加上台灣方面始終不願循達賴喇嘛的管道給予各項救助，都使得『台灣』二字，成為藏人社會中紛爭的起源。

同時，從現在台灣公開的有限資料來看，在『西藏獨立』逐漸成為西藏抗暴運動的主要訴求後，台灣方面的立場便開始顯得躊躇，對於達賴喇嘛、與實際負責政治、軍事聯繫的嘉樂頓珠，也出現了相當的疑慮。民國四十九（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八日國民黨中常會會議提出：『達賴喇嘛與嘉樂頓珠旨在宣傳西藏並非我國領土之一部分，為將來策動西藏獨立鋪路之陰謀。』

這次會議並且重申：『西藏問題我們的立場，當然堅持是國內問題。』

同年十月廿四日會議中，則提到：『嘉樂頓珠表示對我方仍有許多不滿之處，並認為我方與藏人聯繫，應公開邀請組團訪問。』、『嘉樂表示願意接受台灣對難胞之濟助，但款須匯寄達賴，必得電謝。』

同一次會議中，討論到有關嘉樂頓珠來台訪問一事，會中認為由於嘉樂頓珠一貫主張西藏獨立，且為從事西藏獨立活動最烈之人，對於政府存有偏見，奉總裁指示不再與之聯繫有案：『現擬仍本既定原則，目前不予理會。』

從民國四十八（一九五九）年起，國民黨中常會便持續針對西藏問題進行專題報告與討論。五十（一九六一）年十二月時，國民黨二組曾經對西藏政治運用問題提出研究報告。報告中指出，西藏內部的派系從過去分為親英、親漢兩派，到現在分為保守派（舊派）、國際派（新派），而後者則是以達賴喇嘛胞兄嘉樂頓珠為首，此派受國際力量之鼓勵與誘惑，主張西藏獨立，並號召全體藏胞成立所謂『大西藏獨立國』，與中央（中華民國政府）採對立態度。

這份報告分析指出：『嘉樂頓珠的各項活動，係欲依賴美方及其他國際力量之支持，脫離中央（中華民國政府），達到其所謂『西藏獨立』的目的。其對（中華民國）政府的關係，一面譎言攻擊，盡其輕視誣蔑之能事，一面透過關係，試探中央態度，要求經濟支援，及準許西藏獨立。』

報告中說：『該派認為，台灣政府目前已自顧不暇，其在聯合國之席位亦將難保，故依賴台灣係屬愚蠢之舉，惟有在國際力量支持下西藏必獲獨立。同時，蔣總統在告西藏同胞書中對西藏政治地位之允諾不夠明確，故應進一步明確承認西藏獨立始有助於西藏與中央之關係。而且，中央過去對於在印藏胞之零星救濟，無補於藏胞實際生活之改善，今後所有救濟款項應交由藏府統一運用，以有助於藏胞之長久生計。』

在民國五十一（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中國國民黨邊疆工作指導小組第一次會議記錄中提到：『台灣的立場是，中央一向尊重西藏固有傳統制度及習慣，基於此，若干年來對西藏本身之政教設施均未輕予更移，對任何破壞此種制度及習慣之措施亦均不予承認。但是西藏目前仍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對西藏未來之政治問題，蔣總統的告西藏同胞書已有明確指示，但眼前唯一目標仍是以『團結反共、消滅共匪』為第一目標。

而報告中提到國際派與台灣的接觸方面時提到：『以嘉樂頓珠為首之國際派，為使其『西藏獨立』運動獲得中央的承認，曾數度與我駐印工作同志接觸，試探中央態度。如在民國四十九（一九六〇）年八、九月間，該派派朋措札西（達賴姐夫）與我方晤談，表示總統在告西藏同胞書中對西藏政治地位之允諾不夠明確，故應進一步明確承認『西藏獨立』始有助於西藏與中央之關係。同時並希望中央在經濟上予藏政府以支持，當時為我方所婉拒。』

『民國五十（一九六一）年六月間，我方派員赴達蘭莎拉發放難民救濟時，順道晤見達賴，朋措札西及其他藏府官員，當我方告以解決西藏未來政治地位問題必須以總統文告為依據時，達賴表示同意，並願即派代表來台，與政府商談有關問題。同年八月朋措札西攜帶達賴呈總統親筆函，擬代表達賴來台，惟因其函中內容仍涉及獨立及狂妄語辭，故未被我方所接受。』

『同年十二月中旬，我方又應朋措札西之函邀派員赴達蘭莎拉與達賴及其他藏府官員會晤，此行結果，藏方（國際派）表示，關於『西藏獨立』問題，準與不准自在中央，但藏方非繼續要求不可，其派員來台之主要目的，亦為商談此事，至其他問題皆為次要。我方之立場與前同。』

這份文件中提到的達拉朋措札西原為達賴喇嘛的姐夫，曾隨同達賴喇嘛逃亡，在達賴大姐過世後，目前的妻子格桑達拉女士正為『財團法人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亦即達賴喇嘛辦公室在台代表。目前人正在台灣的達拉表示，當時有一漢人名叫高遷規，他原任國民黨四川軍區副團長一職，在共產黨入侵後他跟著逃到拉薩，改取藏名為丹巴頓珠，爾後為安全考慮還進了甘登寺為僧，因此藏人稱他為『假喇嘛』。

達拉說，後來他也跟著逃到印度，到了加爾各答與國民黨的華僑負責人葉幹中接觸後，也與國民黨開始進行聯繫。那時，丹巴頓珠表示他非常關心藏人處境，便向達拉表示衷心希望能見達賴喇嘛一面。

達拉說，丹巴頓珠與葉幹中後來被安排見了達賴喇嘛，但也只是個一般的拜見，丹巴要求與達賴喇嘛合照留念，誰知他卻利用這些照片表示他與達賴喇嘛關係密切。後來丹巴頓珠從國民黨處弄來一筆錢，說是要救濟生活困苦的藏人，但卻在給藏人每人十元印度盧比（當時印度盧比十元約等於美金兩塊錢）時，一一拍張照片存證，這件事被西藏政府知道後，便派達拉到加爾各答向他表示異議。達拉說，後來丹巴頓珠又從大陸災胞救濟總會那裡弄來十萬印度盧比的救濟金，但西藏政府認為台灣目的在宣傳，只是利用金錢做政治上的活動，不是真心要幫助西藏人，所以拒絕了台灣方面的錢。

達拉說，他是曾經在與丹巴閒談時，提到他對蔣介石那份宣言的意見，認為宣言中的西藏立場不夠明確，但從未要求台灣支持西藏獨立或給予經濟支持，也未把丹巴兩人視為國民黨的官方代表，自然沒有任何被『婉拒』的問題。同時，達賴喇嘛也從來沒有寫任何親筆函給蔣介石總統，反倒是當嘉樂頓珠在一九六四年秘密訪問台灣時，曾經帶回一封蔣介石的親筆信給達賴喇嘛，達拉並且提供了這封信的內容。

不過，從蔣介石的書信內容中，似可了解達賴喇嘛曾經寫信給蔣介石。蔣介石的信是這樣寫的：

『達賴喇嘛勛鑒：

按本年三月五日來函，誦讀悉是。令兄嘉樂頓珠先生面告各節，尤感欣慰。西藏事變發生後，西藏同胞處境困難，實一日之忘懷，對西藏抗暴運動支持與救援，我政府自不遺餘力，今後自必續予以支持救援，以盡其職責，拯救藏胞於水深火熱之中。目前全國反共抗暴情勢愈形愈烈，勝利在望不遠，務希加強聯繫，隨時交換意見，無任企盼。

崑復順頌

時綏

蔣中正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四月五日

另外，民國五十三（一九六四）年六月十日第九屆中常會會議中又指出：

『達賴家族嘉樂頓珠等西藏獨立派份子，乃於四十九（一九六〇）年春在印度選舉出各教區各教派人民代表，同年九月成立西藏政府新組織，五十二（一九六三）年三月發表所謂『西藏憲法』，積極展開反漢反政府活動，並離間藏胞與中央關係。』

『關於西藏問題，我在聯合國歷屆常會中，強調所採行動，限於基本人權與自由暨藏胞之文化宗教生活方面，亦即贊成聯大對共匪暴行之譴責；惟反對聯大就西藏政治地位問題作任何討論或決議。目的即是反對西藏獨立，並注意達賴可能再向聯合國要求承認西藏『獨立』及準許『西藏』加入聯合國等事。』

會議中還提到關於西藏未來之政治制度與政治地位問題，我政府如不表明立場，即有默認西藏獨立之嫌，故我駐聯合國代表團宜針對達賴方面之說帖，向聯合國各會員國代表團，引述我蔣總統於三月廿六日告西藏同胞書之談話，說明我政府之立場。

國民黨中常會這些解密不久的資料散在各個會議記錄中，這些曾經列為『機密』文件如今都已泛黃，從這些散落文件中方可回溯當年台灣方面對西藏事務的立場。由於國民黨堅決反共、同時也堅決反對西藏獨立，這種令藏人感覺衝突的立場，讓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根本難與西藏流亡政府建立友善的互信關係。因此，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僅能暗中行動參與行動，情治人員便成為當時活動的主要份子，他們的工作目標，一方面是希望能促成西藏反共抗暴的勝利，另一方面則又希望杜絕『西藏獨立』有任何生存的空間。

在公開的計畫中，民國五十一（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一日的中常會會議記錄顯示：『為爭取留印優秀藏族青年子弟大量來台，依其素質及志願分別送入各軍事、政治學校或普通大專學校設立特別班，予以長期培養，儲備為光復大陸後重建西藏之基幹，為將來以政治方式解決西藏問題準備條件。同時，還計畫充實國立政治大學的邊政學系、興建西藏村、籌建喇嘛廟等工作計畫。』此外，台灣也曾收留一名流亡噶倫蘇康，出資成立一個『噶倫辦事處』。在立法院與國民大會，也都有穿藏袍的藏族代表。

而私下，卻因為當時國民黨一黨領政，西藏事務操縱在少數人手上，這些人投上所好，扭曲資訊，更支配台灣提供給西藏的各項支援。不但當時援藏的帳目不清惹來非議，在印度流亡社會更有『國民黨社區』出現，幾個藏人配合台灣情報工作人員的需要，讓台灣高層誤以為西藏工作已有進展；再加上又以假照片謊報摧毀中共軍事設施，甚至，白紙黑字呈報達賴喇嘛同意蔣總統的文告立場，以吹噓妄報炮製藏人心向國府『亟沐天恩，戮力勤王』的績效幻覺，以符合當時中土雖失、仍猛為上國的政治文化。

由於當時台灣威權政治文化使然，方使得目前才漸漸出土的國民黨中常會資料中，看到許多與真相有極大出入的資訊。台灣方面對於『西藏問題』從一開始就陷入意識型態的糾葛中，許多資訊都因『體察上意』而撰，既無真實而言，當然也就談不上什麼真正的了解了。

而在藏人內部，由於了解國共兩黨的內戰糾葛，當時西藏流亡社會也曾經尋求台灣方面的支援。拉莫才仁提到，嘉樂曾經寫信給台灣駐聯合國代表，這封信其實是他寫的，信中提到西藏問題已成國際問題，希望台灣能在聯合國中為西藏發言爭取獨立，台灣的力量可以幫助西藏人民。

後來他們得到的回音卻是：『對於獨立運動台灣不表關心』。嘉樂想，如果不支持獨立就不需要台灣幫忙，所以就沒有再聯絡。

但到了一九六三（民國五十二）年時，國防部第二廳派了一個巴塘人到大吉嶺，當時木斯塘總部就在大吉嶺。他建議藏人和台灣合作，由台灣來支援，台灣可以派電報聯絡員、指揮員等。但嘉樂說現在已不需要台灣派這些人員，也不需要台灣支援，西藏人可以自己來。拉莫才仁也說，如果台灣想做這些事也可以自己做，不料台灣卻採取了破壞行動。拉莫才仁說：

『結果台灣還是想派人去木斯塘，台灣在那裡有一個組織，並派了一個喇嘛來，因為我們把邊境都佔領了，所以台灣便把組織設在宗目附近，台灣的活動很小，如果他不破壞組織就與我們不相干。』

這個台灣派來的叫格德仁波切，但多數藏人不承認他是喇嘛，這人是個特務，帶了很多的信件，策反在木斯塘的藏軍，這事被發現後，很多信件被搜了出來，最後就把格德給槍斃了。

他們的文件和信號，都有我們的名字在上面，在木斯塘可能還有他們的特務組織，但我們只拿到文件，組織沒有破獲，文件中也找不到線索。

我對台灣第一個印像是，要反對共產黨這點在政治上我們是相同的，但台灣還是認為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那時我們不計較後者，但不了解，為什麼台灣要破壞我們已經組織起來的組織？為什麼要挑撥？當時台灣共策反了十六、七個藏人，這十六、七個人全被趕走，都去參加國民黨了。

另外那個巴塘人也在大吉嶺成立組織，嘉樂向他說請你不要介入木斯塘的事，我們已不需要台灣支持，但還是有一些藏人參加，同樣也是四水六嶺的人，參加的人後來也宣誓加入國民黨，宣誓那天牆上掛著蔣介石的照片，他因為回去要寫報告，結果每一個宣誓入黨的人都站在蔣介石的照片前，拍了照片寄回去。

這個秘密組織究竟發揮了什麼作用？我認為這個組織只是和台灣聯絡，與我們對立，為台灣工作就是反對西藏獨立，挑撥離間，還寫了信要他們離開。蒙藏委員會的人丹巴倫珠是台灣漢人，也是一份藏文報紙的負責人，最主要是利用報紙作掩護，並做情報工作，也儘量為台灣政府做宣傳。他們編造了一些假情報回台灣，在尼泊爾境邊破壞燒了一座橋後拍了照就寄回台灣，說已進入西藏境內，是燒毀中共的橋樑。』

因此，在木斯塘的遊擊訓練中，將台灣列為抗暴的次要敵人。嘉樂頓珠說，他知道在木斯塘一帶，台灣情治單位曾僱用流亡的印度難民，吸收幾個人，給他們槍、武器，讓他們去搗亂的事。他們有兩個據點，一個在尼泊爾境內，約是靠近木斯塘的地方，大概有十八、九個人在那裏做非法活動，結果木斯塘的工作人員要他們繳械。

還有另一個據點則是靠近大吉嶺，也有十一個人，他們就是去散發國民黨的傳單，不是真的到西藏去反對共產黨，我想也是有助於國民黨的宣傳吧！但卻說成國民黨在那裏也有遊擊隊。嘉樂說，這些事蒙藏委員會、國民黨中央黨部第二組、情報局、國防部第二廳都知道。

當時的木斯塘遊擊戰士卡列降巴說：

『當時敵人有三種，第一是我們的敵人中國軍隊，第二是無形的敵人，敵人用眼睛、耳朵來偵測我們的事，我們可能擺脫了敵人的槍口，但並沒有擺脫敵人的眼、耳、嘴，為什麼沒有擺脫？因為我們的一些事還是被發現了，因為一些偷聽、姦細，我們的話還是被偵測到了。

第三的次要敵人是指台灣，當時有十三個部（以貢唐催成為首）他們不向西藏政府納稅，他們的錢全都是台灣給的，不僅僅這些，還有些喇嘛拿到錢後開始咒罵西藏政府，找麻煩，這樣的事太多了。一九六三、四年開始，台灣大量的錢來，台灣還弄去幾個西藏噶倫，在台灣成立了噶廈。

錢都是從貢唐催成和他的秘書直接單線聯繫，大家都知道這個錢是從台灣來的，知道他們幹什麼事，都是在為台灣效勞，因為拿的是台灣的錢，所以他們鬧得很兇，所以十三部就分裂了。』

有關貢唐催成在藏人社會引發的風波一事，達拉朋措札西指出，貢唐催成是安多人，和他同鄉的次仁才巴多傑是國民黨情報局的工作人員。達賴喇嘛一到印度後，他們也跟著來到印度，因為他們兩人的安排，噶倫蘇康、嘉瑪桑佩、格列活佛等人才先後到台灣。

嘉樂頓珠則提到，西藏和台灣也許有一些關係，因為當時青海、四川、藏區和國民政府主政時期曾有過接觸，但共產黨來了後，這個關係切斷了，不過還是有些關係；當時西藏和美國根本沒有來往。嘉樂說，在西藏發生的事是民間自發的，並不是為了響應美國，也不是為了響應台灣。

嘉樂說，那時候有一個問題是，中華民國在國際上對西藏問題的宣傳，有些地方和流亡政府意見不一致。嘉樂頓珠提到他從西藏出來後，就常勸情報部門的工作人員，不應該用國民黨政府那種宣傳方法。因為共產黨一直說並不是西藏廣大人民反對共產黨，西藏廣大人民非常擁護共產黨，主要是反動三大領主一廟主、地主、貴族在反對他們，而且，西藏所有的抗暴都是美帝和國民黨特務挑撥離間發動起來的。

但台灣在進行國際宣傳時又說藏民也是為了反攻大陸，所有的藏民抗暴都是在國民黨政府的援助下發展出來的，這樣的說法對藏人相當不利。嘉樂指出：『國民政府這樣的宣傳和共產黨所說的剛好吻合，等於是支持共產黨對我們的譴責，但卻與事實不符。因此我常要求說，我們很願意接受中華民國政府的幫忙，很願意和中華民國政府合作，但宣傳方面一定要調整。

我的工作是要讓全世界的人了解藏族為什麼要反對中國共產黨？另外又是如何發展起來的？這期間不是因為國民黨，也不是美國人、印度人，也不是上面的貴族階級領導的，完全是民間自發的，他們都是普通的老百姓。我希望中華民國政府在國際上應發表明顯的聲明，說藏族是自發的，是為了自由、民主、保護自己的宗教、固有的文化，這樣才發動運動的。並不是國民黨鼓勵，或配合國民黨政府反攻大陸。

國民黨政府也難怪，因為在國際上來到台灣後，大陸的漢族很少有抗暴運動，都是藏區，我想情治單位、蔣先生也許想這是最好的機會，藏區就是為了反攻大陸的宣傳等。

當然當時與國民黨的情治單位有些關係，國民黨情治單位可能訓練了一些人，但是與我們毫無關係。我來過台灣好幾次，因為蔣先生那時已經老了，不太管事，我就勸經國先生不要這樣。

一九六二年中印發生戰爭時，印度政府那時非常希望我能幫他們的忙，希望我能秘密到台灣，去溝通印度情治單位和台灣情治單位間的關係，我說可以，台灣我熟人很多，我一九五二年勸的事他們沒做到，我再去勸一次，另外在一九六三、六四年我又秘密到台灣三次。我想台灣在藏區沒做特別壞的事情，當時我曾和經國先生溝通兩國關係，國民黨秘書長唐縱、安全局局長陳大慶情報局局長葉翔之都在場。我主要向經國先生說，假如台灣政府能採取開明的立場，為爭取自由民主的藏人向全世界呼籲，並且支持達賴喇嘛領導下的政府，總之不是談獨立而是講事實，這樣把中華民國政府的身分錶明，那我們很願意公開派代表來台灣台北設立辦事處，與中華民國政府聯繫，保持密切的關係。

我在一九六三、六四年時已談到這個問題，最後在外交部次長沈琦的家中，我和經國先生三個人吃了一頓中飯，決定了這件事。經國先生同意在我們離開十天後，他會發表這個宣言，即呼籲自由民主國家，支持達賴喇嘛。結果我離開十天後，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也許是情治單位覺得不應發表這樣的宣言吧！結果經國先生並沒有遵守諾言，我們從那時起就斷絕與台灣政府的關係，雙方官方的任何關係都沒有，一直到一九九一年才恢復。』

從美國國務院一九六八年的歷史檔案中，卻有一封蔣經國與美國駐台大使馬康納在當年二月十二日會談的備忘錄，蔣經國並且在此次會談中提到西藏情勢。這份機密文件指出，蔣經國說，西藏情勢令他非常關切，他說他從中華民國情報單位得到有關西藏內部有嚴重困難的報告，很可能因為食物短缺而雪上加霜。蔣經國認為，美國政府應該密切注意此項情勢發展，依他判斷，部分西藏異議份子可能會向印度求援，中共勢必會對西藏進行更高壓的箝制，如果他們無法獲得援助，異議份子可能會被掃蕩。

馬康納大使則向蔣經國表示，印度現在在國內也有難題，不太願意採取可能激怒中共的作法。蔣經國表示同意印度不會如此做，然而，他覺得，這應該是可資利用的機會，他認為英國情報單位可能才更多有關西藏情勢的資訊。蔣經國還建議，美國應該強化在西藏的情報活動：『以期了解如何協助藏人完成獨立』。

還有一個更機密的行動是，當時台灣政府曾招募流亡西藏青年，秘密來台灣接受情治訓練，並計畫在適當的時機將他們空投回大陸，以進行各項敵後活動。現在住在台灣的羅桑嘉措與丹巴，都是當時參加此一秘密訓練的西藏青年，丹巴在保密了四十年之後，第一次透露了這個歷史秘辛。

在西藏完全受到中國軍隊控制後，丹巴一直向印度方向逃過來，一路上有兩次遭逢中國軍隊，真沒想到能夠逃出來，到了南方後丹巴心情稍微輕鬆一點，因為那裡有四水六嶺的人，然後到了印度邊界時，印度軍隊要求藏人交出武器，這樣丹巴就進入印度了。

丹巴在印度碰到一個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工作人員，他們叫他蔡定中，他與部分西藏難民接頭，並說可以去台灣接受訓練，另外有幾個人不是同一單位的，其中有一部分是情報局管道的，還有幾個好像是安全局和美國情治單位合作的。丹巴說：

『我先是在錫金修公路，那裡有很多西藏抗暴軍在修路，我故意謊報自己的年齡已三十歲，才能修路，在錫金要回西藏很方便，很多人於是都謊報自己的年齡。

蔡定中和我是一個家鄉的，他是藏人，大陸撤退後到台灣，但因工作關係又到印度，在那裡碰到我們這些同鄉。我們逃到印度後成為難民，就聚在一起，他問我們想不想到台灣去，也提到接受訓練的事，我們去台灣的證件都是這個人辦的。

我在修路時有信來，要我們馬上到噶倫堡，可能有辦法到台灣去。到印度後我們馬上去照相，很快就將照片寄給蔡定中，就拿到台灣入境證了。我們什麼也沒有，兩手空空的來到台灣。當時和國民黨中央黨部一起來台灣的共有八、九個人。

羅桑是情報局安排坐船到台灣的，船票等手續是公家辦的，我們是蔡定中買飛機票、拍照片先到台灣辦入境證，然後坐飛機到香港再到台灣，另外有安全局找來的人也是坐飛機到台灣的。

我是民國四十九（一九六〇）年四月十五日來到台灣的，到五十（一九六一）年五月一日時，三個單位的西藏人一起到淡水（海）的一個訓練班，這是國家安全局的幹部訓練班，三個單位的西藏人一起訓練，一共是三十二個人。

從民國五十（一九六一）年五月到五十二（一九六三）年二月份為受訓期間，一直都在接受訓練。學的內容主要是打遊擊，訓練時有一個翻譯官張至中擔任翻譯。

我們來時心想回去的目的是抗暴，我是想如果訓練好就回去，會有一些希望，大家來的時候都是這麼想。

訓練時，政治思想的課方面有時會說：『中華民國是五族共和。』但並沒有說過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西藏不能獨立等。

嘉瑪桑佩是我們西藏抗暴軍的副總司令，但當時他的年齡已大，不可能真的到西藏去抗暴，我們三十二個人是屬於一個機構，是『川、甘、青、康邊疆幹部訓練班』，訓練的內容就是打靶、爆破（如何破壞橋樑）、汽車駕駛、山地訓練（如爬山、過河）、跳傘訓練、等於是特種部隊的都訓練過了。

天天帶我們到海邊教我們如何使用炸藥、如何安裝等。

張至中（漢人）以前在西藏地區是搞情報，在西藏住了好幾年，會藏語，後來到印度，回到台灣，又到印度，在印度開個小飯館做掩護，我們回台灣後他就負責翻譯。

從民國五十（一九六一）年五月到民國五十二（一九六三）年二月，我們都住在淡海，三十二個人都住在一起，成員中有西康省、青海省、甘肅省、四川省的，沒有西藏自治區的人，但我們並沒有被賦予抗暴軍的名稱。我們的工作當時都是保密的，現在這個地方可能沒有了。

原來台灣政府的意思是希望我們馬上回去，去西藏也好、青海也好，西康、甘肅、四川都行，我們的目標正是這些地方，政府也這麼想，計畫也是這樣。我們接受訓練完後，並不是要住在台灣，是要馬上回去的。

但後來情勢改變了，西藏內部已經沒有人接應，沒辦法回去了，所以從民國五十二年時就開始分配工作，有興趣到哪個單位的就去哪個單位，反正回去的希望沒有了。本來一開始有規定我們在台灣不能成家，後來沒有辦法才結婚。

我決定到台灣時，家人都不知道，一直到民國七十一年，我的家人才知道我在台灣，在這之前我是生是死他們都不知道。現在局勢完全改變了，三十二個人中剩下沒幾個了，有些都已經過世了。』

目前已經在台灣定居、並且娶了台灣媳婦的丹巴說，他們三十二個人中沒有人再回去西藏抗暴，他們藏人也曾問為什麼不能回去，丹巴說：『我的家鄉有人說看到國民黨的人，還把武器空投到家鄉中，但家鄉裡面已經沒有人，我們回去能做什麼，回去的希望沒有了。』

在台灣自知已無力支援西藏抗暴後，整個軍事情報行動也漸漸淡了下來，原來被秘密招攬到台灣受訓的，台灣也為他們找了個國文老師，開始教他們中文，並且安插他們到情報局等各個部門工作。丹巴說，民國七九（一九九〇）年後這些藏人大部分都退休了。現在大約有三、四個還留在台灣，其他有的在國外，也有四個人回去大陸，丹巴則曾回甘肅藏人區探親兩次。

最後丹巴是從情報局退下來的，他神色黯然地說：『我們到台灣，藏人對我們好像比對共產黨還不諒解，我們來台灣也不是為反對西藏政府，主要意思還是要回到西藏繼續打仗，那時蔣經國是訓練班名義上的主任。很可惜訓練後無處可用，退休的退休，死的死，現在已沒幾個人在台灣了。』

不過，雖然台灣在軍事與政治上因為意識型態而成為西藏抗暴軍的次要敵人，但在西藏人抗暴而後流浪印度、尼泊爾等異地的日子裏，不管是基於何種理由，台灣也曾經伸出援手救助西藏孩童，先後共有一百零二名孩子離開父母、被接來台灣，並被安頓在『西藏兒童之家』中。

這項政策最大的利益是，雖然這些藏童在印度、尼泊爾的父母只擁有難民的身分，但孩子來台灣後卻立刻就可拿到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當西藏難民在印度連擔任公職的資格都沒有時，理論上在台灣的藏人卻因為有中華民國國籍而有當總統的機會。

根據當時負責這項業務的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顧問湯鎮熹指出，當時西藏同胞在印度、尼泊爾的小孩沒有機會學中文，印度、尼泊爾政府也不容許中文學校的存在，於是有人提出構想後便開始接孩子來台灣讀書，而且人數不斷增加。湯鎮熹說，這些孩子主要是透過『印度華僑總會』會長葉幹中、以及羅桑嘉措去尋找需要幫助的孩子。

羅桑嘉措是台灣情報局的藏族工作人員，曾經在情報局接受通訊、電報、炸藥與策反等工作，孰料這些訓練沒有派上用場，後來卻接受救總委託從事西藏兒童的輔導工作。因為救總沒有人懂得藏語，於是會說中文的羅桑嘉措與妻子蔡嘉便開始協助救總進行救助工作。

羅桑嘉措說，這個構想是救總理事長谷正綱想出來要他去做的。谷正綱認為漢滿蒙回藏本是一家，於是他先在中和自己家裏成立西藏兒童之家，共有十三、四名孩子，救總每個月給每個孩子八百元的補助。

民國六十九（一九八〇）年九月七日，在台北市虎林街的『西藏兒童之家』正式成立，一開始有十七名兒童搬入其中，以後孩子陸續增加，最多達一百零二人。民國八十（一九九一）年時，因為救總面臨預算問題，蒙藏委員會也主動要求接辦此一業務，因此從八十年起，這群西藏兒童的家長便從救災總會變成蒙藏委員會。

只是，這一百零二個西藏小孩極罕見地在台灣長大，卻深刻感受到這裡並不是自己的家；一些已經長大的西藏小孩說，小學時有小朋友不解地問他們：『這裏不是你們的國家，幹嘛還留在這裏？』有的孩子提到他們小時候被同學借錢，同學會說：『幹嘛還你錢，我的父母都在繳稅。』

有西藏孩子疑惑台灣人做事講究關係，找工作還要問爸媽在做什麼？有台灣人對他們四個字的名字很好奇，因此一些西藏人都有改名的念頭。西藏兒童之家中只有少數人升上大學，輔導員吉美也認為最主要原因是：『從小壓力太大，根本書都讀不進去。』

二十年來沒有太多人注意，孩子都已經長大成人，不再是兒童。如今，原西藏兒童之家僅剩斑駁的招牌與空了的臥室，這群西藏孩子大部分仍留在台灣，不過，這些幸運來台的西藏兒童，只有少數人以求學為重，超過一半以上的人以國中程度就投入台灣激烈的就業市場。

根據蒙藏委員會現有統計，在一百零二名西藏兒童中，在民國八十六年九月間共有二十一人尚在就學，其中大專、大學生兩人，高職教育日夜間部共十四人、國中生五人；此外，有十一人正在服兵役，二人在監獄服刑，一人定居美國，十餘人在印度、尼泊爾與台灣間來來往往。另外，則有高達五十餘人正在國內就業。

西藏兒童有了身分證後，多半不願回去印度、尼泊爾，已經就業者更因為流動性極高，換工作時就跟著換居住的地方，變動性極大。因此僅有就學的十餘人尚接受蒙藏委員會救助，一部分住在台北市中坡南路，另一部分住在台北市杭州南路。中坡南路住戶外掛著『西藏文化中心』招牌，杭州南路則悄悄收起西藏兒童之家的招牌，外表上全然看不出他們特殊的背景。

民國六十八、九（一九七九、八〇）年對於西藏兒童人道的援助，固然有些政治宣示的味道，但仍有培植民族幼苗的若干善意，卻因為來的都是小孩，所以也出現種種後遺症。杭州南路的輔導員鄭惠娟表示，她從與孩子接觸中發現，很多問題是因孩子太小就來台灣，有的孩子五、六年才回去一次，有兩個姊妹家人的資料因為沒有保存好，到現在無法與家人聯絡，她深覺太小就將孩子接過來實在造成了一些問題。

這些在台灣西藏兒童沒有父母照顧，和台灣社會完全缺乏脈絡連繫，多數無法適應社會激烈的競爭，有些課業成績低落，連帶造成行為偏差。有的也出現國家民族認同上的問題，也有部分人不願當兵，對社會的價值觀不易確立。

超過一半的西藏孩子在學業僅達國中程度就快速投入就業市場成為這項救助工作最大的無奈。但西藏孩子輟學原因很多，其中一個原因是，台灣社會高度的物質誘惑曾經令這群孩子難以阻擋，也有孩子因此堅持打工而失學，讓工作人員覺得非常無奈。

又碰上台灣泡沫經濟膨脹、物質生活指數上升，兒童在西藏兒童之家出現各種偏差行為，管理上極為困難。原本是希望這些孩子在學業完成後能夠到原居地服務，但現在孩子都散居各地，不願回去了。

一名五歲就來台灣的西藏孩子說，他是一個領有台灣身分證的西藏人，心裡最大的希望就是畢業後在台灣賺錢，然後把錢寄回尼泊爾。

鄭惠娟說，孩子最希望的是可以常回去，在台灣不太希望人家知道他們是藏人，孩子也會要求在班上不要提他們的背景。有的會在認識新朋友時，自己先取一個三個字的新名字。

現年十九歲、不願透露姓名的青年說，在他九歲時進了救總的『西藏兒童之家』，現在才剛剛獲准將父母接來台灣居住，如今他的中文說得比藏語好，他還記得自己的西藏人身分，但是別人問起他會說自己是台灣人，只是，西藏人的名字有四個字，看起來就像外國人一樣，他很不喜歡這種感覺，他很希望可以改個名字。

一個西藏小女孩說，小時候她們經常要穿著藏服被拍照，無法拒絕，現在她們長大了，一定要好好保護自己。

同時，如果不是達賴喇嘛在一九九七年來台灣進行宗教訪問，多數忙碌的台灣人可能不知道有西藏人在台灣的事實；甚至遠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也不清楚，西藏人來台人數正在不斷增加之中，人數甚至直逼在美國、瑞士等自由國家的流亡藏人數量。

此外，隨著藏傳佛教傳入台灣的熱潮，西藏喇嘛來台弘法的情況也愈來愈熱烈，目前平均一年就超過一千人次。

根據蒙藏委員會藏事處處長陳又新指出，台灣西藏人目前登記有案的公民數共有二百四十六人，另外又有百餘人雖然沒有登記，但亦持有國民身分證。而更引人注意是，因為流亡藏人認為在台灣賺錢較為容易，因而亦有百餘名西藏人以非法方式入境然後在台灣非法打工，過著與警察抓迷藏的日子。

蒙藏委員會藏族委員覺安慈仁卻認為，沒有身分的在台藏人約有兩百五十人；他指出，這些人多是逾期居留，在台北縣的各個鄰近縣市打工賺錢，很想讓自己慢慢『台灣化』，進而取得在台合法居留權。

這些在台灣的西藏人人數極少，幾百人的數量已經完全隱藏在二千萬的四大族群中。而且，他們多數不會說中文，從他們四個字的名字結構很容易就發現他們是外來客。又因為他們在台灣多是從事工廠勞力工作，基層藍領的工作型態讓他們永遠是社會沈默的角落。即使如此，與十餘萬流亡在印度、尼泊爾的西藏人相比，台灣仍是一個不錯的新家，因此，到現在還有部分西藏人從尼泊爾購買假護照入境，目的就是想在台灣打工賺錢。

已經持有身分證的仁增沙令指出，雖然他們有身分證，但是台灣的老闆還是把他們當成外勞看，而且因為他們的名字不一樣，講話的腔調也不一樣，但他們的薪水就比其他台灣人少。

藏人巴亞瑪則是到台灣已經一年多以後才拿到身分證。他表示，在拿到身分證後終於可以過著不怕警察的日子，又可以隨時回印度，以後又可能就在台灣長期居留了。

另外的藏人嘉歐就沒有那麼幸運，他來台灣已經三年多，但到現在還是沒有身分證的黑戶，也因此根本無法回印度探親。嘉歐說，為了來台灣，藏人可從尼泊爾買假護照，以觀光簽證入境後逾期居留，有不少非法入境的西藏人都是以此管道矇騙入關的。但他們現在都很希望可以在台灣就地合法化，因為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做台灣的公民。

然而，多數西藏人在台灣都面臨語言上的問題，二十餘歲的仁青沙令說，她很喜歡台灣，回印度探親時也會想念台灣，現在她會講一點點中文，卻完全看不懂中文報紙，但是她們已有身分證，也覺得自己是台灣人，台灣就像是自己的國家一樣。

只是，仁青沙令說，每次當她說自己是台灣人時，別人就會用懷疑的眼光看她。

第十三章 藏獨的來龍去脈

西藏問題在最近幾年似乎成為美國好萊塢的時髦，第一部以西藏問題為主軸拍攝的電影『在藏七年』（台灣翻譯為火線大逃亡），全世界透過好萊塢電影銷售系統，都能欣賞到這部現實而敏感的西藏電影，就連西藏流亡政府所在的達蘭莎拉，也透過內部使用的有線電視線路，讓多數流亡藏人觀賞到這部期待已久的電影，西藏問題也第一次以通俗電影的手法被帶到全世界。

然而，正因為題材敏感，這部電影從一開拍就受到中國北京的強烈反對，後來人民日報海外版更大幅報導這部美國影片內容捏造事實，毫無真實性可言。報導中提到影片中嚴重歪曲中國官員形象與當初那段歷史，並且為了抬高主角德屬澳地利人亨利的角色，不惜貶抑西藏人，看了令人氣憤。

了解西藏歷史的藏人也明白電影劇情確有與真實不符之處，例如片中過度強調西藏人的落後原始，也未忠於西藏的歷史真實，不過藏人不但不氣憤，反而心存感激，關於電影中的歷史謬誤，他們都不計較，但是他們卻特別注意到，觀眾們可以在這部電影中，從西藏人可以拒絕外國人入境一事，就可知道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甚至影片最後出現的雪山獅子旗的西藏國旗，更可看出西方人對『西藏獨立』所採取的同情立場。而流亡藏人在現實中雖可在國外經常看到雪山獅子旗，但對於剛剛逃出來的藏人而言，內心更會發出強烈的震撼。

然而，這個令中國咬牙切齒的『西藏獨立』概念，其實是近一百年來的事，也是西藏尋求自主化發展的重要轉捩點。但，令西藏人悵惘的是，『西藏獨立』雖激發出藏人足以自傲的民族意識，卻也不斷提醒著中國軍隊曾經兩次大舉入侵的痛苦記憶，前後兩世達賴喇嘛還因此被迫流亡。現在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前世一十三世達賴喇嘛，在廿世紀初年就曾經流亡印度，第一次向中國喊出『西藏獨立』的聲音。

如今，隨著十四世達賴喇嘛四十年的流亡歲月，更讓『西藏獨立』成為國際話題，無論是西方政壇或是好萊塢銀幕，都聽得到這個高原民族、在失去地平線後的無助吶喊。

半個世紀以來，西藏的宗教歷史受到中國社會主義的強烈衝擊，而在他們流亡四十年後，政教合一的傳統也面臨最深刻的反省。更特別的是，藏族的民族國家意識恐怕是拜中國的刺刀與槍口之賜才產生的，在西藏歷史上，這還是第一次。

我們可以從歷史中了解到，如果沒有中國的入侵，就沒有西藏政教領袖流亡的恥辱；如果不是親身經歷了亡國、失去家園的痛苦，在藏人世世代代的佛教誦經聲中，根本聽不到『西藏獨立』的政治主張。

但目前中國對西藏主權歸屬的主張卻不是這樣，中國一再宣稱：『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究其立論，中國方面認為，西藏與中國除了自唐朝漢藏間的王室聯婚建立起友好關係後，到了十三世紀中葉，西藏正式歸入中國元朝版圖；明朝接替元朝後，當然繼承了治理西藏的權力；而清朝時代的皇帝曾經分別冊封五世達賴喇嘛與五世班禪，同時更確立『金瓶掣籤』制度，實質掌握決定西藏轉世靈童的地位。而且，在舉行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的坐床和親政大典時，中國中央都會派大員親臨監禮。

到了辛亥革命後的中華民國時，中央政府也一如前三朝般地設立蒙藏事務局，主管西藏地方事務；後來則又於一九二九年設立蒙藏委員會，主管藏族、蒙古族等少數民族地區行政事宜。而在十四世達賴喇嘛被選為轉世靈童時，經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到拉薩察看後，中央政府還特別同意免於金瓶掣籤的申請，而由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正式頒布命令，批准這名年僅兩歲的靈童為達賴喇嘛。

可以理解的是，即使歷史上有部分證據可以說明西藏曾經是中國的屬國，但藏人在情感上，多半不願接受這樣的詮釋，甚至這些歷史回顧在藏人的政治理解中，可以完全是另一種解釋。藏人認為，歷史上即使西藏曾對中國表現臣服，也僅屬尊崇有禮之態，未必有主權歸屬之義。藏人這樣的思想或許不見容於政治主權概念的解釋，但藏人的確覺得要對中原的統治者客氣些，卻也不認為中原的統治者會干涉西藏事務。這些互相矛盾的政治概念卻正是孤立於高原之上的一個政治真實。

對西藏人而言，在過去讀經唸佛的日子裡，從來沒有什麼『獨立』思想，而『西藏獨立』思想的萌芽，則是在十三世達賴喇嘛的流亡後才開始。

中國駐藏軍隊從一九〇四年便與由印度北上的英軍作戰，戰勝的英軍進入拉薩，十三世達賴喇嘛被迫逃亡外蒙古。幾乎在此同時，中國軍隊也從四川進入西藏，由趙爾豐率領的滿清新軍攻城略地，佔據了大部分康區。

十三世達賴喇嘛在英軍退出後準備返回西藏，但由於滿清軍隊佔領康區，又設立郡縣直接統治，因此前往北京交涉，結果滿清要十三世達賴喇嘛行臣禮，見皇帝要三拜九叩，為達賴喇嘛所拒絕，為此雙方會面的日期一拖再拖，最後達賴喇嘛以單腳跪拜勉強赴會。

不久，達賴喇嘛返回西藏，但回到拉薩還不到兩個月，滿清軍隊便跟著侵入，西藏人雖有抗拒，卻終究不是中國的對手，滿清政府佔領西藏，十三世達賴喇嘛又再度逃亡，這次反而是在英國統治的印度中得到庇護。在滿清與西藏間第一次大規模衝突後，雙方至此成為仇敵。

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後，立刻從印度加爾各答發了七次打電報要求滿清政府撤軍，滿清不予理會，同時宣布罷去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名號和職務。由此，達賴喇嘛不再與滿清交涉，西藏獨立思想從此刻開始萌生。

西藏人認為，一九一二年是西藏從中國手中，爭取到獨立地位的重要時刻。一九一一年，中國發生辛亥革命，達賴喇嘛在印度噶倫堡發表聲明：『此雪山之域為觀世音教化之地，我根據歷輩達賴喇嘛的規矩做為全部政教的主人而履行..。』一九一二年二月五日，在拉薩的中國軍隊進攻色拉寺，遭到在拉薩的康巴人與寺僧的頑強抵抗，由此拉開了西藏僧俗驅逐中國軍隊的序幕，而僧兵更是作戰的主力，最後中國戰敗。

隨後，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派人來，並宣布恢復達賴喇嘛的名號與職務，但達賴喇嘛以『我就是西藏的統治者』予以拒絕。當達賴喇嘛返回西藏後，在一九一八年發表一份宣告，這份宣告甚至被西藏人視之為『獨立宣言』。達賴喇嘛在宣告中提到西藏人應繼續努力，趕走中國軍隊，又特別宣示中藏之間只有『檀越關係』，而非『從屬關係』。同時還宣稱：『西藏雖沒有其他國家般的強盛，但卻是一個符合教法、和平的自由國家，..不要忘了中國軍隊不是主人卻強行侵佔西藏』等主張。

由此可知，西藏第一次出現獨立思想，正是滿清軍隊入侵，第一次造成西藏『亡國』的時候起。從這時開始，西藏獨立的概念才開始出現在西藏辭語中，不過仍僅僅為藏人精英所運用，一般民眾尚無此政治啟蒙。

護送達賴喇嘛逃亡的達拉朋措札西曾經想起一段故事，過去中國政府在西藏設有廣播電台，當時分別以英文、藏文、和中文三種語言廣播。由於當時達賴喇嘛還未正式掌權，攝政王有一次透過秘書把達拉找了去，說以後要多聽中國方面的訊息，並且要加以研究，達拉也針對廣播內容做了些報告，如中國在北方如何、在南方如何等，當時還是國民黨時代，以後中國可能會有危險，西藏說不定也會被中國佔領等。

但當時攝政王的反應是：『絕對不會，因為我們有我們的護法神，我們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

達拉說，由此可知，在當時西藏官員的想法中，早有『西藏獨立』的概念，很早以前就有。但是西藏缺乏現代國際知識，就只是想我們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以為說獨立就什麼都辦得到，在當時是封閉的狀態下，官員的思想也比較落伍，這是不可否認的。

十四世達賴喇嘛也曾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我們在一九一二年取得完全獨立時，我們滿足於回到孤立。我們從來沒有想到，我們的獨立，這對我們是一個如此明朗的事實，對外界卻需要合法的證據。假使我們申請加入國聯或聯合國，在我們的危險來到之前，我們若向一些領導國家指派大使，我肯定這些主權標誌會不成問題地得到接受，而我們此一危機的明顯公義就不會被蒙蔽。』

達賴喇嘛說：『現在，我們得學會此一痛苦教訓，世界已小得不容任何人維持在毫無傷害的孤立裡。』

此外，透過對西藏近半世紀抗暴史的回顧後，即可理解，『西藏獨立』概念雖被發源於近百年前十三世達賴喇嘛逐出滿清軍隊起，但『西藏獨立』思想的普及於一般藏民，則是由近五十年抗暴運動所滋生。

當西藏精英領導者普遍存有獨立概念時，一般普羅的國家觀念依然十分薄弱。從拉薩抗暴起，主張『西藏獨立』的組織數量極少，『西藏人民議會』是最主要的組織，而且都是由知識精英所組成。但直到一九五〇年共產中國入侵西藏後，由於藏人的宗教與家園受到嚴重破壞，『獨立』觀念才普遍被激起。目前流亡尼泊爾的四水六嶺戰士恰成丹巴就說：

『說個心裡話，當時我們年輕，並不怎麼懂得獨立，從我母親那一代，就是幫政府收稅的，稅指的都是糧食，要賒。後來西藏貴族不理我們了，中央叫蔣介石的派了人來，又說不收稅了，非常有計策的給我們很多的好處，讓我們隨心所欲，所以也不覺得要反抗。後來共產黨來了，我們作戰當然是為了獨立，但獨立是後來才知道的。』

另一四水六嶺戰士卡列祥巴也說，獨立的說法在當時是想不到的，他的家鄉先是國民黨來了，但來了一下就走了，不騷擾也不理老百姓，對老百姓並沒有太大的妨害。後來共產黨來了，才感覺到自己的家鄉不再屬於自己，所以才開始打仗，才知道獨立的道理。卡列祥巴說：

『原來沒有人提西藏獨立，是因為西藏本來就是獨立的，我們的地方西藏政府不理我們，不派官員過來，國民黨來一下就走了，我們都是自己過自己的。但那時西藏在金沙江以西是獨立的，只有在五九年後才完全失去獨立，所以要恢復獨立。

拉薩失守後，西藏政府在家鄉已經垮台了，這時要恢復自己獨立地位的說法就上來了。』

『木斯塘遊擊基地』總指揮根益西則指出，一般老百姓並不知道『獨立』這個名辭，但談到家鄉時，老百姓認為西藏方面要恢復原有的權利，至於獨立，是老百姓到印度後，西藏政府官員和其他有知識的人告訴大家，人民才開始使用獨立這個辭。

繼西藏因抗暴滋生『西藏獨立』的思想後，流亡印度的西藏政府除了透過達賴喇嘛訪問世界各地以使西藏問題受到國際重視外，西藏政府也於一九六一年發表西藏憲法草案，以象徵國家主權獨立。

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後，印度政府對流亡藏胞提供了人道援助，緊接達賴喇嘛也開始進行政治方面的佈局，即在印度建立西藏流亡政府。然而，流亡藏人在政治上的每一步都走得極為辛苦，到現在由達賴喇嘛所領導的流亡政府，依然得不到任何的官方承認。

國務院中央檔案的機密文件中，提到達賴喇嘛二哥嘉樂頓珠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七日與副次卿詹森會談中，提到達賴喇嘛近種目標是在印度建立流亡政府，同時，達賴喇嘛也央求美國政府重新檢視其立場，並且鼓勵印度對藏人採取政治、而非僅是人道的立場。

爾後，美國國務院在一九六六年三月廿三日在拍發給美駐印度大使館的電報中，正式就此事做出答覆；電報中指出，美國不願意涉入達賴喇嘛流亡政府的行動，電報中說：『我方已經再度檢視本身立場，並從我方觀點作成結論，達賴喇嘛改變地位一事玩不起，事實上，改變地位可能將失去若干支持，若就我們與印度現階段的雙邊關係，我方也無意向印度政府提議這項敏感的議程。』

美方還在這份電報中表示達賴喇嘛在採取任何行動之前，應該對問題做全盤考量，美方認為，不論是從美方、印度與藏人角度來看，達賴喇嘛改變地位的實質利益非常少，無論就其與聯合國、友邦、中華民國政府、或中共打交道皆然。美方更認為，此舉可能大為不利，可能對承認中共的英國和瑞士的藏人辦公室處境不利，並可能阻礙其他辦公室的設立。但是，美國國務院仍然要求駐印度大使向嘉樂頓珠保證，美國政府依然會堅決致力於公道及和平之道，以解決西藏問題。

因此，藏人在流亡四十年間，西藏流亡政府更在美國的紐約與華盛頓、英、法、瑞士、匈牙利、墨西哥、日本、澳洲、尼泊爾、印度、台灣等設立了辦事處，目的即是希望透過國際辦事處得到支持。

然而，流亡政府雖然成功地將西藏問題推展為國際焦點，但是基於政治的現實，到目前為止，在政治上並無人承認或支持流亡政府，十餘個辦事處也只能巧立各種名目登記。

西藏外交部助理秘書長土丹桑佩說，流亡政府在美國的兩個辦事處是向司法部門登記，但是美國政府並不承認這是西藏政府的辦事處；在澳洲則是與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享有同等地位，屬於半承認的政府；而在其他國家的辦事處也都不被地主國承認，官方都不與辦事處接觸，但也不阻止流亡政府的各項活動。

流亡政府最新的一個辦事處設立在台灣；一九九七年，流亡政府以『西藏達賴喇嘛宗教文化基金會』名義，在台北成立辦事處，雖是一個向內政部登記的宗教團體，但同時也是達賴喇嘛在台灣的辦公室。與其他國家經驗不同的是，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李登輝總統，更在基金會開幕時親自到場表示歡迎，這個善意表現為其他國家所罕見。

而且，和其他國家不同的是，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設有官方機構『蒙藏事務委員會』，每年均編列預算進行援藏事務，按理應有更多資源可以運用，但達賴喇嘛在台辦公室卻刻意迴避這個機構，轉而以宗教名義登記，由此更可看出西藏流亡

政府與蒙藏委員會之間的裂痕。最主要原因，除了『蒙藏委員會』的存在即已假設『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外，蒙藏委員會在藏人流亡後，因為政治宣傳以及金錢不當介入引發藏人社會反感，都是原因。

同時，在江澤民宣布達賴喇嘛必須接受『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與『台灣是中國的一省』作為雙方談判的兩個前提後，『中藏關係』與『台藏關係』似乎處於衝突點上。針對這件事，達賴喇嘛在接受作者訪問時也表示，在他的想法中，西藏與台灣之間只有宗教關係，因此他的第一次訪台實為宗教之旅，未來也可在宗教關係上繼續發展，但雙方並無政治關係。

儘管如此，流亡政府外交部秘書長丹巴才仁指出，流亡政府是一九五九年西藏政權的延續，做為一個政府，首先要得到人民的承認，到現在西藏人不管在那一個角落，都承認西藏流亡政府是他們唯一的政府。不過，藏人也了解到其他國家基於自己的利益，不能承認流亡政府是一個政府，而只是達賴喇嘛的個人機構。

世界上有許多的流亡政權、流亡者，有家歸不得是他們最大的痛苦。在達賴喇嘛流亡將近廿年以後，從一九七七年起，中國才開始公開宣布歡迎達賴喇嘛以及逃亡的西藏人回去。一九八九年初，中國指出當班禪大師圓寂時，中共考慮到歷世達賴、班禪互為師徒的歷史宗教關係，經中央政府同意後，中國佛教會邀請達賴喇嘛回國參加班禪大師的追悼活動。但中國方面說，達賴喇嘛拒絕了這項邀請。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廿八日，中國國家主席鄧小平在會見美聯社記者時說：『達賴可以回來，但他要做為中國公民』、『我們的要求就只有一個—愛國，而且我們提出愛國不分先後』，以藉此表明有條件地歡迎達賴喇嘛回歸的態度。

在此期間，中國與西藏流亡政府也不斷透過私下管道，協議雙方進行談判的可能，達賴喇嘛也在此時提出派遣考察團前往西藏的提議。

於是，從一九七九年，共有三支訪問團到大陸進行訪問。一九七九年八月，西藏流亡政府五人考察團在北京停留二個星期，考察西藏四個月；一九八〇年五月，兩支考察團分別從印度前往西藏。但第二支考察團被中國以『挑撥群眾造反，危及祖國統一』的罪名驅逐出境；另外第三支教育考察團則於一九八〇年十月返回達蘭沙拉。

一九七九年二月廿八日，達賴喇嘛派代表回國與中國接觸時，鄧小平在會見達賴喇嘛的代表時明確表示：『歡迎達賴喇嘛回來，回來以後還可以出去。』對於中國與達賴喇嘛談判的問題，鄧小平說：『現在是以西藏是一個國家與中央對話、還是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來討論處理一些問題？這是個現實的問題。』

但，鄧小平說：『根本問題是，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對與不對，要用這個標準來判斷。』

一九八四年時，中國總理胡耀邦也曾經公開宣布表示：『歡迎達賴喇嘛回去，不過若現在不想回去，以後回去也可以...如果要做官，則在北京做，不要在西藏做。』

直到較近的一九九八年七月，當美國總統柯林頓結束北京訪問，並與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上海舉行聯合記者會時，江澤明回答記者問題時指出：『只要達賴喇嘛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及同意『台灣是中國的一省』，則談判大門永遠是敞開的。』

從鄧小平、胡耀邦、到江澤民的談話可以了解，早從七〇年代末期開始，中共就是以『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做為漢藏談判主軸，這個主權立場至今未變。

無奈的是，政治現實終是遵循權力大小與弱肉強食等法則，因而，肩負著西藏前途的達賴喇嘛一直思考著西藏的未來，讓人注意到的是，達賴喇嘛從過去一向堅持西藏獨立的觀念裡，慢慢放棄獨立主張，而改談自治。

從七〇年代末期開始，達賴喇嘛已經用『西藏人民的幸福』此一概念替代『西藏獨立』，從此，在達賴喇嘛的講話中，凡是有關西藏的前途時，都是一直強調『西藏人民的幸福』，幾乎就已經避口不談獨立了。一九八七年九月廿一日，達賴喇嘛在美國華盛頓，提出了『有關西藏問題五點和平計畫聲明』，這份計畫的五個基本部分為：

『一、將全西藏（包括康區和安多兩個東部省分）轉化為非暴力區；二、放棄威脅西藏人民作為『人』而生存之中國人口轉移政策；三、尊重西藏人民之基本人權與民主自由；四、恢復及保護西藏自然環境及放棄中國利用西藏生產核子武器及棄置核子廢料；五、開始有關西藏未來之地位及西藏人民與中國人民關係之真誠磋商。』

更關鍵的是，達賴喇嘛在第二年、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五日在法國斯特拉斯堡發表演說，這次演說除了再一次強調西藏人與中國人間應舉行認真的談判外，更首次提議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繼續負責西藏的外交政策，同時，中國可以享有在西藏保持有限數量的軍事設施的權利，這項設施必須完全用於防衛目的。

但是，西藏政府應該通過它自己的外事局發展和保持在宗教、通商、教育、文化、旅遊、科學、體育等方面，以及其他非政治性活動的對外關係。同時，西藏應該參加與這些活動有關的國際組織。

這個演說明白透露達賴喇嘛有關西藏地區『一國兩制』的主張，繼一九五一年十七條協議首次提出『一國兩制』的雛型失敗之後，為了帶領流亡藏民重返家園，維繫已經破敗的西藏佛教，達賴喇嘛終於在部分流亡西藏人民的強烈反對下，放棄西藏獨立的立場，並盼望中共能回應他一國兩制的主張。

因此，一直到現在，達賴喇嘛經常對流亡藏胞說：『五十年前，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我們有要求獨立的權利。雖然，西藏人民從心裡厭惡中國政府，但是西藏地大人少，若從資金、技術角度看，要靠西藏自己的力量發展很困難。因此為了西藏需要發展，便要 and 中國政府聯合起來，由藏人自己發展文化，而軍隊、國防等涉及暴力的事就交由中國幫忙，如果真正這樣，中國就不用擔心西藏獨立，藏人也不用擔心西藏的廟。』

達賴喇嘛說：『我們現在要解決西藏問題，就要讓中國人放心、讓西藏人放心。』

而在西方，基於對西藏問題的關切，多年來西方領袖也多次呼籲中共，應就西藏的未來與達賴喇嘛進行談判。一九八九年一月，中國與西藏流亡政府代表曾經在日內瓦進行會談，並無任何結果。但在同一時間裡，班禪喇嘛卻在訪問西藏期間，因心臟病發作圓寂；同年三月五日，拉薩發生一連三天的示威，拉薩隨之宣布戒嚴；同年六月，天安門事件發生，中共以武裝行動進行鎮壓造成民眾與學生傷亡的不幸事件，引來國際間同聲譴責。

同樣在那一年的秋天，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中國抗議。

局勢的變化令雙方談判難有突破，直到一九九三年，達賴喇嘛曾派一個代表團到北京與中共談判，然後也曾與中國駐德里大使接觸，但達賴喇嘛說，一九九三年八月是雙方最後一次接觸，從那以後，就再沒有正式接觸。不過卻仍透過一些中國商人、歐洲人、美國人、還有一些歐洲政府，都一直與中國政府就西藏問題保持間接聯繫，但這些間歇的接觸都是非正式的，也未促成任何進展。

更重要的發展是，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最近的談話，開始將『西藏問題』與『台灣問題』合流，中國政府當局並且多次批評達賴喇嘛訪問台灣的行動是『藏獨』與『台獨』的結合。江澤民要求達賴喇嘛表態的做法令這位方與台灣建立友誼的西藏領袖非常為難。

針對此一敏感話題，達賴喇嘛在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三日接受作者訪問時說：『這個時候問題太複雜了，現在江澤民要我接受『台灣是中國一省』的條件，要求達賴喇嘛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省。而且，現在情況很難理解，江澤民說達賴喇嘛必須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省，但江澤民為什麼要這樣說，現在還不明瞭，按道理來說，達賴喇嘛和台灣沒有關係，所以從直覺來說，好像是把我推到某種糾紛與矛盾之中。』

但是，為了即早與中國正式對話，達賴喇嘛卻已宣布『無限期延期訪問台灣』的立場。達賴喇嘛說，他第一次去台灣時，在宗教方面做出了有一定意義的事，覺得很有意義。但是從台灣回來後，中國就提出了強烈的批評和指責。他當時就知道必須要注意中國方面的影響與反應，但由於中國愈來愈強硬，所以就宣布不去台灣了，這個問題早在江澤民與柯林頓沒見面前，就做出了決定，但並不表示就此冷卻與台灣的关系。達賴喇嘛說：

『由於最近幾個月我們與中國的接觸增加，也對中國政府有所期待，所以才宣布無限期延期到台灣訪問。因為我真的很希望與中國政府對話，也把與中國交往和談看得非常重要，所以如果我到台灣訪問一事會讓中國政府很不高興的話，在這種情況下，我可以不去台灣，因此才宣布無限期延期來台。』

（達賴沈思....）根據我的願望，大陸與台灣的关系、大陸與西藏的关系，這些最好不要摻雜在一起。西藏議題與台灣議題一定要分開。另一方面，西藏是在中國控制中，但是台灣不是，台灣有自己的經濟發展，但另一方面台灣與中國有相同語言、文化，西藏則是完全不同的語言與文化，這當中有些相同、有些又不同，所以我想還是分開來談比較好。現在台灣問題和西藏問題都關係到中國大陸，而且其中一個問題解決後都會影響到另一方。

一般而言，西藏問題應該是比較容易解決的，而台灣的問題比較複雜，但西藏問題指的不是要追求西藏獨立與分裂，只不過是改變一下中國的政策。

我經常想，台灣有很多忠誠的好朋友，我是一個佛教比丘，在那邊有很多對佛教感興趣或信仰的，向他們做出幫助這本來是我的責任。如在高雄我在講佛法時，當時天上下雨，但許多人還是靜靜地坐在那裡，表現他們非常的重視，由於政治的原因使我的宗教活動受到了阻礙，這是非常遺憾，很讓人痛心的。』

平時幽默如達賴喇嘛，卻在中國拋出這一記變化球後令他內心充滿無奈，達賴喇嘛從未想到，中國在『香港問題』解決後，竟會將最後的『西藏問題』與『台灣問題』牽連在一起，達賴喇嘛在接受作者訪問時最後談到：『有時候連說實話都是不允許的，也沒地方說，因為這件事不僅僅是我一個人的事，還關係到六百萬藏人，現在我正處在一個非常微妙的狀態。』

此刻，『台灣問題』與『西藏問題』均處在未決的關卡上，就台灣問題而言，儘管台灣島內民眾為了統獨論戰爭執不休，進而激發嚴重的國家認同矛盾，但至少還有台灣這塊土地可以安身立命；而對流亡藏人而言，同樣也陷入統獨兩個觀點的爭執中，就算追究出百年來的獨立意識均因中國侵略而起，是因為槍桿的壓迫才產生獨立意識，但流亡依然是難以改變的命運。

一九九七年藏曆新年過完不久，一場流亡藏人在印度境內的遊行活動，在走了幾個月的歷程後，終於抵達終點站一流亡政府所在地達蘭沙拉。西藏人站在街道兩旁熱烈鼓掌歡迎，人人口中喊著藏語的『吉祥如意』，他們個個穿著藏服，胸前披著白色哈達，喇嘛頭上也戴著寫有『FreeTibet』的帽子。這五百多個僧侶與西藏人穿越印度各地，宣傳西藏問題。

西藏獨立一直是一個敏感的政治議題，雖然達賴喇嘛已經放棄了西藏獨立的主張，但是西藏最大的政治團體『青年會』，至今卻依然堅定主張西藏應該獨立。

與世界其他國家青年會最大不同的是，成立已有二十七年之久的青年會，參加成員並不限於青年，只要是西藏人，為了西藏獨立，都可以參加這個組織，因此在青年會中從十六歲到九十歲的人都有，成員包括男女老幼、僧人與尼姑都有，西藏流亡政府有不少幹部在擔任公職前都是青年會的會員。

但到現在，青年會卻有若干的政治主張與達賴政府不盡相同，最明顯的便是關於西藏獨立的問題。青年會秘書長央金卓嘎提到，西藏政府對未來立場已經出現變化，但是青年會從一九七〇年成立以來都堅持西藏必須獨立。

央金卓嘎指出，達賴喇嘛是西藏人的國家元首，青年會絕對尊重達賴喇嘛，雖然達賴放棄了西藏獨立的立場，但是達賴並沒有要他們也改變自己的觀點，他們也可以抗議、表示不滿。她認為，達賴改變立場是從國家整體來考量，但是青年會堅持自己的立場，則是從團體的角度出發。

有關『西藏獨立』與『台灣獨立』為中共所聯想一事，央金卓嘎認為，台灣人有主張獨立的權利，但台灣人至少有自己的土地，也偏居一處，相較之下，西藏獨立卻更為迫切。西藏人在西藏面臨大量的中國移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反而變成少數民族，十三歲以上的婦女也被進行避孕或結紮，以控制西藏人口的發展。在印度的西藏人在別人的土地上生活，因為達賴喇嘛在這裏，人心才會比較安穩。

央金卓嘎表示，在波士尼亞、以色列等土地上發生的悲劇，全世界都可以透過報紙、電視看到；西藏人所受到的苦難並不亞於他們，但全世界認識到這些的並不多。西藏文明正在面臨滅亡，關於此點外界只有透過達賴喇嘛的訪問而有一點點認識，很少人了解西藏人要求獨立的緊迫性是遠高於台灣人的。她更希望台灣人能了解西藏、認識西藏的苦難、支持西藏人民，現在正是西藏人最需要支持的時候。

做為一個西藏青年，對於國家處境有何種感受？央金卓嘎說，她們這一代藏族青年都是在印度出生，沒見過自己的家鄉、自己的國家，她們在流亡中成長，這一生是很不幸的。如果西藏人可以獲得自由，她一分鐘也不想待下來，馬上就回西藏，不管別人怎麼說，那才是她的家、她的祖國。

央金卓嘎說：『每天早晨一醒來，我就想到自己是一個流亡者，想到沒有自己的祖國、沒有自己的發言權，在這裏寄人籬下，自己的同胞都在受罪，想到這些就很傷心，絕大多數青年都是這樣的。』

央金卓嘎話沒說完，就忍不住掩面痛哭，負責翻譯的達瓦才仁也跟著難過流淚。這樣的眼淚與委屈，說明了獨立思想之於藏人是多麼宿命與無奈。

不知當外界永遠只在『西藏應不應該獨立』的歷史論證與意識型態上吵嚷不休時，可曾想到，此刻西藏人正在落淚？

第十四章 流亡者被放逐的悲哀

流亡後的藏人在別人的國家寄人籬下，目前多數流亡藏人在印度、尼泊爾、不丹等國定居下來，西藏是他們朝思暮想、卻又回不去的故鄉。被放逐的悲哀，讓流亡藏人感受到亡國之痛；而無法扭轉的流亡命運，卻在藏人篤信佛教的平靜心靈中，掀起陣陣驚濤駭浪。

藏人洛桑諾布說：『現在我老了，再也無力為民族效力了。』他說話時神色黯然，年歲已大的他，現在只能在老人院中等待佛陀最後的召喚。

而老人院另一四水六嶺老戰士洛桑更秋，原來是個和尚，卻一生都在當兵，沒想到臨到老時卻只能在印度做個流亡者，和尚沒當成，仗也沒打成。洛桑更秋難過地說：

『後來要在印度建立西藏兵營，我們在修公路時，然楚阿旺派人去兵營，我報上名了，共有八十個人一起入伍，一起被送到德拉東的藏人兵營中，說是要學習六個月，然後再送回西藏去。大家一聽都高興得鼓掌，總算等到機會，三年路算是沒有白修，現在終於有機會去打仗了。這六個月大家學得非常刻苦，後來七個月、八個月一直等下去，隨時準備出發，沒想到整整等了廿年，但一直沒有得到機會。

我們還是一直等，希望有機會回到西藏打仗，人們都說我們有機會，印度教官每天問我們：『你們想不想恢復自己的獨立啊！想回去就好好練。』他老是這樣說，老是埋怨說為了我們這些西藏人才在這裡提供拳打腳踢，這些都是為了你們西藏。

我也覺得這是為了我們西藏，於是拼命學習。我在西藏就會用槍，後來開始學英式步槍，有很多種，子彈可以通用，我都成了教練。後來美國和印度關係好了，美國支援很多槍，我又開始學習美國的武器。美國和印度關係不好後，印度和蘇聯關係好，蘇聯的武器又來了，我又開始學習俄式的。後來印度又學習俄式的造了自己的步槍，我又學這些，什麼都學會了。

但學會時人也老了，沒機會了。』

目前流亡藏人在印度、尼泊爾、不丹都建立了不少藏人定居點。由於印度收留了約廿萬的流亡藏人，不同省份都騰出了一些土地給西藏人，在南部的卡那塔卡省並且撥出了最多的土地，現在有很多西藏人聚集在那裡。印度成為除西藏以外，西藏人人數最多的地方。

藏人流亡到印度後，首先就是要先活下來，但他們過去生活在海拔幾千公尺以上的高原上，現在卻突然來到亞熱帶燠熱的地區，很快就死了很多人。而活著的卻多數妻離子散，親人在西藏還沒有逃出來，而且生死不明，內心有著極大的痛苦。

流亡藏人身在異地，儘管達賴喇嘛聲望崇隆，但流亡社會仍必須面臨微妙的國際政治關係。幾千年來西藏一直介於中國與印度兩個大國間，這個地理上的宿命在印度收留藏人流亡政權後，三角關係更形複雜。

過去中國與印度從未發生戰爭，但自一九五九年中國在西藏進行軍事鎮壓後，不久中國與印度便發生了軍事衝突。一九六二年，印度對中共邊境發動攻擊，隨後釀成激烈的領土戰爭，雙方在戰爭中都是為了爭取西藏的土地。目前雙方在邊境各佈重兵，西藏流亡政權是兩國間一個未決的難題。

印度北部的達蘭沙拉是西藏流亡政府的根據地，也是藏人社會中政治意味最濃的地方。由達賴喇嘛所領導的流亡政府，四十年來在印度、尼泊爾、不丹等國家安置流亡藏人。因為達賴喇嘛駐守在這裡，更使得素有『小拉薩』之稱的達蘭沙拉，成為大陸西藏人民投奔逃亡的精神堡壘。

從西藏穿越喜馬拉雅山到尼泊爾，然後再坐車到印度拜見達賴喇嘛，是很多西藏人此生的心願，也是到目前為止西藏人最主要的一條逃亡路線，但這條路上卻佈滿了西藏人無數的血跡。一九九七年過年期間，有一支二十七個人的逃亡隊伍一路從拉薩過來，還沒踏上尼泊爾的土地，就有兩個孩子與一個女尼死在半路上，還有三個喇嘛因為嚴重凍傷已被送到醫院做截肢手術。但即使天候、路況、尼泊爾士兵都是如此險惡，卻依然無法阻止藏人來見達賴的渴望。

因為達賴喇嘛在這裡，因此無數的藏人都想來到這裡尋找國家的影子、活佛的愛！

一直到今天，依然每年都有不少西藏人陸續從西藏逃出來。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秘書長丹巴才仁提到，在尼泊爾，每年都會有幾十個小孩在窮山僻壤中凍死，更多的人被凍傷，必須做截肢手術，逃亡者有一半是十八歲以下的青年，即使路程險惡，還是要逃過來。

尼泊爾接待站工作人員旦巴格桑也指出，根據他們的統計，平均每年逃出來的西藏人約有二千五百人。而他們吃飯及坐車到印度見達賴共七百五十元尼泊爾幣的經費，完全由『聯合國難民高專』支付。

而在達蘭沙拉的藏人接待站內，陸續有一些西藏人進來借住。裏面張掛著達賴喇嘛的照片，他們說這是達賴喇嘛讓他們住的地方。一個持中國護照來印度的老藏人說，他花了四、五千元人民幣才弄到護照：『為了要見達賴喇嘛，我已經等了三十八年了。』這名不敢說出真姓名的老藏人說，他還要回西藏去，裏面想來的人很多，但有些人拿不到護照沒有辦法來，也有很多人雖然拿不到護照，就越山逃跑。

接待站中還有一對裹在棉被中衣衫破舊的老夫婦，他們來達蘭沙拉的目的是探親。這對還要回西藏的老夫婦說，他們持護照只能到尼泊爾，到印度中國政府是不給簽證的。而從西藏到尼泊爾一共有十五個關卡，每一個關卡都要收錢，給錢後才會放人。老先生說，老太太已經離死不遠了，在這之前，最後的期望是要來拜見達賴喇嘛，對藏人來說，這是臨死前的準備工作。

達蘭沙拉接待站代主任阿旺諾布指出，來到接待站的西藏人不論是在外表或肉體都疲憊不堪，也都受到很大的創傷。這裏會免費供應他們食物，如果國外救濟的衣服夠多，就能每人都發。

在印度北部達蘭沙拉已經略嫌窄小的街道兩旁，有著各式小吃攤販，忙碌的商人正是抵達印度的新逃亡者，從一九八八、八九年中國邊境駐軍撤守後，他們想在這裏找一個新的家。

九五年時奔措跟著父母、一路通過雅魯藏布江上游逃了過來，一過來首先就去見了達賴喇嘛，到現在都沒有再回西藏的打算。但是，在印度的生活卻是另一場艱苦。她指出，在這裏只能靠做涼粉、包子過活，沒有別的營生辦法，每天的營業額大概是印度盧比五、六百元（一九九八年間，四千三百元印度盧比約等於一百元美金）而已。

也是街頭小販的才巴喇嘛為了生活也來做買賣，為了不讓人認出，他戴了頂帽子好遮住自己的和尚光頭。他說和尚也要自力更生，他從一九八七年非法來到這裏後，一直到三年前寺院才幫他弄到一張合法的難民證，成為合法的居民。才巴喇嘛說，非法期間也沒有人來查過，但是他還是覺得合法比較好。

藏人嘎嘎在一九九三年從西藏逃了出來，因為出來的晚，西藏漢人多了，他也會說簡單的中文。嘎嘎說，文化大革命時，他的家因為是地主階級，包括父親、舅舅、哥哥等八個人都被打死，他自己也被勞改了十二年，現在在西藏已經都沒有親人了。

流亡也製造出西藏孤兒，在達蘭沙拉西藏兒童村，就有不少的西藏孤兒。他們的父母不是過世了，就是還留在西藏，他們個人隻身在印度，十歲的女孩白瑪秋卓很小時父母就過世了，她也沒有別的親人。今年十三歲的蓬措久美為了學習英文與藏文，自己一個人留在印度。

問他是不是想媽媽？他想想後，點了點頭。

而在學校內一個育嬰房間，佈置有很多破舊的洋娃娃，裏面住的很多是西藏來的孤兒，這裏的托兒所主任德跡著瑪指出，她也弄不清明確的數字，只知道現在的西藏產生了很多的孤兒，她們在這裏便儘量像個父母一樣的照顧孩子們。另一個工作三十多年的阿瑪措莫說，孤兒是各地送來的，因為這些孩子沒有父母，她自己就裝成父母，去盡到做父母的責任。

從西藏來的女尼丹增更桑流著眼淚控訴說，達賴喇嘛就像是她們的今生父母，孩子當然希望找父母，來這裏主要是想見他，想接受他的教誨，路是不近的，但是她們都從西藏來到這裏，而且不管是生是死，都要來依賴達賴喇嘛，而且，達賴也是她們來世的佑主。

西藏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多少罪？丹增更桑說，文革時她被指控是達賴反共集團的家屬，說她沒有交待清楚，於是她就要經歷太多的挨打與挨鬥。現在她也已見到達賴喇嘛，算是此生有福氣的了。但很多人卻沒有看到，西藏人是愈來愈辛苦了，現在在西藏還有很多人在監獄中，誰都應看到西藏人正在受苦，西藏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在一九八五年逃到達蘭沙拉的洛桑德跡說，她能夠出來感到很幸運，在這裏因為有達賴領導，西藏人好像死而復生，又好像自己又活過來了。

也一樣從西藏逃出來的普布喇嘛說，因為他知道很多西藏人的悲苦，所以他覺得這個世界沒有意義，在西藏因為寺院的喇嘛有名額限制，在寺院清理中，他被寺院趕出來，所以乾脆就逃了出來。苦難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自己是西藏人而起？普布喇嘛說，在他自己身上，爺爺死在監獄中，奶奶餓死了，父母也受了很多的罪，別人的日子也是一樣，他深覺這個世界是無常的，所以要追求有意義的事，於是在二十二歲時出了家。

但是，他也覺得，這一切不幸的開始都是因為中國人的侵略，而他們在西藏，寺院是中國人的，中國人又逼他們去做超出人力的活，不給他們飯吃的也是中國人，他當然恨這一切，因為恨，所以他跑了出來。

西藏格西強巴加措表示，中共甫入藏時，剛開始還可以唸經，但不久寺院的經文、天珠、寶石都慢慢地運到內地，到了文革期間，更開始大量摧毀寺廟與佛塔。摧毀的方式各有不同，但紅衛兵與拉薩各學校聯合，手上拿著標槍等工具，有的把佛像摔在地上，有的把佛像拉下來，或把經文放在地上踩、用腳踢，用各種方式摧毀。

而且，他們把東西分類，值錢的珊瑚、寶石都拿回去，不值錢的才摧毀。一個寺院中的佛像有的用銅、銀做的就拿走，用泥土做的就不拿走。

強巴加措說，他當時是色拉寺的出家人，寺院旁有個大廣場，他白天要勞改砍石頭，做工完回去時發現色拉寺的經典全都被搬到廣場，西藏人若不把經典搬出來，就會被捕、毆打。強巴加措難過的說，經典、唐卡都被紅衛兵燒了，寺院都是煙霧瀰漫，他看到這個景象心裡很痛苦，但也沒有辦法。

經典燒掉後，變成農田上的肥料，強巴加措在寺院的寢室，鑰匙都托別人保管，紅衛兵來時也要了鑰匙，他進去後經文佛像已被集中放在桌上，他們告訴強巴加措盲目崇拜沒有用，要他好好為自己的前途著想，強巴加措說他必須擺出和他們配合的態度，否則後果無法預料。但為了搶救這些佛教遺產，因為白天色拉寺都被包圍，根本無法出去，所以很多喇嘛就利用夜間兩、三點時把佛像用布包著，晚上爬到山頂上挖坑埋著。

另外，有些法器強巴加措在做工時就把它們和工具放在一起，在路上碰到江河就丟到江河裡，任它漂到那裡就漂到那裡，這樣總比燒掉好。

強巴加措說，對於一個出家人來說，這些法器、經典、佛像都是很珍貴的，他有一本菩提道次的經論，捨不得丟掉，工作的時候就帶著，又怕中共查戶口時被別人發現，所以只得埋在工作周圍的農田中，挖個坑埋著。但因農田土地溼溼的，經文都溼了，於是又得挖出來曬曬太陽。

但有的時候也得把經文放在家裡，不得已就放在床底下，有的時候擺在枕頭下，有的時候放在棉被內一起睡覺，所以心裡上確實有很大的壓力，若不是出家人根本感覺不到這個壓力。就這樣直到一九八零年，到目前在西藏還有這部經論，這不只是在我身上發生，很多喇嘛都有這樣的經驗。

在藏人流亡社會中處處可見大小不一的轉經塔，裏面放有佛經，西藏人從左到右旋轉轉經塔，好像自己又把經文唸了一遍，但更重要的是得到佛的庇佑。

藏傳佛教中的紅色袈裟分開了俗與僧兩個世界，雖然袈裟下依然露出屬於男人雄壯的右臂，但卻從此不得再留戀紅塵。達賴喇嘛六歲就出家，佛教是西藏千年的文化傳統，然而從遠離高原的流亡歲月起，西藏的宗教傳統一直受到批判，難免有人會問：『西藏人天天忙著唸經拜佛，根本不管政治，如何讓西藏富強？』

達賴喇嘛的看法卻不是這樣，他不認為這是西藏的缺點，相反地，達賴說：『西藏人的團結與勇氣都是來自於宗教！』

西藏人天生是個小民族，六百萬人分佈在二百五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這麼大的土地沒有公路，但這個民族卻從來沒有分裂，最主要就是因為宗教的力量。

根據流亡政府統計，每年都會有數以千計的外國觀光客到印度達蘭莎拉，他們最主要的目的是來這裏接近真正的藏傳佛教，進而了解西藏文化。這時西藏人才慢慢發覺，過去西藏人跟著中國人跑，中國人又跟著外國人跑，但後來卻發現外國人反而崇拜自己瞧不起的西藏文化時，才回過頭來珍惜西藏文化的特殊性。

過去漢人一直對藏人的某些宗教文化風俗大表不解，例如在西藏人『天葬』的死亡儀式中，會由喇嘛在死人背上劃上幾刀，然後將死者的肉體『施捨』給動物吃，在中國人眼裏卻是死無完屍、碎屍萬段；而西藏人鼓勵孩子出家當喇嘛，在中國人眼裏就算未必是絕子絕孫，也是子嗣無以為繼、對不起祖宗的大問題。

但西藏人卻普遍相信，出家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很多父母會鼓勵孩子出家。來到達蘭莎拉的這對老夫婦說，他們有一個女兒在止貢寺當女尼，還有一個兒子也在止貢寺出家。而三個留在家鄉的兒子中，也有兩個是喇嘛。老夫婦認為，年輕人當然還是當喇嘛好，他們一直很希望子女出家，現在孩子有這個機會弘揚佛法，不僅對今世有用，對來世更好。

流亡政府『西藏通訊』主編達瓦才仁也提到，每個西藏家庭幾乎都有男人出家當喇嘛。他的伯父八個孩子中，有兩個兒子出家；他的妻子的哥哥也是喇嘛，而他自己的三個弟弟，全都是喇嘛。達瓦說，他與父親衝突最大的問題，就是父親一直希望他當喇嘛，父親對他說：『你當再大的官，我都不稀罕，但如果你是個和尚，能穿著佛陀紅色的袈裟，以後能夠死在袈裟裏面，那麼我今生幸福，來生也幸福，即使是要飯也要把最好的飯送給你。』

因此，西藏政府即使被迫流亡，還是把保存宗教看成一件大事。流亡政府宗教與文化部秘書長仲日巴克珠指出，逃出西藏後首先有一千五百人的僧團和女尼的寺院在不丹邊境的巴薩一帶散佈宗教的種子，做為西藏佛教復興的根據地。然後再開始於各地定點發展，如薩迦派、噶居派祖師便在印度南部建立寺廟，格魯派也在印度南方的色拉寺建立據點，寧瑪派則在印度南北建立遍知學院，最後是苯教也在印度北部的西姆拉附近建立總寺。

在流亡政府的圖書館內，就保存有極具歷史價值的藏文版大藏經，以及部分佛學大師的專著。這些經文有的刻在木板上，有的則是手抄本。其中還包括有寧瑪派最主要的經典伏藏，目前除了流亡政府的保存外，很多地方已經找不到了。

也因為這樣，印度成為藏傳佛教保存最完整的地方。而目前在西藏，因為各寺廟有嚴格的配額制，很多人想當喇嘛都沒有機會，因此有不少人便逃到印度來尋求宗教上的皈依。三浪喇嘛就說，從一九九三年開始西藏禁止擺設達賴喇嘛的照片，一經發現就會被抓走，所以他們都不敢再留照片，但是卻偷偷保留在自己心裏。因為這樣，所以在一九九五年五月時，他就下了決心要離開西藏。

一九九一年從西藏逃到印度的坦客塔喇嘛，十四歲就出家，他當喇嘛已有十六年的時間了。他認為，對一個年輕人來說，能夠當喇嘛是最好的，這不但是他的願望也是每個人的信仰。他說：『人的世界是空的、無常的，會讓人迷惑，像在做夢一樣。』當喇嘛正是為了擺脫這些，以追求有意義的目標。然而，當喇嘛真的可以達到這些目的嗎？坦客塔認為，佛教說，至少這是一個最好的途徑。

阿旺尼麻九年前翻過喜馬拉雅山逃到印度來，最主要的心願便是當喇嘛。他說他的父母告訴他因為漢人不喜歡宗教，當喇嘛會吃很多虧，所以不要自己的孩子當喇嘛，但是他卻和三個朋友一起逃了出來，現在四個人都在印度西部出家了。阿旺尼麻說，他很想當喇嘛，因為西藏人相信當喇嘛是人生最好的選擇。

達蘭莎拉小街上剛花十元盧比把長出來的黑髮全部剃掉的若桑貢措也說，他十二歲時和八個喇嘛一起逃出來，他覺得這一生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但是當喇嘛是為了下輩子。

十五歲就出家的江永洛桑也認為做和尚是年輕人最好的選擇，他出家已經四年了，但卻認為最好可以先上學，有了一些學問後再出家。江永洛桑說，他也知道其他年輕人過的日子，也看到年輕人為錢忙，有的人去跳舞，但他並不羨慕這些，因為佛教有戒律，不允許高聲唱歌、或跳舞。

坦客塔說，他偶而看到穿著時髦皮鞋和衣服的年輕人意氣風發的樣子，難免會有點羨慕，但回頭想想：『我是個和尚，有自己的意義，那些只是外表』，這樣一想就好了。

若巴喇嘛九歲就出家，是在舅舅的帶領下當了喇嘛，當和尚已有十八年。當被問到是否曾有俗念時，他發誓說憑著喇嘛起誓，他不會想去過其他的生活，也從來不想這些事。

雖然歷史上宗教是西藏傳統，當喇嘛是人生最好的出路，但最近有若干想法已出現轉折，西藏的宗教傳統最近不斷受到批判。有些人開始擔心，西藏人天天忙著唸經拜佛，根本不關心政治，如何讓西藏富強？還有人私下提到，過去宗教確實妨害了西藏的發展，只不過過去歷史上可能是弊大於利，但現在卻是利大於弊。

印度德里西藏難民村牆上，寫有『拯救西藏』、『中國人滾出西藏，西藏是屬於我們的』等英文字樣，好幾個年輕男孩聚在一起，他們都受了教育，但是卻找不到工作的機會。二十二歲的索南說，這是他們年輕人的大問題，但是，他們卻不會想去當喇嘛。

他們指出，在他們的社會中，有很多穿著僧衣做生意的喇嘛，喇嘛也有很高的素質，但是他們想做一個平常人，這樣才可以嘗試各種工作。其中的丹增庫桑則說，他並不想當喇嘛，但仍想追隨喇嘛的精神，因為佛教仍然是他衷心的信仰。

而在德里達賴喇嘛辦公室任職的塔西旺杜認為，他從來不想當喇嘛，因為當一個俗人可以比當和尚做更多的事。他說政治與宗教是兩條不同的路，而現在唯有政治好，宗教才可能有發展，因此他覺得政治已比宗教重要。

此外，西藏政教合一，達賴喇嘛是西藏人的國家元首，也是宗教領袖，是活佛轉世，達賴喇嘛最近幾年也經常提到西藏政教合一體制的問題。達賴喇嘛說，一旦西藏人返回西藏，他個人將放棄一切政治上的權利、義務、與責任，政教將完全分離。屆時他將只做為一個宗教領袖，只管為社會謀福利的宣道工作，不再過問政治問題。

達賴喇嘛說，在未來西藏獲得自由時，西藏也將按照世界潮流接受一些政治派別，他個人將完全退出政治。

達賴喇嘛雖已放棄西藏獨立言論，改而強調『自由』、『民主』，多數藏人其實心裡難免有些失望。但，秉持著對佛教最虔誠的信仰，流亡在外的達賴喇嘛，到現在還是所有藏人希望之所繫。

尼泊爾的藏人接待中心只是一座簡陋的磚造平房，門房牆上寫有『Free Tibet』，裏面十幾張單人床平擺在一起，包括一個三歲的孤兒，睡在上面的都是從西藏翻山到達蘭沙拉來見達賴喇嘛的西藏人。

三十歲的東珠原來是一個教生物的老師，他辭去了工作，帶著老婆辛苦的越過喜馬拉雅山，一路上身上的錢都被尼泊爾士兵搶走了，走了四十天後，好不容易終於見到了達賴喇嘛。

爭著要見達賴喇嘛的人實在人太多了，什麼話也講不了。見到活佛每一個人都哭了，達賴一個個輪流送佛像和一條紅繩子做為護身符，然後達賴向大家說明他的民族路線與流亡機構的種種改革。當時好多人都哭了，達賴卻笑著對大家說：『在這裏好好學習，想回去的就好好工作。』

要告別時，達賴喇嘛以其一貫的笑容說：『將來我們還會再見面的！』

達賴喇嘛這樣說，但這些不得不回西藏的人卻一點也沒有把握。脖子上繫著紅繩子的東珠忍不住歎息說：『很辛苦，做一個西藏人。』